歷史的臍帶

東南亞建築與生活

賴啟健



歷史的臍帶

東南亞建築與生活

賴啟健——著



前言

二〇〇〇年，我在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攻讀博士學位，這個時期我開始了我另一段的學術論文寫作。這些學術論文一開始是為了學業上的需要，但從中得以拓展我對各種社會政治建築與景觀歷史的理解。這些積累，最終構成了我的學位論文規模，即比較新加坡、馬來西亞和其他東南亞國家的殖民和獨立時期的建築。畢業後回到新加坡，我繼續為不同的書籍和學術期刊供稿。這本集子收錄的二十篇文章，多數沒有經過刪減。幾個在論文中討論的概念和案例是相同的，或在不同的論文中重複，因我對其有更進一步的瞭解和書寫。

這本文集收錄的篇章不以寫作時間排序，而按類別分為四輯。輯一（第一至第六篇）探討了東南亞在理論、歷史編纂、生物地理學和熱帶地區的不同面向；輯二（第七至第十三篇）討論了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特定空間歷史；輯三（第十四至十八篇）我嘗試通過歌曲、電影、

藝術和壁畫來研究文化的作用，輯四（第十九及第二十篇）考察了國家民族形成的時刻，其首都城市、周邊地區及整個世界之間相互關聯的建築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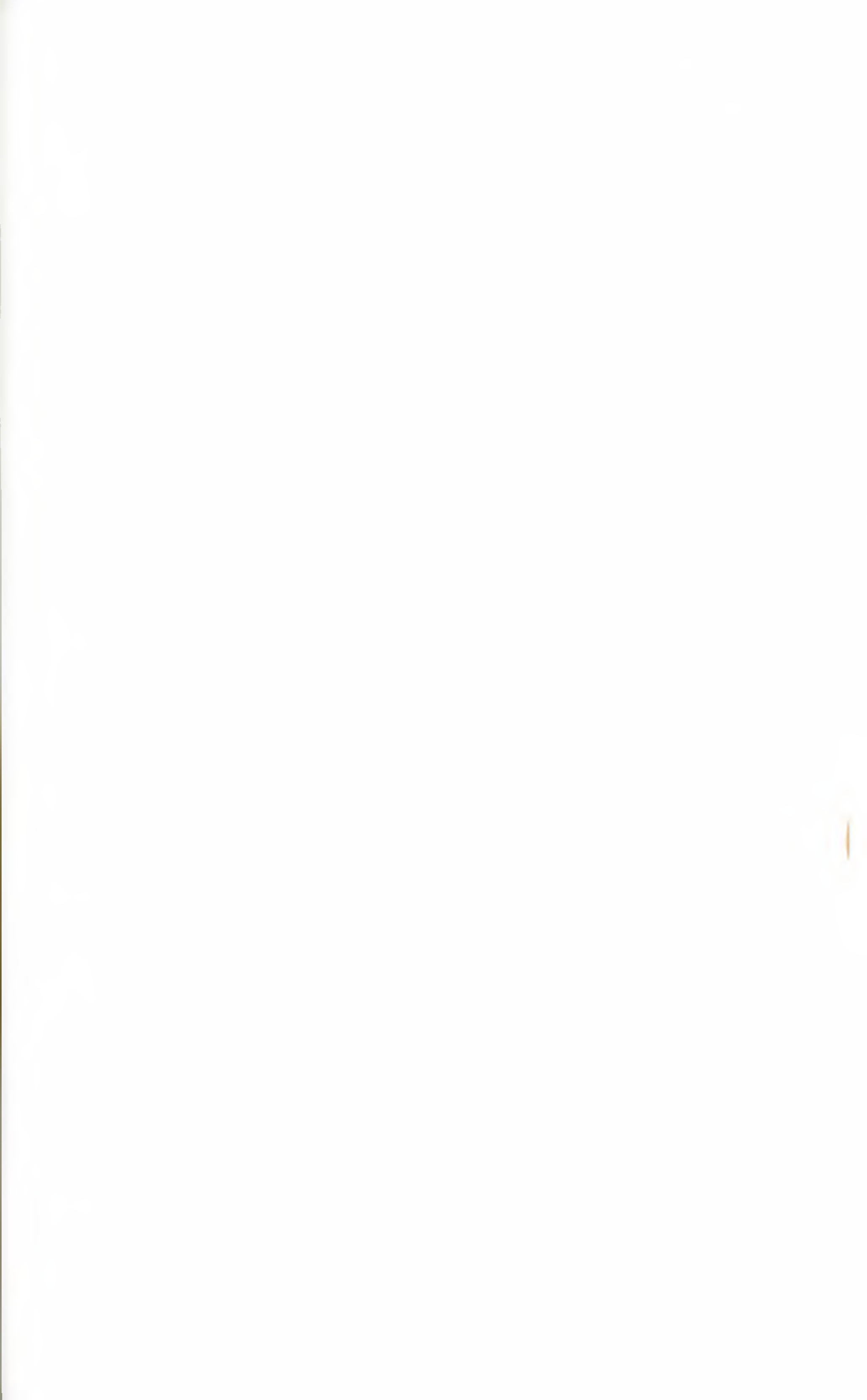
這本書的題目「歷史的臍帶」表明了我的歷史觀：我認為歷史是由一條繩索（臍帶）連結過去與現在。當這些線索（臍帶）產生連結與綁定作用，便有助於我們理解和闡明想法、立場和身分。連結越多，就越能瞭解我們目前居住的環境和時代。我要感謝與我一起走過這些學術研究旅程的朋友、同事和學生，沒有他們的慷慨和志同道合的情誼，這些文章不可能寫成。

感謝台灣國立成功大學建築學系的出版補助金，感謝林韋地和高慧鈴協助本書的出版，同時要感謝為本書做翻譯工作的全體翻譯員。謹以此書獻給我的父母賴耀彬與陳愛洋，以及我的妹妹藝珊和麗紅，感謝他們給予我的愛與關懷。

目次

輯二 新馬篇

輯三 文化研究



輯一　東南亞篇



東南亞理論的實驗性應用

這篇論文寫的是關於我在新加坡和美國修讀建築學時，從個人視角嘗試解讀東南亞建築和城市的故事。最近幾年，我總是盡力向學生介紹所學到的理論，甚至把這門講解擴大成一場實驗，我覺得每一場建築學或城市歷史的討論都必須具備理論基礎，而把這些理論轉化成一個個概念來闡述，可能會比較易於理解。所謂的「東南亞理論」，是指那些已經被我們深深接受的不同光譜對於空間和社會的見解和觀念。這些見解和觀念都是完完全全發源於東南亞的，或是研究東南亞後而引發的理論。當然，或許有更多類似的理論沒有被我提起，但以下的六大理論，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

英國建築師巴尼斯特．弗萊徹（Banister Fletcher）曾經用樹的形狀來解釋世界建築譜系的「建築之樹」理論。不管是新加坡乃至全球的建築系學生，我們對於建築學史的認知都來

自弗萊徹所撰寫的《弗萊徹建築史》（*Sir Banister Fletcher's: A History of Architecture*），但是我沒多久就發現，從一八九六年開始，不管是弗萊徹本人還是後來的編輯們，都沒有把東南亞建築的部分編進書裡，直到一九九六年出版的第二十版才終於加了進去。而在那之前，我們只能各自構想自己的東南亞建築理論。一九九三年到九六年間，我在新加坡國立大學完成我的碩士論文，研究的是西蘇門答臘的民間建築，指導教授是賓納・印多夫博士（Dr. Pinna Indorf），後來在二〇〇〇年到二〇〇五年間，我得到一份獎學金去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完成我的博士學位。那裡與世界高度接軌的環境，極大地形塑了我現在的學術觀念和想法。當時我的副科是在柏克萊大學的南亞與東南亞系修讀的。雖然那裡專研東南亞的講師和教授以及校裡的東南亞研究中心對我影響深刻，但是我當時對他們的後殖民研究，或者所有形式的東南亞研究，都有點失望。這是因為在柏克萊大學，南亞籍的後殖民研究者，不管是人數還是獎學金贊助的方向都是最多的，所以他們在評論那些殖民者方面擁有很大的話語權，也無形中給其他後殖民國家的研究者設立了以南亞為先的排位，而其他地區的研究只能處在一個微不足道的地位。我也意識到，在美國創建和支持的東南亞研究中，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地位遠遠落後於印尼、越南和菲律賓，因為美國在二戰後對這些國家的政治介入，造成了對這些國家的研究偏向。

我最近在東南亞學者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自傳《椰殼碗外的人生》

（*A Life Beyond Boundaries: A Memoir*）中，讀到美國的東南亞研究歷史。這本書的「區域研究」章節裡，提到了美國的東南亞研究框架是怎麼被創建和形塑起來的。安德森在書裡提到東南亞的複雜性時，是這麼說的：

> 「……東南亞這個概念……可以說是自成一格但卻很難在現實中找到。八個極為不同、各有疆域的國家；集齊了穆斯林、佛教徒、天主教徒、道教徒；十六世紀被西班牙殖民、十七世紀被荷蘭殖民、十九世紀被法國和英國殖民、二十世紀被美國殖民而暹羅淪為英國的半殖民地；大量的重要文學著作用了互不相通的語言寫成：緬文、泰文、高棉文、越南文、菲律賓他加祿文、馬來文、爪哇文、古爪哇文、梵文、阿拉伯文等等。」

如果要追溯一條可靠的歷史編纂時間線，比如東南亞歷史是怎麼寫成的，我們可以從東南亞歷史學者維克多．李伯曼（Victor Lieberman）於二〇〇三年出版的《形異神似》（*Strange Parallels*）第一冊裡找到答案。他這本書裡提到東南亞的書寫分為四個時間段：外來時期、自治時期、貿易時期和他自己主張的第四個時期。在外來時期中，李伯曼描述了當中國、印度或西方殖民者等外國勢力殺來時，如何啟動了原本寧靜且被動的東南亞，這時候的歷史作者自然是從外來者的觀點來看待這片區域及所發生的事。但是從一九三〇年代起到一九八〇

年代末，便有很大一股趨勢，試圖從在地人和對當地有利的角度，來深入撰寫東南亞歷史，但結果卻是個別地區或國家的歷史過多，埋沒了整個區域間可能有的聯繫。接下來的第三個時期，據李伯曼的說法是貿易時期，主要從東南亞史學家安東尼．里德教授（Prof. Anthony Reid）的理論而來。但是李伯曼反而認為，儘管當時的歷史記載開創了新的學術觀點，把整個東南亞例如殖民前城市生活風貌、貿易模式及價值等等的思想連結起來，這些學術觀點卻只和依賴航海貿易的東南亞島國（Island Southeast Asia）有關，與東南亞大陸國家（Mainland Southeast Asia）所發生的事幾乎大不相同。而他自己主張的第四個時期，則試圖把東南亞大陸和歐亞大陸聯繫起來，為那個時期沿用了相異但相通的歷史敘述。

安德森那本書的「區域研究」這一章和李伯曼所提出的「四個時間段」理論，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基礎或起點來瞭解東南亞研究。在這些基礎之上，我相信這足以讓我們從研究東南亞的學者們所提出的理論中，完善我們對東南亞的理解和應用。我要分享的六個理論中，第一個就是東南亞社會有如銀河系政體一樣的政治體系（galactic polity），因為東南亞各社會政治體系裡正是有一個中心點，被或複雜或簡單的社會組織環繞著，緊緊環繞著中心點轉動，就像是銀河系裡的行星一樣。這個比喻貫通了東南亞社會的宇宙起源學、地形學、政治經濟學的相互結合。這個中心點是由一個權力非常大的人所啟動，激起一股很強的離心力發散到周邊，而擁護者和百姓們則帶著各自的向心力服從著這個中心點。或者再打個比方，這

個作用力也可以比喻成雨水所產生的漣漪效應，一個很強大的統治者製造了一陣很大的漣漪，但當漣漪漸弱，他的權力或聲望也隨之減弱，如果這時候有另外一滴雨水（即繼承人）再度打中中心點，那麼這個統治力量就會如同漣漪一樣能夠綿延下去。就這樣，我們可以像理解其他政治體系那樣，理解東南亞這片區域被殖民前的政治局勢。我們今天看到的國家形態，就是把這些政治體系結合在一起的成果，泰國歷史學家通猜．威尼查恭（Thongchai Winichakul）則把這些體系的地理形狀稱為一個國家的「地緣機體」（geo-body）。

這個「銀河系政體」理論可以用來解釋東南亞特有的神王（Devaraja）崇拜概念，或也可以解釋我們在政治人類學研究中稱為「大人物相對小人物」的理論（big man - small man theory）。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這個概念是如何體現在當時東南亞的建築構造、景觀設計或城市規劃中。那位「大人物」（或神王）被一層又一層相互間有聯繫的關係網所包圍籠罩，權力再從這個關係的中心發散出來，構築成當時的官僚體系。

大約從十六世紀開始，東南亞「銀河系政體」時代便在西方列強的殖民擴張中戛然而止。當時西方殖民者在東南亞各國殖民勢力劃分，後來也被日軍侵占（有人說是殖民）。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除了曾組建印度支那的三個國家（寮國、柬埔寨、越南）和獨自建國的汶萊以外，其餘國家的幅員大致上都遵循了西方殖民者劃定下來的邊界。

如果要瞭解這些「銀河系政體」怎麼在漫長的殖民過程中一步步瓦解，那我們該參考

專研東南亞地理的泰利．麥吉（Terry McGee）在一九六七年寫成的《東南亞城市》（*The Southeast Asian City*）一書。他在這兩張地圖裡清楚地描繪了「銀河系政體」在殖民化後被轉換到什麼形式，或被安置到哪一些殖民港口城去。我們可以意識到這些古老的中央王權是怎麼被殖民勢力調配到有利於殖民者搜刮資源及將資源運輸給買家的位置上。接著殖民者開始建造鐵路、道路等基礎建設以支援源源不絕的貿易活動，藉此取代了「銀河系政體」和安東尼．里德教授所述的貿易時代。這些殖民港口城相互連結成一個網路，具備堅實的基礎建設，撐起了當時全新的殖民貿易時代。

要理解在殖民統治下的社會樣貌，我們可以翻閱著名人類學家傅乃華（J. S. Furnivall）的一系列著作或直接鑽研「多元社會」（Plural Society）這個概念。傅乃華在殖民時期為緬甸的殖民政府工作，但批評起政府時卻絲毫不手軟，就像荷蘭殖民政府官員愛德華．道維斯．戴克爾（Eduard Douwes Dekker，筆名莫爾塔圖里〔Multatuli〕）在《馬格斯．哈弗拉爾》（*Max Havelaar*）一書中批評荷蘭殖民政府那樣。他也是第一個在緬甸與印尼間做比較研究的學者。他認為，儘管殖民統治讓貿易勢力得以大行其道，但這樣的繁榮卻是建立在撕裂當地人之間的聯繫、安置多元種族於其中卻不加以整合容納的犧牲上。雖然有貿易場合或市場讓不同種族的人可以齊聚一堂，但是場合裡所有人的階級卻已經固化不移，各個種族——原住民、華人、印度人、歐洲人出任不同階層的勞動力、發揮不同的功能，各自族群中再分別以特定的

職業為生。即使他們分屬各自的板塊，一同生活在同一個殖民政權下，卻是各人自掃門前雪，堅定秉持著各自的信仰、文化、語言、思想和生活方式過活，無形中創造了一個只容許外來政權統治的空間秩序。

我們可以從建築史學家格溫多琳．萊特（Gwendolyn Wright）對法國殖民地的空間研究中，利用「同化」（assimilation）和「融入」（association）這兩個概念，來瞭解殖民政府的空間政策。這兩個概念在法國殖民理論的論述中第一次被提出，用來討論當時法國殖民政府如何在施政及文化上以法國為主題的方式去吸納殖民地及當地居民，以及怎麼用法國自身的建築設計和城市規劃來同化他們，使殖民地人民成為法蘭西帝國的其中一個主體。

一直到接近十九世紀末期，這種同化政策才漸漸被融入為主要概念的政策取代，殖民政府開始用與殖民地文化相近或相同的建築特色來與當地人產生連結。這種間接與當地人締結聯繫的行政方式，開銷上較為廉宜，一些管理職位也會選拔當地菁英來出任，只不過宗主國依然牢牢握有絕對的掌控權。

除此之外，同化政策也被運用在城市規劃中。眾所周知，荷蘭殖民政府硬是在當時被改名為巴達維亞（Batavia）的印尼雅加達鑿出一條運河，只因為他們想在東方打造另一個阿姆斯特丹；法國則在越南金邊及其他印度支那城市重現了拿破崙三世期間奧斯曼男爵設計的大道風格。後來，這些殖民者對同化政策既生硬又直接的態度軟化了下來，改由融入政策取而代之。

另一個由同化轉為融入的例子，就是吉隆坡和新加坡的大草場（Padang）周邊的一系列建築物。在一八〇〇年代早期，毗鄰新加坡政府大廈大草場的建築群，簡直像是直接從倫敦搬過來的一樣，這是實施同化政策時期的建築風格；到了一八八〇年代，英國殖民政府在吉隆坡興建獨立廣場和前方那片大草場時，便要求馬來統治者們接納英方在印度研發的伊斯蘭教建築風格，作為與當地統治者產生連結的嘗試。

有一點我們必須注意的是，殖民主義的確造成了明顯的不平等，特別是在宗主國與殖民地之間。兩地之間的這層聯繫雖然直接但卻是強迫所致，因此班納迪克．安德森把這種不平等稱為殖民主義的倒像望遠鏡——雖然在兩地間直接投射出顯明易見的形象，焦點也都有對準在兩端，但兩端被覆蓋的關注範圍根本不均勻。若把宗主國和殖民地的社會經濟領域、教育和硬體建設等各方面配對作比較的話，都可以觀察到這種現象，而且也因為同時間有不同的殖民勢力分布在東南亞各個區域，所以也產生了多部不同的倒像望遠鏡。

最重要的是，這樣的倒像望遠鏡也深刻影響了兩地人民的思想和心理，這是法國作家弗朗茲．法農（Frantz Fanon）首先提出的觀察。而班納迪克．安德森的《比較的幽靈》（*The Spectre of Comparisons*）一書，書名靈感也來自菲律賓民族英雄扶西．黎剎（José Rizal）的名著《不許犯我》（*Noli Me Tangere*），這裡截取書中一段：「眼前這片（馬尼拉）植物園的景象奪走他所有歡樂的回憶：有一隻比較的魔鬼（或幽靈），把他置在歐洲那些揮灑大

把黃金和精力只為了讓嫩葉抬頭或花苞綻放的國家的植物園前，讓他看到這些植物園有多麼富裕、多麼被妥善照顧、多麼慷慨地開放予所有公眾。伊巴拉從凝視中回過神，望向右方，映入眼簾的是老舊的馬尼拉，依然被古老的城牆還有護城河圍繞著，像個萎靡消沉的少女，身上還穿著奶奶在最輝煌的時代穿過的那件裙子。」小說裡的這段情節，是在描述主人公伊巴拉剛剛從西班牙馬德里回到菲律賓馬尼拉，站在馬尼拉植物園前面，絕望地意識到歐洲與菲律賓之間的天淵之別。在這個例子中被用來比較的物件是兩地植物園的景觀，正向我們證明了比較的幽靈確實在同時間評價兩個相似的空間類型時產生。

無獨有偶，這隻比較的幽靈也以另一種面貌出現在其他小說作品中，例如印尼著名作家普拉姆迪亞．阿南達．多爾（Pramoedya Ananta Toer）的名著《萬國之子》（*Bumi Manusia*）中，也作了一番比較：「眾神摯愛的（威廉明娜女王）跟我（明克）一樣都是十八歲，我們同樣在一八八〇年出生，……出生日期和月份也一模一樣：八月三十一日。……當我的小島（爪哇）被黑夜覆蓋時，她的大地正受陽光普照；而當她的國家（荷蘭）被黑夜籠罩時，我的島國就在赤道的豔陽下熠熠生輝。」「她的出生年月日讓占星師有機會把她培養成一個女王而把我伏低為她的子民，與此同時她從未知曉我曾和她一起來過這個世上。」

試想像當我看到我的一名菲律賓好友保羅在二〇一二年發布的臉書帖子時，那難以言喻的心情。這位朋友的帖子是這麼寫的：「早安臉書世界，這是我從新加坡濱海灣金沙酒店的

某個房間望出去的景緻，面向我們的是昨天才剛大張旗鼓開幕的濱海灣花園，還閃著全新的亮光，現身在各大報章頭條上。這座占地一百公頃、斥資十億新幣打造的綠地正體現什麼是全球頂級的生活品質，也毫無異議地反證了為什麼新加坡這座花園城市吸引的遊客數量足足比菲律賓舉國多出七倍。新加坡政府在綠色基礎設施上花的錢跟花在高樓與大道之類的硬體設施的錢一樣多，我們什麼時候才能學到他們的做法？」對我來說，這則臉書帖子也是類似比較的幽靈的化身。

保羅的這番評論，是我要提出來作為繼發性比較的幽靈的最好例子，這種比較心理是基於菲律賓和新加坡兩國共有的殖民歷史而誕生的。有趣的是，在這個例子中被比較的幽靈纏上的也一樣是綠地景觀，只是這次被比較的主角是新加坡，上一個例子則是剛才我們講到的班納迪克．安德森《比較的幽靈》那本書裡說，伊巴拉比較馬尼拉植物園和馬德里植物園的情節。這種繼發性比較的幽靈之所以在兩國共有的殖民歷史上誕生，是因為東南亞各國雖然同樣都有被殖民和被二戰摧殘的經歷，但所遺留下來的發展潛能卻大相徑庭。而這次被倒像望遠鏡聚焦比較的對象不是殖民者，而是同個區域內的前殖民地，因而形成了繼發性比較的幽靈。

二戰結束後，東南亞各國開始積極爭取獨立，而他們別無選擇，一定得加入聯合國，因為只有聯合國握有一套定義民族國家或獨立國家的標準。特別是在劃分何為發達國家、何為發展中國家的那套標準中，更是為所謂的不發達國家制定了逐步現代化與工業化進程的要求，

來滿足這些標準。

我們之前討論了東南亞各國的「銀河系政體」如何在不同的殖民時期被降級為殖民港口城的空間變化。二戰結束後，這些民族國家又有新的表現模式。「銀河系政體」時，各國的邊界劃分相對靈活；殖民時期，疆界也隨時勢而有所變動；但是在國家體制下，每個新的民族國家都得各自涇渭分明。這只是因為聯合國規定每一個發達國家都要有明確的國境，而國境之內必須有一國之都作為國家的統治中心（通常是首都）。國境之外壤地相接的其他國家一同組成一個區域，區域之外更大的空間就是全世界了。這個同心圓的空間差異就在國家、區域和國際範圍內進行區分。

我們必須清楚在政治學定義裡的「國家政府」（state）概念，和我們之前所理解的國族（nation）、「國家」（country）的概念有什麼不同。「國家」是一個地理範圍或國土的概念，而「國族」是一群共有同一個歷史由來或想像、文化、語言、血統，並定居在某個國家或與某個國家有聯繫的人。至於「國家政府」這概念，指的是一個具有完整架構的政治機關，以代表及管理某個國土之上的廣大國民。國家政府在國土大小的影響下，與其國民之間的距離。像新加坡這樣的小國家，她的國民在日常生活中處處可以和政府機關打到照面；反觀國土比較遼闊的國家，當地人民與政府機關之間的距離甚遠，還有各級民意代表、中間管理層和官僚制度的層層阻隔，橫亙在頂層的政府菁英和底層的國民之間。

班納迪克．安德森在他一九八三年出版的著作《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中，表示「國族」這個概念極大部分是靠想像而成的，因為即便再小的國家也好，國民之間也不可能全都互相認識，但是人們卻能在腦海中把其他國民形象化為具有深厚同志情感的社會群體。在這些想像中，「國族」的概念也被認為是有限制的，因為即便是再大的國家也好，都一定會有邊界的盡頭，並擁有自啟蒙運動和工業革命時代傳承至今、打倒了神權與歷代王朝的人民主權。

即便剛才我們說的這些「國族」意識全是想像出來的，但卻已經足以引致強烈、深刻的歸屬感和影響，以至於對這些意識有強烈共鳴的人們，更願意為他們所認定的國家捨生取義。這個意識也有幾種不同的形式：一、以種族融合或斥逐某些種族為出發點的族群國族主義；二、正式的國族主義，由國家政府來定義何謂「國族」，並指導人民如何與這個定義保持一致。

我們可以再用殖民時期的「同化」和「融入」概念，來建構與獨立後國族主義時期相關的空間概念，但這次不同之處在於所有的空間和形式規劃都是由當地政府或國家政府自己做主的，與全世界互動的角度也是在不同時期從這個國族對外或對內的視角出發，要不就與全球同化以融入世界體系，不然就與國境內部的勢力和團體建立連結。加拿大約克大學亞洲研究中心主任阿比丁．庫斯諾（Abidin Kusno）在他二〇〇〇年出版的著作《後殖民時代背後》（*Behind the Postcolonial*）中，就用了印尼的例子充分說明了這一點，在該書的第二和第三

章裡，他對比了蘇卡諾和蘇哈托執政時期的建築風格。在蘇卡諾執政時期的建築物都採用了現代主義風格，以讓蘇卡諾對這個國家的願景得以放在世界舞台上一決高下，所以印尼國家紀念碑、印尼回教堂都必須按照現代風格來設計，以迎合並與世界體系相融合。尤其是在籌建國家回教堂時，蘇卡諾更發下豪言：「我們要建的回教堂，不用瓦片，而是用鋼筋混凝土……用大理石建成、用大理石鋪地、用青銅鑄門。不只是鋼筋混凝土、青銅、寶石這些材料而已，也一定要夠大氣輝煌……我們要建的回教堂，一定得是世界上最大的回教堂。」所以這裡的同化，參考的是世界的標準。

到了蘇哈托上台的時候，印尼看世界的視角就重新掉頭，以印尼群島國境內的各個島嶼及文化習俗為基礎來形塑。這種向內連結的政府宏願，體現在印尼縮影公園及多個回教堂建案上，這些建築物及空間規劃藉由重現印尼本土原有的建築風格，成為反映國族奮鬥成就的理想形式，進而把這些建築形式與民族主義的理想連結起來。從這個例子，我們可以看到同化和融入的政策是如何為國家政府重新利用，以投射一個國族的不同面向。

詹姆斯．史考特（James Scott）在寫出《國家的視角》（*Seeing Like a State*）一書以前，寫了好多本東南亞農民和起義有關的書，在書中他討論了政府插手干預的各種形式，範圍涵蓋政治、共產集體農場、農業建設甚至是巴西利亞新首都的建設。從這些政府介入的例子中，史考特證明政府推行的專案有清晰易懂、簡化的傾向，意思是，為了便於治理，政府制定了

通俗易懂的標籤和待遇類別，利用簡化的類別使治國更簡易。他也提到這些治國手段與策略如何利用人口普查、統一標準、城市設計、公共交通設施，通過農業活動重新分配自然資源等工具，滲透到社會、空間與自然資源層面。這種合理化、通俗化和簡化政策的努力，也給社會、空間和自然環境帶來很大的影響。舉例來說，在稻田內種植作物的古法，強調同一塊地種植多於一種作物的複作制度（multi-cropping）；但是從殖民時期延續至今的種植方式，卻是單一作物制度（mono-cropping），也就是在同一塊地上只種植一種作物的種植方法。

史考特認為，合理化和簡化政策的最大問題在於政府、社會制度和官僚制度永遠不能充分反映自然環境或社會變化進程的複雜性。他們所制定的類別太過粗糙、呆滯、粗淺，沒能充分準確反映他們所標榜的世界觀。所以他的論述表明了保存本土不同領域的實用知識、日常處事方法、即興創意的重要性，以留住這個社會所需的複雜性、多元性，及消除政府插手干預所造成的損害。他把這種知識保存稱為「*metis*」（「米提斯」，意為機智），這是一個源自古希臘文的詞彙，意思是知識只能夠從日常實踐中來。

史考特在書上引用了他在馬來西亞進行田野考察時發現的芒果樹例子來具體說明這種知識保存方法。他是這樣描述的：在我入住的這棟房子旁的空地上，長著一棵名滿全村的芒果樹。當芒果樹上的芒果熟了，很多親戚或熟人就會藉機上門拜訪，希望能得到幾粒芒果來吃，或更重要的是得到芒果種子，以便有機會在自己家裡也種上一棵這麼好的芒果樹。然而在我

抵達這座村莊（做田野調查）的不久之前，這棵芒果樹卻被一窩大紅螞蟻攻占了，不少果實還沒來得及熟透就被牠們破壞殆盡。接著我好幾次看見這戶人家的一家之主莫伊沙大叔，把一大把乾亞答葉拖到芒果樹下放著，並彎著腰仔細端詳。當我終於有機會問他這個舉動的用意時，他雖然對我解釋了，但態度卻有點持疑，因為他覺得這個話題比起我們平常聊天的內容實在太瑣碎無聊了。據莫伊沙大叔的解釋，他這麼做是因為他知道他家後院的那一大窩小黑蟻是這種大紅螞蟻的天敵，他也知道細薄、長矛形狀的亞答葉在乾枯後會收縮捲曲成細窄的管子形，正是小黑蟻的蟻后產卵的理想環境。所以幾個星期以來，他一直在合適的地點置放亞答葉，直到小黑蟻后產下夠多蟻卵，再把滿是小黑蟻卵的亞答葉放到芒果樹旁，隨後觀察長達一星期的黑紅螞蟻決戰。雖然小黑蟻的體型比大紅螞蟻還要小一大半，但小黑蟻勝在數量夠多，最後打敗大紅螞蟻，成功占有了芒果樹周邊的地盤。也因為小黑蟻對芒果樹的葉子或果實根本沒有興趣，也不會破壞芒果樹，芒果樹因而被保住了。

莫伊沙大叔的這個做法之所以能成，就是來自長時間觀察所有變數的過程中積累而成的一系列後天本土智慧。這種精深而有效的方法，不需要動用人為的化學殺蟲跟其他更激烈的方式，更不是位高權重的政府或官僚體系所能想出來的。

最後我想回到班納迪克．安德森的自傳《椰殼碗外的人生》的內容來總結分享，並提議我們應該響應史考特的號召，重拾「metis」這種知識保存方式。這有兩個原因，第一，我們





圖1-1：雅加達伊斯蒂克拉爾回教堂（The Istiqlal Mosqu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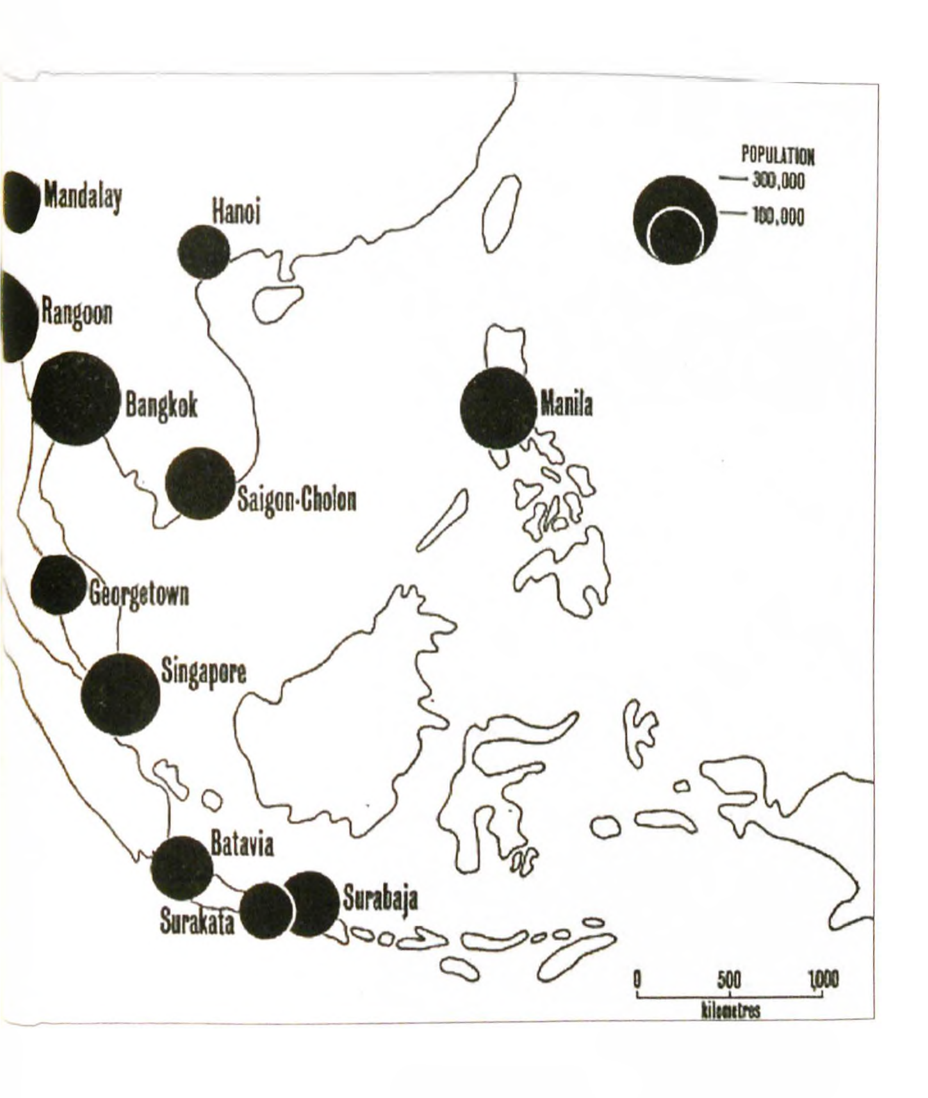
應該加以應用及宣揚從東南亞跨境研究得來的一系列理論；第二，我們也應該開始在反觀自身的同時，像安德森一樣跳脫國境邊界的限制去看別的國家。《椰殼碗外的人生》這本書的封面插圖雖然採用了「碗底之蛙」的意象，但那隻青蛙實際上已經跳出碗外。我們都知道，安德森雖然從一九五〇年代起就一直以印尼作為研究對象，但是蘇哈托在一九七二到一九八八年間禁止他入境印尼後，他就在一九七四年到一九八六年間學會了泰文，並轉而以泰國為考察對象。而從一九八八年起到他逝世的二十七年間，他又把研究目光投注到菲律賓上。如果他沒有把眼光拓寬、不懈於在東南亞各國間做比較研究，他的學術成果和理論也就不會有這麼宏大和精深的規模。我希望在這裡所列舉的這些從東南亞區域研究而來的理論，能夠證明東南亞是一塊建立理論架構的學術沃土，期望我們能對我們所做的一切東南亞研究更有信心，並能更自豪地把這些研究成果與他人分享。







圖1-2：新加坡的大草場（Padang）周邊的一系列建築物。
圖1-3：吉隆坡獨立廣場旁的建築。
圖1-4：馬來西亞昔加末的橡膠種植園（單一作物）。


POPULATION
300,000
100,000
Mandalay
Hanoi
Rangoon
Bangkok
Manila
Saigon-Cholon
Georgetown
Singapore
Batavia
Surabaja
Surakata
0
500
1,000
kilometr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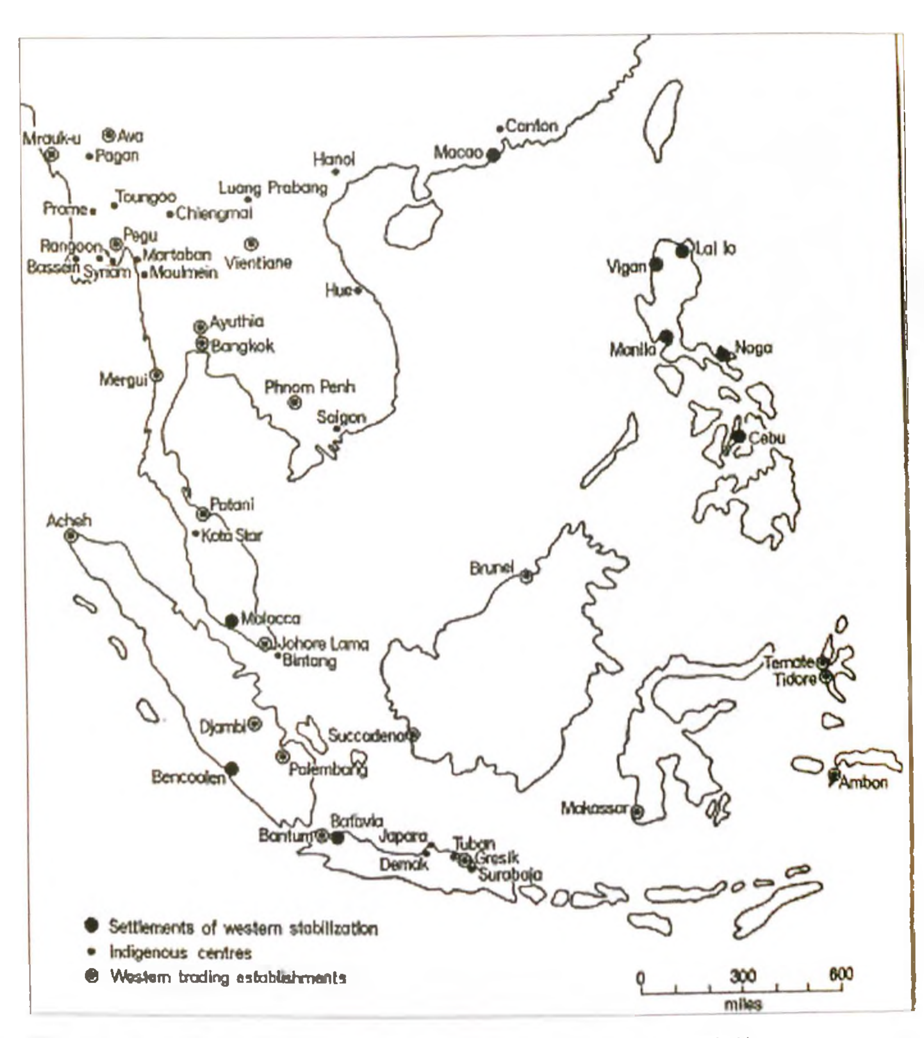


圖1-5：東南亞銀河系政體時代的城市（左）和一九一〇年左右的殖民港口城市（右）（Terry McGe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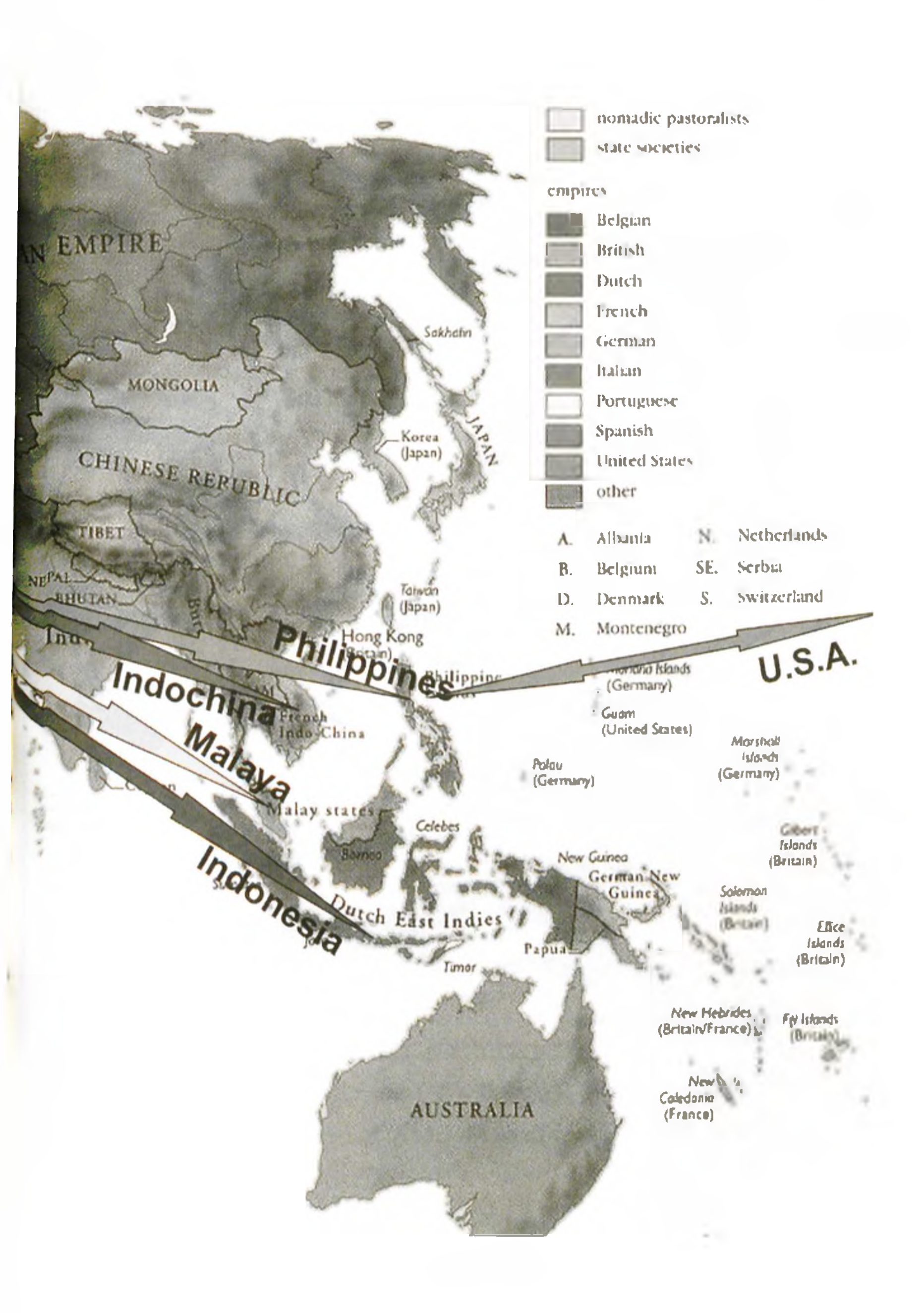

nomadic pastoralists
state societies
empires
Belgian
British
Dutch
French
German
Italian
Portuguese
Spanish
United States
other
A. Albania
B. Belgium
D. Denmark
M. Montenegro
N. Netherlands
SE. Serbia
S. Switzerland
EMPIRE
MONGOLIA
CHINESE REPUBLIC
TIBET
NEPAL
BHUTAN
Sakhalin
Korea (Japan)
JAPAN
Taiwan (Japan)
Hong Kong
Philippines
U.S.A.
Indochina
French Indo-China
Malaya
Malay states
Indonesia
Dutch East Indies
(Germany)
Guam (United States)
Palau (Germany)
Marshall Islands (Germany)
Celebes
Borneo
New Guinea
German New Guinea
Papua
Timor
Gilbert Islands (Britain)
Solomon Islands
Ellice Islands (Britain)
New Hebrides (Britain/France)
New Caledonia (France)
AUSTRALIA

圖1-6：殖民倒像望遠鏡（班納迪克．安德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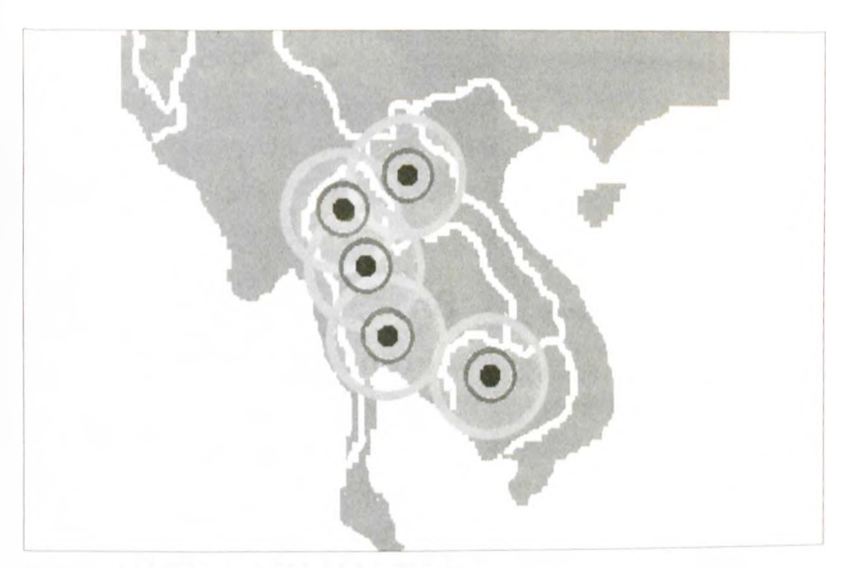


圖1-7：以神王為中心的銀河系政體模式。



圖1-8：國家、區域和國際的同心圓。

東南亞空間歷史與史學

「殖民」與「國族」（nation）的空間研究

在為數不多的東南亞建築參考書目中，〈東南亞民族、身分與建築：精選書目〉發表於《東南亞建築期刊》（二〇〇〇），圖書管理員林楊彬彬（Lim-Yeo Pin Pin）接下了劃分類別的艱鉅任務。[1]小標題下的簡短列表以「東南亞」為首，與其對應的是涉及這廣大地區的作品。

1 Lim-Yeo Pin Pin. "Nation, Identity and Architecture in Southeast Asia: A Select Bibliography". In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Architecture*, 4(2000): 73–81.《東南亞建築期刊》自一九九六年以來由新加坡國立大學建築

緊接著的作品列在個別的民族國家（nation）和其他地理小標題下。調研的出版物包括專著、期刊論文和其他文章，以此審查並即時評估完成的作品。林楊列舉了相當廣泛的作品領域，為通過空間討論東南亞提供了良好的基礎。然而，很快就發現仍存有分歧，這可能基於歷史的書寫，抑或是東南亞地區的政治歷史所致。例如，小標題「印度支那」由前法國殖民統治下的三個民族國家組列，但這當中並沒有汶萊。林楊列出的出版物範圍和數量，在她所提到的國家中也明顯參差不齊。

東南亞空間歷史學在範圍和主題上需要重新審視。理解文本產生的模式、背景和生產者的作者立場，或能讓我們更好地定位未來的作品。尤其是殖民和國族框架在這些作品中扮演的歷史角色，必須仔細研究。這兩種情況繼而影響並鞏固了各次領域的新式書寫，所指的領域與建築、景觀、城市規劃和設計相關。本文旨在評估有關東南亞地區不同形式的空間書寫，主要涉及不同時空主題、範圍和框架下的文本調查。在大量的相關研究工作考量下，它是不完整的，因為審查的資料來源主要是英語，當地或其他殖民地語言的資料則被排除在外。

通過調查、民族誌研究和人類學分析的方式，東南亞空間的正式記錄和書寫可被視為始於歐洲殖民時期。當然，它具有更早的文獻證明，前提是必須將地圖，甚至建築、紀念碑銘文和其他物質文化的表像也視為文本。除了像巴塔克人（Batak）這樣的族群外，東南亞的游牧土著及其口頭傳承留下的早期歷史文獻寥寥無幾。以歐洲語書寫的當地殖民記錄、西方國

土收藏的文物和考古證據，都意味著東南亞學者仍需從當地以外的殖民檔案、圖書館和博物館的收藏採集資料，且須通過這些機構的規程才能讀取。

東南亞國家以不同節奏實現的現代化，主要是因二戰後獲得獨立，它們從根本上改變政治文化、社會，乃至國家所需的景觀和空間。全球和區域的發展政治要求工業化並實現各種指標，如識字率、健康與衛生指標、工業指標和國民生產總值等等。這些從根本上迅速改變了景觀、城市規劃和建築。戰後，它們急於建立本土的專業機構和建築學校，且策劃達至全球標準，於是在殖民時期後，相對很少人接管或繼續參與學術工作，大多數建築及相關領域的畢業生更是直接參與了「國家建設」項目。這導致當地戰後建築的調查和記錄普遍缺乏，更不用說對殖民文獻的持續性審查或建立新立場和分析。

殖民和民族主義的「幽靈」（spectre）陷入了學術論述和研究中，例如由 KITLV 出版社出版，謝福德（Schefold）、多梅尼格（Domenig）、納斯（Nas）和威辛（Wessing）編輯的兩冊《印尼房屋》（二〇〇三和二〇〇八）。[2] 這些與鄉土建築有關的調查和學術論文都是對世界有價值的文獻，即使有些是從早期書冊重寫的章節。然而，必須要質問這些建築說明所

系出版，一直致力於提供東南亞的研究和觀點，包括不定期的參考書目。

2 Reimar Schefold, Peter Nas and Gaudenz Domenig, eds., *Indonesian Houses 1 and 2* (Leiden: KITLV, 2004 and 2009). 「幽靈」的解說請參閱〈東南亞理論的實驗性應用〉。

依據的框架：印尼的建築形式是怎樣的？將這些形式遷移到馬來西亞半島時，米南加保和武吉斯人的房屋是否仍是印尼房屋？婆羅洲／加里曼丹哪些建築是印尼的，哪些是馬來西亞的？

過去二十年裡，東南亞的建築實踐與全球經濟緊密相連，以此產生了兩種類型的建築出版物。第一種著重於應付區域常規的房屋生產。羅伯特・鮑威爾（Robert Powell）的《亞洲房屋：東南亞當代房屋》（一九九三）就是一個典型例子：這類作品成為了富人和新貴的「風格指南」。[3]第二種記錄的是，意圖將遊客帶入神話樂園般的度假勝地和酒店環境，以此輔助全球旅遊業，就如陳福明（Tan Hock Beng）的《熱帶隱居地：地方詩學》（一九九六）和《熱帶天堂》（二〇〇〇）。[4]這兩種類型的書寫都蘊含著殖民主義遺留下的潛台詞，儘管它們論述了新的跨國、區域和全球人類運動。

本文將討論東南亞研究者需要關注及思考的多項議題，特別證實僅通過殖民或民族視角研究的問題和限制。史學考察的是各類文本，而不是其包容或排斥性的政治。就如先前的論述，論述的架構比作品本身的學術真實性更重要。

史學與建築書寫的問題

阿比丁・庫斯諾在二〇〇〇年發表於《東南亞建築期刊》上的文章〈構想區域主義，重塑東方主義：當今的一些東南亞建築論述〉，是迄今為止對東南亞的空間論述及相關史學方法最好的評述。[5]庫斯諾則運用了巴尼斯特・弗萊徹、斯皮羅・科斯托夫（Spiro Kostof）、蘇梅特・朱姆賽（Sumet Jumsai）、鄭慶順（Tay Kheng Soon）和楊經文（Ken Yeang）的作品加以分析，並質疑其文本所闡述的幾個理論框架。[6]

庫斯諾的文章詳細評論了弗萊徹的研究，於一九七五年第十八版中特別指出東南亞的引入較晚，並揭露建築學術中獨裁研究的各種主觀意見，特別是以歐洲為中心的研究。這後來

3 Robert Powell, *The Asian House: Contemporary Houses of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 Select Books, 1993).

4 Tan Hock Beng, *Tropical Retreats: The Poetics of Place* (Singapore: Page One Publishing, 1996); *Tropical Paradise* (Singapore: Page One Publishing, 2000).

5 Abidin Kusno, "Imagining Regionalism, Re-Fashioning Orientation: Some Current Architectural Discourses in Southeast Asia", In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Architecture*, 4(2000): 45-61.

6 朱姆賽、鄭和楊（Jumsai, Tay and Yeang）分別是泰國、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領先建築實踐者，但一直在推廣東南亞特有的建築和城市環境理論。

發展成他的開創性作品《後殖民時代背後：印尼的建築、城市設計和政治文化》的章節之一。然而，有趣的是，在第十九版（一九八七）和第二十版（一九九六）中，庫斯諾並沒有討論東南亞部分的後續「發展」。似乎現有標題的獨裁和壓迫感不夠，這些作品相應的編輯——約翰·穆斯格羅夫（John Musgrove）和丹·克魯克山克（Dan Cruickshank）繼續細分，並將條目分為三個標題：〈歐洲以外的前殖民時期建築〉、〈歐洲以外的殖民時期和後殖民時期建築〉及〈二十世紀的建築〉，再次牽涉歐洲中心主義和排外主義。就如分期的時段所示，「殖民時期」和「歐洲」被視為構建這種建築論述的合適且毫無問題的工具。

第十八版中，明妮特·德·席爾瓦（Minette de Silva）作為顧問撰稿人，在東南亞的介紹部分所扮演的角色值得審查。涉及的國家僅限於在德·席爾瓦框架內的「緬甸、柬埔寨、泰國和印尼」，但旁隨的「斯里蘭卡、阿富汗、尼泊爾、西藏」是「遠東」的「新」部分。於此，政治必須再次被視為研究的基底，德·席爾瓦以此反轉弗萊徹文本中長期認可的印度「偉大傳統」霸權：不難看出，這些東南亞國家在歷史或經濟上都與德·席爾瓦的出生地斯里蘭卡有關聯，在那裡她仍是「亞洲首位女建築師」。

庫斯諾對朱姆賽作品以「文明」和「原始」為術語的批判將在本文後討論。然而，在批評弗萊徹和科斯托夫後，他對「近期建築論述」的分析需要在其語境背景下理解。首先，朱姆賽、鄭和楊的討論成果，雖然是自弗萊徹研究以來對學術進展的有效探察，但其忽略了該

地和西方的大量當地作品。其次，朱姆賽、鄭和楊是主要的實踐者（在自己的國家都具有影響力），發表了有關東南亞建築環境的理論反思和論述。他們的出版物源於實踐經歷和現有的文化領域發展，雖然建築師對其區域（和全球）環境的檢驗很重要，但必須承認這些作品是補充他們實踐的產物，在某些情況下是從屬的。實踐宣言的制定及其在出版物中的呈現方式是建築、城市和景觀設計中已確立的常規模式。如果我們承認弗萊徹研究具有強烈的歐洲中心主義（因此也是殖民主義），還有近期橫跨後殖民／民族和實踐的關注，那東南亞學者該怎樣以範圍和方法論來撰寫空間和建築？

我們需要重新尋找其他可能審查嚴謹的典型史學。幸運的是，地區的文化和歷史分析包括許多交叉和相關學科或次領域，其中一些與空間研究特別有關聯。跨學科的範圍可能涉及考古學、人類學、藝術、城市地理學、語言學，當然還有物質文化。維克多．李伯曼（Victor Lieberman）對九世紀以來的東南亞前殖民歷史的分析是迄今為止最有用的。[7] 他提出了東南亞「早期」歷史書寫的四個階段或方法，稱之為「外部主義」史學、「自治」史學、「商業時代」命題和他自己的「第四種方法」。

7 Victor Lieberman, *Strange Parallels: Southeast Asiain Global Contex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套用李伯曼的話，第一個「外部主義」歷史書寫階段的特點是，來自歐洲的學術研究是由對占領地的殖民興趣所驅動的。這階段的作品將東南亞描繪成一個惰性和被動的國家，這不僅僅因為人們認為其社會在政治上被征服，且文本源自歐洲。再者，東南亞文化被視為兩個亞洲大國的附屬，不是「印度化」就是「中國化」，其結構性或內在導因可在社會組織和建築中找到證據。一九三〇年代展開下一階段的「自治」歷史書寫，顧名思義，考察了堅定的本土和土著勢力。這類文本的作者認為，伊斯蘭化和早期殖民主義等主要勢力，其實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東南亞的固有特徵，凡．勒爾（Van Leur）舉例說明了這個框架。凡．勒爾評論：「世界宗教和外國文化形式的光澤是一層薄薄的片狀釉；在其下，整個古老的土著傳統持續存在著。」[8]

第三階段稱為「商業時代」，一九六〇年代由安東尼．里德（Anthony Reid）的作品推動。里德考察了十五至十七世紀的馬來印尼界，當時從海事者努力將土著文化勢力和貿易工作與全球接軌，因此其政治和經濟也隨之變化。[9]跨學科文本的使用將論述擴展至比迄今為止的學術研究更廣泛的範疇，包括城市發展的研究表明，一六五〇年該地區百分之五的人口生活在大城市。對「商業時代」論文的主要批評是，對群島的關注混淆了東南亞大陸的發展，這些發展在本土政治、農業，還有貿易和文化實踐方面，與陸地相連的歐洲和歐亞的中間區域相當不同。李伯曼的作品隨後被框定為一種新方法，它處理了過往方法中的「不平衡」，在不

受分歧的約束下對比了大陸和群島的結構。[10]

區域術語

不像非洲、美洲和某範圍上的歐洲等大陸次區域，其海岸被完好地定義為包含「陸地」的地區，東南亞地區在地理和歷史上都難以界定，因為其邊界更「模糊不清」，定義也搖擺不定，歷年來擴張或減縮。大多數的東南亞地理界定依據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一系列邊界民族國家加入如「東南亞條約組織」的政治國防聯盟發起，最初還包括孟加拉（前東巴基斯坦），但最終被排除了。而東盟是個鬆散的貿易、安全和文化組織，一九六七年成立時只有五個國家，但現已擴展至十個。

8 Jacob Cornelius Van Leur, *Indonesian Trade and Society* (The Hague: W. Van Hoeve Publishers, 1955).

9 Anthony Reid, *Southeast Asia in the Age of Commerce, 1450-1680*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8 and 1993, in two volumes).

10 東南亞的陸地通常被認為或區分為大陸和島嶼，大多數國家都包含在其一類別中，除了馬來西亞位於婆羅洲的東馬。這些國家之間的政治分歧有時會浮出台面，例如首次設想為「東南亞半島運動會」的區域性體育賽事，後來改為包括東南亞島嶼的「東南亞運動會」。

命名的複雜性，可以從不同時期和人對東南亞的各類定義中看出。在生物地理領域，術語「馬來西亞」（英文舊用「Malesia」，後改「Malaysia」）先前用於描述「馬來群島」的動植物（阿爾弗雷德·拉塞爾·華萊士〔Alfred Russel Wallace〕，一八六九），直到一九六三年因「馬來西亞」的政治部署而變得複雜。[11]它被標為「亞洲」或「亞太」的一部分，在大洋之間則是「印度太平洋地區」。史前史將其描述為「印尼馬來西亞群島」（彼得·貝伍德〔Peter Bellwood〕，一九九七）。語言學研究將一大片區域定義為「南島」，邊界遠至馬達加斯加、紐西蘭、台灣、夏威夷群島和復活節島（白樂思〔Robert Blust〕）。[12]「努山達拉」（Nusantara）一詞在馬來世界被廣泛使用，從中國和印度的大「極地」來看，該地區分別是「印度更遠」（和更早的「黃金半島」）或「南洋」。它還經常被稱作氣候或宗教術語，作為「熱帶」或「伊斯蘭界」的一部分。

許多在南島術語下的鄉土建築專著包括菲律賓北部的台灣，以及一個人們從亞洲大陸開始越洋分散的重要考古遺址。斯帕克斯和豪厄爾（Sparkes and Howell）在《東南亞的房子》（二〇〇三）中呈現台灣和日本之間的琉球群島研究成果。跨學科和時間段的定義範圍如此廣泛，早期歷史的研究者須要特別注意這些不同之處。

史前、文明與海景

遺傳學和考古學的最新發現顯示，早期人類從非洲東移到新月沃土，再到亞洲大陸。[13]幾千年後，南島人沿海從亞洲大陸遷移（離開亞洲東部和南部邊緣）至東南亞島嶼，再進入大洋洲和波利尼西亞，遇上熱帶海域（彼得．貝伍德，一九九七）。為了前往這些島嶼，他們需要重新支配社會和現有的技術，以適應海程並在開發的島嶼上建造住所。支腿船技術的發明和依賴，以及對船和旅行概念的高度仰賴，有助解釋部分或全部民居，也暗示政治社會皆為這部分移民歷史的象徵。

許多學者從事海洋歷史遺產研究，包括布羅尼斯拉夫．馬林諾夫斯基（Bronislaw

11 Alfred Russel Wallace. *The Malay Archipelago*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1962 [1869]).

12 Peter Bellwood. *Prehistory of the Indo-Malaysian Archipelago*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5 and 1997); Robert Blust. *The Austronesian Languages* (Canberra: Pacific Linguistics. Research School of Pacific and Asian Studies.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2009).

13 Vincent Macaulay and others. "Single. Rapid Coastal Settlement of Asia Revealed by Analysis of Complete Mitochondrial Genomes". In *Science* 308: 5724(2005): 1034–1036.

Malinowski）（《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一九二二）、哈登和霍內爾（Haddon and Hornell）（《大洋洲的獨木舟》，一九三八）、皮埃爾・伊夫・曼金（Pierre-Yves Manguin）（〈齊整的社會：在東南亞島嶼船的象徵和政治制度〉，一九八六）和斯蒂芬・奧本海默（Stephen Oppenheimer）（《東方伊甸園：被淹沒的東南亞大陸》，一九九八）。[14] 大衛・索弗（David Sopher）展示了海民如何長期生活在船和支腿獨木舟上，更重要的是在東南亞沿海形成了分化的政治社會——其中一些後來還扮演了「海盜」的角色。[15] 比起住在陸地，許多東南亞人住在船上更愜意。阿德里安・霍里奇（Adrian Horridge）對印尼和東部群島帆船的各種調查（一九七八、一九七九、一九八一、一九八二、一九八五、一九八六、一九八七）表明，這種遠洋船隻特別是支腿獨木舟，在技術上不斷地改進以應對不同的海陸環境。[16]

有鑑於此，我們或許可以重新評估蘇梅特・朱姆賽在《那迦：暹羅和西太平洋的文化起源》（一九八八）一書中有關西太平洋領域的主張。[17] 朱姆賽有理由認同並讚揚以海傳播的亞太文化「水上」起源，並稱其特別影響了東南亞島嶼的房屋和生活，但庫斯諾譴責朱姆賽作品中聲稱的起源是正確的。

印度／中國論述與「大傳統」傳統

用印度和中國的「大傳統」來詮釋東南亞現象，已有悠久歷史。保羅．惠特利（Paul Wheatley）的《黃金半島》（一九六一）和《國與都：東南亞城市傳統的起源》（一九八三）

14 Bronislaw Malinowski, *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 An Account of Native Enterprise and Adventure in the Archipelagoes of Melanesian New Guinea* (London: Routledge, 1922); Alfred Haddon and James Hornell, *Canoes of Oceania* (Honolulu: Bishop Museum, 1938); Pierre Yves Manguin, "Shipshape Societies: Boat Symbolism and Political Systems insular Southeast Asia". In David Marr and Anthony Milner, eds., *Southeast Asia in the 9th to 14th Centuries*: 197–199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86); Stephen Oppenheimer, *Eden in the East: The Drowned Continent of Southeast Asia*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98).

15 David Sopher, *The Sea Nomads: A Study of the Maritime Boat People of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 National Museum, 1965).

16 相對於海洋領土，土地持有權成了財產所有權和全國人口普查的法律指標。雖然海洋民族曾經是東南亞傳王國政權和戰爭的支柱，但這些「無國籍」的民族在一九六〇年代減少了。

17 Sumet Jumsai, *Naga: Cultural Origins in Siam and the West Pacific*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分別是早期政治經濟學改變東南亞地理和歷史命運的關鍵研究，對其城鎮都市圈做出了預測性描述。[18]應和東南亞的多方「影響」，惠特利的研究使用了多種語言的資料來源，但引用的關鍵文本是印度和中國的，該地區被描述為「位於印度東部和中國南部」。緊隨中國（一九七一）和日本（一九七八）城市史兩部作品的是一九八三年的著作，以「考古、文本和碑文資料來源」的證據構建這些城市的形式。

由於東南亞大陸的部分地區（尤其是越南）在政治上與中國有關聯或受其控制，因此不難理解為何這種學術研究必將東南亞視為中央王國的邊屬。事實上，後來移居的華人群體也對許多城市的發展產生影響，就如約翰內斯．維多多（Johannes Widodo）在《城市中的船：移居華人和東南亞城市的建築》（二〇〇四）中所討論的。[19]同樣，學者們也將東南亞「印度化國家」的印度佛教建築與印度聯繫起來，例如千原大五郎（Daigoro Chihara）的《東南亞的印度佛教建築》（一九九六）。[20]將建築或城市空間作為中國或印度模型的衍生發展，這類研究往往忽略討論平行或隱含的本土空間改革。

據凡．勒爾，宗教與宗教性影響可能被視為東南亞本土建築的掩飾物。因此，雖然大量的早期磚石建築不可否認地受到了印度佛教傳統的影響，但由大衛．馬爾和安東尼．米爾納（David Marr and Anthony Milner）編輯的《九世紀到十四世紀的東南亞》（一九八六）一冊中的各類作品表明，其關聯性取決於本土因素，並可追溯到不同於印度和中國的本土物質文

化的某些層面。[21]這感知對解釋許多這些古蹟的混雜性質非常重要，它們有著長期惡化的木質結構，並附有其所在地的特有形式和裝飾。此外，也有新穎和「獨特」的創造：吳哥窟的巴戎、柬埔寨和爪哇島中部的婆羅浮屠，必須被詮釋成在其他印度佛教世界未曾見過的結構。東南亞的考古知識近來得以擴大，這是緣於出版的努力，由巴斯克斯、格洛弗、皮果和沙羅克（Bacus, Glover, Piggot and Sharrock）編輯的兩卷論文重新激發了人們對古代建築形式的興趣：《揭露東南亞的過去》（二〇〇六）和《解讀東南亞的過去》（二〇〇八）。[22]

18 Paul Wheatley, *The Golden Khersonese* (Kuala Lumpur: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1961); *Nagara and Commandery: Origins of the Southeast Asian Urban Tradi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1983). 在李伯曼的理論中，國與郡可能被理解為「形式主義」，但惠特利也因他對東南亞空間的嚴謹考察而聞名。他是一位在書寫有關該地區時，持矛盾立場的學者。

19 Johannes Widodo, *The Boat and the City: Chinese Diaspora and the Architecture of Southeast Asian Cities* (Singapore: Marshall Cavendish Academic, 2004).

20 Daigoro Chihara, *Hindu-Buddhist Architecture in Southeast Asia* (Leiden: E.J. Brill, 1996).

21 David Marr and Anthony Milner, eds., *Southeast Asia in the 9th to 14th Centuries*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86).

22 Elisabeth Bacus, Ian Glover and Vincent Piggot, eds., *Uncovering Southeast Asia's Past: 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1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European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Archeologists* (Singapore: NUS Press, 2006); Elisabeth Bacus, Ian Glover and Peter Sharrock, eds., *Interpreting South-*

傳統的鄉土建築、民居

如果一九三二年現代藝術博物館的「國際建築」展覽是全球推廣現代主義建築的關鍵事跡，那麼一九六四年伯納德．魯道夫斯基（Bernard Rudofsky）在同家博物館舉辦的「沒有建築師的建築」展覽亦同具影響力。它標誌著其他以鄉土形式存在的建築，由地方社區監督下建造或「非純種」的建築師設計的。[23]儘管有者批評該展覽及其相關書籍美化了這些作品，並且沒有討論大多數展覽品的社會文化背景，但它仍然是個重要的呼籲，呼籲須要研究「其他」建築的結構和背景，這成為十年後區域主義者討論的先驅。它啟發並鼓舞了學者們在「鄉土」上展開嚴謹的學術研究，並將「本土」定位為合法的建築學術語。儘管早在勞吉爾和森珀（Laugier and Semper）時期就已被預設，但尚無先例。在魯道夫斯基的書中，東南亞僅以越南為代表：圖片和文字更多作為圖式調查，而不是空間文獻。在恩里科．吉多尼（Enrico Guidoni）（一九七五）的《原始建築》裡，同樣粗略地描繪了該地區。[24]

伊茲科維茨和索倫森（Izikowitz and Sørensen）的《東亞和東南亞的房子：人類學和建築學層面》（一九八二）可被視為早期作品，其後是雅克．杜馬凱（Jacques Dumarçay）的《東南亞房子》（一九八七）。[25]基本的線條畫和圖像構成了這些書冊中學術研究的基礎；它們可被視為對土著房屋形式的試探性研究，產生於本土身分認同焦慮感日益擴大的時期。恢復和記

錄這些建築結構的項目始於不同國家，但由此產生的出版物在處理本地與國際，學術與普通讀物的方式各異。作品更具特殊性，而非對比性，如薩基特和薩利赫（Sargeant and Saleh）的《印尼傳統建築》（各種版本，一九七三）、約瑟夫・普里約托莫（Josef Prijotomo）的《爪哇建築的構想和形式》（一九八四）、基斯・約瓦爾（Kis-Jovak）等人的《巴努阿・托拉哈：建築的變化模式和薩阿丹・托拉哈的象徵》（一九八八）、阿蘭・維亞羅（Alain Viaro）的《尼亞斯島傳統建築》（二〇〇三）、阮八當（Nguyen Ba Dang）等人的《越南傳統建築》（二〇〇四）和弗朗索瓦・坦圖里爾（François Tainturier）主編的《柬埔寨木質建築：消失的歷史遺跡》（二〇〇六）中看到的例子。[26]

---

east Asia's Past: Monument, Image and Text (Singapore: NUS Press, 2008).

23 Bernard Rudofsky, *Architecture Without Architects: A Short Introduction to Non-Pedigreed Architecture* (New York: Doubleday Books, 1964).

24 Enrico Guidoni, *Primitive Architecture* (New York: H.N. Abrams,1975).

25 Karl Gustav Izikowitz and Pers Sørensen, *House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Anthropological and Architectural Aspects* (London: Curzon Press, 1982); Jacques Dumarçay, *The House in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26 G.T. Sargeant and R. Saleh, *Traditional Buildings of Indonesia 1-3* (Building Research institute, Indonesia and United Nations Regional Housing Centre); Josef Prijotomo, *Ideas and Forms of Japanese Architecture*

除了東南亞研究所提出的建築對比研究（稍後討論）之外，東南亞以外的澳洲和歐洲機構也有類似的研究視角。澳洲國立大學的南島對比項目由詹姆斯．福克斯（James Fox）領導，開始研究屬於南島一部分的東南亞，從中製作了許多書冊，包括重要的《南島房屋內部：生活的室內設計視角》（一九九三）。十年後，斯帕克斯和豪厄爾編輯了北歐東南亞研究協會的《東南亞房子：不斷變化的社會、經濟和政治領域》（二〇〇三）。[27]

殖民建築及其內容／不足

正如羅克薩娜．沃特森（Roxana Waterson）一九九八年編輯的《旅行者眼中的東南亞建築》所建議的，旅行的書寫與記錄提供對東南亞早期遺址和建築的看法，所指的時間段是它們轉型成殖民地城鎮和港口城市的前中期。[28]城市規劃和建築在殖民研究中起了重要作用，除了建築和城市空間本身標記這一時期的殘餘文本外，獲取不同歐洲語言的文本素材支持了這些建築的書寫與記錄。

殖民和殖民時期的建築通常被視為毫無問題的建構，憑藉景觀中的實際存在通過發展敘事法呈現。簡．比米什和簡．弗格森（Jane Beamish and Jane Ferguson）支持該觀點，他們的《新加坡建築史：城市的建立》（一九八五）顯示殖民主導國家和社會的起源。[29]殖民形式

的最終擴散也導向了將其描述為類型的作品，例如羅伯特・艾肯（Robert Aiken）的《帝國眺望樓：馬來亞的山站》（一九九四）及彼得和韋弗尼・詹金斯（Peter and Waveney Jenkins）的《種植者的平房：馬來半島之旅》（二〇〇七）。[30]

(Yogyakarta: Gadjah Mada University Press, 1984); Jowa Imre Kis-Jovak et al., *Banua Toraja: Changing Patterns in Architecture and Symbolism among the Sa'dan Toraja, Sulawesi, Indonesia* (The Netherlands: Royal Tropical Institute, 1988); Alain Viaro, *Traditional Architecture of Nias Island* (Gunungsitoli: Museum Pusaka Nias, 2003); Nguyen Ba Dang et al., *Traditional Vietnamese Architecture* (Hanoi: The gioi publishers, 2004); François Tainturier, ed.h, *Wooden Architecture of Cambodia: A Disappearing Heritage* (Phnom Penh: Centre for Khmer Studies, 2006).

27 James Fox, ed., *Inside Austronesian Houses: Perspectives on Domestic Designs for Living* (Canberra: ANU Comparative Austronesian Project, 1993); Stephen Sparkes and Signe Howell, *The House in Southeast Asia* (London: Routledge-Curzon, 2003).

28 Roxana Waterson, ed., *Architecture of Southeast Asia through Travellers' Ey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29 Jane Beamish and Jane Ferguson, *A History of Singapore Architecture: The Making of a City* (Singapore: Graham Brash, 1985).

30 Robert Aiken, *Imperial belvederes: The Hill Stations of Malaya*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eter Jenkins and Waveney Jenkins, *The Planter's Bungalow: A Journey Down the Malay Peninsula* (Singapore: Editions Didier Millet, 2007).

葛月贊（Gretchen Liu）的《花崗岩與灰泥：新加坡國家古蹟》（一九九六）強調了一個難題，即使這種書寫是在「民族」的框架中鑄造的，缺少本土檔案資料或本土語言的材料，可能導致闡述從殖民角度延伸。[31]的確，對殖民文本或建築的評估是這一時期所有書寫者面對的難題，即將文本本身的真實性與其相應的物理形態詮釋為建築。面對這難題的一些作品是加法．艾哈邁德（A. Ghafar Ahmad）的《馬來西亞的英國殖民建築（1800-1930）》（一九九七）和諾瑪．阿拉爾孔（Norma Alarcon）的《前西班牙和西班牙時期的菲律賓建築》（一九九八）。[32]

班納迪克．安德森對都市圈和殖民地之間的縮略性與光譜性對比，用於審查建築形式在空間和時間兩個定位相互關聯的過程，這引起了書寫者們的關注。在這方面，殖民主義博覽會主題最適合討論以此建構的「世界觀」。[33]這類博覽會處於西方領域，出於某些政治原因和場合而組織起來，但也涉及來自大都市以外的殖民地人民代表和參與者。與東南亞相關，帕特里夏．莫頓（Patricia Morton）的《混雜的現代化：一九三一年巴黎殖民博覽會的建築與呈現》（二〇〇〇）和瑪麗．布隆伯格根（Marieke Bloembergen）的《殖民景象：世界展覽上的荷蘭和荷蘭東印度群島（1800-1931）》（二〇〇六）從法國和荷蘭的角度審視此現象。[34]魯道夫．姆拉澤克（Rudolf Mrázek）在他的《幸福土地的工程師：殖民地的技術與民族主義》（二〇〇二）中，探索了殖民地與國家之間難以捉摸的空間。[35]在其他地方，也可發現描

述建築組合的嘗試，如蕭友仁（Eu-Jin Seow）未發表的論文《馬來亞的建築》（一九六七）和《新加坡的建築發展》（一九七三），還有林山福（Jon Lim）的《喬治市（檳城）和新加坡的殖民建築和建築師（1786-1942）》（一九九〇）。[36]維姆・拉維斯泰因和簡・科普

31 Gretchen Liu, in *Granite and Chunam: The National Monuments of Singapore* (Singapore: Landmark Books and Preservation of Monuments Board, 1996). 在創造「民族敘事」的過程中，殖民空間經常被新菁英們統一，並置於新的掌權機構旁，以此宣稱接管主權空間並表明政治合法性。

32 A. Ghafar Ahmad, *British Colonial Architecture in Malaysia, 1800–1930* (Kuala Lumpur: Museums Association of Malaysia, 1997); Norma Alarcon, *Philippine Architecture during the Pre-Spanish and Spanish Periods* (Manila: Santa Tomas University Press, 1998).

33 「世界觀」是馬丁・海德格爾創造的術語，表示一個人或一個群體對世界的看法。雖然這通常是構建出的，但海德格爾（Heidegger）也表示它是在同時認可「其他空間」下形成的，並說明了它如何通過溝通科技和旅行構成。

34 Patricia Morton, *Hybrid Modernities: Architecture and Representation at the 1931 Colonial Exposition, Paris* (Cambridge: MIT Press, 2000). Marieke Bloembergen, *Colonial Spectacles: The Netherlands and the Dutch East Indies at the World Exhibitions, 1880–1931*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2006).

35 Rudolf Mrázek, *Engineers of Happy Land: Technology and Nationalism in a Colon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2).

36 Eu-Jin Seow, *Architecture in Malaya* (Masters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1967), *Architectural Development in Singapore*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1973); and Jon Lim, *Colonial Architecture*

（Wim Ravesteijn and Jan Kop）編輯的《盈利與繁榮：荷蘭工程師對印尼公共工程的貢獻》（二〇〇八）作為機構的作品全集記錄，已成為重要的參考書目。[37]

到目前為止，最具吸引力和批判性的殖民建築論述，是那些涉及比殖民地本身更大的景觀，即爭論、建設或談判的場所。邱思妮和阿卜杜勒·拉扎克·盧比斯（Khoo Salma Nasution and Abdur-Razzaq Lubis）的《近打谷：開創馬來西亞的現代發展》（二〇〇五），以及林學進和費爾南多·豪爾赫（Lim Huck Chin and Fernando Jorge）的《馬六甲：來自街頭的聲音》（二〇〇五），從多個角度特別是從地面觀察馬來西亞的殖民景觀，為其不同的民族爭取合法性和發言權。[38]討論印度支那的格溫多琳·萊特的《法國殖民城市主義中的設計政治》（一九九一）；楊淑愛（Brenda Yeoh）的《新加坡殖民的爭論空間：權力關係和城市建築環境》（二〇〇三），還包括阿諾瑪·皮利斯（Anoma Pieris）的《隱藏之手和飛地空間：新加坡多元社會的刑罰史》（二〇〇九）皆質疑殖民的連帶影響，並給予建築參與者和專業人士的新興社群更大持有權。[39]

建築的國族主義與國家調研

東南亞的當代國家主要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後來籠罩整個地區的漫長冷戰之間形成的。

「後殖民」時期可用作時間性術語，描述脫離西方殖民者的過程。然而，出於許多原因，與從屬研究理論相關的論述和研究整體上無法令人滿意。首先，北印度傳播的後殖民論述文本，後被東南亞研究領域的劃分和政治複雜化，當全球其他前殖民國家置於與印度相同的論述中時，便製造了新的霸權（相比於明妮特・德・席爾瓦和推翻「偉大傳統」的企圖）。其次，東南亞的後殖民和民族時期發生在相對較短的時間內，後立即被捲入區域的冷戰爭論中，因此多地語境比僅僅在大都市和殖民地之間的更合適。最後，在國家與全球間產生共鳴的發言和各類區域的背景，都可讓記錄和批評變得更豐富有質。

and Architects of Georgetown (Penang) and Singapore, between 1786 and 1942 (PhD dissertatio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1990).

37 Wim Ravesteijn and Jan Kop, *For Profit and Prosperity: The Contribution Made by Dutch Engineers to Public Works in Indonesia, 1800–2000* (Leiden: KITLV Press, 2008).

38 Khoo Salma Nasution and Abdur-Razzaq Lubis, *Kinta Valley: Pioneering Malaysia's Modern Development* (Ipoh: Perak Academy, 2005); Lim Huck Chin and Fernando Jorge, *Malacca: Voices From the Street* (Kuala Lumpur: Badan Warisan Malaysia, 2005).

39 Gwendolyn Wright, *The Politics of Design in French Colonial Urbani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Brenda Yeoh, *Contesting Space in Colonial Singapore: Power Relations and the Urban Built Environment*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Anoma Pieris, *Hidden Hands and Divided Landscapes: A Penal History of Singapore's Plural Society*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9).

儘管如此，一九八〇至一九九〇年間見證了多方的努力，他們期望從中獲得國族認同感，而這與「民族」界限和要求有關。與民族國家相關的敘述和歷史整理產生了各種版本的史記，甚至在環境建設和建築上也如此。[40]例如，S．弗拉特西斯（S. Vlatseas）的《馬來西亞建築史》（一九八〇）和陳志勇（Chan Chee Yoong）的《獨立後的建築（1957-1987）》（一九八七），還有楊經文的《馬來西亞建築》（一九九二）都試圖序列化或連貫馬來西亞的歷史情節，抑或通過多民族人民的努力，將各別的描述組成故事。[41]其他人則意圖恢復鄉土房屋的特點，將其作為國家敘事的重要層面，如林日源（Lim Jee Yuan）的《馬來房屋：重新發現馬來西亞土著的居住體系》（一九八七）和阿卜杜勒．哈利姆．納希爾（Abdul Halim Nasir）的《傳統馬來房屋》（一九九六，馬來版本一九九四）。[42]

在更廣大的區域界定裡，「馬來西亞」以外的政治用語仍讓人糾結，龐大的建築記錄體系促成了如溫南．克拉森（Winand Klassen）的《菲律賓建築：跨文化背景的菲律賓建築物》（一九八六）和克拉倫斯．阿森（Clarence Aasen）的《暹羅建築：文化歷史的詮釋》（一九九七）之類的作品。[43]在一九九〇年代後期，印尼和馬來西亞熱衷於製作社會和文化歷史的百科全書，分別是《印尼文物保護計畫》和《馬來西亞百科全書》。每個系列都有一冊於一九九八年發行、專門介紹建築的書籍，由謝陽元（Gunawan Tjahjono）（印尼）和曾文輝（Chen Voon Fee）（馬來西亞）編輯。[44]這種冗長的「民族」調查近來持續產出，魯泰．蔡

鍾拉克（Ruethai Chaichongrak）等人合著的《泰國的房子：歷史與進化》（二〇〇二）、尼提・施塔皮塔農達（Nithi Sthapitanonda）的《泰國建築：傳統和現代形式的指南》（二〇〇五）和彼得・納斯（Peter Nas）編輯的一冊《現在的過去：印尼的建築》（二〇〇六）主要以歐洲作者為主。[45]

---

40 在構建這些作品的框架和內容時，前殖民和殖民時期的建築因存在於同一個「民族空間」，而被視為發展建築或與當代建築有關。

41 S. Vlatseas, *A History of Malaysian Architecture* (Singapore: Longman, 1980); Chan Chee Yoong, *Post-Merdeka Architecture 1957–1987* (Kuala Lumpur: Pertubuhan Arkitek Malaysia, 1987); Ken Yeang, *The Architecture of Malaysia* (Amsterdam: Pepin Press, 1992).

42 Lim Jee Yuan, *The Malay House: Rediscovering Malaysia's Indigenous Shelter System* (Penang: Institut Masyarakat, 1987); Abdul Halim Nasir, *The Traditional Malay House* (Shah Alam: Fajar Bakti, 1996).

43 Winand Klassen, *Architecture in the Philippines: Filipino Building in a Cross-cultural Context* (Cebu: University of San Carlos, 1986); Clarence Aasen, *Architecture of Siam: A Cultural History Interpretation*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44 Gunawan Tjahjono, ed., *Indonesian Heritage: Architecture* (Singapore: Archipelago Press, 1998); Chen Voon Fee, ed., *The Encyclopedia of Malaysia: Architecture* (Singapore: Archipelago Press, 1998).

45 Ruethai Chaichongrak and others, *The Thai House: History and Evolution* (Bangkok: Asia Books, 2002); Nithi Sthapitanonda, *Architecture of Thailand: A Guide to Traditional and Contemporary Forms* (Singapore: Editions Didier Millet, 2005); Peter Nas, ed., *The Past in the Present: Architecture in Indonesia* (Rotterdam: NAI, 2006).

從這年代開始，一些研究人員開始仔細探討並質疑東南亞獨立後的國家建設項目，包括其與現代主義建築必然存在的轉形。首先是阿比丁．庫斯諾《後殖民時代背後：建築、城市空間和政治文化》（二〇〇〇）的開創性作品，通過建築和城市空間的討論，剖析殖民與民族的主題和主觀性。[46]緊隨其後的是傑拉德．利科（Gerard Lico）的《建築情結：權力、神話和馬科斯國家建築》（二〇〇三）。[47]接著的兩部作品展示了各國如何設法接上全球的建築網絡，努力擴展國家的想像：王運起（Wong Yunn Chii）的《新加坡一比一——建築與城市設計畫廊》（二〇〇五和二〇〇七）及海倫．格蘭特．羅斯和達里爾．萊昂．柯林斯（Helen Grant Ross and Darryl Leon Collins）的《柬埔寨建築：「新高棉建築」（1953-1970）》（二〇〇六）。[48]這些作品不僅是重要的國家研究，且對現代主義建築的稀缺記錄和其在東南亞的衰落趨勢作出重要貢獻。我曾試圖通過《默迪卡的建構：吉隆坡獨立時代的建築（1957-1966）》（賴啟健，二〇〇七）研究馬來亞／馬來西亞國家建築項目的複雜情況，而羅斯金（Ross King）最近在《吉隆坡和布城：談馬來西亞的城市空間》（二〇〇八）中研究了馬來西亞的兩個「國家」首都。[49]

城市研究與發展政治

早在一九六七年，泰利・麥吉（Terry McGee）的《東南亞城市：東南亞原始城市的社會地理》就討論了東南亞城市與其殖民和民族時期之間的重要聯繫。[50] 據麥吉，通過西方殖民主義實施的城市化模式，該殖民城市的人口會翻倍增長。在激烈的國族主義（nationalism）時期，新國家的政治菁英們隨後利用城市的形式來展示和實現社會與政治改革，包括將重建的殖民

46 Abidin Kusno, *Behind the Postcolonial: Architecture, Urban Space and Political Cultures in Indonesia* (London: Routledge, 2000).

47 Gerard Lico, *Edifice Complex: Power, Myth and Marcos State Architecture* (Quezon City: Ateneo de Manila University Press, 2003).

48 Wong Yunn Chii, *Singapore 1:1. A Gallery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Design* (Singapore: Urban Redevelopment Authority, 2005 and 2007); Helen Grant Ross and Darryl Leon Collins, *Building Cambodia: New Khmer Architecture 1953–1970* (Tokyo: The Key Publisher, 2006).

49 Lai Chee Kien, *Building Merdeka: The Architecture of Independence in Kuala Lumpur 1957–1966* (Kuala Lumpur: Galeri Petronas, 2007); Ross King, *Kuala Lumpur and Putrajaya: Negotiating Urban Space in Malaysia* (Singapore: NUS Press, 2008).

50 Terry McGee, *The Southeast Asian City: A Social Geography of the Primate Cities of Southeast Asia* (London: G. Bell and Sons, 1967).

西亞，但本內爾、德拉蒙德和何浩（Bunnell, Drummond and Ho）編輯的《東南亞城市的批判性思考》（二〇〇二）書冊中提供了類似於麥吉框架的學術研究。[56]

其他關於東南亞規劃和發展研究的作品選擇的前提，似乎是將該地區放在全球範疇內對比。這些作品採用大量的統計和指示性數據，以作為定位和衡量東南亞城市相對於第一世界的標準。由於其範疇主要是在當代時期，殖民和民族主義的討論不是沒有就是不明顯。其中包括埃弗斯和考夫斯（Evers and Korff）的《東南亞城市主義：社會空間的含義和勢力》（二〇〇〇）及瓊斯和道格拉斯（Jones and Douglass）的《亞太巨型城市地區：全球時代的城市動態》（二〇〇八）。[57]該作品以像紐約或倫敦的城市為例，做了一般的對比，有時並沒有將其所依據的原則合理化，採用的數據在很大程度上將情況和語境相等成表格、圖表和描述性對比。選擇研究的城市標準有時並不統一，例如：瓊斯和道格拉斯把他們的研究納入了亞太地區，除了曼谷、馬尼拉、胡志明市和雅加達，還納入了台北和上海。這些文本雖可作為東南亞城市的有用記錄，但很少討論作為實體建構存在的城市形態。

其他學者已開始將城市理解為文本，從而允許了不同類型的學術競比，同時進一步遠離實體和現實。以這種方式編輯的兩冊書於二〇〇三年出版，即吳和楊（Goh and Yeoh）的《東南亞城市作為文本：城市景觀、文化文獻與經歷詮釋》（二〇〇三）及畢肖普、飛利浦和楊（Bishop, Philips and Yeo）的《後殖民城市主義：東南亞城市與全球進程》

（二〇〇三）。[59]該書冊的一般社評是，相比於城市設計、規劃和建築學科中對物理形態的關注，它們只是廣泛地考察各類城市。文章甚至以轉移方式採用後殖民和其他理論框架，並沒有理智地批判其適當性，當該框架轉移至另一個不同區域時忽視了其問題。每篇文章都包括一兩個知名研究者的東南亞城市研究作品。而從整體上看，大多數的其他文章現為多餘的包袱，因為比起急需不斷探討的城市化，現在更迫切需要的是基本理解。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89).

56 Tim Bunnell, Lisa Drummond and Ho Kong Chong, eds.,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Cities in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 Times Media Pte. Ltd., 2002).

57 Hans-Dieter Evers and Rudger Korff, *Southeast Asian Urbanism: The Meaning and Power of Social Space* (New York: St. Martin' s Press, 2000); Gavin Jones and Mike Douglass, *Megaurban Regions in Pacific Asia: Urban Dynamics in a Global City* (Singapore: NUS Press, 2008).

58 Robbie Goh and Brenda Yeoh, eds., *Theorizing the Southeast Asian City as Text: Urban Landscapes, Cultural Documents, and Interpretive Experiences*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2003); Ryan Bishop, John Philips and Wei-Wei Yeo, eds., *Postcolonial Urbanism: Southeast Asian Cities and Global Processes*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對比範疇

一九八〇年代初期，林蒼吉（Lim Chong Keat）在《「建築與身分」區域研討會》（一九八三）一冊中發表了一篇題為〈東南亞建築的國際背景〉的論文。[59]談及現代建築時，他強調東南亞存在的各種鄉土建築，並呼籲對其進行集體性研究。林蒼吉曾與新加坡東南亞研究所合作，該研究所擁有三萬一千張黑白照片和七千張彩色投影片，是桃樂茜．佩爾澤（Dorothy Pelzer）在九個東南亞國家拍攝的民居，包括林蒼吉在內的「東南亞文化研究項目」小組最終製作了《東南亞棲息地：民間建築的圖式調查》（一九八七），而佩爾澤於一九七二年去世時的更大研究範圍被同是小組成員的羅克薩娜．沃特森接手推行。[60]作為該作品集一部分的沃特森《居住的房屋：東南亞建築的人類學》（一九九〇），成為建築和人類學交叉研究的最重要文本之一。[61]幾年後，同在新加坡工作的賓納．印多夫製作了另一個重要的建築形式和術語調查項目，稱為「東南亞傳統建築術語表」（SEATAG，一九九六）。[62]

東南亞鄉土建築的文檔記錄和後續分析的努力，在其他類型的建築研究中尚未達到同等水平。因為文檔記錄的研究項目雖是許多東南亞建築研究者的主領域，但不太可能為了供其他學者查閱而放在機構檔案中。在這方面，馬來西亞理工大學的「馬來世界建築環境研究中心」計畫值得關注，它強調收集馬來西亞周圍伊斯蘭界的數據、文物和測量圖紙，目前大約

有四百五十個項目。一九九九年，印多夫在「東南亞語料庫」（SEACOR，一九九九）項目中，繼續對東南亞六國的大約二十個八至十世紀的神殿及其音譯文本作可視化記錄。兩年後出版了一冊主要由土著學者貢獻的書。而林山福編輯的《改變傳統：東盟國家、汶萊、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新加坡、泰國的建築》（二〇〇一）一直是迄今為止該地區最好的建築歷史介紹，儘管其章節皆從「民族」角度書寫，且分布和寫法不一。[63]

從一九八〇年代中期開始，策劃東南亞建築語境的文檔記錄和研究項目的衝勁，受到全球建築論述「區域主義」和「批判性區域主義」研究浪潮的挑戰。這主要來自大西洋的學

59 Lim Chong Keat, "The international Context for Southeast Asian Architecture". In *Robert Powell, ed., Architecture and Identity: Proceedings of the Regional Seminar* in the series *Exploring Architecture in Islamic Cultures*: 25–29 (Singapore: Aga Khan Award for Architecture, 1983).

60 SEACURP, *Habitat in Southeast Asia: A Pictorial Survey of Folk Architecture* (Kuala Lumpur: Balai Seni Lukis Negara, 1987).

61 Roxana Waterson, *The Living House: An Anthropology of Architecture in South-East Asia*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90).

62 Pinna Indorf, *Southeast Asia Traditional Architecture Glossary* (Singapor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1996).

63 Jon Lim, ed., *Transforming Traditions: Architecture in the ASEAN Countries, Brunei, Malaysia, Indonesia, Philippines, Singapore, Thailand* (Singapore: ASEAN Commitee for Culture and information, 2001).

者和資源，開始出現以其他聯合形式探索地區的趨勢，即隨著現代主義運動和遷移而從歐美軌跡轉移，這包括「傳統」身分的捍衛或先驅。阿迦汗伊斯蘭文化基金會是《Mimar》（阿拉伯語意為「建築師」）期刊的貢獻者，並贊助了如《建築區域主義：區域研討會論文集》（一九八五）的出版物。[64] 隨後又有幾冊，包括羅伯特·鮑威爾編輯的《區域主義：偽造身分》（一九九一）。[65] 十年後，「區域主義意識」的多個趨勢被發起者之一遏制，如今「熱帶」主題被納入了其論證範圍下，宗尼斯、勒費弗爾和史塔格諾（Tzonis, Lefaivre and Stagno）編輯的一冊《熱帶區域主義：全球化時代的批判性區域主義》（二〇〇一）是第三世界國家討論熱帶建築的峰會結果。[66]

結論

正如奧利弗·沃爾特斯、保羅·惠特利、安東尼·里德、班納迪克·安德森和維克多·李伯曼等學者所證實的，東南亞範疇是個具有潛在價值的研究體，無論是作為一系列特定地區或國家，抑或是整體地區。該地區的歷史也向我們表明，不能只將其視為具有包容性，因為它持續對全球勢力保持開放並兼受影響。定義該地區的研究，連同其中的觀察視角和框架仍成立，原因如下：

首先，國家「nation」不應該是解讀空間和建築的唯一框架。有越來越多年輕學者的作品，他們並沒有經歷過民族或民族國家以外的政治形式。在東南亞相關的研究作品置入國族（nation）直接揭示了國族主義（nationalism）的問題，警示我們主題和詮釋的多種其他語境的可能性。我在其他地方論證過，從安德森的都市圈和殖民地之間的「幽靈」對比，延伸到如今的東南亞國家之間在獨立後，當地菁英以不統一的各類形式加以利用殖民主義殘留物，致使更多的「幽靈」湧現。東南亞必須形成對比分析的基礎，以此探討城市、建築或其景觀，因為這些不只是當地專用的。東南亞意識擴大了國族（nation）的範疇，一方面減少了對內部的關注，另一方面也將討論帶到了地區外部的同軸領域（若非國際領域）。

其次，近二十年來，研究東南亞課題的學者數量顯著增加，他們的研究在各個領域都有共鳴或開拓性。這意味著他們研究的理論框架和假定可用於未來的研究，而不是過分依賴於

64 The Aga Khan Program, *Regionalism in Architecture: Proceedings of the Regional Seminar, Exploring Architecture in Islamic Cultures* (Singapore: Concept Media, 1985). Forty- three issues of Mimar were published from 1981 to 1992.

65 Robert Powell, ed., *Regionalism: Forging an Identity* (Singapore: School of Architecture, NUS, 1991).

66 Alexander Tzonis, Liane Lefaivre and Bruno Stagno, eds., *Tropical Regionalism: Critical Regionalism in the Age of Globalisation* (Chichester: Wiley Academy, 2001).

「外部主義」或歐洲中心主義作品的理論。通過在整個地區進行對比研究，在主位和客位之間或深度和廣度之間，解析的機會更高。最後，庫斯諾、麥基等人的作品表明，「殖民」和「國族」都是豐富東南亞空間論述的重要範疇和視角，但這類論述已不再侷限於此。一九八〇年代後，「後國族」（post-national）概念和與之相關的建築產生新形式，開始在東南亞國家與早期的民族建築一起浮出台面。

本文討論了東南亞空間形式探討中產生的大量文本，對其認可與論述是必要的。可以意識到，在更好地理解本文所提出的各種主題框架前，需要進行更多的學術工作。其中之一便是為使用不同語言工作的研究者提供譯文，特別是涉及跨越不同前殖民地的作品。學者們仍然缺乏學術平台定期討論和批評彼此的作品，就如他們的作品仍在尋找達至期刊和峰會的途徑。東南亞地區的內外都有各類研究中心，但它們之間的合作仍少之又少且相距甚遠。如果有辦法建立各種聯繫，未來我們對東南亞空間歷史的理解將提高。



圖2-1：中爪哇島的普蘭巴南興都教廟宇群。



圖2-2：法摩沙堡（A Famosa）——葡萄牙人在馬六甲建立的城堡。



圖2-3：新加坡國家劇院（現已拆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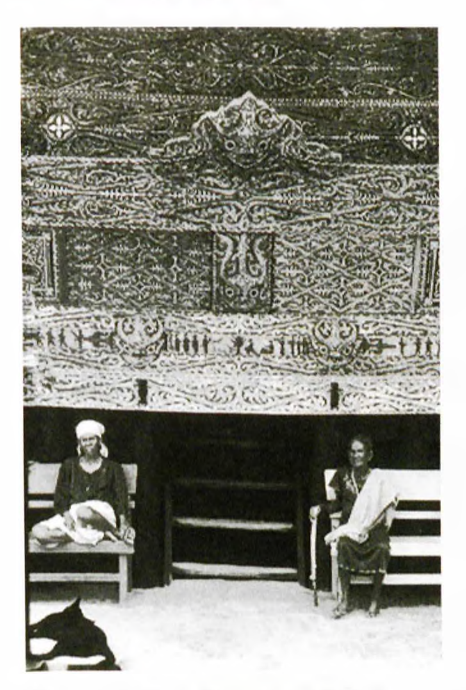


圖2-4：印尼蘇門答臘巴塔克民居（Toba Batak house）。

想像十九與二十世紀的東南亞園藝景觀

「眼前這片【馬尼拉】植物園的景象奪走他所有歡樂的回憶：有一隻比較的幽靈，把他放在歐洲那些揮灑大把黃金和精力只為了讓嫩葉抬頭或花苞綻放的國家植物園前，讓他看到這些植物園有多麼富裕、多麼被妥善照顧、多麼慷慨地開放予所有公眾。伊巴拉從凝視中回過神，望向右方，映入眼簾的是老舊的馬尼拉，依然被古老的城牆還有護城河圍繞著，像個萎靡消沉的少女，身上還穿著奶奶在最輝煌的時代穿過的那件裙子。」

這段文字截取自菲律賓民族英雄扶西・黎剎一八八七年寫成的名著《不許犯我》（*Noli Me Tangere*）。班納迪克・安德森在他的書裡引述了這段文字，認為這是小說裡的關鍵轉折

點：這是在一八八〇年代的殖民地馬尼拉，剛剛從歐洲旅居歸國的混血少年英雄伊巴拉，透過車窗放眼望向馬尼拉市立植物園時，發現自己正處在馬尼拉與歐洲之間的倒像望遠鏡的尾端。不可避免地，歐洲和馬尼拉的植物園景觀被小說主角重疊起來，互相對比，他再也不能像以前一樣以平常心看待同樣的空間與景觀，從此只能不停反射性地照見歐洲和馬尼拉之間的不平等和差異。黎剎在小說中把這景象重疊的產物命名為「el demonio de las comparaciones」，而安德森把它翻譯成「比較的幽靈」（the spectre of comparisons）。關於這一點，安德森在同樣以「比較的幽靈」來命名的著作中，藉由這種由空間所造成的陰影，來預示當今東南亞各國作為前殖民地，經過後殖民時期的反復沉澱與思考後，與殖民國之間的關係。

在這篇文章，我會先描述東南亞各殖民地經過殖民歷史對這塊地理區域及其中的關係網的洗禮後，對各自國內園藝空間的想像。接著我會用新加坡大草場（Padang）和植物園的由來和背景作為例子，來試著推論新加坡政府在濱海灣南部建造濱海灣花園的決策背後的出發點。我將引用安德森提出的「比較的幽靈」的框架，來考證殖民歷史是否、如何影響英殖新加坡早期的空間規劃。

殖民地理的形成和記載

歐洲各國自十六世紀起迅速擴張殖民版圖，加速了世界地圖的繪製，以及對全球人種分類的認知。這段時期也見證了歐洲帝國們如何通過地圖繪製和人種數據來記載這個世界。原本在十五世紀末期還是無名地域的歐洲南方，到殖民時期接連被驗明正身，那裡的人種、地貌、動植物種類都一一被發掘、辨明、繪記、命名了。如同地理學者維克多・薩維奇（Victor Savage）在他的研究中指出的，這種對事物本質加以支配、服從和利用的猶太基督教信仰，是受到帝國主義的擴張政策、啟蒙番地的理想、發現新科學的熱情，還有使用林奈雙名法（Linnaeus binomial nomenclature）來為新事物定性的積極性所驅動的，儘管當時這所謂的「番地」本身已經是經過一番發展的都會了，這記載工作依然故我。

至於東南亞的部分，阿爾弗雷德・拉塞爾・華萊士和海因里希・佐林格（Heinrich Zollinger）這兩位自然科學家，在定義和分類當時還被稱為「Malesia」（馬來群島）的這片區域及這片土地動植物分布的工作上，可說是厥功至偉。十多年來久居東南亞群島特別是婆羅洲的經歷，讓華萊士觀察到地球板塊構造對因海平面上升而被阻隔開來的異他陸棚上的動植物種的影響。作為創始生物地理學這門新分支學科的第一人，華萊士提出了馬來群島（Malay Archipelago）這片「區域」間是有相互關聯性和各自特性的理論，而這片「區域」又可以分

為以下幾個子區域：

一、印度－馬來群島：由馬來半島、新加坡、婆羅洲、爪哇島、蘇門答臘島組成；

二、東部群島：由帝汶島、弗洛雷斯島、松巴哇島、龍目島和其他幾個島組成；

三、則勒伯（Celebes，又稱西里伯斯島）：由蘇拉群島和現為蘇拉威西島的本頓島（Bonton）組成；

四、摩鹿加群島：由布魯島、斯蘭島、巴吉島、吉洛洛島與摩帝島組成；也包括了幾個比較小的島嶼，如千那地、第多利、馬基安、開翁、安波那、班達、戈蘭和馬塔貝洛；

五、巴布亞群島：由新幾內亞大島和和阿魯群島、密梭島、沙拉哇地島、衛吉島還有其他幾個小島組成。卡伊群島雖然在動物學和地理學上應該屬於摩鹿加群島，但其民族學特性跟巴布亞群島相似，因此歸在這組。

瑞士植物學家海因里希．佐林格在一八五七年第一次使用「Malesia」（馬來群島）這個名稱。根據荷蘭植物學家馮斯蒂尼斯（C. G. G. J. van Steenis）的記載，佐林格在寫《馬勒（來）西亞植物誌》（*Flora Malesiana*）這本書時第一次用了這個名稱，也在一八四〇年代後期到這個區域研究坦博拉火山爆發的影響時，提出了跟華萊士的理論相似的劃分這個區域邊界的

方法。幾十年後，「Malaysia」（馬來西亞）這個名稱在稍微調整發音後，被旅居此地的英國博學家們大量用在文獻中，以符合華萊士和佐林格劃分這個區域的生物地理學主張。主要例子有：一九二二年約翰．C．莫爾頓的《馬來西亞的哺乳動物》、一九四〇年新加坡萊佛士博物館館長弗雷德里克．N．查森（Frederick N. Chasen）的《馬來西亞哺乳動物清單》。查森在他的著作中把「馬來西亞」解釋為「東洋界的一個子區域，覆蓋整個馬來半島、蘇門答臘島、婆羅洲、爪哇島及其他鄰近的島嶼範圍」，北邊和東邊分別與印度支那、菲律賓、澳洲東部的子區域接壤。

查森版本的「馬來西亞」（Malaysia）偏離了華萊士版本的「馬來群島」（Malay Archipelago），他移除西班牙殖民的菲律賓巴拉望群島，納入華萊士和一百年後的馮斯蒂尼斯都沒有列入的英屬科科斯群島及聖誕島。一九五〇年，在印尼茂物植物園工作的馮斯蒂尼斯發表了同樣題為《馬勒（來）西亞植物誌》（*Flora Malesiana*）的植物專科全書，作為「馬來西亞植物群的圖解系統說明」。雖然書名用的是「Malesia」，但書中通篇卻用了「Malaysia」這個名稱，指代跟華萊士的版本不同的研究區域，而且納入了整個菲律賓和幾內亞群島。馮斯蒂尼斯版本的馬來群島細分出九個子區域，部分子區域重疊了華萊士的版本，這顯示就算有不同的政治議程、殖民歸屬、學科偏好的影響，十九世紀中期以後的歐洲自然科學家們基本上都有同一個「Malesia」或「Malaysia」的地理區域認知。一九六三年以後，博物學研究

開始捨棄「Malaysia」這個名稱，轉而使用「Malesia」來指代這個區域，因為「Malaysia」這時已經被馬來西亞國父東姑阿都拉曼和英國人，用來表示由馬來半島、新加坡、砂拉越和英屬北婆羅洲（現在的沙巴）組成的新政治實體所涵蓋的區域。

植物園及其關係網

在生物地理學研究和各種生物的記載工作如火如荼地進行時，植物園也隨著殖民擴張的腳步抵達世界各地，以方便帝國科學家們採集植物標本作定性、分類和實驗工作。位於倫敦郊區的英國皇家植物園邱園為越洋開設和保養植物園所作出的貢獻可說是數一數二，尤其是在約瑟夫・班克斯爵士管理邱園的一七七八年到一八二〇年間。《帝國花園》的作者大衛・麥克拉肯（David McCracken）認為，包括新加坡植物園在內，大英帝國在自己的殖民地上共有一百一十五座這樣的植物園。這一百一十五座植物園形成一個相通的關係網，創造了一個讓植物標本、文獻、研究及管理人才、植物專家和所有資源可以不受管轄和約束而流通的空間。在這過程中，有了英國皇家亞洲學會和旗下林奈學會，還有後來當地的農業暨園藝學會和自然學會的紛紛加入，來自不同國家的會員們得以交換意見，一同構想和實現各自的植物學方案，讓這個關係網的環境和流通更臻完善。

當時的植物學發展不僅和殖民歷史密不可分，更催生出兩種跟植物有關的玻璃容器發明。納薩尼爾・沃德（Nathaniel Ward）是一名醉心於園藝、對工業革命破壞了社會和環境感到深深不滿的外科醫生。他在一八二九年發明了「沃德箱」（Wardian Case）：一種木製的箱子，用玻璃封頂，底部塞滿泥土，隙縫間填滿油灰。在這個密封的小生態箱裡，植物得以不受當時環境污染的影響，自給自足地獲得水源、生根發芽。這個玻璃箱子不僅滿足城市人觀賞園藝植物的療癒性作用，更是大大方便了植物標本遠渡重洋抵達世界各地的運送路程，橡膠樹標本當年便是受益於沃德箱才能成功抵達新加坡。

沃德箱面世的十年後，英國專業園丁約瑟・派克斯頓（Joseph Paxton）帶頭在英國，特別是在邱園裡，建造一系列大型溫室。這個建築構思後來藉助維多利亞工業革命時期大量預製玻璃和鋼鐵零件的能力，啟發了一八五一年倫敦世界博覽會英國展館水晶宮的設計靈感。倫敦世界博覽會作為全球性展覽會的前身，更讓殖民象徵和壯志有更大的空間去實施、想像、記述和驗證。

當比較的幽靈駕臨新加坡殖民地

一八一九年英國殖民者們一抵達新加坡，就把新加坡原有的海濱景緻作了一番改動。

一八二二年英國繪測員菲利普・傑克遜（Philip Jackson）的傑克遜計畫（The Jackson Plan of 1822，也被稱為「新加坡城計畫」）顯示了英國人在新加坡河沿岸地區的一系列規劃：從海岸綿延到內陸山峰的一大片景觀帶，最外面是由炮台牆包圍著的草場，中間是植物園和植物實驗園，尾端是拉浪安山（Bukit Larangan，禁山之意）上的福康寧堡（現為福康寧公園）。這樣的規劃明明白白地向當地土著展示大自然可以如何被征服和改造，以分別形成平地、可以控制樹木和灌木叢不瘋長的植物園子，及山上的防禦工事。景觀帶裡所建的建築物類型也經過一番認真思量：教堂、法院和政府辦公室分布在廣場和植物園中間，當時的新加坡總督萊佛士的住處矗立在山上，景觀帶周邊的地區則以這片人造景緻為中心逐步發展起來。

作為空間的其中一種類型，濱海區（Esplanade）的政府大廈大草場（Padang）同樣被籠罩在歷史和相互對比的影子下。這個空間類型首先是由波斯帝國的阿巴斯一世在十六世紀末期提出的，當時的波斯帝國正把首都遷往伊斯法罕，而阿巴斯一世設想這個延長的開放空間能把王宮、市集、回教堂、學校等所有公共空間正式連接起來，作為別具一格的治國用途之餘，也讓整座城市的輪廓更加明確。這種被稱為「maidan」（露天空地）的伊斯蘭式空間類型，也被英殖民者正式引用來治理印度，在各個「maidan」邊建造類似的公共建物，在加爾各答、孟買、馬德拉斯（現在的金奈）加建抵禦外敵的圍牆堡壘。馬來半島方面，隨著檳榔嶼在一七八六年成為第一個海峽殖民地，也被英國殖民者引進這個空間類型，隨後也逐步在

其他城市實施。

新加坡直線形設計的濱海區大草場（Esplanade，源自拉丁文 *explānāre*，意思是水平對齊）在擴大面積後取代了當地原本的廣場，用作聯繫英國殖民者和當地人民的第一個景觀空間。除了用作軍隊集結和訓練的地方外，這塊綠地也是英國殖民者的運動或遊戲場地，部分也是因為板球會所就在草場的其中一端。作為運動場，它可以用作板球、足球和橄欖球比賽的場地；作為活動場地，它也能滿足英國殖民者舉行正式典禮的需求。這三種用途都為英國殖民者向當地居民灌輸和宣揚他們紀律嚴明、堅忍不拔的作風，也同時展示這些白人的另一面：雖然有時紀律嚴明、驍勇好戰，但是對於其他人，他們可以放下警惕，休息整頓。他們邀請殖民地人民和他們一同共用這片草地，尤其每當運動賽季更是廣邀群眾共襄盛舉。在大草場周邊，一棟棟新古典主義風格的政府及商業建築物的組成，鞏固殖民政府的合法性，彰顯當地人和這些新移民之間的差異。

傑克遜於一八二二年繪製「新加坡城計畫」時，把康寧堡山腳下一塊十九公頃大的土地框定為植物園和植物實驗園。這個決定是出於萊佛士和納撒尼爾·瓦立池（Nathaniel Wallich）的提議，萊佛士是自然史愛好者；瓦立池則是來自丹麥的加爾各答植物園園長，一八二二年因病來到新加坡休養。除了種植各種香料和經濟作物，瓦立池計畫在這片園子培育可以用作建材或補船材料的樹種，以應付英國把在馬六甲海峽的主要港口從檳城遷往新加坡後突然大

增的木料需求。只是這個實驗計畫只維持了七年就結束了，隨後這片土地重新劃分，一部分用來建亞美尼亞教堂，其餘的地方陸續建了學校、醫院，最後則是新加坡高等法院（現已改為新加坡國家美術館）。

植物園的角色

設立植物園的努力並未因此消停，反而接踵而來。一八三六年，新加坡農業暨園藝學會的幾名會員得到原址的二點八公頃土地作園藝用途，但後來他們打理這塊園地的意願減退了，所以這塊地在十年後又交還到殖民政府手中。直到一八五九年，重新活躍起來的新加坡農業暨園藝學會得到了一塊由親英慈善家胡亞基捐贈的甘蜜種植地，面積達五十六英畝，地點在東陵（Tanglin）。這次的努力總算有所收穫。一八七〇年代，這個園子裡已經生長著大約五百個不同的植物品種，有長滿花朵的梯形休閒花田和一潭寬闊的沼澤湖。

以殖民標準來看，東陵這座植物園在隨後的殖民發展過程所扮演的角色，可說是蔚為楷模。除了是收藏植物和實驗的地點之外，一八七九年，這座植物園裡有四十一公頃的面積都在扮演「商業植物園」的角色，協助英殖民政府在海峽殖民地探索和開發新的農地。隨後英殖民政府積極推動新加坡、馬來亞及這片區域內的農地大量種植單一作物，從根本上不可逆

轉地改變了這個區域的地理景觀和經濟地位。像亨利・李德利就成功點石成金，把幾株沃德箱裡的橡膠幼苗，搖身一變成一桶桶製造巨大利潤的乳膠，為這個區域的橡膠產業奠基之餘，也鞏固橡膠樹一百多年來在馬來亞的經濟支柱地位。

二戰後的重新想像

一九六五年，經歷了二戰的創傷，以及獨立的洗禮後，新加坡政府大廈大草場和植物園的含義及用途徹底改轍易途，當地政府及人民重新拿回這兩個空間的自主權，由當地人自行管理和使用。殖民時期的宣導被新的國家教育內容取代後，這些空間背後蘊含的政治意味或相關的聯想也一併轉向，新一代年輕新加坡人可能已經無從得知這段過去了。

二〇〇五年八月，新加坡政府宣布將在濱海灣南部的一大塊填海空地上建造濱海灣花園，這讓園藝景觀和它背後夾帶的意圖，再次成為新加坡重塑國家形象和重新想像自我的先鋒。現在的濱海灣花園被寄予厚望，將取代殖民時期的濱海區、二戰後的摩天大樓，為這座城市重新劃出一條新的海岸線。相較於在東海岸公園兩旁興建高樓大廈的計畫，濱海灣花園建案可說是迥然不同，不管是開車途經高速大道，還是從海上俯瞰，這都是新的空間規劃和對比所要創造的新體驗。

參考書目

Alfred Russel Wallace（阿爾弗雷德・華萊士）, 1869. *The Malay Archipelago: The Land of the Orang-utan, and the Bird of Paradise. A Narrative of Travel, with Studies of Man and Nature*.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Benedict Anderson（班納迪克・安德森）,1998. *The Spectre of Comparisons: Nationalism, Southeast Asia and the World*. New York: Verso.

Bonnie Tinsley（博妮・丁斯利）, 1983. *Singapore Green: A History and Guide to the Botanic Gardens*. Singapore: Times Books International.

C.G. G. J. van Steenis（C. G. G. J. 馮斯蒂尼斯）, 1950. *Flora Malesiana—being an Illustrated Systematic Account of the Malaysian Flora, including Keys for Determination, Diagnostic Descriptions, References to the Literature, Synonymy, and Distribution, and Notes on the Ecology of its Wild and Commonly Cultivated Plants*. Jakarta: Botanic Gardens of Indonesia, Bogor.

Donal P. McCracken（大衛・麥克拉肯）, 1997. *Gardens of Empire: Botanical Institutions of the Victorian British Empire*. London: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Frederick N. Chasen（弗雷德里克・N・查森）, 1940. *A Handlist of Malaysian Mammals: A Systematic List of the Mammals of the Malay Peninsula, Sumatra, Borneo and Java, Including the Adjacent Small Islands*. Singapore: Raffles Museum.

Jeyamalar Kathirithamby-Wells（傑亞瑪拉・卡提里坦比・威爾斯），2005. *Nature and Nation: Forests and Development in Peninsular Malaysia*. Copenhagen: NIAS Press.

José Rizal（扶西・黎剎）(Soledad Lacson-Locsin, trans. 1996). 1887. *Noli Me Tángere*.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Lucile H. Brockway（魯希爾・H・布洛克威），1979. *Science and Colonial Expansion: The Role of the British Royal Botanic Garden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Stephen P. Blake（史蒂芬・P・布雷克），1999. *Half the World: the Social Architecture of Safavid, 1590-1722*. California: Mazda Publishers.

Victor R. Savage（維克多・薩維奇），1984. *Western Impressions of Landscape in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圖3-1：茂物植物園實驗室



圖3-2：茂物植物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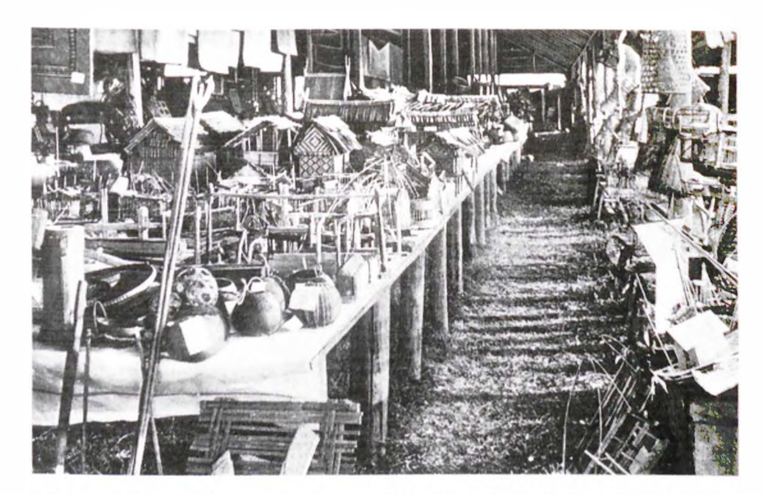


圖3-3：在馬來西亞霹靂州江沙舉行的一個農作物及植物展銷會。



圖3-4：把藤曬乾。（地點：新加坡）



圖3-5：新加坡的一家製藤工廠。

世界主義與東南亞城市

「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這專有名詞是一個由來已久的概念，衍生自希臘文「*kosmopolitēs*」，即「世界」與「市民」的結合，用以形容自古以來人類在地球上的持續流動。它或許具有地域、文化、語言甚至是種族上的意義，但並不具有國家層面的意涵，因為其概念及實踐早於國族及國族主義（nation／nationalism）的概念形成之前。儘管如此，過去五個世紀以來，國家的形式已成為我們時代中，政治及空間意識上最普世的正當價值。就如其先驅國際聯盟（一九一九），聯合國（一九四五）是目前被公認為一個維護所有國家形式的全球性組織。國家形式在這過程中取代了古老的主權形式，從內戰或國家間的交戰中可見，其效忠度或已促使追隨者自願犧牲，最終獻出生命的地步。國家邊界或疆界的劃定限制了世界主義者的流動，但基本上並不妨礙其發展。

「東南亞」作為一九四五年二戰後一個地域分類及學術研究上新穎的名詞，它涵蓋了許多位於亞洲大陸的國家如越南、柬埔寨、寮國、緬甸及泰國；其他包含在內的國家，由南中國海的群島或部分島嶼組成，如菲律賓、汶萊、印尼及新加坡。當中，馬來西亞不但是大陸的一部分，也是婆羅洲島（加里曼丹）的一部分。這些古老邦國日益重要，是因為本區位置順著亞洲、中東及歐洲之間各方陸運及海運的貿易路線，以交易種植品及天然物產。這些古老的海運航道運用交易及季風系統，使東南亞人們聯通到較大的航海地理區，亦即廣為所知的太平洋南島語系諸島，其範圍北至台灣、南至紐西蘭、東達復活節島、西到馬達加斯加。此區的人們共享語言以及各種社會與物質文化的特徵。在西方殖民之前，東南亞地緣政治上的集合城市被形容為曼荼羅體系的邦國或銀河系政體一樣的政治體系（galactic polities），神王在此授予權力，而其統治勢力從節點狀的中心向外放射。在遠離中心的邊緣上可察覺到「統治者」影響微乎其微，而且並沒有固定的邊界存在。上述節點狀的權力中心以及其他海岸城市的脈動、成長及沒落，取決於政治面貌以及占據此空間體制中顯要地位的人物。東南亞各景觀反映出這類治理形式在西方殖民期前持續有效。

除了上述陸地和水域空間的種種想像，植物學在東南亞都市的轉變中亦被認為有其重要性。西方帝國主義起源於十六世紀，總的來說，是個關於資本家到其他地方控制當地自然資源的故事：產自東南亞的香料和農林產品是各地被殖民的主要原因，伴隨而來的是科學上的

合理化，以及地景與海景基於生物和原料目的之功能性轉換。殖民時期，為了生產經濟作物，規定土地形態採行單種栽種的種植場方式：這與赤道氣候利於多樣性和空間共存的複雜植物生長模式不一致或背道而馳。種植橡膠、甘蜜、胡椒、茶葉、咖啡等經濟作物而合理化自然空間，但同時也創造了城市和產業城鎮，生產經濟作物及加工產品出口到其他地方供消費。這期間，幾個主要殖民城市的人口規模呈指數成長。二十世紀之交，日本人為了殖民目的，特別向英國學習了很長一段時間，自一九四二至一九四五年在亞洲取代大部分西方殖民者，侵略、占領了大部分的東南亞國家以建立所謂的「大東亞共榮圈」，並引爆了第二次世界大戰。

在東南亞，西方殖民期間闡明了世界主義者的移動，與宗主國的空間、殖民地以及兩者間的其他空間相關。各社群自然且有意識地被分隔成居住、工作及休閒三個空間，而子群和次社群則寄居在這些空間中。在區域及全球的尺度中，空間也受到與西方殖民者類型相關的內部結構的影響。舉例而言，越南、柬埔寨及寮國由法國占領，並命名「印度支那」；同時，法國還為越南建立了對柬埔寨和寮國其他兩個國家的內部政治和社會支配權。緬甸、汶萊、馬來半島及新加坡曾被英國殖民，英國鼓勵來自中國南方及印度大規模的移民，以與土著勞動力競爭，在這些經濟企業自行成為大規模菁英集團之前協助他們。

誠如專研東南亞的知名學者班納迪克．安德森所主張，殖民時期透過空間以及空間的營造，迫使殖民帝國的宗主國與殖民地之間產生連結。在《比較的幽靈》一書中，他形容小說《不

許犯我》的主角如何回到一八八〇年代的殖民地馬尼拉，站在那相當不起眼的植物園前面，失智地將這些資金充足且獲得細心照料的歐洲植物園想像成幽靈。諸如此類殖民地的空間形態，不再能被理解為日常和平凡，但出現在宗主國時卻能同時意識到它們的差異。這本小說的作者正是菲律賓最重要的民族主義者扶西．黎剎，他也穿梭行旅於（西班牙和歐洲的）各大宗主國和東南亞之間，並導引出如此觀點。對於受困於這些空間中的人們，國際旅行相當大幅度地受限及兩極化於這些軸心和連接點，而不是自由自在地旅行並符合「世界主義」的原意。

在西方帝國的各宗主國裡，大規模的博覽會及展銷會也開始在空間上指涉並建構各殖民地的形象，向殖民帝國和西方觀眾展示和遊行他們所征服的帝國一部分，企圖教育他們的公民，並宣示其在世界中「文明」的角色。舉例而言，一九二四年，鄰近倫敦的溫布利便興建了馬來亞館，但其構成迥然相異而顯得矯揉造作。在這座虛構出來的建築物前方，複製了一尊殖民官萊佛士的雕像，建築外表是印度伊斯蘭風格而內部則是倉庫般的室內空間。二十位馬來工匠及隨員自馬來半島搭船前來，穿上他們的傳統服飾陳列其間，為會館「增添真實性」，卻因為與赤道氣候全然不同的寒冷嚴冬，造成一人逝世，其他人則病倒。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日本將這種殖民空間計畫擴展至東南亞，我們或許也可以通過這類展覽空間的形式，見證日本的殖民野心及其受到英國的指導。尤其是一九一〇年倫敦的日本—英國展，日本在朝鮮館及福爾摩沙館中，向其他帝國勢力展示其殖民地的歷史及文化。

經過兩次世界大戰、地方菁英群體重新獲得政治主權、開始去殖民化及建國的進程。他們提出在首都和其他城市地點設置國家的建築物，想像、創造國家的形式，並創建如同今日我們所認知的當代國家。在兩次世界大戰前後的民族主義階段，世界主義所扮演的角色都必須被重視。舉例而言，世紀之交之際，孫中山和泰戈爾分別訪問過東南亞的城市，孫中山向東南亞及海外華僑尋求支援及募款，泰戈爾則想像東南亞和亞洲的文化與藝術的未來。後來，許多東南亞民族主義者如陳馬六甲（Tan Malaka）、胡志明（Ho Chi Minh）及翁嘉化（Onn bin Jaafar），證明了如何藉由旅行和僑居與大量離散在東南亞城市的人口，建立聯盟、團體和網絡以追求民族主義的理想。當這些國家脫離西方和亞洲的殖民者達成獨立後，世界主義在東南亞的重要性進一步擴大，這次在東南亞內扮演一個比較受限於國與國之間的角色，但也藉由全球資本主義新框架而開展。

戰後國家的空間或地緣機體（Geo-Body）由邊界圍合而成，藉由國家的維護及防衛，以限制「未經許可的踰越」或遷徙。在東南亞，這些邊界重新塑造銀河系政體以及其後的殖民政體，也變成模糊的三不管地帶，隔離了有共同種族淵源的人們，或是那些在先前連續通暢的區域空間中，宣誓信奉相同宗教的人們。這種情況或許在泰國南部及菲律賓南部可見，或者如泰國和柬埔寨為了爭奪柏威夏寺（Preah Vihear Temple）而正進行的軍事衝突，這次是因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可」該廟為一處「世界遺產」。在這種地理邊界的國家空間內，首

都或行政中心被興建為國家的新治理空間，既可能會取代原來的政治中心或是全新打造而成。首都或是行政中心提供一個單一的空間中心，治國之道可在此集中、概括且明顯地示範，並且向外投射到該國其他城市、鄉村和地景。在國家之外，為了想像及創造國家而建立的領域和空間，也在其實際疆界和邊界之外同心地構建為兩個意識形態領域：區域和世界。世界上的（國際性）國家是其最終的結構，而「區域」也許可理解為介於國家和世界之間從中反映歷史紀事的空間地點。「區域」也指稱其他地理上環繞在旁的諸國空間。在許多例子中，「區域」也可比擬成一個不連續的時間和／或空間裡民族國家的網絡，既出於某些目的或議題而聯合或共存的團體。

在國家的首都城市或行政中心裡，公共建設或建築計畫工程被視為「國民」達致自治與獨立的意義，將他們和國家連接起來，並且為了新的和潛在的公民而使空間具體化。二戰的結束預示了冷戰的到來，這個地區立刻變成一座嚴酷的政治劇場，同時重塑當地的勢力範圍及其世界盟國；以美國為首的「自由世界」和蘇聯之間的對立分歧，也在各國和東南亞本身的空間上表現出來。就如明確表達他們選擇的治理形式般，這些新國家的治理菁英們和主要派系的基金組織聯盟及談判，競相地建立他們的城市和基礎建設，進一步參與當地、區域和全球政治經濟。我曾在別處議論過，不同組合的「比較的幽靈」對於各個國家嵌入式「宗主國—殖民地」的關係，以及由於不同民族國家先前的殖民化而導致空間和經濟上差異的程度，

進而創造了第二種幽靈以比較冷戰開始後的發展及區域內部政治上的治理。

當冷戰使相關國家分裂成兩大陣營時，數個非洲和亞洲國家則提出一個第三世界（新興力量聯合會或亞非聯合會），國際「戰爭」的形式表現被轉置為城市體育，尤其是各國可基於身體「格鬥」的形式而互相競爭和「戰鬥」。一八九六年復辦的奧運，展示了其包容和排斥的國際政治，導致替代的運動會：由東南亞和東亞國家所舉辦的遠東運動會（一九一三至一九三四），以及新發起的「不結盟運動」所舉辦的新興力量運動會（GANEFO，一九六三至一九六六）。東南亞的城市體育和社會進步、現代性與民族主義（我們相對他們）緊緊相依，不久較小規模的賽會逐步地醞釀且實現：亞運會（始於一九五一年）及東南亞半島運動會（始於一九五九年）。在這些運動會中，主要以「國家」場域作為其認同和再現，以及各國家組織短暫且空間上的社群結盟和想像。一九五〇年代至一九七〇年代，各式各樣興建在東南亞的體育館，證明這些因國家結盟而產生的新空間之重要性，加上初期的媒體報導，已經產生了我所說的「觀者國族主義」（spectator nationalism）。

在空間上，以新的、國家的建築物轉換或替代現存的殖民建築物，已成為該地區民族國家首要關注之事。獨立之後，我所謂「比較的幽靈」中的建築物已在實際上和視覺上顯現東南亞城市的改變與發展。舉例而言，在吉隆坡，為一九五七年馬來亞獨立而興建的默迪卡體育館，允許兩萬人得以在此觀看政權轉移，並取代了人工綠地空間的殖民時期草場。隨後，

一九九七年宣布的十五乘五十公里線性規劃的多媒體超級走廊將馬來西亞首都空間化，包括新的吉隆坡城中城（二十二項綜合計畫中以國油雙峰塔最為著名）、散布在四千五百公頃土地上的新行政中心布城、賽城以及新的吉隆坡國際機場。在新加坡，一九七二年興建的國家體育場為國民觀眾創造一處集會空間。儘管如此，最壯觀的發展是自一九七〇年代，在環繞一片水域的海埔新生地上創建出來的濱海灣，以及沿岸各個標誌性建築的安置。這片海灣本身與殖民時期的草場相連，交錯縱橫於主要道路和目前各項計畫的工程地點，像是新的濱海灣植物園、一個浮動舞台和露天劇場（國民觀眾）、濱海藝術中心，以及新商業區裡一棟棟的建築物。與草場及其周遭各新古典主義的建築直接地實際對比，事實上，濱海灣或許可解釋為一種對殖民時期空間置於前後比較中的轉換。然而，為這些在馬來西亞和新加坡進行中的計畫而工作的建築師和工人們，是從當地、區域和全球各處招聘而來，而這件事本身或許就是對世界主義的浮現及先見之明的注解。

誠如我嘗試在本文中所論證，東南亞人及其城市的命運總是與橫跨世界地理者的大規模世界主義活動，以及隨後超越國家形式的各階段相關。在社會及文化上已經產生更巨大且更深入的衝擊，與政治及資本主義原理並肩而行，表面上看似操控了今日「全球化」的世界。在東南亞地區和世界各地，相關世界主義與其對空間的衝擊以及空間實踐將持續變得重要，而我們需掌握並有所認知。

參考書目

Benedict Anderson, 1998. *The Spectre of Comparisons: Nationalism, Southeast Asia and the World.* New York: Verso.

James C.Scott, 1998. *Seeing Like a State: 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Lai Chee Kien, 2007. *Building Merdeka: Independence Architecture in Kuala Lumpur, 1957-1966.* Kuala Lumpur: Galeri Petronas.

Lai Chee Kien, 2008. "Spectres and Lags: Comparative Spatial Studies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alism". In *Paper for Symposium: Social Theory and Historiography in the Writing of Asian Architecture, 20.* September 2008, Institute of Post Colonial Studies, Melbourne, Australia.

Milhail Bakhtin, 1981. *The Dialogic Imagination: Four Essays*. ed. Michael Holquist, trans. Caryl Emerson & Michael Holquist.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Oliver William Wolters, 1999. *History, Culture, and Region in Southeast Asian Perspectives.* Ithaca: Southeast Asia Program, Cornell University.

Pheng Cheah, 1998. "The Cosmopolital-Today". In *Cosmopolitics:Thinking and Feeling beyond the Nation*, Pheng Cheah and Bruce Robbins ed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Rustom Bharucha, 2006. *Another Asia: Rabindranath Tagore and Okakura Tenshi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Thongchai Winichakul, 1994. *Siam Mapped: A History of the Geo-Body of a Natio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圖4-1：馬來西亞納閩直轄區河村景象。



圖4-2：在泰國曼谷昭拍耶河沿岸曬魚之景象。



圖4-3：越南的湄公河三角洲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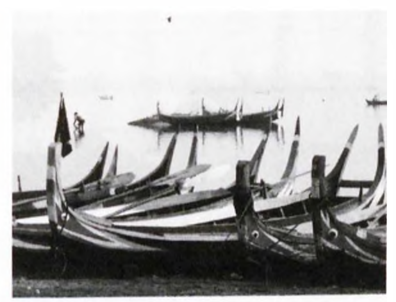


圖4-4：緬甸伊洛瓦底江沿岸的船隻 。



圖4-5：馬來西亞登嘉樓河沿岸的船隻。



圖4-6：印尼巨港穆西河 (Musi River) 渡輪。

熱帶的隱喻：濕熱氣候下的建築政治

前言：哥斯達黎加論壇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一場名為「遇見熱帶」的論壇在哥斯達黎加聖荷西（San José, Costa Rice）熱帶建築學院展開了。它是由哥斯達黎加建築師布魯諾．史塔格諾（Bruno Stagno）所發起召集的，他在哥斯達黎加進行的建築工程獲得了荷蘭克勞斯親王文化和發展基金。他成立研究所，並邀請共八位分別來自印度、馬來西亞、新加坡、澳洲、巴西、巴拿馬和古巴等熱帶地區執業的建築師、學者和評論家，一起參與論壇。當時提出批判地域主義概念（Critical Regionalism）的荷蘭台夫特理工大學的亞歷山大．宗尼斯（Alexander Tzonis）和莉亞納．勒

費弗爾（Liane Lefaivre）亦受邀參加。[1]透過研討過程迸發的集體火花，也促使召集人和與會者將各自提交的文章集結成《熱帶建築》（*Tropical Architecture: Critical Regionalism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或許他們「已意識到透過地域發出自鳴聲量的重要性，以及熱帶對生活和文化的重要性。」[2]藉由宗尼斯和勒費弗爾的推薦，兩位來自新加坡的建築師馬裕華（Philip Bay）和鄭慶順對相關議題討論文章，也收在該書第十二及十三篇。這篇文章是我試圖藉由建築政治及熱帶地域建築發展面向，討論該場論壇和那本著作所呈現的各種利害關係。

緯度、比喻和熱帶

熱帶，由地理和天文現象組成，被定義成介於地球表面兩個假想緯度之間的區域：北迴歸線以南和南迴歸線以北——即北緯二十三點五度和南緯二十三點五度之間的赤道地區。陸地範圍涵蓋了中南美洲、非洲中部和南部、南亞部分地區、東南亞和澳洲北部的國家，其中有絕大部分是由歐洲和美國所管轄的前殖民地和自治區。

「熱帶」（tropic）和文學修辭的「比喻」（trope），這兩個詞彙皆源於古希臘文「tropikos」，意思是「轉向」。「比喻」是在描寫事物或說明道理時，將原本的意義透過某種特定方式，把單字或片語刻意轉化另一個顯著的含意，而這兩件事物或道理具有共通點。[3]

在古希臘天文學中，「trope」這個詞描述的是冬至時太陽轉向並穿過黃道的地理位置，而北迴歸線以南和南迴歸線以北的假想線之外，太陽則永遠不會升起至地球表面仰角九十度乃至於改變軌跡。

地球表面所謂熱帶地區的假想邊界，實際上也經常發生變化，並非始終維持在二十三點五度。由於其他行星所造成的引力，這兩條線正以每年十四點四公尺的速度向赤道方向位移，並且將在九千年後轉向南北極。[4]因此，我們稱為熱帶的地方其實是一個不停位移的地帶，就類似後續章節討論的建築政治，熱帶是一個不斷與溫帶氣候相互協商／妥協的地區。在此前提下，我把「熱帶建築」視為一種比喻，因為截至目前為止，它在不同的歷史進程中、在不同的主權治理下，被預期的含義、定義和受眾，一一衍生出不同的變化。我的目的是表明，「熱帶建築」一詞的特殊性不僅擴張到東西方之間的緊張關係中，也隱含在南北、殖民／後殖民及發展和地緣政治議題之間的對話中。

1 Bruno Stagno. *Tropical Architecture*, Preface, p. vii.

2 同上。

3 M. H. Abrams ed., "A 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 p. 96.

4 Benjamin Chao(趙丰), "'Concrete' Testimony to Shifting Latitude of the Tropics", pp. 9-11. 趙丰計算出(太陽)改變運行軌跡，導致熱帶地區將再移動九十公里。

殖民意圖：地理、醫學、人類學

在上個千年的前半葉，熱帶地區並不是地理學中認知土地或「已知土地」的一部分，因此在這段時期西方所繪製的地圖中並沒有出現熱帶地區。隨著歐洲旅人的腳步及殖民企業的擴張，熱帶被納入自然地理範疇中。這些殖民企業從十六世紀開始貿易並剝奪香料、食物、原料和勞工。近代自然地理學、醫學和人類學等學科訓練，亦同步發展出各種特殊工具和方法，藉由圖像化和計算的手法，合理化解釋熱帶地區被西方殖民長久盤據範圍（甚至延續至今）所包含的種種行為，也為帝國經濟學和法國哲學啟蒙運動背書。

對西方大眾來說，熱帶地區的感知和消費在歷史上被表述成對立面，猶如「危境與天堂」。在這種情況下，熱帶的環境特殊條件、高溫、潮濕和非溫帶病原體的存在，對西方人（或來自於高緯度地區的人）構成了生物環境的危險。軍隊和殖民地人口因熱帶疾病而喪失能力和大量死亡，進而確立並發展出熱帶醫學的分支，以遏止或預防熱帶疾病的發生，並緩解熱帶地區居住的難以適應性。[5] 英國針對熱帶疾病的第一部重要著作《關於炎熱氣候下歐洲人偶發疾病》（*Essay on Diseases Incidental to Europeans in Hot Climates*），是由海軍外科醫生詹姆斯．林德（James Lind）於一七六八年所撰寫的。之後其他醫學相關著作中，熱帶這類所謂危險地區，被圖像化並被視為不健康的和人類低能量水平地方的代表。[6] 隨著殖民發展，「熱

帶」一詞逐步連結並衍伸至更多學科，例如社會學、地景設計甚至流行音樂。[5]

然而，對熱帶地區發自內心的想像，是根據當地資源和物產豐饒程度而來，這一點直到今日仍廣為流傳。世界各地除了依賴熱帶特有的生物多樣性所生產的食物和物品，人們提及熱帶時腦海所呈現的畫面，莫過於鬱鬱蔥蔥和未受破壞的自然景緻，很容易連結到再建伊甸園和非工業化城市的想像。因此，這種物產豐饒且非西方式的自然，被嵌入了具有象徵性的、物質的和政治的結構中，而不是熱帶殖民地地區的性別和種族被納入。許多例子顯示，即使西方「專家」即時記載並「掌握」當地生活事務，這種觀點也始終存在。舉例來說，我將引述建築師馬克斯威爾．弗萊（Maxwell Fry）的說辭，那是他根據自己在非洲和印度的經歷發表的一篇關於熱帶建築的重要文章。後來他在一九六三年第一次訪問馬來西亞。因此，他被重新引入同為熱帶但不同的區域：

「我初抵埠吉隆坡時還滿幸運的，頭一星期平實但開心，每個細節對我來說都很印

5 有關此的延伸討論，請參照：Nancy Stepan, "The New Tropical Pathology", in *Picturing Tropical Nature*, pp. 149-179; 以及 Alfred Crosby, *Ecological Imperialism*, pp. 134-144

6 Nancy Stepan, *Picturing Tropical Nature*, pp. 158-171.

7 Ibid., p. 212.

象深刻。對比以往經驗，熱帶景緻從未像現在這樣神奇，種族之間從未如此交融而和諧，連接待我的主人氣質和態度也從未如此謙和暖心。」

「你必須接受我簡單的愉悅，因為它值得。……就目前而言，除非你能為我找到（草叢中的蛇），否則我仍然是你的亞當，仍無罪地在你花園裡散步。」[8]

有關現代熱帶建築論述的系譜

現代熱帶建築論述的起源，或許可追溯到一九三二年由亨利．羅素．希區考克（Henry-Russell Hitchcock）與菲力普．強生（Philip Johnson）在當代藝術博物館（MOMA）共同策劃，當時急速增加的現代主義建築的展覽，被人們稱作「國際風格」（International Style）。一九四六年，希區考克在倫敦的建築聯盟（A.A.）宣讀一篇題為〈不同國家對現代建築的適應性〉（"The Acclimatization of Modern Architecture in Different Countries"）的文章，澄清並且修正十四年前他和強生共同發表的宣言。因為對象是英國觀眾，希區考克在文章中分別引用了法蘭克．洛伊．萊特（Frank Lloyd Wright）、阿爾瓦．阿爾托（Alvar Aalto）、奧斯卡．尼邁耶（Oscar Niemeyer）和勒．柯比意（Le Corbusier）在巴西的建築案例，坦承「建築並不像過去二十年的趨勢那樣，具有完全的國際統一性」。在討論建築師們對氣候和區域

的介入時，他總結說：「國際現代建築可能被視為一種新的建築語彙，不只是表達普遍存在國際間的樣式，也是特定地方和民族特徵的載體。」[10]他強調：「建築在戰後的目的是提供數以萬計的住宅，以便重建整個城市，以提供當今文明認為對人類福祉必備的社區。」[11]

同時，這批在海外不同熱帶殖民地工作的私人建築師和工程師，都承認需要以適應當地不同氣候的方式來建設。他們在非西方世界所做的各種現代主義建築的嘗試，後來陸續在不同期刊、會議和書籍中以更正式的方式分享經驗。一九六九年弗洛・艾金森（Fello Atkinson）在一篇題為〈現代熱帶建築的起源〉的專文中，首次將「現代」一詞與熱帶建築結合起來。艾金森曾拜訪許多不同熱帶國家，並在其中的一些地方興建房子。在倫敦皇家藝術學會發表時，他向觀眾描述在異地廣泛的旅行經歷，並藉由建築手稿說明。儘管艾金森是通過東方主義的視角以解釋了他賦予「現代」的含義。差異主要體現在美學和功能兩方面，美學上他坦承這些熱帶國家存在的現有建築相對「少了點優雅」，而功能上這些結構「幾乎無

8 E. Maxwell Fry, *First Impressions of Kuala Lumpur*, pp. 26-27.

9 Henry Russell Hitchcock, *The Acclimatization of Modern Architecture in Different Countries*, p. 3.

10 Ibid., p. 6.

11 Ibid., p. 5.

法滿足當今更複雜的條件」。[12]之後，他定義熱帶建築之所以出現新樣貌，乃歸因於民族國家的形成，以及外國建築師相繼參與重大的國家計畫：

> 「二戰後各個國家如雨後春筍出現，這些新的獨立國家轉向現代主義建築師，例如柯比意的香地葛（Chandigarh）、路易斯·康（Louis Kahn）的伊斯蘭瑪巴德（Islamabad）、格羅佩斯（W. Gropius）的巴格達（Baghdad）等等。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些國家獨立前，並沒有熱帶建築。」[13]

因此，希區考克和艾金森的兩篇文章爭論點在於差異性，以及如何透過持續強加具有實證主義意圖的現代主義建築，來減緩這種情況。這些潛在問題，不僅在於物理距離和殖民意圖，也在於西方新興建築風格和實踐，與被視為「傳統」、鄉土或區域建築的衝突。

熱帶建築研討會

一九五〇年代，在西方許多城市舉辦好幾次關於熱帶建築的研討會。此時，歐洲正逐步從二戰中恢復，並期許能重新加入全球經濟市場。戰後，歐洲除了經歷自己所屬國家的重建

過程，他們也將目光投向前殖民地和第三世界的發展和建設。其中，許多國家最近陸續或即將獨立，並重新塑造其國家的社會政治經濟格局，以因應全球已存在的諸多挑戰。援助和專業知識的介入，被視為迫切需要並且有益處。此類海外建築計畫尾隨的經濟潛力和價值，也十分巨大。一九六八年倫敦建築研究所（Building Research Station, BRS）報告也顯示了此一跡象，英國光是在熱帶地區的建築價值就高達一億七千萬英鎊。[14]該研究所出版品《海外建築筆記》（*Overseas Building Notes*）也報導：一九六〇年，整個亞洲估計達到一億四千五百萬個單位的住房嚴重短缺。[15]

從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二年，聯合國發表專家們拜訪南亞、東南亞及加勒比海地區的低成本熱帶住房及城鄉和國家規劃報告。[16]熱帶建築研討會在鹿特丹（一九五一年九月二十一至二十五日）、里斯本（一九五二年）、華盛頓特區（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十八至十九日）和倫

12 Fello Atkinson, *The Genesis of Modern Tropical Architecture*, p. 548.

13 Ibid., p. 554. 艾金森也揭示了他與柯比意的巴西計畫和海外執業建築師之間的談話。

14 Building Research Station, "Building Overseas in Warm Climates" *Digest* 92 (Second Series), SfB Bb1, April 1968.

15 *Overseas Building Notes*, No. 111, July 1966, p. 8.

16 Mary Vance, *Tropical Architecture: A Bibliography*, p. 13.

敦（一九五三年三月二十三至二十七日）舉行。里斯本研討會和華盛頓特區研討會，分別由國際住房和城市規劃大會以及美國建築和研究諮詢委員會主持，側重於發展中國家住房及熱帶地區建造和生活技術與實踐。在每種情況中，演講都是長期關注各國住房發展或領導技術、材料或氣候研究領域的「專家」所發表的。[17]

一九五三年的倫敦研討會由來自奈及利亞的阿德多昆・阿德耶米（Adedokun Adeyemi）發起，他當時是曼徹斯特建築學院四年級學生。阿德耶米組織了一個由英國皇家建築師學會和殖民地辦公室代表所組成的委員會，研討會在以上機構的協助下共發表十五篇文章。[18]根據當時的報導，共有兩百名學生、執業建築師、工程師和政府顧問團成員參加，「超過一半的與會者，來自熱帶或亞熱帶地區」。[19]除了之前歐洲和美國會議上提交了技術論文外，這次研討會最顯著的差別在於：對建築實踐專業和隨之而來的規劃和設計關注點，進行更詳細的闡述。決議在會議的最後一天進行，以繼續開展工作並促進以下五點事項[20]：

一、為有興趣在熱帶地區工作的學生和建築師改進教育設施，特別是建立普通和研究生等級的建築和規劃研究永久中心。

二、鼓勵當地建築工藝以及適於當代建築的使用方式。

三、著重熱帶建築與規劃資訊的相關出版。

四、建立區域研究和資訊中心。
五、加強研討會的相關組織。

建築科學、規範和學術界

倫敦建築聯盟（Architectural Association, A.A.）所屬的熱帶建築學系，是一九五三年倫敦研討會的直接結果。奧托．柯尼斯堡（Otto Königsberger）當時是倫敦衛生與熱帶醫學學院研究員，阿德耶米與柯尼斯堡接觸，並開設了在第三世界設計和建造的短期課程。該課程涉及第三世界的特殊性及氣候條件，阿德耶米認為自己過去在英國的訓練過程未能解決問題。熱帶建築學系在一九五四年九月收了第一批主要以英語為媒介語的學生，為期六個月的

17 華盛頓特區研討會包含 Douglas Lee、Victor Olgyay、Albert Mayer 和 G. Anthony Atkinson 國際或國家建築研究計畫的顧問。BRAB research conference no. 5 "Housing and Building in Hot-Humid and Hot-Dry climates"，pp. i to iv.

18 見會議記錄報告，"Conference on Tropical Architecture 1953"，pp. 1-4.

19 The Builder. "Tropical Architecture Conference at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April 10, 1953, p. 558.

20 見議事錄報告"Conference on Tropical Architecture 1953"，pp. 123-128. "The Development of a School"，p. 337.

課程由剛從印度返回的馬克斯威爾．弗萊和珍．德魯（Jane Drew）兼職教授。隨著柯尼斯堡從一九五七年開始親自參與熱帶建築系的運作，招生人數增加，並主要來自各個「發展中國家」。[21]

位於赤道的另一端，熱帶建築開設另一門專門學術課程是在七年後。始於一九六二年的澳洲墨爾本大學建築系，一群跨學科教師開始為期一年的全日制研究生碩士課程。學校的目標是培養在地適性的合格澳洲建築師、工程師和城市規劃師，並為返回熱帶國家工作的非洲和亞洲學生提供幫助。第一批共十三名學生，分別來自非洲、香港、新加坡和墨爾本，由巴爾萬特．辛格．薩伊尼（Balwant Singh Saini）所帶領。[22]

在兩系課程中，「氣候研究」是學生入學後第一次接觸的重要課程，形式分為授課、討論課、作業和計畫案，目的在為學生提供「熱帶和亞熱帶世界不同地區氣候學的良好基礎」，[23]並瞭解氣候對建築形式的物理影響。兩所學校課程的第二部分主要是設計案，以小組或個人形式參與。兩所學校的設計案的重點，因應授課老師各自的喜好興趣、「在地」或是假設項目的可用性而異。柯尼斯堡在參與學校期間，也同時擔任聯合國的發展專家，並與聯合國在非洲和亞洲所主導的計畫案關係密切。因此，聯合國計畫案帶來的研究和指導方針，也構成設計探索過程的基礎。其中，澳洲小組調查了澳洲熱帶地區當地的房屋設計，並與地方當局（例如鐵路局）合作，提出了住房設計的解決方案。

兩所學校在進行設計實驗前必須先瞭解技術，這決定了設計項目的基本調性。學生們被要求將氣候條件和特性測量依序做成分析圖、圖表和相關統計數據，再確定設計成果。[24]在建築聯盟的情況下，學生在整個課程中都與熱帶地區分開，儘管學生大多都是來自熱帶地區。因此，學生「重新學習」對熱帶地區的知識，這些知識再被重組為代碼，技術設備並做出合理化的詮釋和關注。一九六〇年代曾就讀於建築聯盟熱帶建築學系的新加坡建築師陳守仁（Sonny Chan）回憶說，學校所做的氣候研究對大部分來自發展中國家的同學來說，並不新鮮，課程之外的社交活動反而使同學之間更容易瞭解彼此來自哪裡，以及他們所屬地方的特殊性。[25]學校與其調查區域的天差地遠，甚至讓到訪學校的人倍感驚訝。英國技術合作部長丹尼斯・霍斯珀（Dennis Vosper）描述一九六三年的所見所聞，他認為建築聯盟地處於溫帶環境卻還能

21 Patrick Wakeley, *The Development of a School*, pp. 337-339. Wakeley 一九六三年畢業於熱帶建築學院。

22 Balwant Singh Saini, *About Tropical Building Studies*, pp. 1-4.

23 Patrick Wakeley, *The Development of a School*, p. 339.

24 因此，歐洲和澳洲學生對氣候條件的理解是為了他們未來在熱帶國家或殖民地工作時配備的設計能力。直到一九六〇年代，倫敦殖民辦公室仍派遣建築師前往殖民地。在規劃和發展領域方面，澳洲對亞太島嶼區居民的經濟和福利有著濃厚的興趣。來自 Balwant S. Saini, *About Tropical Building Studies*, p. 3.

25 訪談新加坡的建築師，二〇〇一年七月。

找到熱帶建築課程，著實令人驚訝。[26]

時值一九六〇至一九七〇年代，這些受過教育的建築菁英在各自國家的發展中扮演的角色是極為重要的。回國後，這批學生絕大多數參與了建立建築與規劃專業課程，並建立在地的建築學校。在此之前，建築培訓和專業主要藉由殖民地行政部門、各類公共工程部門和機構進行。許多學生獲取獎學金來到倫敦或墨爾本受教育，再返回母國擔任重要的政府職位，在國家的架構下制定發展策略。因此，透過地方層級的實際工作和參與，熱帶建築的論述也被納入菁英工作範圍。

一九六四年，馬克斯威爾．弗萊和珍．德魯出版了《乾熱與濕熱的熱帶建築》（*Tropical Architecture in the Dry and Humid Zones*），這是第一本關於熱帶建築技術與多樣主題的國際教科書。這本教科書以討論氣候和提供氣候數據為開始，並包含六十頁的附錄，其中包含空調、真菌與白蟻防護以及植物選擇等不同主題的技術問題。本書核心部分以分析圖和照片進行大量說明，介紹如何在熱帶地區解決建築問題，並附有詳細解釋的文字。選定的案例來自世界各地，包括在非洲和印度的許多實際工作記錄。隨後的文本例如格奧爾格．利普施梅埃爾（Georg Lippsmeier）於一九六九年出版的《熱帶地區的建築》（*Tropenbau: Building in the Tropics*），提供大量「建造錯誤」的數據和插圖，這本書和許多其他後來的文本將熱帶建築的重點轉移到建築科學領域，並相信在技術上合理化氣候條件的可能性，以使將其轉化為

建築形式、建築零件和技術，以提供「正確」的建築解決方案。

除了研討會，五零年代還見證西方公共領域對熱帶建築討論顯著地增加。[27]著眼於促進發展中國家建設的可能性，並在世界各地建立建築研究所，利普施梅埃爾報導了多達五十處。[28]英國 Watford 建築研究所定期發布報告，例如《海外建築筆記》（*Overseas Building Notes*）記載了英國殖民地和自治區進行的新工作和研發出的技術。弗萊和德魯、The Architects Co-Partnership 和艾金森等私人海外案例也經常出現在建築期刊，喬治・艾金森（George A. Atkinson）等顧問就特殊主題發表的專題文章也是如此。然而許多書寫仍帶有帝國主義的口吻，例如，珍・德魯以下列方式就建築物的間距提出建議：

「濕熱地區的建築物在成簇群也必須靠得很近，因為人類在熱帶地區的能量相比其他地方少得多。」[29]

26 *Architectural Association Journal*, Vol. 78 No. 871, p. 312.
27 有關熱帶建築期刊文章數量暴增的延伸閱讀，可參閱 Carmen de Figueroa 著作 *Architecture for the Tropics*。
28 Georg Lippsmeier, *Tropenbau: Building in the Tropics*, pp. 260-266.
29 Jane Drew, *Architecture in the Tropics*, p. 5.

發生在熱帶地區的論述，本質上是具備地方性的，主要出現在亞洲和拉丁美洲的許多地方期刊和專業領域。主要原因之一，是西方建築的話語權仍被追隨潮流的菁英認定與他們實務操作有關，即使有延遲的同化。與此同時，當地的專業和學術界也努力形成自身關於身分、傳統、發展和具備現代性的本土論述。除非有西方建築師的參與或由建築師或評論家引領，否則在地的話語權仍舊被其他國際建築平面媒體一再邊緣化。

熱帶建築、批判性區域主義和全球化

從一九七〇到九〇年代，熱帶建築的討論從以西方為中心的建築論述中消失了。一方面，後現代主義和結構主義等理論在西方建築辯論中逐漸浮現。另一個原因，是關於熱帶建築的爭論已確實轉移到外圍的非西方地區，而每個地區又針對不同的特性各自做出反應。至於那些新萌發的、焦慮的和不守成規的形式，相較於西方中心論述中來說也無足輕重。[30]

一九九八年，在哥斯達黎加召開的論壇與以往召開的所有論壇形成鮮明對比。熱帶地區的建築師和學者，第一次聚集在熱帶地區討論熱帶建築及相關議題。討論的背景，也跳脫舊有的戰後熱帶建築企業和經驗，轉移到二十一世紀地方和全球範圍內更廣泛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問題。其中一位與會者拉胡爾．梅洛特拉（Rahul Mehrotra）以下列方式，在南半

球討論了短文會面：

> 「……這是一場南方與南方之間的對話。你或許沒意識到這件事，這真的很令人耳目一新——與人交談可以很簡潔，因為每個人都明白問題所在。我們彼此之間不必花時間告訴對方我來自哪裡，也不必為所做的事辯護——這感覺非常令人耳目一新。」[31]

與會者選擇討論的主題多樣而複雜，強調人們對「主題：熱帶建築」的立場和關注。二〇〇一年研討會相關文章被編纂成書《熱帶建築：全球化時代的批判區域主義》（*Tropical Architecture: Critical Regionalism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並搭配圖說和照片。討論的主軸包含南北半球關係、視覺體驗、城市自然／天堂、傳統／現代以及地方／全球。辨別撰稿人本身關注點的方式是根據他們的章節標題排序，從殖民主義／國民身分（赫拉爾多・莫斯克拉〔Gerardo Mosquera〕、塞韋里亞諾・波爾圖〔Severiano Porto〕、愛德華多・特吉拉・戴維斯〔Eduardo Tejeira Davis〕）、傳統／傳統模型的使用（羅伯托・塞格雷〔Roberto

30 在使用「焦慮」一詞時，我與 Sarah Goldhagen 和 Rejean Legault 著作 *Anxious Modernisms* 中提出的概念相通。

31 與拉胡爾・梅洛特拉的電話交談，二〇〇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Segre」、Tan Hock Beng、愛德華多．特吉拉．戴維斯），到城市發展（羅伯托．塞格雷、鄭慶順）、建築回應（拉胡爾．梅洛特拉、布魯諾．史塔格諾、鄭慶順、楊經文）、綠色／永續議題（布魯諾．史塔格諾、鄭慶順、楊經文）和全球化（赫拉爾多．莫斯克拉、鄭慶順）。

然而，這次論壇上的討論不盡然是南方之聲，史塔格諾還邀請了亞歷山大．宗尼斯和莉亞納．勒費弗爾這兩位荷蘭台夫特的學者，他們在建築史發表廣泛著作，並在一九八〇年代後期首次在國際建築論述中提出「批判性區域主義」一詞。該論壇後決議把與會文章編纂成冊，由史塔格諾、宗尼斯和勒費弗爾共同編輯審定。

最終，書名使用「批判性區域主義」一詞。宗尼斯和勒費弗爾在先前提出批判性區域主義的舊有理論和歷史框架的保護傘下，又進一步合併「熱帶的建築」的範圍。他們也坦承，二〇〇〇年五月的這場論壇[32]及透過與新加坡建築師和學者進一步對話，是一個嫁接[33]現有的類似詮釋的大好時機，也趁機驗證了原先的假設。同時，他們也承認這本書是「有關差異的一種宣言」，是在「相互聯繫與對話的框架中，反映出個體的語境」。[34]

宗尼斯和勒費弗爾為這本書撰寫的章節，題目為〈一九四五年後對區域主義和熱帶主義的抑制和反思〉，它指出建築和城市歷史學家劉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試圖探討區域主義思辨在美國被邊緣化的情況，以及他與國際風格發起人亨利．羅素．希區考克的祕密交集；[35]文章後半的目的則是為建築師們命名，宗尼斯和勒費弗爾認為建築師乃是透過

建築案將現代主義轉移到世界不同角落的關鍵參與者，包括明妮特．德．席爾瓦（Minnette de Silva）、弗萊和德魯、柯比意、理察．諾伊特拉（Richard Neutra）和幾位非洲、南美和東南亞的建築師。而書中所謂的「批判」，是指運用康德或法蘭克福學派具有反身替換的理性手法、俄羅斯評論家維克托．什克洛夫斯基（Victor Shklovsky）所提出的去熟悉化（defamiliarization），相繼運用在建築上。[36]

透過援引「全球化時代」一詞來表示當代相互關聯的全球網絡，宗尼斯和勒費弗爾省略早期全球化時代以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為特徵的討論。因此，本文前面曾描述到一九五〇至六〇年代所提出較早期「熱帶建築」論述的影響和相關歷史背景，也一併被排除在外。從論

32 Tzonis, Lefaivre and Stagno, ed., *Tropical Architecture*, pp. 1-2.

33 同上，引言。決定使用正確術語的困難性，往往可在工作中發現。類似概念稱為批判性區域主義或批判性熱帶主義（critical tropicalism），有時又稱為融合主義（fusionism）和現代熱帶的巴洛克（modern-tropical-Baroque）。

34 Ibid., p. 12.

35 這一章是對宗尼斯和勒費弗爾曾發表過的文章的重寫。一九九一年，由Spyros Amourgis主編的一卷題為〈批判區域主義：Ponoma會議討論過程〉章節中，也有關於批判區域主義和Lewis Mumford的討論。

36 Tzonis and Lefaivre, *Critical Regionalism-The Ponoma Meeting proceedings*, p. 20, and *Tropical Architecture*, p. 8.

壇所創造出的各種不同名稱，我們可以觀察到：他們對各種熱帶建築不同詮釋的修正與調整，極為全神貫注。一九九九年，這本書被稱為《熱帶建築：全球區域主義》（*Tropical Architecture: A Global Regionalism*）。[37]二〇〇一年，最終修改標題為《熱帶建築：全球化時代的批判區域主義》（*Tropical Architecture: Critical Regionalism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他們共同撰寫的那一章被改編並發表在二〇〇二年《拉丁美洲的建築與城市主義》（*Architecture and Urbanism in Las Americas*）雜誌，標題為〈全球化時代的熱帶地區主義〉，[38]是相關主題再一次的細微變化。

迪佩許．查克拉巴蒂（Dipesh Chakrabarty）將歷史論述融合成一個中心曆法式解讀的過程，這種過程被描述成一種以歐洲為中心的殖民舉措，將被殖民者鑲嵌進「歷史的等候室」。[39]藉由重新創造熱帶建築的宏大敘事（meta-narrative）並提供其歷史脈絡，宗尼斯和勒費弗爾重新編制一套由南方向北方和西方所提出的倡議。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實際上已征服這套橫跨大西洋兩岸殖民建築論述的熱帶建築史了。作為編輯，宗尼斯和勒費弗爾本身並沒有採取更具批判的角度來解讀這些文章，因為其主要目的在於辨認這些論述背後所隱藏的重要特質，故將這場論壇文章的多樣性簡單歸納成「具有異質性的必然結果」。

詮釋學的熱帶：愛德華・達雷爾・斯通（Edward Stone）和艾弗・希普利（Ivor Shipley）作品的比較

論壇召集人布魯諾・史塔格諾在論壇發表的論文題目為「熱帶性」（Tropicality）。史塔格諾於一九六九年至一九七二年前往巴黎高等美術學院繼續學習之前，曾在家鄉智利學習建築學。一九七三年，史塔格諾抵達哥斯達黎加，從那時起他一直在哥斯達黎加生活並實踐。[40] 在文章中，他將自己前往熱帶生活的經驗描述為「沉浸在一個新的世界」，這也使他進一步去「懷疑」（等同笛卡爾哲學的「懷疑」）理性適用性及符合邏輯的假定無誤。[41] 史塔格諾認

37 正如宗尼斯和勒費弗爾的附註三所引用的，*Bruno Stagno and Architectural Biodiversity*, p. 28. 編輯群出現在書中的順序是「史塔格諾、宗尼斯和勒費弗爾」，到二〇〇一年順序已改成宗尼斯、勒費弗爾和史塔格諾。

38 Lefaivre and Tzonis, "Tropical Regionalism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in AULA #3, pp. 6-17.

39 Dipesh Chakrabarty, *Provincializing Europe*, pp. 8-9 and p. 74.

40 Bruno Stagno, *An Architect in the Tropics*，封底內頁。

41 Bruno Stagno, "Tropicality", in *Tropical Architecture*, p. 65.

為，在熱帶地區設計建築的行為，是由「真實浸淫在心理、情感和感性」[42]中所帶來的參與存在感，才可以宣稱「我們感受，故我們存在」。[43]

史塔格諾文章中所闡明的現象學維度，是他與宗尼斯和勒費弗爾文章的最基本差異：「空間的創造，需要設計師對該場所的真實體驗和詮釋」，這正是海德格在文章〈築、思、居〉[44]所探討的「原初的渾然一體」（a primal oneness）。這兩篇文章的差異也許就是迪佩許．查克拉巴蒂所描述，社會科學中分析和詮釋學傳統兩者間的鴻溝：[45]宗尼斯和勒費弗爾的觀點來自馬克斯威爾．弗萊所描述的「熱帶之外」的位置，且僅僅作為「一段發揮智力的過程」（an intellectual process）。[46]

我認為，熱帶地區的建築實踐不僅需要在當地萌發出的理論和技術知識，還需要透過實際操作以獲取現象學自我詮釋。我將這種方法稱為「一個詮釋學的熱帶」（a hermeneutic tropical），藉由比較兩對建築師的工作，以作為深入討論。首先比較兩位海外建築師——美國建築師愛德華．達雷爾．斯通（Edward Durell Stone）和英國建築師艾弗．希普利（Ivor Shipley）分別於一九五〇年代和六〇年代在亞洲的作品，之後我想比較亞洲當地兩位建築師——楊經文和鄭慶順的作品。他們皆為宗尼斯、勒費弗爾和史塔格諾編纂該書寫了文章。

愛德華．斯通在一九五四年接受委託設計美國大使館，在短暫訪問新德里後，愛德華．斯通設計了一項十分響應遴選委員會號召的作品：「對於敏感而富有想像力的設計師來說，

這將邀請他們認真研究當地氣候和場景，並理解及同理當地風俗習慣和人們……假如以上這些條件促成建築思維的真正進步，那麼設計師將不會害怕使用新技術或新材料。」[47]愛德華・斯通描述設計過程如下：

「我選擇將辦公室設置在在水上花園周圍的兩層樓上，以獲得噴泉和水池的冷卻效果。為了遮擋陽光和其他玻璃表面並減少眩光，我在外牆使用了磨石子格柵——這是適應熱帶氣候的一項古老原則。整個建築被一個與二樓天花板相隔幾英尺的矩形天篷遮蔽——這是一條散熱風道。為了獲得適當的遮蔭，我將天篷往外延伸超出建築物的外牆——甚至超出了懸臂的範圍——所以需要另外的柱子來支撐。」[48]

42 Ibid., p. 73.

43 Ibid., p. 73. 這是笛卡爾「我思故我在」的展演。史塔格諾在此實驗過去在巴黎高等美術學校所學得的知識。

44 Martin Heidegger, "Building Dwelling Thinking", in Basic Writings, p. 351. 海德格將「渾然一體」(oneness) 描述成「大地、蒼穹、神祉與凡人的相互交融」。

45 Dipesh Chakrabarty, *Provincializing Europe*, p. 18.

46 Maxwell Fry and Jane Drew, *Tropical Architecture*, p. 1.

47 來自 Edward D. Stone, *The Evolution of an Architect*, p. 138.

48 Ibid., p. 138.

在愛德華．斯通認為美國大使館的氣候設計原則正確而恰當的同時，也夾雜著東方主義的意味，[49]並帶有強行推銷的意味（hucksterism）。這件作品不但是愛德華．斯通建築生涯的關鍵轉折點，他還獲得同事們的讚譽和認可，包括萊特也認為這件呼應熱帶氣候的設計恰如其分：

「大使館建成後，萊特稱之為百年來最好的建築之一，也是唯一一個對美國做出貢獻的大使館。當他說：『愛德華，那是一座非常漂亮的建築』時，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如果是我，也會以同樣的方式進行。』」[50]

斯通在書中援引了萊特的肯定，不僅代表一位知名同事所給予的積極評價，此外，作為一位以掌握場域特色而做出傑出作品聞名的建築師，萊特表明「會以相同手法處理」，在某種程度上也使斯通採用的手法更具說服力。顯然地，斯通對場域充分瞭解後再將氣候和當地文化轉化，也成為了嶄新的現代主義建築和美學。與萊特作品一樣，對其作品考驗是時間，斯通的大使館在功能使用或面對氣候方面，顯然都無法承受。簡．洛夫勒（Jane Loeffler）在四十年後的評論中，這麼批評它：

「舉例來說：住所缺乏堅固的內牆，因此未能替大使或其客人提供足夠的隱私：臥室壁櫥太狹窄了，以至於無法掛上大衣或西裝。庭院的鋁網屋頂，沒辦法將雨水從辦公室走廊導引至他處，這也導致法官辦公室工作人員經常被淋濕。至於具有高度遮蔽性的玻璃牆，反倒造成辦公室有幽閉恐懼感——以上是眾人反映的問題。」[51]

斯通嘗試在設計融入對微氣候控制的細節，例如庭院內的游泳池，可惜也沒有像最初設想的那麼見效。事實上當建築物進行翻新以幫助解決安全問題時，情況變得更糟，這並不是斯通所預見。另一位評論家蘭吉特．薩比基（Ranjit Sabhiki）寫道：

「……基於安全考量，僱員再也無法自由川行不同空間，而必須離開室內，穿越戶外拱廊，才能到達另個辦公室。一位僱員說，在夏天這可能意味著必須從冷氣房離開，突然接觸華式一百三十度（攝氏五十四度）的高溫。她還說，游泳池帶來潮濕，影響更

49 Ranjit Sabikhi 認為「浪漫的法官給印度帶來了一點好萊塢，很快的，就成為了一個熟悉和可識別的紀念碑。」Ranjit Sabikhi, *Evaluation of a 50s Landmark*, p. 76.

50 Edward Durell Stone, *The Evolution of an Architect*, p. 139.

51 Jane C. Loeffler, *The Architecture of Diplomacy*, p. 263.

加顯著。」[52]

一九六一至一九六三年艾弗．希普利任職馬來西亞公共工程部，是一位受過倫敦建築聯盟訓練的建築師，由他負責設計馬來西亞國會大廈。建築群包括一座十八層樓塔和一座四層的裙樓，分別容納辦公室以及上下議會。建築物覆蓋著預鑄磨石板，也提供了遮陽功能，此外，還裝設精心製作的玻璃帷幕系統以防止眩光，並讓建築物有雕塑般的效果。裙樓內部附有中庭，毗臨樓塔設有一個具反射效果的大水池。

隨時間淘洗，建築物逐漸帶有典雅的陳舊感，持續多年也幾乎不太需要維護，掩飾了某些設計和建造不容易被發現的過程。這不僅是建築師希普利長期以來對熱帶建築實踐的耐心等待內化的過程，而且透過馬來亞公共工程部設計和研究部門——一個大型機構肩負承擔，不斷磨練改進與氣候文化相關的建築實踐、工具和經驗。當設計這些建築案時，希普利在熱帶已生活約莫十年。

對於希普利來說，這過程很早就開始了。當時在檳城度過了頭半年，希普利唯一的任務是維護馬來亞公共工程局的建築物，對他來說這是非常寶貴的經驗。他說：「我在熱帶地區學到的最有價值的東西可能是維修工作。」[53]他還引用現存的風土建築和戰前建築，這些建築提供明智的例子，說明如何在設計時考慮到方向、通風和陽光控制等氣候問題。[54]

與此同時，希普利透過期刊和書籍追隨馬克斯威爾．弗萊和珍．德魯等等對熱帶建築倡議者時興的論述，因此，他的學習過程在不斷實踐的同時，也透過對理論的同步辯證，而變得更加敏銳。事實上，當希普利在設計國會大廈時，馬克斯威爾．弗萊訪問了馬來亞，而留下以下印象：

「談到馬來亞國會大廈，我僅憑模型就被一種形式感擄獲，它由水平線控制的重複模組所建立，當然這些模組令人感覺喧囂，卻又能營造出寧靜感。同時，在最讓我滿意的設計階段，我其實不太希望看到強調垂直結構的塔樓。

此外，接近國會大廈的感受是令人愉悅的，既不朽卻又帶有十足現代感，一圈圈的聯外道路的至高點是一座華麗的高架橋，在中間的棕櫚樹則使氣氛大為失色，否定具備儀式感所需要的向心特性。

這一切都如此宏偉，如此完美彰顯出熱帶特色的環境，任何事物都不應阻礙其完美呈現；政府意圖如此美妙地體現不僅是在單一建築，而是前例（政府綜合大樓）所提到

---

52 Ranjit Sabhiki, "Evaluation of a 50s Landmark", p. 77

53 訪問 Ivor Shipley #1。

54 同上，這些包含長廊和挑高屋頂等等。

的體現於整體地景環境中。」[55]

當希普利待在檳城時，曾為錫礦資源豐富的霹靂州首府怡保設計一座未建成的政府大樓，這段經歷帶來「精神上的淬鍊」，也一併影響到往後設計國會大廈，例如針對塔樓將如何控制陽光這件事。[56]與國會大廈一樣，霹靂州政府大樓建築群也有並列的塔樓和裙樓。藉由設計三層樓的長型辦公大樓，希普利進一步試驗想法，這個試驗後來也成為馬來亞公共工程局的標準辦公大樓（Standard Office Block）設計。底樓由幾根挑高柱列支撐，柱列上方則是八個十英尺乘二十三英尺四英寸、典型的長方形標準模組所組成，兩側再由長十英尺的柱間距串聯起來。使用夾層玻璃板以減低日照眩光，並設置一整套垂直和水平方向的遮陽板，這些系統往後都被細緻地應用到國會大廈。

根據一份針對馬來亞公共工程局的評論，一位在馬來西亞工作好幾年的德國建築歷史學家朱利葉斯．珀森納（Julius Posener）認為，馬來亞公共工程局除了體現冷靜、克制而周到，同時也表現出一種正確面對熱帶地區——或許不是特指馬來亞——建築的施作方式。[57]珀森納在文章中提到希普利作品，似乎暗示設計的「趨勢」源自對當地的地點和氣候是否夠敏感，並與是否在特定地點施作有關，希普利的例子是在熱帶地區，而他對於熱帶的劃分是正確的，這表示若是對熱帶地區建築案子的構思、設計和建造不當，結果可能與當地環境格格不入。

具建議，並尋學的熱帶論[illegible]方法，不僅需要對理論[illegible]設計的正確方式，還需要針對該地點現象學式的理解，並在該地不間斷地實際操作，過程中既可以「學習」，也可以「忘卻所學」（請見附錄）。在馬來亞執業幾年後，希普利加入 Fry, Drew & Partners 並在適當時機成為事務所合夥人。一九六〇年代中期，馬克斯威爾．弗萊向希普利描述他對模里西斯國會大廈議會廳的設計，並提議玻璃穹型屋頂的設計，此舉招致希普利的強烈反對，而弗萊最終也放棄了這個並不合理的想法。在熱帶地區實際的經歷，這種幫助同時體現在其他經典設計中。

兩位建築師：楊經文和鄭慶順

《熱帶的建築：全球化時代的批判地域主義》（*Tropical Architecture: Critical Regional-*

55 Maxwell Fry, *First Impressions of Kuala Lumpur*, p. 27. 弗萊曾來訪吉隆坡擔任某建築競圖的評審，希普利接待他並帶他參觀這座城市，他們一起討論馬來亞國會大廈的設計，希普利提及弗萊曾就該如何設計塔樓而給予建議。以上內容來自對艾弗．希普利的訪談記錄。

56 訪問 Ivor Shipley #4.

57 Julius Posener, in *Malaya*, p. 60. 朱利爾斯．珀森納在一九五〇年代末曾擔任吉隆坡科技學院建築系主任。

ism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的出版，也將建築師楊經文和鄭慶順再次帶到一個相互比較的平台。楊經文受邀在論壇發表文章，而鄭慶順的文章則被收錄在宗尼斯編輯的書中，宗尼斯在書介中稱鄭慶順為「當代最重要的建築思想家之一」。[58]我想在此討論這兩位建築師在書中所出現的章節，並透過文本討論馬來西亞和新加坡這對東南亞鄰國在熱帶建築思辨的背景和利害關係。

實際上，這並不是首次比較這兩位建築師對熱帶建築看法的著作。阿比丁·庫斯諾（Abidin Kusno）在其著作《比較的幽靈：東南亞建築和城市設計論述筆記》（*Spectre of Comparisons: Notes on Discourses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Design in Southeast Asia*）中，討論他們使用「非政治、利用氣候表述的身分認同」，以作為熱帶地區後殖民國家為「削弱普世現代主義美學形象的回應，並在過程中實現自己「跨地域主義建築」（translocal regionalist architecture）的想法。[59]庫斯諾以一九八〇年代兩位建築師的早期作品來評論，他們雙方都曾提倡透過「熱帶城市」的觀點來評估適合熱帶地區的建築和城市設計，並清楚說明建築和規劃議程，以打造一個對氣候富有想像力且經得起氣候考驗的宜居生活，也可以隨機應變調整。鄭慶順自一九七〇年代開始實務設計，主要涉及中低價住房，並在一九八九年東南亞研究所舉行的公共論壇發表看法。楊經文的實務設計也始於一九七〇年代，直到一九八六年出版這本書，當時他的事務所已完成許多房屋和辦公大樓建案，最有名的莫過於楊經文自宅——雙頂

屋（Roof-Roof house，一九八四）。

因此，辯論開始十年後，兩人在二〇〇一年的書中所提交的文章使其思想和方法成為焦點。楊經文文章〈綠色議程〉是他在所屬事務所制定出的技術設計標準，可稱為生態設計的統一理論，這是過去針對氣候／能源計算與實踐公式長期積累的筆記，包括水、照明、遮陽和噪音等方面。[60]鄭慶順文章題為〈重新思考熱帶城市：熱帶城市的概念〉，闡述後殖民時代，在全球經濟和西方霸權文化的矩陣中，快速城市化和國家所面臨的挑戰。文章最後強調，重新思考仍需必要的建築城市策略，以應對衍生而來複雜的挑戰。[61]

楊經文以文章形式提供一組技術上的數據，回顧一九五〇年代開始的熱帶建築學派、殖民建築研究站和建築科學工業所採用的氣候設計和元素，當時建築的理想氣候表現是透過運用器材和特定技術來挑戰和解決。[62]事實上，楊經文這位受到倫敦建築聯盟訓練過的建築師，

58 Alexander Tzonis, "Tropical Critical Regionalism: Introductory Remarks", in *Tropical Architecture*, p. 12.
59 Abidin Kusno, *Behind the Postcolonial*, pp. 197-203.
60 Ken Yeang, "The Green Agenda", in *Tropical Architecture*, p. 216-228.
61 Tay Kheng Soon, "Rethinking the City in the Tropics", in *Tropical Architecture*, pp. 266-306.
62 楊經文在早期的作品中，將這種方法稱為「為了種種詮釋而存在的盔甲」（An Armature for Interpretations）。Yeang, *Tropical Urban Regionalism*, pp. 34-73.

在劍橋建築學院技術研究部工作以探索具備生態考量設計的理論框架。[63]楊經文在一九八九年意識自己的強項在於設計具有回應生態特質的大型建築，[64]從此以後便專注於具備生態氣候特質的摩天大樓設計。綠色議程也形成了他所謂的「作案手法」實踐。[65]除了氣候因素，也關注於工程遮陽板、格柵、種植植物箱和開放空間等等設計語彙，以上都曾在楊經文早期專著發表，但在出版品中卻缺乏個人作品的圖像。

在鄭慶順的文章中，他強調將繼續把城市視為熱帶地區最重要的討論和實踐場所，建築和其他各種城市元素只是其中的組成成分。他強調，發展亞洲經濟的重要性即是實現高樓建築和高密度，同時，將設計視為一種公共住居和詩意的真實體驗。過去十幾年，鄭慶順分別與私人和公部門合作，在新加坡特定區塊的尺度下針對住房和城市設計提出解決方案。他堅信生活在熱帶本身就是一種充滿體驗感的生活，與史塔恰諾和希普利等建築師之間產生共鳴。對於他們來說，透過平凡生活和內在所賦予的各種詮釋也是設計過程重大訊息的一部分，已超越過度合理化或理論化所涵蓋的面向。

透過設計摩天大廈，楊經文的作品專注這在城市中非常特殊的元素，而不是城市設計或更大尺度的環境可續性問題。楊經文的設計出現在馬來西亞各大城市而引起人們的注意，這些摩天大廈交織在原先傳統的城市紋理中，並形成強烈而鮮明的對比。在哥斯達黎加的論壇中，楊經文的綠色議程摩天大樓作品，以其技術嫻熟且具備生態與氣候特質樣貌展現給世人。

楊經文與其他與談者採取截然不同的設計策略，他與一群使用斜屋頂、陽台和其他傳統或現代形式的低層低密度建築作品錯身而過，而這場爭論持續盛行於一九八〇年代的東南亞。楊經文的論述著重點在技術優勢和經濟發展方面，給在場其他來自熱帶國家的與會者帶來了強烈的對比和分歧。[66]

透過分析哥斯達黎加論壇的內容，現代熱帶建築背後所賦予的政治意涵，因此被導向不同的理論和政治範疇。因為是針對發生在全球範圍內某個區域的細節討論，所以被快速拉進中心——邊緣的話語中，並通過它們與它們的輔助理論、政治和歷史保持一致。在區域層面，它上演發展政治的圖式，一場富人和中產階級的份額爭奪戰，他們繼續主宰著旅遊和房地產行業，以低層建築和度假村組成蔥蘢，「熱帶」設置，涵蓋了現代性、身分和發展問題。既不能令人滿意地反映熱帶不同地區的現有問題，也不能反映一九九八年「南南」對話產生

63 楊經文的博士論文題目為《在建築環境的設計和規劃中，納入生態考量的理論框架》（*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Incorporation of Ecological Considerations in the Design and Planning of the Built Environment*），來自 Robert Powell, *Rethinking the Skyscraper*, p. 11.

64 Robert Powell, *Rethinking the Skyscraper*, p. 41.

65 Ken Yeang, preface to *T. R. Hamzah and Yeang*, p. 6.

66 該研討會並沒有非洲代表，這某種程度上說明了當時非洲大陸的發展情況。

的真正友情。召集人和參與者或許可以在第一次「熱帶相遇」的衝擊之外繼續發展不同的問題和利害關係，並在不久的將來在當代全球舞台上展現自己的全球影響力。

附錄：作者賴啟健和艾弗・希普利（Ivor Shipley）的訪談記錄

IS：艾弗・希普利（Ivor Shipley）；賴啟健：賴

賴：所以這是事務所主要的建案嗎？

IS：我們會就正在進行中的建案相互辯論，彼此之間的爭鋒相對並不緩慢。舉個例子來說，如今親愛的弗萊已去世了，前幾天才跟我兒子提到這件事，他剛好人就在模里西斯。弗萊為模里西斯的議員們設計了議會建築。這個議院是一棟由玻璃屋頂和四周完整白牆構成的建築。我在事務所看到這龐大玻璃屋頂的設計，然後心想：「這設計究竟怎麼回事？」我問弗萊：「這棟建築位在模里西斯嗎？」「是的。」「但是你不可能在熱帶國家建一座玻璃屋頂議院，人們會被烤焦的。你的目的在於把太陽擋在外面，而不是邀請太陽進來。」「艾弗你說得對，畢竟我離開熱帶國家太久

了。」最後的設計，建築物頂部仍有照明系統，卻沒有初步設計時的那個玻璃圓頂了，也許只是那種普遍採用的透明窗戶。而針對類似的辯論，我們從不猶豫或退卻，有人曾對我說：「你在曼谷做的設計，到底怎麼回事？」

賴：模里西斯國會大廈是何時興建的，約在一九六〇年代嗎？

IS：約莫在一九六六至一九六八年，往後還有大規模擴建，包含模里西斯政府醫院和大型的政府中心。

賴：所以他為議會大廈設計了一個巨大的玻璃屋頂。

IS：一個玻璃圓頂。

賴：馬克斯威爾．弗萊設計的玻璃圓頂。

IS：是的，直到我指出這玻璃屋頂簡直是胡來，他說：「是的，你是對的，你當然是對的。」所以最後議會大廈並沒有出現玻璃圓頂。我想我大概拯救了不少模里西斯人被熱炒（fry）。

賴：嗯，弗萊他的姓氏嗎？

賴：馬克斯威爾．弗萊，馬克斯威爾姓「FRY」。

IS：什麼？

賴：馬克斯威爾．弗萊，馬克斯威，「熱炒」。

IS：是的，沒錯，弗萊（Fry）所設計的「熱炒」（fry）建物。我們在向前邁進的道路上從不落後，我們非常挑剔。珍設計的一些東西是離譜的，我們告訴她，「珍，妳不能這麼做。」「為什麼不能？」「不能，這太荒謬了。」「哦，我會考慮的。」

參考書目

Abrams, M. H.. 1957. *A 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 (Seventh Edition). Fort Worth: Harcourt Brace College Publishers.

Amourgis, Styros, ed.. 1991. *Critical Regionalism: The Ponoma Meeting Proceedings*. Pomona: College of Environmental Design, California State Polytechnic University, Ponoma.

Antonin Raymond & L. L. Rado, Architects. 1947. "Cable Station designed to make life bearable for American staff in tropical, sea-girt Guam". In *The Architectural Forum*, Vol. 87 No. 1, July 1947, pp. 93-97.

Aravamudan, Srinivas. 1999. *Tropicopolitans: Colonialism and Agency, 1688-1804*.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Architectural Association Journal. "Department of Tropical Studies: A Cross-Section of Recent Work and Teaching Methods"; *Architectural Association Journal*, Vol. 78 No. 871; April 1963; pp. 302-313.

Architectural Design. 1959. "Towards a Tropical Architecture: The work of Architects Co-Partnership in Nigeria". In *Architectural Design*, Vol. 29 April 1959, pp. 128-137.

Atkinson, Fello. 1969. "The Genesis of Modern Tropical Architecture". In *Journal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Arts*, No. 5156, Vol. 117, July 1969, pp. 546-561. London: Adelphi.

Atkinson, G. Anthony. 1950. "Building in the Tropics". In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Institute of British Architects*, Vol. 57 No. 8; June 1950; pp. 313-320.

Atkinson, G. Anthony. 1953. "British Architects in the Tropics". In *Architectural Association Journal*, No. 773-782; June 1953; pp. 7-21.

Atkinson, G. Anthony. 1955. "British Architects in the Tropics". In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the Institute of Architects of Malaya*. Vol. 4 No. 3; 1955; pp. 36-64.

Atkinson, G. Anthony. 1960. "Principles of Tropical Design". In *The Architectural Review*, Vol. 127 No. 761; July 1960; pp. 81-83.

Berry, Andrew, ed.. 2002. *Infinite Tropics: An Alfred Russel Wallace Anthology*. London: Verso.

Bothamley, Jennifer. 1993. *Dictionary of Theories*. London: Gal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Ltd.

Building Research Station. "Building Overseas in Warm Climates". In *Digest 92* (Second Series). SfB Bb1. April 1968.

Chakrabarty, Dipesh. 2000. *Provincializing Europe: Postcolonial Thought and Historical Difference*.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Chao, Benjamin Fong. 1996. " 'Concrete' Testimony to Shifting Latitude of the Tropics". In *Earth in Space*, Vol. 9, No. 4, December 1996, pp. 9-11. American Geophysical Union.

Cordner, G. Frank. 1947. "Puerto Rico Experiments with Tropical Housing". In *The Journal of Housing*, Part 1: Vol. 4 No. 10, Oct. 1947; pp. 291-293, Part 2: Vol. 4 No. 12; Dec. 1947; pp. 352-354.

Courtenay, Percy Philip. 1982. *Northern Australia : Patterns and Problems of Tropical Development in an Advanced Country*. Melbourne: Longman Cheshire.

Crosby, Alfred W. 1986. *Ecological Imperialism: The Biological Expansion of Europe, 900-19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1963. "Type Designs by the 1962 Tropical Building Study Group". In *Tropical Building Studies*, Vol. 2 No. 1, unpaged.

Dewey, John. 1916. *Essays in Experimental Logic*.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Dobney, Stephen. 1998. *The Master Architect Series III: T. R. and Yeang*. Victoria: The Images Publishing Group.

Drew, Jane. 1960. "Architecture in the Tropics". In *The Malayan Shell*, No. 7, 1960, pp. 4-8.

Eggener, Keith. 2002. "Placing Resistance: A Critique of Critical Regionalism". In *Journal of Architectural Education*, Vol. 55 No. 4, May 2002, pp. 228-237.

Federation of Malaya Society of Architects. 1963. *BINA: Journal of the Federation of Malaya Society of Architects*, Vol. 5 No. 1, 1964. Kuala Lumpur: Federation of Malaya Society of Architects.

Frampton, Kenneth. 1980. *Modern Architecture: A Critical History.*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Fry, E. Maxwell. 1962. "First Impressions of Kuala Lumpur". In *PETA: Journal of the Federation of Malaya Society of Architects*, Vol. 4 No. 1, June 1962, pp. 26-27. Kuala Lumpur: Federation of Malaya Society of Architects.

Fry, Maxwell and Drew, Jane. 1964. *Tropical Architecture in the Dry and Humid Zones.* Florida: Robert E. Krieger Publishing Co. Ltd.

Fuster-Felix, Nathaniel. 1997. *The Tropicaliz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Style: Identity and Criticism on the Architecture of Development in Brazil and the Caribbean.* Unpublished D.Des. dissertation for GSD, Harvard University.

Goh, Hock Guan. 1963. "Developing a Malayan Architecture". In *JKR Magazine*, pp. 15-17.

Goldhagen, Sarah W. and Legault, Réjean, ed. 2000. *Anxious Modernisms: Experimentation in Postwar Architectural Culture.* Massachusetts: MIT Press.

Gut, Paul and Ackerknecht, Dieter. 1993. *Climate Responsive Building: Appropriate Building Construction in Tropical and Subtropical Regions.* St. Gallen: SKAT (Swiss Centre for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in Technology and Management).

Heidegger, Martin. 1951. "Building Dwelling Thinking". In David F. Krell ed., *Martin Heidegger: Basic Writings.*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Herbert, Gilbert. 1984. *The Dream of the Factory-made House: Walter Gropius and Konrad Wachsmann.* MIT Press.

Hitchcock, Henry-Russell. 1946. "The Acclimatisation of Modern Architecture in Different Countries". In *The Architectural Association Journal*; Vol. 62:704; June-July 1946; pp. 3-9.

Hitchins, Stephen, ed. 1978. *Fry, Drew, Knight, Creamer: Architecture.* London: Lund Humphries.

Holabird & Root, Architects. 1942. "Buildings for the Caribbean Area". In *The Architectural Forum*, July 1942, pp. 46-48.

Kukreja, C. P. 1978. *Tropical Architecture*. New Delhi: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Kusno, Abidin. 2000. *Behind the Postcolonial: Architecture, Urban Space and Political Cultures in Indonesia*. London: Rouledge.

Lai, Chee Kien. 2002. Book Review: "Tropical Architecture: Critical Regionalism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by Alexander Tzonis, Liane Lefaivre and Bruno Stagno. In *Traditional Dwellings and Settlements Review*, Vol. 13, No. 2, Spring 2002, pp 74-75.

Lee, Douglas H. K. 1951. "Thoughts on Housing for the Humid Tropics". In *The Geographical Review*, Jan. 1951, pp. 124.

Lefaivre, Liane and Tzonis, Alexander. 2002. "Tropical Regionalism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In *Architecture and Urbanism in Las Americas*, No. 3, pp. 6-17.

Levi-Strauss, Claude. 1973. *Tristes Tropiques*. Jonathan Cape Ltd.

Lippsmeier, Georg. 1969. *Tropenbau: Building in the Tropics*. Munich: Callwey Verlag München and the Institut für Tropenbau im Architekturbüro.

Organising Committee, Conference on Tropical Architecture. 1953. *Conference on Tropical Architecture 1953: A Report of the Proceedings of the Conference held at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March 1953*. London: Allen & Unwin.

Posener, Julius. 1960. "Malaya". In *The Architectural Review Special Issue: Commonwealth 2*, Vol. 128, July 1960, pp. 59-64. London: The Architectural Review.

Powell, Robert. 1989. *Ken Yeang: Rethinking the Environmental Filter.* Singapore: Landmark Books Pte. Ltd.

Powell, Robert; Tay, Kheng Soon and Akitek Tenggara. 1997. *Line, Edge and Shade: The Search for a Design Language in Tropical Asia*. Singapore: Page One Publishing Pte. Ltd.

Powell, Robert. 1999. *Rethinking the Skyscraper: The Complete Architecture of Ken Yeang*.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Prakash, Gyan. 1999. *Another Reason: Science and the Imagination of Modern Indi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Rivera de Figueroa, Carmen A. 1980. *Architecture for the Tropics: A Bibliographical Synthesis*. Puerto Rico: University of Puerto Rico Press.

Saini, Balwant Singh. 1963. "About Tropical Building Studies". In *Tropical Building Studies*, Vol. 2, No. 1, 1963, unpaged. Published by the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Saini, Balwant Singh. 1970. *Architecture in Tropical Australia*. London: Lund Humphries Publishers Limited.

Spence, J. McKay. 1955. "The New Role of the Architect in the Tropics". In *Architectural Association Journal*, Vol. 71, No. 794; July-Aug. 1955; pp. 56-61.

Stepan, Nancy Leys. 2001. *Picturing Tropical Natur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Tay, Kheng Soon. 1989. *Mega-cities in the Tropics: Towards an Architectural Agenda for the Future*.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The Architects' Journal. 1957. "Building in the Tropics". In *The Architects' Journal*, Vol. 125, No. 3246, May 16, 1957, pp. 744-750.

The Builder. 1953. "Tropical Architecture: Conference at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In *The Builder*, Vol. 184, No. 5747; April 10, 1953; pp. 558-560.

Tzonis, Alexander and Lefaivre, Liane. "Critical Regionalism". In *Amourgis*, Styros, ed., 1991. *Critical Regionalism: The Ponoma Meeting Proceedings*, pp. 3-28. Pomona: College of Environmental Design, California State Polytechnic University, Ponoma.

Tzonis, Alexander; Lefaivre, Liane, and Yeang, Ken. 1999. *Bruno Stagno: An Architect in the Tropics*. Selangor Darul Ehsan: Asia Design Forum Publication.

Tzonis, Alexander; Lefaivre, Liane, and Stagno, Bruno. 2001. *Tropical Architecture: Critical Regionalism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West Sussex: John Wiley and Sons.

Wakeley, Patrick Ian. 1983. "The Development of a School: An Account of the Department of Development and Tropical Studies of the Architectural Association". In *Habitat International*, Vol. 7, No. 5/6, pp. 337-346.

XXI International Congress for Housing and Planning. 1952. *Housing in Tropical Climates*. Lisbon: International Congress for Housing and Planning.

Yeang, Ken. 1987. *Tropical Urban Regionalism: Building in a South-east Asian City*. Singapore: Concept Media.



圖5-1：攝於蘇門答臘倫班加拉加的巴塔克民居（Toba Batak house）前陽台。



圖5-2：蘇門答臘尼亞斯島南部（South Nias Island）的Onohondro之住宅內部景觀。



圖5-3：新加坡烏敏島一所房子的前庭。



圖5-4：位於蘇門答臘北尼亞斯達哈納（Dahana, North Nias, Sumatra）的房屋一般都建著很大的屋頂。



圖5-5：馬來西亞檳城浮羅山背房屋。



圖5-6：新加坡帶陽台的洋房。

東南亞通風磚的使用

從熱帶東南亞的許多建築結構和環境中，可看出為了長時間內保持溫度適宜而實行的措施。從主要使用植物和天然材料建造的民宅，到如今現代建築物使用預製或已施工的建築部件，這些結構的設計考量在於適應場地和氣候的環境條件；否則建築會因它們的長期影響而惡化。熱帶建築作為世界建築的一個分支，因其引人注目的藝術外觀，或作為當地設計師和建造者的實踐與經驗知識而備受關注；它已逐漸融入建築、城市及景觀設計領域的學術和實踐中。

溫帶區域的建築被比作六邊的立方體，和其表面如何被形塑以創造一個圍起來的空間。如果是這樣，那熱帶地區的圍牆建築需要額外的中間區域環繞它，以在室外的炎熱下，調節和保持室內的舒適。土著建築或殖民時期房屋使用的高天花板和高架地板，滿足了「立方體」

頂部和底部表面的中間區域要求。一個高架平台或地板，以及一個「呼吸」／可滲透的屋頂空間，這樣的結構設計成為歷史上設計的準則。鄉土建築的縱向斜屋頂特徵，有助於最需要的高層空氣流通，而高腳結構促成低層的其他使用功能，這些都是進一步的銜接。保持乾燥區域或地面，是通過分段設計中深思熟慮的各種方式實現的；通過屋頂屋檐、隆起的土墩，適當的排水規劃和其他一些策略，這應用於個別建築物也應用於城鎮與城市規劃。

在這想像中的「立方體」垂直界面，陽台（verandah）被視為典型的中間空間，連接相鄰的遮蔽走道與具有各種功能的空間。這樣的空間也可透過從不同屋頂坡度延伸出的屋簷創建，因其意圖的環境功能，有時不太明顯。此創造空間不僅從物理上起到調解作用，且在許多傳統和現代情境中，不時充當相互連接的社交空間。牆面被構思、設計和塑造成可滲透的平面，包含可移動、轉變和通風的寬大開口，並在需要時調節光線和空氣。篩狀的牆壁以有效調節微氣候的門窗部件分級，包括使用凸窗或季風窗、百葉窗或其他具有這些調節功能的部件或材料。在較小的規模上，還會使用撐帶或撐條和扇形楣窗等等，穿過牆壁或建築部件及其他類似裝置的間隙。

穿孔磚，或更常被稱為空心混凝土砌塊，其使用自二十世紀初以來在東南亞盛行。這些砌塊的結合，不僅表達它們作為通風集合點的使用需求，亦充作牆壁細節美化的面板或特徵。常見的用途是作為樓梯核心面的整個面板，或利用其磚塊和靈活性的特色設為螢幕或牆壁。

盥洗區和浴室等潮濕空間，通常將它們用作牆壁頂部的擋帶。在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獨立後開建的學校建築、公共房屋計畫和其他設施中，禮堂或其他大型公共空間的牆壁可能完全用這類砌塊建造，以實現可接受程度的空氣流通。

然而，如果仔細閱讀新加坡和馬來西亞戰後的建築和貿易期刊，你可能也會注意到這類砌塊的廣告明顯完全缺席。當工業和大規模生產的產品被引進英屬馬來亞，且許多城鎮（例如新加坡的裕廊和吉隆坡的八打靈再也）被要求工業化時，市場上出現了一系列新的建築產品。另一方面，空心砌塊是由當地的建築材料供應商用模具製造的，主要以手工製造。在許多建築工地，建築商會自己鑄造各自項目所需的砌塊。這或許解釋了為何它們沒有出現在媒體報導中，卻可以從建築物中觀察到其大量應用和多樣的模式與形式。

通風磚至少三英寸厚，以確保內部結構的完整性和施工的便利。最常見的磚塊是壓制成的方形或長方形，形狀由混凝土的周長構成，每邊的總尺寸約為六英寸到一英尺。該框架的內部空間根據設計，用混凝土的線條或幾何形狀銜接，但為了通風而留空某些部分。另一種常見的磚塊是個具有兩個扁平法蘭的框架，它們連接框架的兩個相對側，但它們的位置交錯排列，以便法蘭邊緣不相觸：這促成穿過砌塊的「潛望鏡式」空氣流通，但並不造成整個砌塊和牆壁透明。其他更創新的形式包括三邊空心塊，以及三角形、半圓形、八角形、沙漏形等外部形狀，還包括C形或V形砌塊。它們甚至可以是不定形的形狀，只要它們可以連接頂

部和底部且能承載負重。

一些砌塊有倒角，這不僅是為了降低運輸或施工過程中角部碎裂的風險，而且倒角的設計還可在與同面牆壁中其他設計相似的砌塊連接時，創建更大的圖案。建造時，這些砌塊有時會被隔開，以此產生更多的間隙，也可能是為了減少整體和材料的使用。有些砌塊分為兩種類型，它們的交替使用讓內牆和外牆表面產生波紋，而不是達成平面的整體。三維砌塊的斜面創造一個動態的正面，白天可能會在牆上投下非常有趣的影子。磚塊設計以及創建相互關聯和複雜圖案的可能性，是整體藝術效果和是否採用其磚塊的重要考量因素。注視這些牆壁的人是從視覺上被圖案吸引，而不是白天它們背後的形式和活動（如柚木屏風），但在夜間當這些牆壁兩側的光線條件相反時，它們會被顯露出。

馬來西亞的一個城鎮——霹靂州的太平，可觀察到城市的通風磚使用。該城鎮不僅示範了它們的使用，且體現了其建築結構中設計的一系列其他通風裝置。它位於印度洋和太平山之間，作為馬來西亞半島最潮濕的小鎮，基本上每年平均降雨量為四千毫米。在這種情況下，建築物和城市規劃需要從單個結構和城鎮角度出發，以降雨分配量設計和建造。結構還需要提供良好的通風，以迅速降低因幾乎每天反覆地下雨所引起的內部潮濕。在整個牆壁中使用通風磚，作為窗戶或門戶上的撐帶、建築部件之間的分隔物，或作為空間中空氣流動的面板，皆反映了運用它們達成良好效果的砌塊設計師及建造者們的聰明才智。如同其他通風裝置，

它們對建築師和建造者是一種關於某些基本考量很好的提醒，因他們在設計建築時需要繼續應對這地區的地理和氣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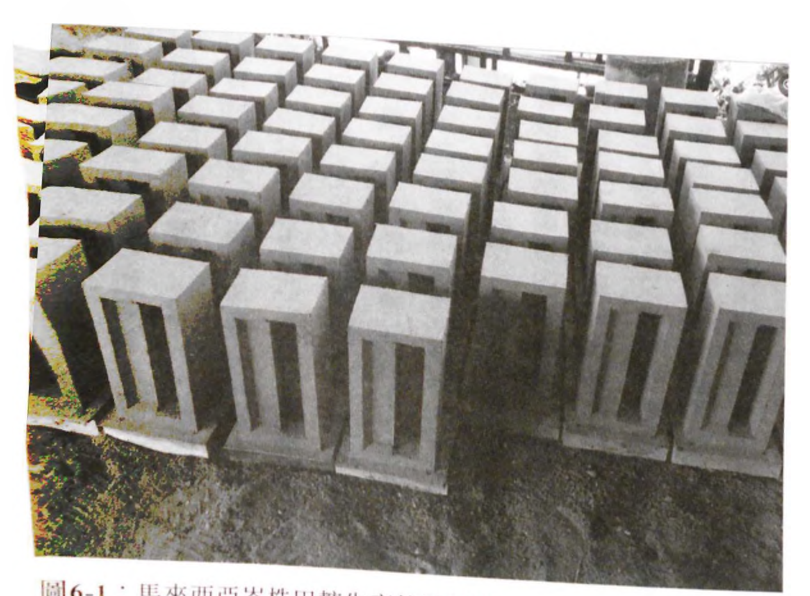


圖6-1：馬來西亞峇株巴轄生產的通風磚。



圖6-2：帶有漢字的通風磚。



圖6-3：新加坡一所房子使用的通風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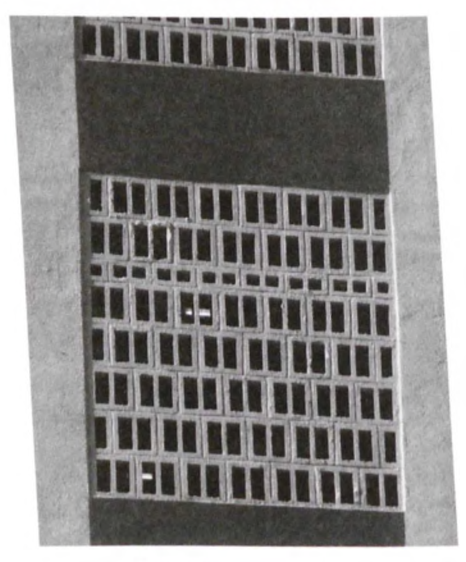


圖6-4：香港深水埗公屋使用的通風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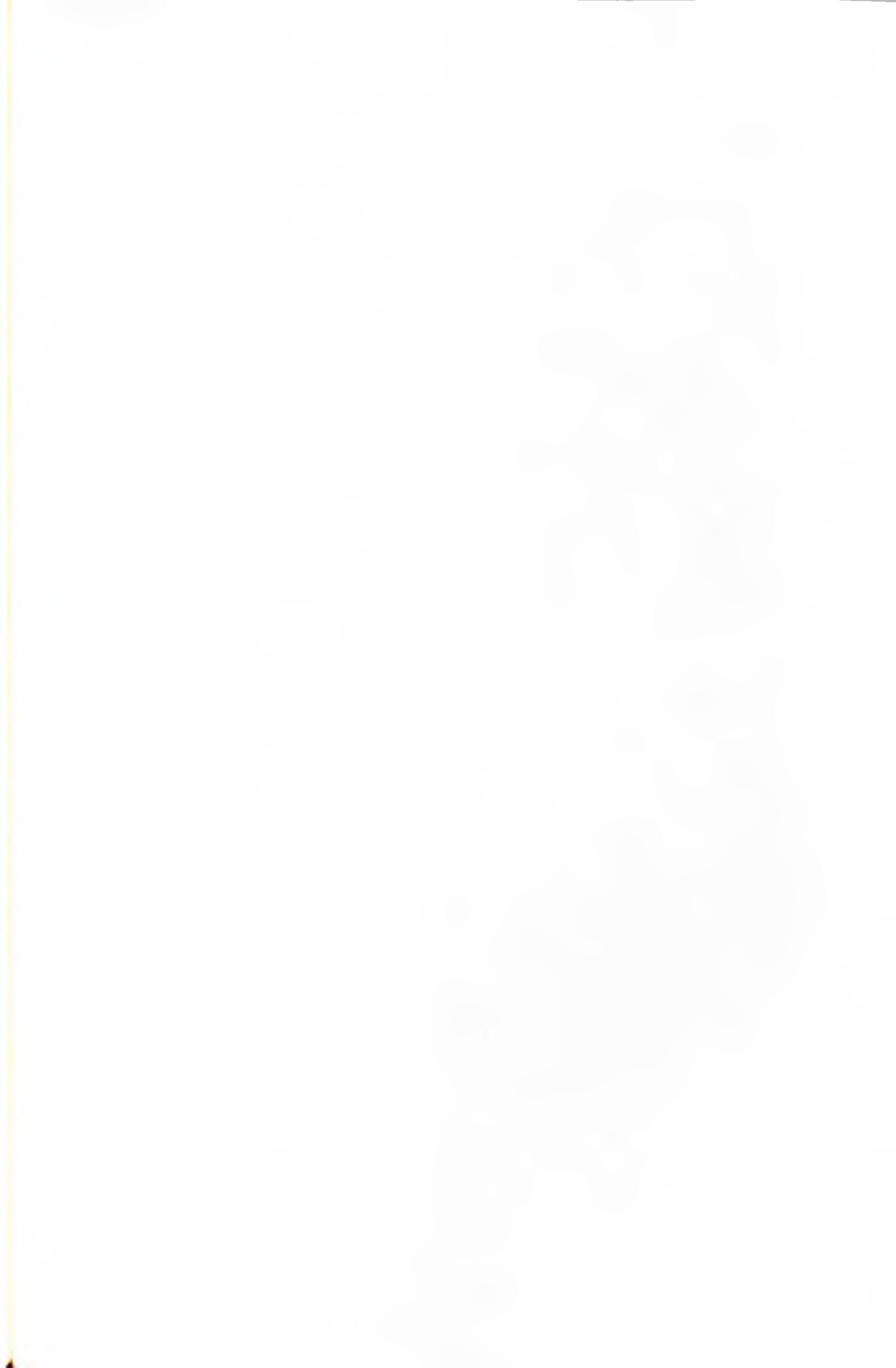


圖6-5：胡志明市圖書館正面的通風磚。



圖6-6：胡志明市濱城市場使用的通風磚。

輯二　新馬篇



從馬坦到大草場：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大都會裡大草坪的進化過程

摘要

大草坪是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城市中受監管的公共綠地。這個象徵曾被英國殖民主義影響的「遺產」，苟延殘喘延續至今，與其四周迅速發展的都會景觀相映並衡擊著，形成了一種鮮明的比對。作為政府權力和控制的表徵，「大草坪」概念起源於十五世紀伊斯法罕，由波斯國王阿巴斯一世委託建立的伊瑪目廣場（Maidan-i-Naqsh-i-Jahan）。圍繞於這個空間的，是特意組建的國家權力、宗教、商業、教育、休閒和紀念等功能。在

伊斯法罕和殖民馬來亞之間，身在印度的英國人利用「馬坦」（大草場）的實際和象徵性的功能，讓馬坦成為了監視、軍事演習、展示和行政，以及其溫柔和無戰意的用途，即體育和紀念意義用的模範空間。這個開放空間對馬來亞和新加坡來說是錙銖必較的工具；但它同時也被進化了，英國在印度學到的知識應用於這兩座新的殖民城市。本文考察了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從馬坦到大草坪的轉變，以及圍繞這些空間的建築形式和運用。當地各單位也模仿殖民大草坪形式，在自己的城市建立屬於自己的開放空間。多年來，大草坪的意義和用途歷經了維護、改變、顛覆和改造。文章進一步認為，大草坪作為一種「空間傳統」，在獨立建國後及當代的新加坡和馬來西亞，以被回憶或顛覆的形式還魂，並繼續存在。

著名政治科學家安東尼．金（Anthony King）在考究一九七六年的印度城市後，提出殖民地城市衍生「第三殖民文化」（colonial third cultures）的論點，稱有別於一般城市文化，此類城市文化一般會與本土元素結合，開拓出屬於自己的第三城市文化（third urban culture）。這概念顛覆了過往的格局，為新的殖民形態提出了嶄新的詮釋。爾後，他的著作由此開展推論，從一九七〇年代的「生產方式」模型分析，至八〇年代的「多元主義政治經濟學」，將被殖民國家的城市視為「極其廣泛的類別」，並需要深探其「因殖民統治下遭移

植的歷史概況」[2]。更為重要的是，自此研究便轉移到該城市被殖民後引發的狀況，而非局部性放大式或鉅細靡遺的探究該城市的發展狀況。

在東南亞，被西方國家殖民過的城市，在殖民者離開後，沒有帶走的遺產往往形成發展規劃的暴力遺跡。隨著二十世紀的到來，原生的街道和生活方式不復存在，已被殖民主義模式所取代。[3]跟隨殖民腳步而至的，是建鑄於本土景觀上的歐洲式空間配置，這一切，皆為了讓殖民地得以鞏固其治理和經濟的架構。舉一實例，荷蘭在巴達維亞（印尼雅加達老城）開通的運河，以及法國在柬埔寨和越南主要城市打造的林蔭大道系統。[4]此文將解析英治時期的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城市綠地經歷的演化。

正如羅伯特・霍姆（Robert Home）所說，公共廣場這「標準模式」是英國在其殖民地刻

1 A. King, *Colonial Urban Development: Culture, Social Power, and Environment* (London: Routledge, 1976).

2 A. King, *Urbanism, Colonialism, and the World Economy: Cultural and Social Foundations of the World System* (London: Routledge, 1990), p.16.

3 T.G. McGee, *The Southeast Asian City: A Social Geography of the Primate Cities of Southeast Asia* (London: Bell, 1969).

4 For a detailed discussion on city planning in Indochina, see G. Wright, "Indochina: The Folly of Grandeur", In G. Wright, *The Politics of Design in French Colonial Urbanism*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91).

印下的八大模式之一。[5]這些等角和網狀方塊模鋪陳在殖民地的廣場猶如「收編蠻地的終極象徵」。對開放空間的廣泛操縱在早期的殖民地試驗中極為明顯。有別於美國的薩凡納和查爾斯頓，或者澳洲的阿德萊德，統治者利用這些土地大量地開墾種植，不可逆轉地改變了土地和動植物的原生態。毫無意外地，倫敦殖民部（Colonial Office）的前身是種植園委員會，負責為「鄉鎮的種植者處理民事及安全問題……預防敵人的羞辱及入侵」。

無論如何，這些大英帝國統治下的諸多管轄範圍內，因為殖民風土民情的不同而產生不同的空間管理概念。因此，與其說創造大英帝國世界，不如說大英帝國是如何「用不平衡來權衡」各個大都會。對這帝國來說，印度如珠似寶，然而亞洲其他經英國統治的地方如錫蘭、緬甸、馬來亞和新加坡，僅籠統地被稱呼為「遠印度」（Further India）。值得一提的是，這些屬地中有幾個位於馬六甲海峽兩側，將法國在印度支那的利益和荷蘭在東印度群島的利益從歐洲隔開。故此，馬來亞半島上的檳榔嶼、馬六甲和新加坡由加爾各答作為二級殖民地來管轄。

位於加爾各答的馬坦公園屬於人造草坪，這「第三類文化」是大英帝國城市規劃和種植實驗的產物，從此在印度其他地方被採用，比如阿麥達巴。[6]一七五七年，英國舉軍從孟加拉世襲統治者納瓦卜手中重奪加爾各答，威廉堡重新被器用，並清空其四周的建築物和民宅，形成一望無際的濱海大道，亦即馬坦公園。[7]無論是視野上還是防衛上的坦蕩蕩，這涵蓋二乘

一英里的空間，實際上也具備防火功能。同時，威廉堡和毗鄰的胡格利河也讓在此駐紮的英國人監視這迅速發展的新殖民城鎮。[8]經許多學者觀察，許多重要的公共建築物皆環繞在加爾各答馬坦公園四周，除此之外，這河畔全景也成為了許多藝術家和作家的創作題材，儼然成為了詮釋這座城市的主題配備。

除了被英國當局青睞以外，馬坦，「*maidan*」或「*maydan*」這兩個只有一個英文字母之差的字，皆源自於波斯。在九世紀的伊斯蘭城鎮，「馬坦」指的是公共廣場之波斯園林設計。聶沙（Nezar AlSayyad）曾寫道，類似的「馬坦」早在中世紀的開羅法蒂瑪皇家轄區中心就存在過。廣場之大，據說一支萬人军队可以在这个被称为拜恩·卡斯雷恩（Bayn al-Qasrayn）的地方集结，它位於城市的兩个宮殿之间。在歷經多翻改朝換代，各個繼承者展現其中樞權

---

5 R. Home, "The 'Grand Modell' of Colonial Settlement". In R. Home, *Of Planting and Planning: The Making of British Colonial Cities* (London: Spon, 1997), pp.8–35.

6 A. Mathur, "Neither Wilderness nor Home: The Indian Maidan". In J. Corner, ed., *Recovering Landscape: Essays in Contemporary Landscape Architecture* (New York: Princeton Architectural Press, 1999), pp.206–8.

7 S. Chattopadhyay, *Representing Calcutta, Modernity, Nationalism and the Colonial Uncanny*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p.46.

8 N. Evenson, *The Indian Metropolis: A View Towards the Wes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19.

威時不斷的重塑、重組和重建，它依然標杆性地屹立多個朝代。[9]

在波斯，馬坦（波斯園林廣場）被認為是附屬在城市內的皇家大院其中一部分。伊斯法罕的沙阿·阿巴斯一世大帝（Shah Abbas I），對伊斯法罕進行大規模的城市化設計，充分利用這個廣場進行各個活動，以闡明其統治的核心所在。在他之前的朝代，主要城鎮的核心位置並不在此，而是老城的哈倫老廣場（Maidan-I Harun Vilayat）。隨著阿巴斯在城市的另一端建造一個新城鎮的指令，伊朗第一個什葉派王朝中心因此誕生。這座建造於一五九七年到至一六二九年、占地四百四十乘一百六十碼的伊瑪目廣場（Maidan-i Naqsh-i Jahan）取代了老廣場，成為了集合國家權力、宗教、商業、教育、休閒和紀念儀式等多個功能的新楷模。[10]

有別於其他的波斯園林廣場，阿巴斯的馬坦被一條六英尺寬、以磚塊打造的運河環繞，並在二十英尺寬的綠茵之中，在運河和馬坦周邊種植了一排排的樹木。一片綠蔭下一字排開的雙層商店，加插著十幾個主要的大門和通道，條條大路通馬坦，日常中為商隊和民生而繁忙。在這皇家地帶裡，可見集市、回教堂、花園、宗教學校和其他公共建築或擁有紀念元素的建築物在宮殿周邊環繞，清晰地表達了沙阿（shah，譯按：波斯語，古代君主頭銜）統治的中央集權，和他作為政治、經濟和公民生活提供者的高明手段。誠如史蒂芬·布雷克（Stephen Blake）所描述，馬坦是日常或季節性制定的皇家展演之場所，其中如：馬球、賽馬、閱兵典禮、煙火盛會、軍演、接待外使、官方禮儀以及宗教節慶。此外，有一條六公里長，綠樹成蔭，

擁有噴泉的夏巴大道，貫通馬坦，直達扎因代河（*Zayandeh River*）。

因此，在某層面上，既是名稱也是形式，加爾各答的馬坦乃是大英帝國實驗性質的從這些伊斯蘭古鎮盛行的空間規劃，以其特徵及目的，打造出來的「殖民第三文化」。

換了瓶子也換了藥，擁有如此出身背景的馬坦在大英帝國的改造下，正式化成為好比孟買和馬德拉斯這些城鎮的行政工具。其雛型乃是四周皆有建築物環繞的人造草坪，然而，有別於伊斯蘭古鎮的馬坦，英式馬坦矗立著一棟棟的圍牆和堡壘。在馬來亞半島，最初可見此類型的馬坦位於檳榔嶼，其後在一七八六年被英國商人占據。這裡的康華利斯堡建於一個具有戰略意義的海角位置，並被檳城板球俱樂部和政府大樓夾在其中。[11] 隨著英國馬來亞的政權交替，這個混合空間被當地人廣稱為「大草場」（「*Padang*」）。

9 N. AlSayyad, "Virtual Cairo: An Urban Historian's View of Computer Simulation". In *Leonardo*, Vol.32 No.2, pp.93–100.

10 S. Blake, *Half the World: The Social Architecture of Safavid Isfahan, 1590–1722* (Costa Mesa: Mazda Publications, 1999), pp.xvi–xvii.

11 K. Garnier, "Early Days in Penang". In *Journal of the Malayan Branch,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1 (April 1923), pp.5–6. 逐漸從一片曠地發展開來的廣場(esplanade)，堡壘和小市集的殖民地，並在一年內吸引了各個不同族群的人與當地的馬來人共居一個空間。

新加坡和吉隆坡的大草場

英國占領了新加坡的同時，也改變了海岸線一帶的景觀。幾乎同步的，在他們抵達的同時，也開闢了這塊曠地。著名的英殖民地奠基人萊佛士（Thomas Stamford Raffles）意識到錨地的山丘具有俯瞰殖民地和防禦優勢，於是在這裡的山頂建造了一座堡壘作為監視用途。[12]在一八二二年，依據傑克遜計畫，新加坡河岸一帶的地區規劃涵納了一條延綿的人造景觀帶，並從海岸線延伸到最近的內陸山丘。這景觀帶內涵一個開放式廣場，由富勒頓堡的炮台牆保護著，而這個實驗性質的植物園就在其中間。爾後，這裡就是「禁山」（拉浪安山，Bukit Larangan）上的福康寧堡。這三種人造元素的出現意味著原住民是如何被壓制和操縱，任由殖民者鏟平（成為「大草坪」）、規律的樹木和灌木區（成為「植物園」）以及山丘上俯瞰的防禦。[13]日後此區即使稍有其他添加建築物，也是指定和特別的建築物如：教堂、法院、廣場和位於花園之間的政府樓，以及萊佛士在山上的住所。

一八六七年，新加坡、馬六甲和檳榔嶼的管轄和管控權從加爾各答遷移到倫敦殖民部，並組成海峽殖民地，俗稱三州府。「esplanade」，這一字源自拉丁語「*explānāre*」，即「調整水平線」的意思。英國人建立的廣場沒多久即成為了英國殖民者與當地居民之間的主要對接處。此處用途甚多，用於軍事集會和演習。另外，這片綠意盎然的空間也成為了一個多功

能的活動場所——用以進行板球、足球和橄欖球比賽，以及其他殖民者舉辦的盛事和各類儀式。通過軍事、休閒和儀式用途，該空間向定居於此的群體灌輸殖民紀律和畢恭畢敬的意識。於此也充分展現了白人統治者不同的一面：必要時好戰和軍裝必備，但偶爾也能放鬆警惕，能屈能伸以及適時放鬆。當體育比賽上演時，被管轄的群體也能被邀請分享場地，共襄盛舉。

新加坡大草場周邊的新古典主義行政樓及商業化建築物，標誌著殖民者的合法性以及原住民與外來移民的區別。如同檳榔嶼，這裡英國的東印度公司與國內商人緊密合作，沒多久，他們也成功說服了被委派來此的參政司，讓他們占據大草場一帶的土地。其中包括布斯泰德家族（Boustead family），他們在此土地上建造歐洲酒店（Hotel de'la Europe），其後就是薩奇斯兄弟（Sarkie brothers），在鄰近建立了萊佛士酒店。[14] 然而這抵觸了萊佛士的授權。在此之前，他曾指定新加坡河北岸的一部分必須是政府保留地。但隨著約翰・克勞福（John

12 Letter from T.S. Raffles to W. Farquhar dated February 6, 1819, as cited in L.T. Firbank, *A History of Fort Canning*（無出版紀錄）, p.16. 一開始，浮爾頓堡為防禦用，沒多久，這個保家衛國的角色被福康寧堡取代了。

13 C.K. Lai, "Botanical Imaginations of Southeast Asia in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ies".(《想像十九與二十世紀的東南亞園藝景觀》) in *Singapore Architect*, No.233 (July 2006), pp.70–79.

14 K.L. Lee, *Telok Ayer Market: A Historical Account of the Market from the Founding of the Settlement of Singapore to the Present Time* (Singapore: Archives and Oral History Department, 1983).

Crawfurd）成為新加坡的新參政司，他修改了這個規定，轉而開始向商人出租土地。包括羅伯特·史考特（Robert Scott）、詹姆斯·史考特·克拉克（James Scott Clark）、愛德華·布斯泰德（Edward Boustead）以及威廉·蒙哥梅利（William Montgomerie）在內，他們紛紛在大草坪外圍建立住所和酒店，直到這些地方被政府徵用，成為了市政廳、最高法院和政府大廈。[15]

在大草坪周圍創造一個統一的新古典主義外牆的過程是漸進的。當中依序建造的包括國會大廈（一八二六至一八二七年，最初計畫是私人住宅用）、聖安德魯大教堂（一八三五至一八三七年，然後一八五六至一八六一年）、板球俱樂部（一八五二年）、維多利亞紀念堂（市政廳一八五六至一八六二年、一九〇二至一九〇九年）、政府大廈（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九年）和最高法院（一九三七至一九三九年）。儘管當時現代主義已經開始影響整個東南亞的建築設計和裝飾藝術風格，然而這棟最高法院還是以新古典主義風格設計。它的外牆沒有使用大理石作為主要材料，而是由鋼框架上的花崗石元素組成。為了紀念奠基人的貢獻以及其對此自由港的建立和發展所做出的貢獻，當地社區還於一八八七年在大草坪中心豎立了萊佛士的雕像。[16]

整體來看此格局，大草場周邊的建築物頗有喚起殖民權力和紀律之意。實際上，新加坡社會學家蔡明發（Chua Beng Huat）設想，這新古典主義建築的規範元素帶出的願景為：「隨

同總督兩側的是一列排開的殖民行政人員，皆威風凜凜地在制服上貼滿勳章。他們坐在講台的頂端或陽台上，以俯瞰的角度巡視聚集在大草場的被殖民者。」[17]

大草場旁，海口的浪花拍岸，這海濱邊緣則綠樹成蔭，供一般公眾使用。誠如一八五〇年代某位遊客描繪的那樣：「每週兩次，同樣場景總會隨著樂團演奏而像上了發條一樣重複上演。這樣的場合，老婦人聚首說說別人的醜聞，而她們的女兒則恣意調情。」[18]隨著慈善家陳金聲紀念碑的建造，此地區的紀念價值因此增強。二戰結束後，這裡更是建造了一座戰爭紀念碑。從一九五三年起，濱海藝術中心被稱為伊麗莎白女王步道，然而它依然不變地作為該區一個重要的海濱長廊。

在新加坡以北，馬來亞的殖民首都、後來成為馬來西亞國家首都的吉隆坡的建築，呈現出與檳城和新加坡等海濱城市不同的營地模式。濱海區域往往具備有利位置和防衛功能的山

15 K.L. Lee, *The Singapore House, 1819–1942* (Singapore: Times Editions, 1988), pp.148–49.

16 此雕像為弗雷德里克・韋爾德 (Frederick Weld) 所委託製作，並由托馬斯・伍爾納 (Thomas Woolner) 設計和雕刻。A. Woolner, Thomas Woolner, *RA: Sculptor and Poet, His Life in Letters* (London: Chapman & Hall, 1917), p.326. 此雕像隨後被轉移，現址為後來被轉移到維多利亞紀念堂。

17 B.H. Chua, "Decoding the Political in Civic Spaces: An Interpretative Essay". In *Public Space: Design, Use and Management*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58.

18 M. Jayapal, *Old Singapore*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25.

頂，好建築堡壘，作為軍事集合地或者其他休閒功能。然而，做為一個靠河的城市，吉隆坡則呈現出迥然不同的狀況。

一八八〇年代在馬來亞，巴生河和鵝麥河交匯處一帶的茅屋和菜園被清理徵用，吉隆坡首個閱兵廣場便在此建立。這個廣場爾後成為了英殖民者與本土華人和馬來人的分界線，楚河漢界的西邊是殖民者的營地；東邊則是就地生活的華人和馬來人社區。廣場主要用途為警察日常操練演習的地方。這綠色區塊一點一點地被夷平，同時也被用作多用途活動場合。這筆價格不菲的維修費用就落在置於側邊某角落的雪蘭莪俱樂部身上。作為一個運動場，該空間前後舉辦了板球、足球和橄欖球比賽。一八九七年的維多利亞女王登基鑽禧紀念等殖民時期活動也在此舉行。它後來被命名為大草場，就和其他殖民城市類似的綠色草場沒什麼不同。

與此同時，能俯瞰兩條河流匯合處的斜坡附近的好位置被英國官員的房子占據，而較低的地區則為軍營、軍械庫、政府辦公室、綜合醫院和其他各種政府宿舍。值得一提的是大草場周圍的政府樓和宗教建築：一邊有印度伊斯蘭風格的建築，延伸一英里，乃是土著馬來統治者對其他民族社區表達的支持。另一邊廂，英格蘭都鐸式建築，或不拘一格的新古典主義建築則建立在另一側，好以道明大英帝國曾到此留下痕跡。這種千姿百態的風格表明了殖民之下，依然能有不同的建築被建立起的意願。其中，又數宏偉的祕書處大樓（現為蘇丹阿都沙末大廈）那座一百三十五英尺高的鐘樓最為鶴立雞群，成為了此處最鮮明的地標。除了建

策，殖民主義的監視感還通過每天中午從當地發射大砲來維持，似乎提醒所有當地居民莫要忘記英國的軍事力量。

殖民土地的複製

很快的，這種既宏偉又正式的空間被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其他小規模城鎮複製開來。他們各自的殖民政府將這些小規模的空間分散開來，作為基礎設施工程的一部分，旨在銜接和控制他們的各種選區和聚落。舉個例子，新加坡殖民政府在新加坡大草場兩側的沿海定居點，指定了一系列開放區域作為綠地或遊樂場。這些被開闢的區域成為次要「項鍊」地帶，意指：由道路連接，在擁擠和人口稠密的地區和民族聚落內充當了民生的緩衝區。

除了這些不固定的由政府規定的開放空間，當地居民也開始在自己的地盤創造自己的公共空間。這些附屬空間在配置上與殖民政府的主要草場極其相似，並通過模仿他們在人造草場周邊建築明文規定的排序，說明一種「次要」社會政治等級制度，通過此表現出對殖民特徵的同化感。

早期的新加坡，從中國南部遷徙而來的亞族群，定居在新加坡一個名為「水車路」（Kreta

Ayer）的地區，位於新加坡河兩岸，以及河岸東北之處。[19]一個當地的「華人」和「馬來人」通婚的混血族群，或廣為認知的「海峽華人」（Straits-born Chinese）後裔定居於此。由於他們擁戴歐洲風俗、穿戴打扮和教育，更勝自己原生的「家長」文化和習俗，因此，他們也被稱呼為「國王的華人」（King's Chinese）或「女皇的華人」（Queen's Chinese）。更重要的是，他們長袖善舞，遊走在殖民官員／歐洲社區與其他原住民群體之間，充當社會和商業的中介，因此，在此期間也被視為「開明的」英國臣民。

一八七六年，當地海峽華人章芳林捐贈了三千美元，將中央警察局和警察法院大樓附近的土地改建為公共花園，並聘請了兩名園丁打理。[20]此廣場的所在位置絕非偶然，皆因這兩座建築的存在位置介於新加坡的渡口和倉庫間，西南方又是中國遷徙而來的亞族群「華人」的店屋聚落，頗具戰略性。在這裡可以監察所有經濟交易活動，同時也可以監視來此工作的勞工群體。這兩座建築物——尤其是這四層樓高、幾乎四處可見的警察法院大樓，採用了新古典主義的建築風格，與新草場並列在軸線上，完全凸顯了殖民者如同龐然大物的存在。只見這一區外圍並列著殖民時期建築和草場，與各個店屋和道路並列，形成了一個封閉的城市界線，格局儼如幾何規格。

這個整修齊整的空間最終以其贊助人的名字命名，被稱為芳林公園（前身為「登文埔」）。在一八八七年，一座專為海峽華人康樂俱樂部（Straits Chinese Recreation Club）建立的八角

亭子矗立在其中，與警察大樓在軸線上對齊。此處用作各項體育用途，其中有草地滾球、板球和做為操練各項「英式運動」的場地。這個草地上的俱樂部成為了纖只收白人為會員的新加坡康樂俱樂部（SRC）之後的第二個當地人設立的草場，這草場也成為了該俱樂部專屬的公共場合。如此安排立竿見影地對比新加坡康樂俱樂部在大草場的地位，以達到與英國社會之間的權衡作用。[21]

在吉隆坡，為了說服更多馬來人來到城鎮，相同的草場如出一轍。根據早期的市區人口普查，「華人」和外國人口比「土著馬來人」還要多出很多，這引起了統治者的擔憂。因此，在一九〇〇年，位於巴生河和「吝部律」（Batu Road，Batu 為馬來文，是「東姑阿都拉曼路」

19 有關殖民地模式文章，請參閱賴啟健文章：“Multiracial Enclaves: An Examination of Early Urban Settlements in Singapore”. In *Dialogue Magazine*. No.78 (March 2004). pp. 28–30. 首後，牛車水 (Kreta Ayer) 被新加坡旅遊局標籤為「唐人街」。另外，在新加坡北部也有華人農民駐紮的務農用殖民地。

20 章芳林 (1841–1893) 是一名福建籍貫華人，從事鴉片和酒類貿易。他在河邊擁有許多店屋和倉庫，芳林碼頭也以他的名字命名。H.S. Lim. “Cheang Hong Lim the Unclannish Philanthropist”. In *Hong Lim: Past and Present* (Singapore: Hong Lim Citizens Consultative Committee. 1977). pp.22–24; and O.S. Song. *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1967). pp.168–69.

21 正如賴啟海（音譯）所指出般，當殖民時期的建築被拆除後，這片綠地繼續發揮著國民表徵和功能。它持續的作為國家文化表演、政治集會的場所，並最終成為一名「說故事的人」。S.H. Lai. “In Search of Civitas: The Urban History of Hong Lim Green”. 未發表論文，新加坡國立大學。

的前身）之間，一個占地兩百二十四英畝的城鎮邊界內的土地被保留用作「馬來農業移居地」。該空間位於城市河流交匯處以北約一英里處，部分位於高處，部分位於沼澤地，是通過驅逐擅自居住此地的華人所得。正如一八八七年土地法令規定的那樣，其目的是「此移居地完全保留給馬來人，並鼓勵農作和生產有用的藝術和手工藝品，並為在城鎮中心附近工作的馬來人提供一個廉價的住所和工作地點」。猶如威廉．特雷徹（William Treacher）報導的那樣，該移居地還旨在鼓勵馬來人「打造更優質的住宅、更好的衛生環境和更高等級的居家環境」，越是靠近城鎮，就越能達到此理想。在那之前，大多數土著馬來人居住在被稱為甘榜的河流或沿海的鄉村，主要是浮腳木屋，或者居於其他耕地或天然林野之中。

這個初推行的馬來新村（Kampung Baru）先是建立了兩座小型馬來房屋，以及一個專為到該地英語學校就讀的馬來寄宿生提供的大型宿舍、兩口磚井，同時也僱用了兩名園丁和一個工頭。[22]其餘部分則被劃分為一百九十六塊土地，其中二十六塊是較大的沼澤地，用於種植水稻。剩下的半英畝土地，在業主無需支付任何費用下，永久地出租。這裡的地以矩形地塊劃開，如此排列使得房屋可以在地塊內集中建造，並由道路完好連接。根據董事會成員赫爾（A. Hale）的說法，這種安排對環境上是「衛生的」，同時它遵循了「傳統的馬來甘榜生活，不過系統上是進化和改良了」——縱然它已經明顯的遭到了破壞。[23]

沿著赫爾路（Hale Road，已被易名為 Jalan Raja Abdullah）可見添加的各種社會和公共

設施，環繞著一個休閒草場，俗稱為「馬來草場」。除了前文提到的寄宿學府之外，還有一所男校和一所女校，以及蘇丹蘇萊曼俱樂部皆建立在草場外圍。隨後建立的還有社區回教堂，僅僅一街之隔，毗鄰還有一座週日市集（Pekan Ahad）以及一座伊斯蘭墓園。該草場及該民生結構像極了那片殖民大草場，位於兩河交匯的吉隆坡那一座，只是格局微型。尤其是俱樂部和教育中心的所在位置，模仿著市中心草場的意味甚濃，是二級大草場。這空間「啟發」乃是一個慘痛教訓，它喚起馬來人對城市擬像的接受和同化，做為換取在城市生活的條件。但最終它的目標——為殖民政府給馬來人提供靠近城市的住宿，提供技術和教育，以及為城市種植出水稻的計畫——並沒有取得多大成效。

「國家」認同的替換

在東南亞，二戰結束後到一九七〇年的這段過渡期，興許被喻為後殖民政府試圖詮釋和

22　J. Hands, "Malay Agricultural Settlement, Kuala Lumpur". In *The Malayan Historical Journal*, Vol.2 No.2 (December 1955), p.146.

23　A. Hale report, as cited in K.K. Khoo, *Kuala Lumpur: The Formative Years* (Kuala Lumpur: Berita Publishing, 1996), p.22

定義「國家」含義的時期。此時的當務之急，就是要修改，甚至給殖民架構尋找一個新的替代、舉國性的方案。獨立後，新建築將成為物質上和視覺上體現變化和發展的藍圖——既為了公民的共同使用，同時也能體現願景，並向世界各地展示的「國家」形象。二戰後，屬於新加坡和馬來亞殖民時期的大草場，以空間扮演的特殊角色將被替換，特別是在形式和結構上，其他的新體育場亦然，毫無差異可言了。

在這新體育館場內，顯要們秩序井然地端坐在階梯之上，搖身一變成為了國民。在這樣的設定下，代表權貴的官宦與普羅大眾之間，似乎也可以因為這席位的等級分配，而讓權力關係一目了然。正如約翰・貝爾（John Bale）所指出，這種體育場形式，拓展了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對於社會或人性政治權利的看法：在這種情況下，奉公守紀者除了運動健將，還包括觀眾本身。[24] 後獨立時期，當權者以此方式使用體育場，可說在民眾之中產生了多方面的影響。要是紀念活動，他們可以通過集體觀賞賽事來激發內心情感。舉辦的各項體育賽事，尤其是那些講究團隊精神的賽事，得以激發民族熱情，漸進式的聯合、區分或分裂社會或政治團體。[25]

一九五七年八月三十一日，在吉隆坡，默迪卡體育場的建設創造了一個可以見證政權從英國轉移到本土政府手中的空間。這個由鋼筋混凝土打造、人造的綠色「草場」，可容納兩萬人的空間，隨後取代了殖民地的大草場，成為舉行任何與獨立有關或其他娛興慶典的場所。

馬來西亞是最早在體育場內舉行獨立慶典的國家。爾後，一九六二年的牙買加、一九六四年的贊比亞和一九九〇年的納米比亞，也效法使用體育場作為舉行獨立慶祝活動的場所。[26]

在新加坡，從政府大草坪到國家體育場——這個象徵權力轉移的空間治理，則花了更長的時間。新加坡於一九六五年獨立一年後，決定每年八月九日在政府大草場舉行國慶大遊行紀念活動。當這個可容納五萬五千名觀眾的國家體育場建好，為人們打造了一個替代的集會空間之際，正是一九七三年。

正如阿南達·拉賈（Ananda Rajah）的論述，新加坡的國慶閱兵是該國作為一個想像中的國家政治共同體的主要象徵。早期階段在大草場舉辦的活動，最具象徵意義之處，恐怕就是徹底顛覆了殖民地關係。然而，大草場所展現的代表性不僅限於在這個指定地點聚集的官民。在更廣泛的層面上，該活動旨在展示該州的行政能力以及對策劃和協調的絕對熟練程度。[27]因

24 J. Bale, "The Spatial Development of the Modern Stadium". In *International Review for the Sociology of Sport*, Vol.28 No.2/3 (1993). 貝爾引以大不列顛的足球體育館作為例子。

25 A. Pereira, "It's Us against Them: Sports in Singapore". In *Past Times: A Social History of Singapore* (Singapore: Times Editions, 2003), p.149.

26 有關體育場的重要性以及其建造的歷史討論，請參閱：C.K. Lai, *Building Merdeka: Independence Architecture in Kuala Lumpur, 1957–1966* (Kuala Lumpur: Galeri Petronas, 2007), pp.15–25.

27 A. Rajah, "Making and Managing Tradition in Singapore: The National Day Parade". In K.W. Kwok et al.,

此，遊行的混合性和創新性——其性質、內容、賣點，甚至地點——都做出了改變，以維持其與節慶相關的儀式感，並在定期和儀式上體現國家公民的成功。早期，在大草場舉辦的特點和壓軸活動，莫過於閱兵儀式所展出的軍裝和配備，好以展示二戰後自力更生的實力。但隨後，它的主題變得多樣化了，場地也變得更加靈活使用。[28]在大草場舉行的遊行總共有十八場次，在國家體育場則是十八次（自一九七六年）。多年以後的二〇〇七年，該遊行搬到了一個更新的場地，亦就是新開發的濱海灣。[29]

新加坡國家體育場始於加冷機場區從一九六〇年代開始的重建計畫。一九三〇年代，該機場地址落在經填海工程填平的盆地和沼澤中。新加坡公共事務局參與了這項符合奧運會規格的建造和設計，並採用了粗獷主義，以不修邊幅的鋼筋混凝土建造而成，被許多人認為這與丹下健三在一九五八年設計的東京體育場，以及奧托和貝尼奇於一九五八年在慕尼黑設計的體育場，似乎沒什麼不同。[30]

一九七三年，此處舉辦了第七屆東南亞半島運動會，讓成為東道主的該國首次驗收這體育機構和聯繫全球的初體驗。[31]

建國後的現代奇觀（spectacle）

在一九七〇年代的石油危機之後，馬來西亞和新加坡政府皆重新努力創建各項地理和發展項目，致力讓公民與各個民族和國家的官方新願景聯繫起來。在馬來西亞，一九九七年一月，第四任首相馬哈迪（Mahathir bin Mohamad）正式提出了十五乘五十公里、從吉隆坡大規模向南線性延伸的的開發計畫，並稱之為「多媒體超級走廊」。其本意是通過這種以新興知識

eds., *Our Place in Time: Exploring Heritage and Memory in Singapore* (Singapore: Singapore Heritage Society, 1999), pp.101–9.

28 L. Kong and B. Yeoh,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through the Production of Ritual and Spectacle: An Analysis of National Day Parades in Singapore". In *Political Geography*, Vol.16 No.3 (1997), pp.213–39.

29 於大草場舉辦年份為一九六六至一九七四、一九七八、一九八二、一九八四、一九八七、一九九〇、一九九三、一九九五、二〇〇〇、二〇〇五；於國家體育場舉辦年份為一九七六、一九八〇、一九八五至八六、一九八八至八九、一九九一至九二、一九九四、一九九六至九九、二〇〇一至〇四、二〇〇六。二〇〇七年之後至今，該遊行便移師到濱海灣舉行。

30 W.H. Ho, "Is the National Stadium's Demolition Inevitable? Reclaiming Singapore's Modern Architectural Heritage". In *Singapore Architect*, No.240 (2007), pp.140–50.

31 參閱活動手冊："Seventh SEAP Games Singapore Bulletin 1973" and "To Commemorate the Opening of the National Stadium, Republic of Singapore."

和網際籠絡的全球經濟的國際想像，加以本土化，進而重新規劃了此國家的空間。此計畫由四個部分組合而成，其中三個將建在舊首都的邊界之外：布城（Putrajaya），一個占地四千五百公頃的政府樓綜合體，通過清理油棕芭而打造出來的新聯邦直轄區；賽城（Cyberjaya），位於布城西面，一個占地七千公頃的曠地，將成為「東方矽谷」；最後則是位於走廊南端的吉隆坡國際機場（KLIA），該機場將取代建於一九六五年的國際機場。在吉隆坡內，第四個組成部分，即吉隆坡市中心（KLCC）雙子塔區域，由舊賽馬場改建而成，涵蓋多達二十二個功能項目。

計畫布城，不外乎是還魂馬坦的意義構想。它不過為了揮畫出馬來西亞、伊斯法罕和伊斯蘭中東之間的聯繫假想。第一區是該計畫中構思和建造的第一個元素，以一條四點三公里長的直線軸向林蔭大道為主要骨幹，一端是主要的政府綜合體，另一端則是會議中心。[32]靠近政府綜合大樓的是林蔭大道末端，一個直徑三百米的圓形瓷磚區域，稱之為布特拉廣場（馬來文「Dataran Putra」〔Putra「Square」〕）。鄰近建築組合包含了一個布城首相署、布特拉回教堂和一個俯瞰人工湖的市場（bazaar）。在它的東北邊緣，毗鄰首相署的是一條直線大道，堪比重新包裝的夏巴大道。根據官方說法，這是該地區與該區域其他部分貫連的主要聯繫，旨在精心打造一個「水道、花壇和樹木相映成輝的路徑」。[33]

如同伊斯法罕，布特拉廣場周邊的建築設計和裝潢的伏筆是該國的「歷史刻表」。它那

放射狀底紋圖案，結合三個重疊的從中心展開的多角星星，計有十一個、十四個和十四個點。這圖形設計是對國家發展的回顧，從一九五七年，馬來亞時期的十一個州，到一九六三年發展成十三個州的「馬來西亞」，隨後又增加了「聯邦直轄區」構成十四。[34]根據官宣資料顯示，此設計「……具有強烈的馬來和伊斯蘭特色打造，一座結合馬來西亞特色和國際外觀的建築。……它的頂部是傳統的馬來式斜屋頂和主街區的伊斯蘭圓頂。……」[35]一如伊斯法罕的伊瑪目廣場，其精心挑選的各別元素在馬來西亞建國後的新景觀中被重新展現。

與此同時，新加坡最引人注目的建國後的發展項目莫過於濱海灣的創建。這一大規模的發展可被視為該島國最新穎的物理重構，此濱海灣項目在歷史悠久、遠在殖民時期已經沿用

32 整個布城廣場（dataran）以首相署辦公室為主軸，往前開展的星名為布城（Putrajaya）、民眾廣場（Rakyat）、宏願廣場（Wawasan）、國庫控股（Khazanah）、大回教堂（Masjid Besar）以及大法院（Mahkamah）。摘自 *Perdana Putra: An Appreciation of the Architecture and Interior Design of the Office of the Prime Minister of Malaysia* (Putrajaya: Putrajaya Holdings, 2001), p.183.

33 布城官網：http://www.ppj.gov.my

34 多角星星同樣也出現在馬來西亞國旗之上。（布城）瓷磚上的圖案如出一轍地描繪此變化。一九五七年星星有十一個角，但隨著新加坡、沙巴和砂拉越三個州併入馬來西亞，星星的角一九六三年改為十四個。當新加坡在一九六五年脫離馬來西亞時，星星的最後一個角就用以代表聯邦直轄區。多角星星也是各個第一批國家建築物偏好的圖案設計。論點請參閱賴啟健著作《Building Merdeka》。

35 *Perdana Putra*, p.15.

的海濱沿岸建造一個遠離海灣新的蓄水池，從填土土地上的構思和建造到後期的完工，歷時三載。此依水而立的三個主要填海區（濱海中心、濱海南和濱海東）自此開展了一個無論規劃和建設都舉足輕重的系列項目。在硬體上，它被廣泛的道路和地鐵網羅，包括三個地鐵站，穩穩地將之架在其中。迄今為止，該項目得到了超過四十五億新元的國家資助。[36]

從一開始，濱海灣的設計師就意識到，殖民者當初為了改變新加坡有限的土地和水源所做的各種努力。因此，它的「工程初衷」堪稱為舊工程的預測和延伸。[37]事實上，昔日的殖民銘文成為了需要努力超越的標準或基準。

在過去的三十年裡，新加坡約有百分之十五的土地面積是從河流、沼澤和海洋中經填土開墾出來。[38]環顧歷史，大草場本身在一八四三年和一八九〇年因填土開墾而擴張。濱海商業區也明顯的在一八五八年被大肆動土，並在一八八〇年代初、一九一〇年和一九三〇年代擴充開展。[39]戰後，殖民政府曾提議，進一步開墾直落亞逸海濱、美芝路，往東海岸一代延伸開展。[40]隨著一九五九年的政權歸還和自治，到一九六五年的完全獨立，新的轉變應聲而至，並迅速地在紅樹林沼澤中創建一個工業區，因此有了一九六〇年代的西南海岸（裕廊）和一九七〇年代後期的東北海岸（樟宜）的機場綜合區。

新加坡另一個持續存在的問題是水供。自一九六五年獨立以來，供水一直被視為國家重要議題之一。一八六七年開始，市政為其殖民城市提供淡水，只是，由於人口迅速增加，

一八九〇年代之後，需要通過在該國南部的人造蓄水池作為原有系統的補充。一九二七年，通過與柔佛蘇丹達成的協議，一條橫跨柔佛海峽堤道的輸水管道的建造讓該國獲得了額外的水源。[41]至今，每天仍有二點五億加侖的淡水從這個馬來西亞最南端的州屬供應淡水到該島。[42]儘管維修及擴大島上的蓄水區和水庫的基礎設施建設，發起了各項教育公眾節約用水的活動，並努力開源和設計其他集水方式，但這種對國外供應的依賴仍然持續發生。

36 Urban Redevelopment Authority, "Singapore in Metamorphosis: Interview with Mdm Fun Siew Leng," *Dialogue*, No.129 (2008), p.25.

37 此結論採自概念計畫和規劃報告中不斷作出的引用和歷史段落中所建立的聯繫。

38 這只是保守估計，如同魯道夫・德・科寧克（Rudolphe de Koninck）等地理學家估計，約六百一十七點八平方公里的百分之二十五（一九八〇年）。*Singapore: An Atlas of Perpetual Territorial Transformation*, p.14.

39 B.H. Chua, *The Golden Shoe: Building Singapore's Financial District* (Singapore: NUS Press, 2008), pp.40–45.

40 C.W.A. Sennett et al., *Report on the Proposed Redevelopment of the Coastal Area, Mountbatten Road, East Reclamation Road, July 1948* (Singapore: Singapore Government Press, 1948).

41 Y.C. Kog, "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 & Environmental Security in Southeast Asia: A Case Study of Clean Water Supplies to Singapore". In C.G. Kwa, ed., *Beyond Vulnerability? Water in Singapore-Malaysia Relations* (Singapore: Institute of Defence and Strategic Studies, 2002), pp.26–27.

42 同上，頁二七至二八。將於二〇一一年和二〇六一年滿約，和柔佛簽署的水供協議，也被稱為《柔佛河水協議》。

一九七七年二月，新加坡總理李光耀發起了一項增加當地供水的新舉措。他向環境部發起挑戰，要求清理新加坡河和加冷盆地的原水，這兩處的水源占全島總水量的百分之三十。為了呼應總理的挑戰，一項「河道清理」計畫啟動，隨後重新規劃加冷盆地計有四萬二千名及新加坡河沿岸計有四千名聚居者的所在地，以搬遷或淘汰的方式重新安頓六百一十個養豬場、五百個養鴨場和兩千八百個其他行業。[43]此一系列的河流改造計畫有系統地展開，除了清理堆積在河床的沉積物，四千九百二十六名街頭食品小販也被安置到稱為小販中心的地方繼續營生，造船業和其他被認為造成污染源頭的行業被重新安置或直接終止。[44]然後，加冷盆地的低窪地區被從鏟平大巴窯連綿起伏的山丘得到的泥土填平，附近的一個地區被圈定為衛星公共住宅區，一氣呵成地創建了兩個用於住宅和工業用途的「白板」（tabula rasa）曠地。[45]

經過長達十年的努力，河道清理計畫終於在一九八七年實現目標的同時，總理又推出了一個建造新水庫的計畫，儲蓄收集這些河流系統的逕流。這樣的項目利大於弊：除了增加國家水源供應，防範緊急情況，洩洪防洪，也順道打造了一個新的休閒場所。[46]

在隨後的幾年裡，開闢水源仍然是國家機構重中之重的舉措。二〇〇二年引入「NEWater」（回收和處理污水而成的新生水）用於工業用途，並於二〇〇五年正式啟用海水淡化設施。但最大的成就是以V字形水道的頂端築壩，在濱海海峽創建了兩百四十公頃的濱海灣蓄水池，成為島上的集水系統裡第十五個蓄水池。[47]這些舉措因此正式促成了四個「國家

[illegible]當地集水區的水源供給、來自柔佛州的進口水、新生水計畫和海水淡化工程。

嘗試增加水源的同時，一九七〇年到一九八五年進行的填土開墾土地計畫也創建了濱海中心和濱海南區。[49]在一九八五年到一九九七年間，一系列的概念計畫和規劃報告，從區塊分割、分區發展和土地售賣，一覽無遺地闡述了這些地區的未來用途。[50]到了一九九〇年代，新

43 Y.S. Tan et al., *Clean, Green and Blue: Singapore's Journey towards Environmental and Water Sustainability*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08), pp.71–72.

44 Ministry of the Environment, *Clean Rivers: The Cleaning Up of Singapore River and Kallang Basin* (Singapore: Ministry of the Environment, 1987), pp.14–31.

45 R.E. Gamer, *The Politics of Urban Development in Singapor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2), pp.60–71.

46 J. Hon, *Tidal Fortunes: A Story of Change: The Singapore River and Kallang Basin* (Singapore: Landmark Books, 1990), pp.41,104.

47 在一些伊斯蘭城鎮馬坦中心點，必置放一個大蓄水池或水井。Mathur, "Neither Wilderness nor Home", pp.208–9.

48 Y.S. Tan et al., *Clean, Green and Blue*, pp.156–57, 238–40.

49 一部有關此土地開墾計畫可在此文尋獲：*Water Margins: Final Report of NUS Research Project* R295-000-057-112I (2009), pp.72–98.

50 新加坡市區重建局，一九八九、一九九五、一九九六及一九九七年市中心核心區規劃報告。

加坡已完成三百七十二公頃的填土計畫，其中九十公頃用於擴建中央商務區，劃為「中環」（Central）。然而，在一九八九年，經總規劃草案中分析得知，原始的海灣形狀，亦就是濱海南西北邊緣的弧線太寬，需要額外的填海工程來重塑它。到一九九五年，一個更為垂直的平面，以平行排列方式將政府大草場納入地圖，並驚歎地還原出舊大草場的形狀。[51]

為了支持它成為「一個生活、工作和休閒的好地方」的口號，圍繞這個新的「水力草場」的開發項目包括高端公寓樓、濱海藝術中心、金沙綜合度假村（亦是一個賭場）、各種博物館，以及一個新的植物園——濱海灣花園。[52]一度承載悠久歷史的濱海區也發生了變化：曾經是海外華人移民的主要場所的科利爾碼頭（Collyer Quay）被重新分配為商業用途，富麗敦大廈則被改造成一家酒店。在海角某端，一個主要的旅遊標誌——魚尾獅，在二〇〇二年，為了海濱「好景觀」而不得不移遷一百二十米，使其更加的一覽無餘。而在濱海中心的重點邊緣，增設了一個帶有傾斜座位的浮動平台，為觀眾精心設計了一個賞景地區。自二〇〇七年起，這裡即成為了國慶日的主舞台和觀眾區。[53]

另有兩個元素成就了這個新的國家級別景觀。濱海灣花園橫跨三個填海區，最大的區塊是濱海南，一片占地五十四公頃的花園，向東北方向擴展。與海灣（和大草場）平行的，是人造的自然環境，這與早期殖民時期建造的植物園相呼應。與其依賴鋼骨水泥，這些自然景觀排列的是花草樹木，與濱海灣的堅硬邊緣形成鮮明對比。[54]與此同時，新加坡摩天觀景輪，

一個一百六十五米高的觀景遊樂設施，引用了一九〇四年聖路易斯世界博覽會（St. Louis World's Fair）裡的鼻祖摩天輪，並和於二〇〇八年開始運作的倫敦眼（London Eye）齊名，成為世界上同類遊樂設施中最高的遊樂設施。它位於濱海中心尖端的戰略位置，可以在座艙上升時欣賞加冷盆地的景色，並在下降時瀏覽這座城市和濱海灣的無敵景觀。[55]

這種重新打造城市土地和海面的方式，除了話題，也為該國將名字印刻在此區域內擁有卓越成就的大城市名錄當中。但是，人們關注的是國家發展方略，能否擁有宏觀意志能力才是滿足期待和明定目標的因素。通過一九七一年推出的《新加坡概念計畫》（Concept Plan），

51 一九九八年，新加坡建築師學會舉辦了「二〇〇〇年城市設計競賽」，徵集各項設計理念，最終主要由建築系學生獲勝。城市重建局還於一九九八年與哈佛大學設計研究生院召開了設計研討會。參見："Year 2000 City Design Competition". In *Journal of the Singapore Institute of Architects*, No.148 (1988), pp.14–21; and R. Machado, ed., *Singapore's Marina Bay: Urban Conditions Recreated* (Cambridge: Harvard GSD, 1999).

52 Urban Redevelopment Authority, "Painting the Future of Singapore's City Centre". In *Dialogue*, No.78 (2004), pp.64–65.

53 自二〇〇二年以來，一名創意總監被任命為國慶閱兵統籌和總指導——這個職位通常由著名的娛樂界人士和當地劇院導演領銜。

54 論點請參閱賴啟健文章："Singapore: Towards Another Botanical Age". In *Dialogue*, No.129 (2008), pp.104–13.

55 這個能覽盡整座城市和濱海灣的無敵景觀的摩天輪，在二〇〇八年卻被風水師認定「會帶走城市的財富」。

各種開發的監管逐步實現了此目標，此後每十年更新和審查一次。這項規劃工作由國家發展部（Ministry of National Development）和城市重建局（Urban Redevelopment Authority）以及所有其他機構，包括國防、金融和貿易在內的各個機構共同監督，所啟動的任何計畫都確保能按照指令和領導方針運作。正如河道清理計畫和濱海灣的發展所表明那樣，如此廣泛的重塑國家空間的努力，取決於政治意願，並結合了各級機構間以及公共和私營部門之間的協調和共識——當然還有監管和法律的力量，讓其執行、維修和管理都依循方針進行。濱海灣的發展，以及其各種功能結構也是漸進式的，根據全球環境和內部需求，在整體形式和元素方面催化而成。然而，其核心是一個集權結構，其無間的權力、金融、溝通、激活和傳播促成了一個巨大且具有象徵意義的區域性轉型。[56]

承先啟後的轉變

誠如班納迪克・安德森所說，歐洲大都市對東南亞殖民地的空間想像，乃是一種「比較的幽靈」，以緊密相隨卻又無限伸縮的想像方式，將大都會和殖民地的空間聯繫起來，儘管它不過也是霸權某程度上的尺度轉換。[57]殖民時期的吉隆坡和新加坡，城市形式彰顯於官用大草場，依然可以在不斷切換的發展新城市格局中被改造裡並存。此類項目可能被解釋為當權

者建立對其前殖民帝國的疆域切割的態度，或顛覆其前大都會殖民者的主權，以表明戰後的國家身分認同——或者及時地創建出一個新的「後國族」（post-national）身分。

在整個過程中，此願景還魂及轉移到新的「草場」（按：此草場未必有草）上，以作為一種國家驅動的表述舉動，它仍然可以與沙阿・阿巴斯一世大帝建造的伊斯法罕的馬坦扯上關係。阿巴斯決定建造一個新的國家共用空間，消除了遠古就開始長存的、位於老城的哈倫老廣場的作用。因此，商人和工匠們不得不依據權貴的利益，而遷移到新的空間。[58]隨著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原有殖民地大草場的功能——政府、司法、經濟和休閒用途——一一被瓦解，並將它們重新組成不同的功能（體育場的使用方法、成為政府綜合中心和新加坡的水力「草場」），也可被重新審定為能夠永續實踐的用途。

在吉隆坡，一九五七年新建的默迪卡體育場內的人造草場完成了國家誕生那一刻、民眾所產生的情意結。這顛覆了殖民時期草場的用途。但這種安排現在已轉移到在布城架起的馬坦。那裡的建築物和空間的布置揭示了國家宣言對建築和城市形式的依賴，古往今來——儘管

56 以新加坡環境部改組為新加坡環境和水源部為例，反映出新項目全新開展的面貌。

57 B. Anderson, *The Spectre of Comparisons: Nationalism, Southeast Asia and the World* (New York: Verso, 1998).

58 R.J. Abisaab, *Converting Persia: Religion and Power in the Safavid Empire* (London: I.B. Tauris, 2004), pp.82–83.

這不過只是在擴大國家管轄的空間。

在新加坡，原本的殖民地政府大草場則被原封不動地保留下來，作為國慶慶典的場地。只是在一九七三年之後，當國家對工業化和住房供應的關注穩定下來之後，才會為這些活動開發新的體育場。此後，國慶慶典的舉辦地從政府大草場轉移到國家體育場。然而，這可以局部觀看一個國家、人民和城市縮影的場地現在已轉移到濱海灣各個重建項目中。[59] 在創造「後國族」空間的方向選擇，馬來西亞政府採取的是勾勒古代馬坦的輪廓，而新加坡政府則對其「繼承」的大草場進行了大規模的改造。

延續安德森的論述，新加坡的濱海灣是多種「比較的幽靈」之場所，原本的大草場空間得以保留，然而對比其周邊，璀璨矗立著的高聳建築物已經讓以前的光景黯然失色。讓人立即聯想起古舊的殖民主義，卻也宣告了儘管有這樣的過去，但已被新的城市所取代。兩者的彰顯在於，此刻占據著正宮位置，大草場附近濱海灣這座新的「水力草場」(liquid padang)，消除了舊政府大草坪功能之餘，也架空了它的存在意義和霸權地位。這個國家不需要每日周而復始地用盡「水力草場」的每一寸空間，因為光是矗立在那裡，它就已經顯示其功能。事實上，只需要在此精心策劃每年的國慶節目，就獲攢一次認同感。

二〇〇八年九月，一級方程式夜間賽車在新加坡開幕，使用的道路和高速公路貫穿兩個新舊「大草場」。路線從新加坡摩天觀景輪附近的濱海中心開始，穿過部分的加冷河，再穿

[illegible]的新線，[illegible]點，越過新加坡河，沿著濱海灣蜿蜒的邊緣，通過其浮動平台，在世界各地的電視轉播中，攝像機不斷地在兩個主角——人造草場和它們的配角建築之間飛來飛去，向觀眾展示了這座現在聲稱完美承先啟後的城市。

59 讓城市搖身一變成為大劇場的概念並非什麼新鮮事。這種殖民觀的重塑也曾不可思議的彰顯在印度形式的杜巴廣場（durbar），其後轉移到了英國人的身上。J. Hosagrahar, "City as Durbar: Theatre and Power in Imperial Delhi". In N. AlSayyad, ed., *Forms of Dominance: On the Architecture and Urbanism of the Colonial Enterprise* (Aldershot: Avebury, 1992), pp.86–92.



圖7-1：新加坡大草場四周的鳥瞰圖。大約攝於一九六九年。



圖7-2：新加坡的芳林公園。



圖7-3：新加坡的濱海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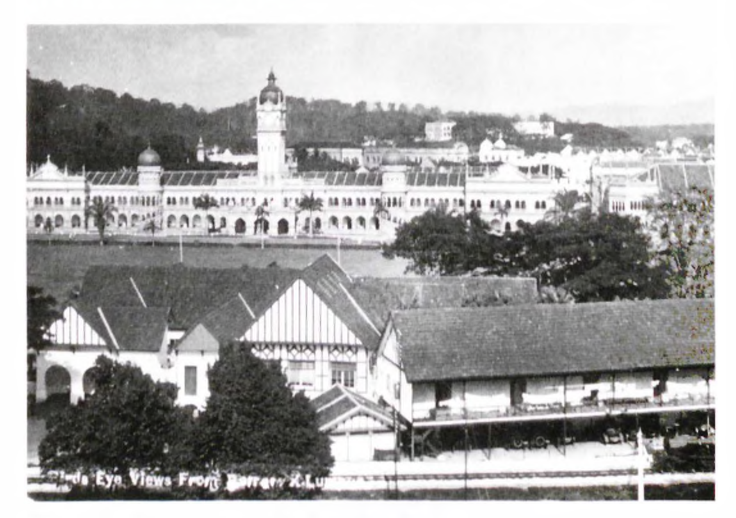


圖7-4：吉隆坡獨立廣場的明信片圖。



圖7-5：位於吉隆坡甘榜巴魯（Kampong Baru）的蘇丹蘇萊曼俱樂部。



圖7-6：從馬來西亞布城的布特拉廣場角度看首相署辦公室。

新加坡：邁向另一個植物時代

新加坡政府為了建構未來而投資實體發展，特別是在城市形態和水上環境的創新。島嶼南部的主要市中心從殖民時期就開始發展，其毗鄰的河流和海岸線及海灣周圍的填海土地，皆為當下主要關注的空間。濱海灣地區先前以擴大市中心為規劃，如今作為一年一度的國慶遊行舉辦地點，摩天輪可欣賞該地區的全景，海灣花園、濱海堤壩和其他橋樑則最終串聯了各個海陸空間。

在這篇文章中，我將闡述植物學創新在景觀中所發揮的作用，包括新花園以及將國家與公園綠地完全串聯起來的計畫。對於一個位於赤道的島嶼而言，這種與植物共存的創造並不新鮮，實際上在過去的八個世紀裡，從人類開始居住時就已存在。殖民城市形態的形成始於一個開放空間的建設——政府大廈大草場。該形態在一九六五年新加坡獨立後持續建設。希望

透過不同時間點的對比為這些新形式提供背景。

帝國地理與用語

自十六世紀，歐洲企業和國家的殖民擴張加速了人們對世界地理和生命形式的認知。通過地圖和民族誌數據的產出，這一時期見證了散布於世界各地的帝國用語。十五世紀後期，歐洲南部的大部分土地都已廣為人知，其民族、地理形態和動植物被發掘、記錄、描繪及命名。在帝國主義企業、資本主義框架、啟蒙思想、科學熱忱和林奈雙名法命名法的驅動下，猶太－基督教支配自然的信仰清晰地合理化這些新地方的大自然，在這些城市化和被開發的土地上。

在東南亞，馬來西亞（Malesia）地區的定義和特徵，包括其動植物的分布或歸功於兩位自然科學家：阿爾弗雷德．拉塞爾．華萊士（Alfred Russel Wallace）和海因里希．佐林格（Heinrich Zollinger）。在東南亞群島特別是婆羅洲逗留了十多年，華萊士意識到陸地板塊構造對巽他陸棚動植物物種的影響，因海平面上升而使板塊與之前毗連的陸地分離。作為生物地理學次領域實際上的創始人（他提議的物種進化中自然偏差的可能性其實比達爾文［Darwin］早了一年），他提出了馬來群島「區域」內的相互關聯與特性。

然而，「Malesia（馬來西亞）」一詞最早於一八五七年被瑞士植物學家海因里希．佐

林格提出，他創造了「Flora Malesiana」（馬勒西亞區植物）這個詞，並使華萊士一味，在一八四〇年代後期訪問該地區後，提議如何劃分其邊界。隨後的幾十年裡，經語音轉變的「馬來西亞（Malaysia）」術語主要被移居國外的英國博物學家使用，用於表示華萊士和佐林格所提出的生物地理劃分。「馬來西亞（Malaysia）」被視為「東方地區的一個次區域，這包括馬來半島、蘇門答臘、婆羅洲、爪哇和所有相鄰的小島」，並與其北部和東部的其他次區域接壤，包括印度支那、菲律賓和澳東次區域。

自十九世紀中，自然科學家們達成共識，將他們所知的生物地理區域命名為「Malesia」或「Malaysia」。在各自的制度、殖民統治或學科偏好下，其具體範圍或次區域並不一致。一九六三年後，「Malaysia」一詞在自然歷史論述中被棄用，取而代之的是早期的「Malesia」，因為前者在政治上被用於暗示一個新國家的地理邊界，將馬來半島、新加坡、砂拉越和英屬北婆羅洲（現為沙巴）重組成一個整體——馬來西亞（Malaysia）。

植物園與網絡

隨著生物地理區域的用語與生命形式的指稱，伴隨著殖民的擴張，植物園在世界各地設立，以此收集植物標本作分類鑑定和實驗，並最終用於帝國商業。位於倫敦郊區的邱園成為這

廣大網絡的中心點。該網絡用於建立和維護世界各地的花園，特別是在一七七八年至一八二〇年約瑟夫．班克斯（Joseph Banks）擔任董事期間。大衛．麥克拉肯（David McCracken）是《帝國花園：維多利亞時代大英帝國的植物研究所》（*Gardens of Empire: Botanical Institutions of the Victorian British Empire*）的作者，他統計了一百一十五個建於英國管轄地的花園，包括新加坡的一個。植物標本及其現存的文獻、研究和實驗結果，皆在網絡中被收集和流傳。該網絡常有各種社團參與其中，例如皇家亞洲學會及其分支、林奈學會，以及後來的當地農業園藝學會和自然學會，成員們沉浸於跨越自然科學，涉獵殖民經濟學和學術界的交流中。

在這時期，隨著世界另一處發展的兩種玻璃構造形式，植物學與殖民歷史學科產生交匯。醫生納撒尼爾．沃德為工業革命帶來的社會和環境後果深感痛心，他在一八二九年發明了一種側面和頂部都是玻璃的木架盒子，底部用泥土填滿，接縫和邊緣則用膩子密封。植物封閉於內，經過生根和澆灌，它們在自己的小氣候中茁壯成長，同時也受到保護，免受喬治王朝後期倫敦的嚴重污染。這被稱為「沃德箱」的裝置，不僅讓人們以凝視植物「天堂」作為療癒性的城市樂趣，而且還促進了植物樣本在世界各地的流通，就如用作新加坡橡膠和其他植物樣本的運輸箱。

十年後，約瑟．派克斯頓——一名受過培訓的園丁——率先在英國建造了大型溫室，其中最著名的在邱園。這是在迅速發展的維多利亞工業革命即興創作而成的，以大量生產的預製

玻璃、鋼鐵構件和新的組裝方法為一八五一年倫敦世博會（世界博覽會的前身）建造了水晶宮。溫室的內部結構使熱帶植物能在人工控制的溫和氣候中生長和被研究。與此同時，工業革命的玻璃和鋼鐵意味著新的美學以及材料使用，引領著現代建築時代。

殖民景觀與植物管控

一八一九年，英國占領新加坡不久後，迅速改變了海岸景觀。一八二二年，從傑克遜計畫可看出新加坡河周圍的區域規劃。它顯示一條從海岸至最靠近內陸高地的地帶，包含一個開放、精心打造的廣場，城牆和拉浪安山（Bukit Larangan）的福康寧防禦著廣場，間中還有植物和實驗花園。三種人造景觀顯著地向當地定居者展示了自然如何被壓制和操控，以此形成平坦的田野（政府大廈大草場）、樹灌被嚴密管制的花園以及山丘上的防禦布置。這條人造景觀地帶的建築是精挑細選的：廣場與花園之間的教堂、法院和政府辦公處以及其「創始人」（萊佛士〔Thomas Stamford Raffles〕）的山上住所。

從空間上看，政府大廈大草場也散布著殖民和歷史性的精緻特點。其建築和構造最初是由波斯的沙阿．阿巴斯（Shah Abbas）設計，這是當他的首都在十六世紀後期遷移到伊斯法罕時，為某些治理用途而設的。設計目的是為了在一個狹長的開放空間（獨立廣場）周圍正

式設立宮殿、集市、回教堂、伊斯蘭學校和其他公共建築，以呈現清晰的城市建築。在印度，伊斯蘭的廣場規劃構思被英殖民者採納，正式用於工具性行政管理。在加爾各答、孟買和馬德拉斯等英國占領的城市中，各種大草場周圍的治理結構建築增設了防禦性的圍牆堡壘。在馬來半島，當檳榔嶼於一七八六年被吞併時，這構思也被轉輸到當地，接著被引入其他城市和國家，如新加坡。

擴建後的直線型海灘（Esplanade），成為英殖民者和當地居民之間的第一交流景觀。政府大廈大草場的綠地用於軍事集會和演習，後來也成為殖民者的多功能遊戲場。作為運動場地，它用於舉辦板球、足球和橄欖球比賽，還包括其他隆重的殖民者盛會。通過軍事、娛樂和禮儀用途，該空間向其他定居群體灌輸了殖民紀律及遵守的概念。它展示了白人男性的不同方面：有時是集體且好戰的，其他時候也能卸除戒備，娛樂放鬆。被統治的群體會被邀請共享場地，尤其是在體育競賽活動上。在政府大廈大草場周圍，新古典主義行政和商業建築的設立形成了壁壘，以此進一步標誌殖民合法性，也彰顯他們與當地或移民者的差異。

新加坡植物園

一八二三年，傑克遜計畫制定時，在自然歷史愛好者萊佛士（Raffles）和加爾各答植物園丹麥館長納撒尼爾．瓦立池（Wallich）的建議下，一個十九公頃的地點被命名為福康寧山腳下的植物和實驗花園。除了香料和經濟作物，瓦立池還建議種植樹種，以滿足島上的建築和船舶維修需求，這是因為新加坡當時取代了檳榔嶼，成為帝國在馬六甲海峽的主要港口。該實驗持續七年後就停止運作，土地賣給了亞美尼亞社區，建設教堂、學校、醫院，甚至是監獄。

隨後又嘗試了兩次建立植物園。一八三六年，當地農業園藝協會的幾名成員從福康寧地的十九公頃土地中獲得二點八公頃作園藝。然而，因興趣消退，十年後土地歸還殖民政府。一八五九年，親英慈善家胡亞基（Hoo Ah Kay）將東陵區的五十六英畝甘蜜園土地捐贈予一個復興的農業園藝協會。第三次的嘗試更成功，到一八七〇年代，它擁有大約五百種植物、一個有大花圃的梯田遊樂花園和一個廣闊的沼澤湖泊。

植物園在隨後的殖民發展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在殖民標準中堪稱典範。除了收集和實驗，一八七九年有四十一公頃的土地被用作「經濟花園」，協助該社區建立種植園和小型種植地。例如，亨利．李德利（Henry Ridley）種植一些裝在沃德箱的橡膠樹苗，從中獲得了利潤豐厚

的乳膠產量，繼而在該地建立橡膠基業。在新加坡、馬來亞和該地的莊園和種植園，他們被鼓勵主要栽培單一農作物，這不可逆轉地改變了實體物理和經濟景觀。直到二十世紀，橡膠樹一直是馬來亞的經濟支柱。

對經濟植物的關注和種植園系統的引進意義非凡，殖民生產和貿易取代了歐洲到來之前東南亞的現有系統。以柔佛廖內地區的華人種植者為例，他們一直在種植及買賣甘蜜和胡椒，包括其他香料和農產品。其他植物產品如馬來膠採集於當地，但轉眼就被引入新發現的歐洲市場。如上所述，帝國企業掌控了生產線和貿易，並建立了新的種植園、引進新的農作物。這種情況很大程度上一直持續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當時大部分東南亞在所謂的「大東亞共榮圈」下，因日本的占領重新界定。

戰後的創新

二戰和一九六五年獨立後，新加坡政府大廈大草場和植物園的意義和用途都發生了變化。政府和人民自行收復了這兩個殖民空間，並在它們上面刻上了新的國家解讀。該空間的政治聯繫亦更動了，對年輕一代的新加坡人而言更是如此。一九六三年，時任總理李光耀發起了植樹運動，不久後花園城市的構思（與埃比尼澤・霍華德〔Ebenezer Howard〕為工業西區提

出的截然不同）被規劃，並在全島實施。除了旅遊區和新的公共住宅區，裕廊也有革新實驗。裕廊是一個新的工業城鎮，在河流及鄰近的湖泊、西部海岸線和現有的山丘周圍規劃了大片的花園和綠地。

公園及樹木部門最初是公共工程部的分支，最終演變為國家公園管理局（Nparks），目前肩負著維護和概念化國家創新的責任。它最初是一九九三年由相關公眾人物提出的「新加坡綠色計畫」，這種一致性的整體綠色發展計畫，如今已成為國家與非政府組織和學術界協商的領域。最新計畫旨在通過線性公園連接，為整個島嶼提供通往花園和自然保護區的綠色通道。它與新加坡南部山脊的新園藝公園一同推出，重點是為公眾提供一個兼有園藝和生活方式的空間。除了國家公園管理局的園藝課程和研究項目，新加坡國立大學建築系於二〇〇八年開設了景觀建築碩士課程。

在私人界，建築規劃師鄭慶順自一九八〇年代初，開始思考赤道環境中建築形式的形狀和性質。一九八三年，他提出了「熱帶城市」的概念，闡明並論證了在氣候條件下城市景觀的可持續性。在工業時代的建築和城市規劃中，植物的生命形式在空間和意識形態上被操控，並重新回歸建築和都市圈設計基礎的思考。在一九八九年及隔年，兩個項目進一步勾勒出他的想法，其一為出版物《熱帶地區的巨型城市》（*Mega-cities in the Tropics: Towards an Architectural Agenda for the Future*），另一個則是他主導的甘榜武吉斯設計指南計畫中的設計

部分——向政府機構提出了七十六公頃水陸多種建築可能性的提案。每個項目的重點在於整體性的全球化視野及景觀感知，不僅限於以建築作為思維改變的考慮因素。也可在新加坡國立大學擴建校園的方案中看到鄭（Tay）的最新實驗，大學規劃者決定與當地專家進行內部合作。該團隊挑戰了傳統校園規劃中設置的綠色景觀，並重新改造高速公路和道路的邊界，建議沿著基地兩側設置一公里綠牆。建築沿著不同的高度起伏，最高達二十米，這其中設有各類空間，作為學生宿舍、研究室和教學室，其他空間則用於支持新校區的學術和社交活動。作為一個與交匯點相結合的線性結構，大部分空間沿著其長度平均分布，從而減少了「傳統」校園布局所需的物理設置，亦騰出了內部場地作其他用途。除了沿路種植的灌木，綠牆的垂直表面還種了植被，以此改善不利的場地條件，並調適內部的微氣候。

隨著二〇〇五年八月提出的濱海灣地區重建計畫，植物與新島嶼景觀的創新再次成為新加坡下一階段的核心。如今，由國家公園管理局主導的「濱海灣花園」項目將預示城市的新海岸線，而不是殖民時期的海濱區或戰後的摩天大樓。這些花園被規劃為濱海灣向內陸延伸的三個邊角，坐落於主要的國家土地上。它們最終將與橋樑和特色景觀相連，成為迄今為止最振奮人心的城市創新，操控著島嶼的景觀與氣候。占地五十四公頃的最大花園——濱海灣南花園，擁有兩個被稱為「冷室」的大型空調結構，模擬著亞熱帶、半乾燥和地中海區域的環境。它看似挑戰了派克斯頓的玻璃溫室，有趣的是，就像它十九世紀的前身那樣，其目的在於操

控植物，並開發新的與植物學和植物生命有關的建築策略，例如，位於濱海南部十七層樓高的人造建築「超級樹」，其表面設計成附有植物，樹冠層則配有光伏電池。另外，花園的其他兩個地塊正在規劃中。

從景觀、生活方式和全球對環境可持續性問題的認知上探討，新加坡預示下一個「植物時代」的重要性是具有特殊意義的。在公共和私人領域，建築和城市結構的重塑越來越著重於兩方面，即植物的衰減情況與批判性的植物學思維，而不僅僅是重申傳統城市的形式。本文的宗旨在於說明，這絕不是突如其來的涉獵，對植物和地貌的持續理解及改造可追溯到新加坡的殖民時期。實驗中付出的顯著性努力，將在未來的城市景觀中清楚地表達大自然，對形形色色的觀眾而言，想必既忐忑又期待。

參考書目

Alfred Russel Wallace, 1869. *The Malay Archipelago: The Land of the Orang-utan, and the Bird of Paradise. A Narrative of Travel, with Studies of Man and Nature*.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

Bonnie Tinsley, 1983. *Singapore Green: A History and Guide to the Botanic Gardens*. Singapore: Times Books International.

Carl A. Trocki. 1979, 2007. *Prince of Pirates: The Temenggong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Johor and Singapore 1784-1885*. Singapore: NUS Press.

Donal P. McCracken. 1997. *Gardens of Empire: Botanical Institutions of the Victorian British Empire*. London: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Frederick N. Chasen. 1940. *A Handlist of Malaysian Mammals: A Systematic List of the Mammals of the Malay Peninsula, Sumatra, Borneo and Java, including the adjacent small islands*. Singapore: Raffles Museum.

Jeyamalar Kathirithamby-Wells. 2005. *Nature and Nation: Forests and Development in Peninsular Malaysia*. Copenhagen: NIAS Press.

Lucile H. Brockway. 1979. *Science and Colonial Expansion: the Role of the British Royal Botanic Garden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Stephen P. Blake. 1999. *Half the World: the Social Architecture of Safavid, 1590-1722*. California: Mazda Publishers.

Tay Kheng Soon. 1989. *Mega-cities in the Tropics: Towards an Architectural Agenda for the future*.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Victor R. Savage. 1984. *Western Impressions of Landscape in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1	2
3	4

圖8-1：位於倫敦郊區的英國皇家植物園邱園。

圖8-2：新加坡的大草場（二〇一一年）。

圖8-3：新加坡植物園入口處。

圖8-4：新加坡植物園。



圖8-5：新加坡金文泰組屋區的社區農場地塊。



圖8-6：濱海灣的擎天樹。

畫框裡的紅毛丹

——韓槐準與華人在新加坡的空間表達

據估計，有兩千五百萬至三千萬海外華人遍布世界一百四十個國家，而當中大約百分之八十的人定居於東南亞國家。這龐大的人口是基於東南亞鄰近中國，而華人大約在十六世紀開始從中國南方沿海一帶，移居當時在政治上被歐洲列強殖民統治或控制的東南亞地區。在這些東南亞地區中，經過定居、貿易及社會關係的發生，海外華人與其他種族的比例大致保持不變。

到目前為止，針對世界各地離散華人（Chinese diaspora）定居地點的學術研究，主要專注在勞動地區或華人所聚居的「唐人街」，以及他們在新定居城市所建立的「混合型」社會經濟領域與環境。在那些國家中，各華人社群合併所形成的一種共同「華人」身分認同是這

類進展的必要前提。基於東南亞華人的龐大人口、歷史與空間構成，其定居空間或聚居地必須與美國、澳洲或歐洲的唐人街分開來討論。

新加坡和其龐大華人人口的歷史，可能與一般東南亞的離散敘事一致。當時的英國殖民者歡迎外來人口遷移至他們管轄的殖民地，以促進帝國經貿發展，及與當地或區域性已存在的經濟模式競爭。文字記述顯示，新加坡在一八一九年成為自由港不久後，人文景觀是「世界性」的。但是，中國南方移民的大量增長和他們最終對各個勢力範圍的控制，改變了新加坡島接下來的歷史。在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時，新加坡人口中的百分之四十三註冊為華族。這個比例現在是大約百分之七十五，而華人是目前新加坡第一大族群。

自一八一九年英國殖民新加坡開始，華人便陸續移居新加坡。首批華人移民主要是合同和契約勞工，但華人群體不斷壯大，建立學校以教育本地新一代的需求也出現了。當時，教育被認為是至關重要的，因為它能提高華人移居者個人乃至群體的社會與經濟地位。在二十世紀之交，不少華文報和華校已經創辦，而這吸引了更多識字的華人來到南洋以填補各種教學和行政職位的空缺。這群新移民通過參與報業和學校的運作，以及設立和管理商會、社團及機構，最終成為離散文化與文學領域的關鍵主導者。他們從小學和中學開始，再設立其他的教育機構。比如，在一九三八年成立藝術院校——新加坡南洋美術專科學校（現改名為南洋藝術學院），以及一九五六年成立華文大學——南洋大學。

在本文中，我將討論和比較新加坡少數華人社群的各種聚居地。我將描述英國殖民地計畫最初如何集中在新加坡島南面，並追溯在新加坡河兩岸的華人定居點的大背景下，市區海南社群聚居地的形成。接著，我再關注一名特別的海南移民在新加坡定居長達半個世紀的活動——從他二十世紀初到新加坡開始，先居住在市區聚居地裡，再遷移到郊區，直到一九六〇年代回中國。我也將論證一個觀點，即植物學與植物、植物產品的接觸，對瞭解華人的文學、藝術和學術興趣，以及他們對赤道熱帶新情況和社會環境的適應至關重要。那名海南移民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創建的紅毛丹果園，即是這觀點強而有力的知識與空間的表達。通過討論一幅本地出生的畫家所繪之紅毛丹果園紀念畫，我亦將比較新加坡兩代華人的觀念、態度和經驗，以及他們的知識空間的形式和基調。

聚居地的形成和海南社群

在新加坡，英國殖民地政府為了規劃多元社群與方便監視控制他們，把島上的不同種族進行區分。除了掩飾不同次族群社群之間的區別，早期殖民地城鎮計畫中空間區隔所使用的簡單名稱分類，如「印度人」和「華人」，亦「制服」了不同定居者社群的領導權，並且忽略了這類多族社群的「多樣性」。

根據資料記載，一八一八年，種植甘蜜的華裔農民已經在柔佛廖內帝國（Johor Riau Empire）後裔的庇護下於新加坡島上開墾種植園。被公認為首名定居於新加坡殖民地的英國人——萊佛士（Thomas Stamford Raffles），在一八一九年到達新加坡後，便在兩條河流系統之間建設一座軍隊營地，以改變南面沿海的面貌。歐洲人城鎮位於軍隊營地的西北邊，而兩者之間由四條與沿海地區平行的馬路連接，和四條馬路呈垂直狀的密駝路（Middle Road）則標誌著蘇丹王宮及新加坡河軍隊營地之間的中間線。許多的機構，如教堂和學校的確座落在今天的政府行政區域邊緣，標誌著早期歐洲人定居於規劃的城鎮區域。然而，歐洲定居者後來因各種原因被華族和其他族裔迫遷。

當時，華人移民被視為「勤勞的民族」以及英國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人口從一八二四年的三千三百一十七名，大量增加至一八八一年的八萬六千八百名，到了一九〇一年又再度倍增。福建、潮州或廣東（連同一些客家）次族群移民較早定居在新加坡河的西南邊，而其他的華人次族群則定居在歐洲人城鎮內。在那時候，歐洲人開始隨著華裔甘蜜農民的開墾而往島內遷移，居住在他們種植園內的獨立式房屋，以遠離商人和「勞工」人口逐漸密集的城區與鄉村。

鑑於河流西南邊較早設有聚居點，所以密駝路較晚設有的聚居點被華人俗稱為新加坡河岸的「小坡」，以對應西南邊的「大坡」。橋北路（North Bridge Road）和橋南路（South

Bridge Road）連接了河流兩岸的兩個「城鎮」，被認為是「一馬路」或「大馬路」。其餘在小坡橋北路北邊的平行道路則繼續按照順序進行編號，而靠近蘇菲亞山（Mount Sophia）的實利基路（Selegie Road）被稱為「七馬路」。

在小坡，少數華人社群聚居地與新加坡河的距離也說明了他們定居點的先後次序：首先是海南人，接著是客家、福清、福州和興化族群。他們連同馬來族（包括蘇丹的家族與侍從、阿拉伯人和武吉斯人）、印度族和住在這些地區的歐洲人，在新加坡河原定居點的東北部形成一個多元種族和多元宗教的景觀。

居住在小坡的各個華人次族群中，海南社群最大，雖然其人口僅領先排名第二的客家社群一些。他們應是第一個定居在這個地區的少數華人社群，因為其聚居地位置緊靠其餘的歐洲古建築，如教堂、軍營和萊佛士酒店。該聚居地從美芝路（Beach Road）海岸，往新加坡島內西邊延伸直達橋北路，其中包含了一個泊船區。與這兩條路垂直的三條街道：密駝路（俗稱海南一街）、巴米士街（Purvis Street，海南二街）和佘街（Seah Street，海南三街），被海南人與其他華人社群用來構想出聚居地的空間。

首批海南定居者很可能是在一八四〇年代來到新加坡。由於他們比起其他族群如福建、潮州、廣東較晚來到新加坡，沒有定居在新加坡河附近的主要倉庫，所以大部分的早期海南定居者都在種植園工作或充當水手。其他海南人則任職早期的服務業，或經營雜貨店、船舶

供應和匯款服務、小酒店及咖啡店。但是，海南人在區域內最聞名的是經營飲食生意。例如，王共產所掌握的一種搭配白斬雞的飯類佳餚，由他的徒弟莫履瑞所開設的「瑞記雞飯」發揚光大，過後以「海南雞飯」之名再傳播到海南島和東亞。萊佛士酒店酒保嚴崇文亦在一九一五年發明了一種稱為「新加坡司令」（The Singapore Sling）的雞尾酒。

首座海南會館和宗祠建築在一八五七年設立，位於馬拉巴街（Malabar Street）附近的三座店屋內。一八七九年，會館／宗祠遷至美芝路的現址。有證據顯示，海南人是一個非常緊密相連的社群，他們有必要的社會實踐活動和新移民接待，以及通過美芝路附近的各服務和設施提供社群福利。除了美芝路的主要協會大樓以外，三個主要街道上也設有不少宗親會。它們的劃分方式除了根據海南島的各個區域或村莊之外，還包括家族的姓氏。但是，這些居民大部分已經在一九八〇年代從聚居地搬遷到新加坡島的其他地區。

新加坡島內陸和其操縱的景觀

如以上所述，這個殖民地的集合城市——新加坡城鎮，最初建立於兩個河口之間的南部邊緣，最終延伸到新加坡島的北面、東面和西面「腹地」。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梧槽河（Rochore River，亦作 Rochor River）和梧槽溝渠（Rochore Canal，亦作 Rochor Canal）

仍作為主要城鎮的想像北方界線，而河的另外一岸則被視為郊區。我們可通過對比早期的遊記來感受新加坡當時發展的形態和速度。

在一八二四年，也就是新加坡開埠後的五年，文西・阿都拉（Munshi Abdullah）與居住在森林裡的內陸幫派取得聯繫，需要花費十一個小時的時間。一八二七年，參政司約翰・普林士（John Prince）從城鎮步行至武吉知馬（Bukit Timah），需要花費五個小時。到了十九世紀中葉，四條主要馬路——武吉知馬、湯申（Thomson）、實龍崗（Serangoon）和樟宜（Changi）交叉貫穿新加坡島，直達北部和東部區域。但在一九〇一年，從加文納路（Cavenagh Road）騎自行車至北邊的克蘭芝（Kranji）鄉村仍需一整天的時間。

在眾多用途中，新加坡城鎮邊緣或更偏遠的地區被指定用以種植農作物。這些土地上曾試驗種植的農作物包括蔗糖、棉花、肉豆蔻、芋頭、大米和咖啡，而北部地區的甘蜜和胡椒種植園數量在城鎮商人的投資下有所增加。在大約十年的時間內，甘蜜和胡椒種植園已擴展到海峽對岸的柔佛。在那之後，主要由潮州人所經營的「港主制度」在一八三〇年代正式由柔佛統治者推行。新加坡的這類種植園平均面積在二十至五十英畝之間，使用的是刀耕火種的方式開墾，使得大片土地上的樹林植物被清除乾淨以及土壤耗竭。從十九世紀中葉開始，通往這些種植園的道路建設，以及園區土地使用權和免地租的實施，加速了新加坡島內陸農村和種植園的建設，形成了城郊或半農村的景觀。

新加坡的種植園史或許處在世界其他地方的資源獲取和開發計畫的大歷史背景下。在西半球，殖民地自十六世紀起隨著地圖的製造和民族誌資料的獲取開始在世界各地擴張。基於地圖和民族誌資料能夠有系統及合理地統整帝國主義事業發展所遇到的地區地形、人口、植物群和動物群。猶太—基督教信仰的大自然主宰和征服（建立在啟蒙理想、帝國架構與科學理性的基礎上），在這些「新疆界」刻下印記和對其進行控制。在殖民地中，景觀被重新布局與劃定，以進行農作物種植和礦產開採，促進殖民地經濟增長。

在一八二三年的傑克遜計畫中，一座能俯瞰原住民定居點和新加坡河碇泊區的山，被認可具有防禦性優勢。於是，萊佛士下令在山頂設立堡壘作為軍事偵察之用，而「原住民」則被迫遷出平原。此外，一個鄰近的「人造景觀帶」也建於這個區域內，從海邊一直延伸至最接近的內陸山丘，其中包含一個公開和修剪整齊的廣場。廣場四周由一個炮台牆、浮爾頓堡（Fort Fullerton）和拉浪安山上的福康寧保護著，而炮台牆及浮爾頓堡之間還隔著植物和實驗園。這三個人造景觀組成部分向原住民定居者展示了大自然如何被「征服」和「操縱」成一片平坦的綠地（政府大廈大草場，Padang）、一個用以研究樹木和植物的花園，以及山丘上的防禦性設施。這個人造集合城市上的建築物設立是具有高度選擇性的，包括在廣場和花園之間的一個教堂、法院和政府辦公室，以及「創始者」在山丘上的住宅。

從軍隊營地開始，原本政府大廈大草場的空間在新加坡其他地區以略微不同的形式複製。

殖民政府將較小型的開放空間分散到城市各地，作為銜接和控制各個團體和事業的基礎建設。例如，新加坡政府大廈大草場兩旁的沿海定居點內有一列相互間斷的開放區域被指定為綠地或遊樂場。這些空間成為擁擠和稠密的市區或族群聚居地內的第二個「空地鏈環」，起到為市區居民提供綠地或悠閒空間的作用。

除了殖民政府之外，當地人也有份設立一些公共空間。這些空間與殖民地時期的主要政府大廈大草場的布局和構造類似，是透過模仿人為領域周圍的特定結構組成安排的「空間權力」（spatial power）而必然成為的空間，間接體現了當時的社會與政治階層和對殖民當局政策的效忠。例如，章芳林在一八七六年捐贈了三千元，以將中央警察局和警察法院大樓旁的一塊地轉變成娛樂和休閒用途的公用操場。這塊開放空間設在中央警察局旁邊的位置並非偶然，而是具策略意義，因為警局靠近新加坡河的碼頭和貨倉，以及在其西南面的華人次族群店屋聚居地。

新加坡島開埠時，島上也有一些帶有對外開放花園的私人別墅。胡亞基是十九世紀中葉著名的商人，他的住宅「南生花園」包含了林蔭大道、果園、空中花園、荷蘭式小道、矮竹和橘子樹，偶爾會開放給公眾。他還捐贈了一塊東陵（Tanglin）區二十三公頃的土地，後來成為復興後的植物園。此外，阿卡夫（Alkaff）家族開發了阿卡夫湖公園（Alkaff Lake Gardens），包含了青翠的土地、湖泊和日本式花園。自一九二九年開始，阿卡夫湖公園在長

達二十年的時間裡開放予公眾。在西南地區，胡氏兄弟——胡文虎和胡文豹於一九三七年將山丘旁的產業開發成虎豹別墅，而公園有許多華人民間傳說的雕塑作品，以讓華人民眾可以更瞭解傳統「華人」文化。

文學、藝術和學術作品中的植物學

新加坡和馬來亞華人早期的文學創作以中國為中心，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它受到了五四運動前後期間所出現的「新文學」影響。在一九三〇年代，出現了一種更白話形式的詩歌和散文以表達東南亞當地事物的意識。故事主人公在政治和社會文化領域中的生存、交織和磋商，於當地地點和場景進行，而氣候和地點調整則是故事敘述的重要背景。這被稱為「南洋華文文學」，具體代表著新加坡和馬來亞半島的創作，而在當時這兩地已被公認為發展成熟的文學創作中心。

這類作品主要聚焦殖民地社會、中國與新場景之間的適應，以及突出跨種族身分的主題。這類作品在二十世紀的發展，與南洋或海外華人（而非「勞動者」或「旅居者」，或甚至「中國人」）身分認同的逐步清晰與接受有關聯。這類意識在當時不只限於文學中，同時也可以在其他創作形式中找到，如日常用語在表達方式上受馬來方言影響。

植物學在南洋華人文學的空間想像上扮演一個重要角色，擁有著轉喻或隱喻的涵義。例如，橡膠樹和橡膠種植園是代表殖民占領和剝削的中心思想，而華人或其他土著女性角色在種植園內被強暴則是比喻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的不正當。「蕉風椰雨」一詞則體現了熱帶的大意和特質。同樣地，許多植物、水果和它們的產品成為了文學中的情節背景與當地情況的隱喻。「香蕉」和「椰子」皆成為文學副刊的「旗幟」：《蕉風》是在一九五五年開始出版，且迄今仍在流通的文學雜誌；而《椰林》是新加坡最早的華文報《叻報》的一個文學專欄，從一九二八年開始出版長達三年。

我們以香港報人劉以鬯的文章作為例子，來詮釋文學作品如何使用熱帶水果來表明二戰以後對環境的持續適應。劉以鬯於一九五〇年代居住在新加坡和吉隆坡，為許多報紙專欄寫過文章和詩歌，最終還寫小說。劉以鬯似乎是個「自我東方主義者」，他在作品中使用熱帶水果和植物、鬥魚、日落，以及馬來女性等意象來描寫本地場景，滔滔不絕地書寫所觀察到的甘榜或農村生活。劉以鬯在一九七二年創作了一部長篇小說《對倒》，王家衛的電影《花樣年華》正是改編自這部作品。作品似乎屬於半自傳體，因為在長篇小說和之後改編的電影中，主角都是一名於一九六〇年代居住在新加坡的報人。在長篇小說和電影中，吃水果與適應新加坡劃上了等號：

> 「那是抵達新加坡的第二個星期，他走去『山芭』一個遠親的家裡，那遠親在山芭設農場為生。他在那個農場裡看到不少榴槤樹，也聽到不少關於榴槤的傳說。他的遠親告訴他：榴槤是水果之王，喜歡吃榴槤的新客不會回唐山去……」

藝術創作中有一種通過熟悉或攝取水果，以稀釋及適應本土性的方法。其中一種詮釋每日生活方式的媒介即是靜物畫。在諾曼．布萊森（Norman Bryson）的著作《注視被忽視的事物》中，查爾斯．斯特林（Charles Sterling）對「巨大的描繪」（megalography）和「趨小的描繪」（rhopography）的區分，被用來檢視「宏大」題材和瑣碎題材描繪之間的關係。布萊森認為「趨小的描繪」的概念最適合用於靜物畫，因為它頌揚這類作品富含熟悉度、女性、個人和家庭價值，而並非宏大的英勇價值。藝術家用以聚焦主題和將主題「排除」在周圍環境之外的有框畫布，是一種提供給觀者的「趨小的描繪」模式，以便這類風景感覺更易辨認、熟悉、像是日常。

戰前在新加坡居住的中國移民藝術家為瞭解他們在熱帶的新棲息地和日常生活，開始繪畫他們的新環境，而畫熱帶水果成為了東南亞藝術家的風氣。或許，這可以被理解為一種在遠離中國南方或歐洲環境的熱帶氣候中適應生活的方法。他們通過描繪和題詞，及最終的「消化」與「攝取」，以熟悉那奇異的南洋果實。雖然繪畫題材上有所變化，即溫帶水果被

本土水果「取代」，但畫靜物的行為仍被視作他們在西方的藝術生活的延續，而在早期至這南洋的藝術家都使用熱帶水果來作靜物畫。例如，現今被認為是新加坡畫家的張荔英和劉抗，便在他們新的環境中改變了靜物畫題材。一九三〇年代，張荔英在巴黎畫的是橙子和蘋果；一九五〇年代時，隨著她遷居檳城和新加坡，其繪畫題材改變成紅毛丹、山竹和其他水果。劉抗的早期靜物畫裡刻有一九三〇年代巴黎的向日葵、麵包和葡萄酒瓶，但是這在他回到新加坡後變成了香蕉、紅毛丹和其他本地水果。

學術文摘與愚趣園

我們也許可以從學術出版物察覺到南洋華人與植物學和植物的接觸。在那之前，由西方人主導的學術研究主要發表在博物館期刊，以及一八七七年於新加坡設立的皇家亞洲學會馬來亞支部（Malay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出版物。《皇家亞洲學會馬來亞支部學報》旨在對當地的情況進行記錄，包括它的植物群、動物群以及相關的東南亞題材，如考古學、地方文化和土著群體。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中國文人移民的數量足以在皇家亞洲學會（Royal Asiatic Society）外設立不同的學術空間。南洋學會（The South Seas Society）在一九四〇年由一組學者和報人設立，其設立目的一部分是為了擴展華人研究者針對南洋議

題的新興研究，而另一部分是為了與《皇家亞洲學會馬來亞支部學報》內以歐洲為中心的學術研究進行對比。學會很快便出版本身的期刊——《南洋學報》。《南洋學報》與《皇家亞洲學會馬來亞支部學報》的學術目的類似，但兩者間的重大不同是：《南洋學報》在南洋角度和身分架構裡進行研究。

雖然《皇家亞洲學會馬來亞支部學報》在所出版的文章中為植物群和動物群提供相同的重視和版位，《南洋學報》卻「犧牲」動物群轉而突出植物群。事實上，動物群在《南洋學報》所出版的文章中明顯「缺席」，而植物群則非常常見。學報首刊的主題為芒果，在接下來期刊中刊登了菠蘿蜜、山竹、木瓜、無花果、椰子、黃梨、杜古果（duku）、蘭撒果（langsat）、麵包果、刺果番荔枝、榴槤和紅毛丹。這個偏好可能是因為許多撰寫者是植物學家，如張禮千和韓槐準。然而，植物群的「存在」與動物群的「缺席」不僅可能反映這組撰寫者的學術研究興趣趨向，或許也反映他們對於植物產品經濟活動的關注。

韓槐準（一八九二至一九七〇）是南洋學會的創辦成員。如以下所述，他的紅毛丹果園——「愚趣園」是學術研究和文學追求與植物學交叉的地點。韓槐準在一九一五年從中國南方的海南島來到新加坡。由於他只有小學教育程度，因此只充當割膠工人和在藥房（神農大藥房）分配化學品與藥物。經過自學，他開始熟悉一些學科，如化學、考古學、歷史地理學、道教神明、陶瓷和植物學，並且為許多學術期刊撰文，其中包括《南洋學報》。他在一九六〇

年寫了《南洋遺留的中國古外銷陶瓷》一書，並且是第一位可以通過釉的化學分析來規範中國陶瓷鑑定程序的人。

韓槐準一生對化學學習的追求，在他定居新加坡的四十七年生活中盛開綻放。當他還在海南島時，他的家族生意包括織品和布料的化學染色。但韓槐準對西方化學的認識，是在一九一六年英國殖民地政府拍賣了位於新加坡的德國藥房——「醫療辦公室」（Medical Office）後開始增強。韓槐準成功和其他夥伴投標購買該藥房，藥房接著被重新命名為「神農大藥房」。韓槐準任職於該藥房時，花費了很多時間自學。最初，他在一九二〇年代學習化學和沖洗照片。一九三四年，他對陶瓷的興趣被點燃後，便研發出一種追查陶瓷產地的新方法。這過程是通過識別其無機釉料和染料，再觀察其他方面如燒製技巧、粘土質、釉料精細度、燒製溫度、塗料技巧和圖式種類，以確定陶瓷從中國進口的時期。日本占領時期，他與商業夥伴基於對此領域的興趣，成立了「華夏化工用品公司」。

愚趣園

韓槐準最終搬離城市，而他位於湯申路上段（Upper Thomson Road）的果園和園內大約兩百株的紅毛丹樹成為了他的收入來源。果園也成了南洋學會重要成員和其他當代著名人物聚

集的地點，特別是在每年五月紅毛丹季節。一九六二年三月，他在北京故宮博物院的邀請下，返回中國出任外銷陶瓷的專家顧問。八年後，他於一九七〇年在北京逝世。果園在一九六二年賣給其他業主，並且被轉換成了養雞場，但這個養雞場最終在政府回購土地之後撤離該地點。

果園現在雖屬於國有土地，但這塊地可以根據果園創建人和訪客的描述和記述，以及透過當時的照片和繪畫恢復原貌。一九五三年，韓槐準寫了一篇有關種植紅毛丹的論文，在其中回憶道，他在一九三三年於三巴旺區域購買了一塊地進行辣椒、菸草和紅毛丹種植試驗。但是，他因為土地被徵用以建設機場（三巴旺空軍基地，Sembawang Air Base）而必須讓出土地。一九三六年，他用七百元在新加坡中部（實里達南區域，Mukim South Seletar）購買一塊二英畝半的坡地，以作為住宅和特定農業試驗用地。他瞭解新加坡北部先前的種植園史，即開始為甘蜜和胡椒種植園，接著轉換成黃梨和橡膠種植園。種植甘蜜和胡椒將耗盡這些原土的腐殖質和養分，但他確信通過重新還原土壤的化學物質和養分，能再度將土地用作種植用途。

他清除了土地上的所有植物和地下根，尤其是雜草（比如白茅草）。這些植物、樹根和草連同表層土壤一同燒盡，以製造草木灰。在棲息地結構的細心分配之後，則開始挖掘距離相隔三十五至四十英尺的樹洞。在種植特種紅毛丹樹苗之前，則先放入草木灰和肥料的混合

物。這些植物需要在首幾年進行持續的特別照顧，特別是在排除過多雨水，使用肥料和保護免受昆蟲侵擾上。我們可以從一位訪客連士升的記述中獲得有關當時場景的描述：

「愚趣園是個山坡，紅毛丹依山坡一層一層種下去。每棵樹的周圍築成高闊幾吋的田塍，同時，裝置水管，讓多餘的水流出去。從樹上掉下來的殘花、敗葉、枯枝、爛果，都堆在樹底下，讓它們慢慢腐化，變成肥料……愚趣園利用泉水，自己裝置自來水管。泉水不分晝夜地流著，泉甘水清，不用消毒，不經沙溜（餾），終年可以得到良好的飲料。」

瑪戈確認了這種理想的種植情況。他寫道：「浴室建設在山坡下，泉水收集到一個水缸裡，多餘的水通過排水溝流走。這種設置安排給人有寬敞和舒適感。」愚趣園曾經有許多著名的文人和學者拜訪。他們除了品嚐水果之外，還題字或留書。瑪戈回憶起中國畫家徐悲鴻曾經贈送一幅描繪紅毛丹的中國畫給韓槐準。劉先德在他的靜物畫中也採用了果園內的水果。另外，韓槐準對劉抗一幅以韓槐準的書籍與文物貯藏室、神龕和其他周邊區域為背景的油畫表示欣賞。畫作描繪了韓槐準坐在一個石桌前面，另外還有兩人在他背後的另一張桌子上吃著紅毛丹。另一幅由經常到訪愚趣園的黃葆芳所創作的靜物畫中，可以看出中國南方與新加

坡兩地之間的想像聯繫。畫中除了畫著可能是果園種植的紅毛丹之外，還引用了曾到訪果園的著名作家郁達夫的畫題：「不辭客路三千里，來啖紅毛五月丹」。那三千里即是代表著新加坡和中國之間假定存在的離散距離或遠近。

目前，果園最著名的空間表徵是藝術家林木化的作品，題為「愚趣園圖」。這幅作品由韓槐準的許多朋友在他於一九六二年回中國時委託林木化創作，以紀念他們在果園內的時光。除了韓槐準於一九五三年在《南洋學報》所發表的長篇論文之外，該作品是唯一以視覺形式呈現韓槐準理想的紅毛丹種植方法之例證。人們可以從畫中看到樹木間距、允許自然灌溉的景觀詮釋，以及人們居處的位置，還有以木材和波紋鋁板構建的簡單建築，包括韓槐準的住宅、工作室和裝有文物的棚子。

林木化和新加坡的變化景觀

林木化（一九三六至二〇〇八）出生在戰爭期間的新加坡。他在一九五五年畢業於新加坡南洋美術專科學校。他在學校內任教直到一九六九年，並且在接下來的五年擔任《南洋商報》編輯，最後成為全職藝術家。雖然畢業於南洋美專的西方美術專業，林木化卻也精通各種不同的藝術媒介，包括油畫、墨畫和碳畫。他的木刻版畫和諷刺漫畫也甚為知名。從一九五六

年間等，他的作品在無數的個展和群展中展出，他的文章和評論也曾出現在媒體、報刊、一些出版物中。

值得注意的是，林木化在一九五〇年後的主要藝術創作，正好巧遇新加坡風景面貌的迅速重構和轉型期。林木化在以華文為教學媒介語的學校受教育，後來就讀於東南亞首間由華人管理和執教的藝術院校。他把新加坡島當作家園，不斷地繪畫島上的不同景觀，記錄了如丹戎禺（Tanjong Rhu）、樟宜、勿洛（Bedok）、裕廊（Jurong）、武吉巴梳（Bukit Pasoh）以及他最終居住的直落布蘭雅（Telok Blangah）地區。我們可以從林木化的木刻和主題繪畫作品中，觀察到他對生活細節和生活中的各情景的關注。有關船廠、甘榜、丘陵地區及採石場的畫作，使他的作品成為新加坡重要的景觀和迅速發展之下，富有紀錄功能的風景畫。相反的，他的其他作品以更「廣闊」的規模來描繪新加坡的景觀，在巨大的帆布上作畫，如鳥瞰的視角。

身為當地受華文教育的新興文人之一，林木化經常應藝術史學家瑪戈的邀請，到位於湯申路上段八英里半的愚趣園。大約在一九六一年，也就是韓槐準離開新加坡的前一年，瑪戈要求林木化認真考慮製作一幅有關果園的紀念畫。當時，林木化已經開始素描果園的一些地方。在瑪戈和其他人的鼓勵下，他精雕細琢地製作出了一些果園區域的碳畫，其中帶有幾分特別的含義。他在大約一九六四年製作了三幅籌備構圖，其中兩幅是墨畫，一幅是鉛筆畫。接著，

他將所有的草圖結合成一幅廣闊和全景觀的畫作。最終畫作完成於一九六四年，使用了棕褐色宣紙和中國水墨，長六英尺寬四英尺。畫作所採取的視角有如從空中高處俯瞰整個果園的面貌。然而，果園周圍的地區並沒有繪入畫作中，以加深觀者對果園空間的注意。瑪戈過後透露，林木化自己決定減少一些樹木以強調畫中的幾個重要區域，但除此之外，該畫對果園的描繪是準確的。

在最後的版本中，林木化將自己加入到畫中韓槐準的住家前面，站在他的一旁一起交談。兩人前面放置了一個大藤製籃子，裡頭裝滿收割好的紅色水果。另外還有十三人散布在畫中的各個地點，或單獨或結伴同行。他們是韓槐準的家人和其他果園的訪客。果園的土地面貌看似經過人為因素的「改變」和「雕塑」，體現在從背景（湯申路上段）延伸至前景（湯申路上段）的平緩斜坡上。韓槐準的住所和廚房、貯藏室和研究室、大伯公神龕和一間廁所與戶外家具，數個結構體以水平線的方式放置在畫的中間位置。畫的其餘中間位置和前景主要布滿了排列整齊的紅毛丹樹，它們的根部和相對的位置相互連貫，似乎是依據景觀輪廓的曲線和對角線來描繪。每一棵樹都種植在一個土堆上，而枝葉中的紅斑點群標示著當時正是紅毛丹季節，時間可能是在五月。其他的樹和灌木，如椰子和香蕉樹，則種植在紅毛丹樹之間。

在畫的上方可以看到來自六名不同作者的題字（從右至左閱讀）。林木化為畫題了「愚趣園圖」的標題，並且附上簽名和中文蓋章。剩餘以散文和詩句題上圖解的作者依次序排列

者：謝文、黃載靈、陳宗瑞、陳世集和謝雲聲。黃載靈、陳宗瑞和陳世集都是畫家、任職在南洋美專的藝術家及同事，在圖解中描述和讚揚了韓槐準的創作以及所設置的空間。一些圖解也說明了畫作的紀念價值。畫上刻的日期是一九六五年，地點是新加坡，並且有作家們的簽名和蓋章。可見，林木化使用了傳統的中國山水畫格式來想像與刻劃紅毛丹園的空間。即使華人文人當時已經在新加坡居住和工作，使用圖解、簽名和印章仍是他們的慣例。

居住於「偏遠的北方」，想像中國「南方」

韓槐準居住在自己所創立的混合型種植園的選擇，可以通過許多方式來解釋。最明顯的是將果園作為「雅集」（寬敞的居住空間）的提喻。這是中國園林史上的一種正式空間類型，也是一個文人常會聚集參加季節性聚會的風景地。雅集中，文人會鑑賞詩歌、繪畫、音樂、遺跡和文物，並且通常會一起享用茶水和食物。這雖然是一個學者紳士、流亡政客或朝廷官員的聚集地，他們的學術眼光和身分也將在這裡與景觀產生「互換」，但是這個空間並非只是學者的隱退悠閒之地。如柯律格（Craig Clunas）所指出，在明代時的蘇州也設有中式林園，縱使充滿青翠和詩情畫意的一面，其中也種植了許多經濟作物或水果。

若要尋求雅集的先例，我們或許可以參考李公麟在一〇八七年畫的《西園雅集圖》。畫

中描繪了十六個名人在王詵位於開封的西園內相聚。這些人中包括蘇軾（蘇東坡）、蘇軾的弟弟和李公麟本人。他們連同其他人鑑賞著詩歌、繪畫、音樂和文學。該畫所描繪的活動和布景至今已經成為象徵文人活動和場景的知名畫作，即使其他當代學者已證明這些人物的聚會實際上並沒發生過。但是，在這種景觀布景之下的聚會活動確實極常見，這可以通過其他文字如詩歌和專著中找到證明。例如，明代醫聖李時珍在《本草綱目》中就寫到，來自社會不同階級的人都會於農曆五、六月聚集在荔枝樹下，以品嚐成熟的水果和鑑賞荔枝樹。

宋代傑出人物蘇軾和荔枝樹的引用，對於構成雅集的觀念，和其喚起新加坡定居文人的身分認同很重要。蘇軾是中國宋代深具影響力的詩人和散文家。他原先為北宋時期的頂尖官員，後因變法改革而被數次貶職及流放至距離廣東省廣州以東七十英里的嶺南（惠州），並且最終流放到中國最南端的海南島。到訪果園的人，包括許雲樵，都曾論及蘇軾和荔枝樹的引文。韓槐準本人也通過以下的方式描述了他的果園，我們可從內容中看出其沿著「雅集」的思維展開：

> 「至五年樹已成蔭，而結實更多，當其熟時，綠葉縫中，紅丹累累，誠天然之美境，可任人寄情自娛，及至夕陽垂西，雲已出岫，縱遊叢中，伸手可得，或箕踞樹下，讀韓昌黎《送李愿歸盤谷序》，吟蘇子瞻《食荔枝詩》。正所謂齒頰浮香，眉宇競爽矣。」

韓槐準的郊外身分定位的第二原因，或許是為了將自己與新加坡的市中心，即與殖民地事業有關的其他成功華人文族群的空間代表區別開來。他從勞動者至備受尊重的學者的轉型，在殖民地時期的新加坡實屬罕見，而他對使用華文和馬來文的堅持更讓他顯得特殊。如明代的林園一樣，他將寓所搬遷至郊區的種植園內，可提供自己一個較隱祕的空間來進行學術實踐和「培養」。另外，通過販賣紅毛丹和其他水果，他無需擔憂經濟生計。他那多汁和精心培育的紅毛丹於每年五月，都可以在城鎮上獲得最高的市場價，而知道種植園位置的人甚至會驅車到那裡專門購買水果。

韓槐準在定居新加坡期間所到過的地方，或許也可以聯繫到海南人離散空間的歷史。到了一八八五年，除了上述市區內的海南定居點之外，海南人也開始在義順（Nee Soon）區與利芭（Kampong Heng Leh Pah）和其他甘蜜種植園工作。韓槐準學習西方化學的地方——神農大藥房正位於海南定居點一端的百勝路（Bras Basah Road），但他過後加入了移居到城市北部其他地方的海南人行列。愚趣園位於白立達巷（Lorong Pelita）附近。該區是一個設有養雞和養豬場的龐大海南人定居點，但其定居點遺跡如今被發展成湯申自然公園。

植物、場所和身分的嫁接

林木化的果園畫展示了韓槐準施用在果樹上的創新嫁接方法。這是一種稱為「靠接嫁接」(Inarch Grafting)的即興形式。在這個種植方式之下，一年之後不同樹種的根和莖將可以相鄰種植並一起嫁接，最終形成一棵由幾處樹根所組成的樹。在樹的早年發育期，這類多莖系統的優勢是可以為弱樹苗提供結構支撐。多重雜交樹在完全成年之後，將可以產生多達五個不同的紅毛丹種類，使得同一棵樹可以生長出不同特色和口味的紅毛丹。如果這些樹所產生的不同混合品種再被重新嫁接和種植在別處，則將有更強的基因，「缺陷」亦將被彌補。

韓槐準種植紅毛丹與進行紅毛丹果樹雜交的選擇，可能和其身為中國南方人的社會與文化身分的自我建設有關。值得指出的是，紅毛丹屬於無患子科(Sapindaceae)，這科有四種主要水果：荔枝、龍眼、葡萄桑(pulasan)和紅毛丹。龍眼和荔枝主要可以在亞熱帶地區找到，葡萄桑和紅毛丹卻只可在熱帶地區茁長成長。早期有關南洋紅毛丹的中國(Sinic)記述，錯誤地把紅毛丹描述成荔枝的其中一個品種。明代馬歡的《瀛涯勝覽》稱紅毛丹為「野荔枝」，而吳其浚的一八四八年著作《植物名實圖考》將它稱為「毛荔枝」。一些文字記錄，如王大海的一七九一年著作《海島逸志》，也將紅毛丹的顏色和味道比喻成荔枝。

韓槐準在他有關紅毛丹的著名論文中承認，他選擇在果園種植紅毛丹有雙重的目的，首

先，這與他的化學研究有關，因為他對硝酸鉀可否用作肥料有所好奇；其六，這是基於紅毛丹與中國南方荔枝的關係。對於韓槐準而言，紅毛丹是他懷念過去亞熱帶氣候家鄉的「身分寄託」或「替代」。韓槐準將這情懷比喻成「愚者之趣」，因此將他果園的中文名命名為「愚趣園」：

> 「（我）乃再選買南實里達區（Mukim South Seletar）二英畝餘之土地而家居，並兼植與荔枝同科同屬，南洋特產之紅毛丹，其良種之紅毛丹果實，不但甘美適口，至成熟時幾如故國之荔枝可供欣賞，使精神舒暢，其殆愚者一得之趣，因以名園為愚趣。」

在這個情況中，荔枝的引用不是為了裝飾或構建一種新的華人身分認同，而是引起人們原有的中國南方身分認同。荔枝是一種只在亞熱帶區域可以找到的常綠果樹，並且無法在北方較寒冷的氣候中生存。在中國北方眾多有關於荔枝的傳說中，較著名的莫過於楊貴妃：一個貴妃對新鮮荔枝的悅目和療效如癡如醉，因此皇帝下達命令驛站將荔枝從南方運往位於北方的宮廷供貴妃食用，造成了重大的人馬傷亡和巨大的宮廷財政損失。

我們可以透過觀察果園訪客的其他文字創作，以探討荔枝和南洋紅毛丹之間的關係，再進一步討論南洋身分聯繫。《南洋學報》主編許雲樵在一篇題為〈南洋名果十首．紅毛丹〉

的詩中聲稱：「韶荔抗禮本同科……不讓嶺南獨頌坡。」嶺南是中國南方的一部分，也因當地最著名的旅居者蘇軾而聞名。當時，蘇軾正是被流放至嶺南（惠州）和海南島。在那裡，蘇軾在自己的花園裡種了荔枝、橙和柚子樹，還寫了他最著名的詩〈食荔枝〉。這首詩的最後兩行寫道：「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

說回紅毛丹園，海外華人文人抓住機會引用了這些著名詩句，但在當中嫁接水果、相關元素和地方。譬如黃葆芳引用了蘇軾的詩句，但將「荔枝」替換成「紅毛丹」，「嶺南」替換成「新加坡」，變作「日啖毛丹三百顆，不辭長作星洲人」。韓槐準的好友——著名中國畫家徐悲鴻曾經在畫中題字道：「日啖紅毛丹百顆，不妨長作炎方人」。連士升在一九五一年所寫的文章中談到，愚趣園內有一種棉蘭（Medan）品種的紅毛丹種子細小，果肉有如福州的荔枝。除了從文學上將荔枝轉換成紅毛丹及嶺南轉換成新加坡的文字和空間「移植」之外，愚趣園可能確實有類似荔枝的紅毛丹雜交品種。

結論

在這篇文章內，我通過描述少數海南人次族群原來的市區聚居地，並且將其與一名海南移民所創建的文人空間進行對比，探討了二十世紀新加坡華人空間的創建。我認為愚趣園是

一種混合型的空間。它的空間形態不屬於市區，也與華人或英國殖民種植園有所不同。它是一種原本的時空體（chronotope），負責「傳送」有關中國文學的時間和空間想像，以及與時間和空間有關的園林景觀。一旦創造之後，它為訪客提供一個熱帶和新加坡生活的適應與想像空間。如同果園園主韓槐準的籌畫一樣，東南亞華人的特定身分認同也可以通過這個空間的功能來培育。

我認為與熱帶植物學和植物產品的接觸，在這些文人適應熱帶的過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而這體現在他們的藝術、文學和學術研究中。通過植物的熟悉和最終食用，他們也「吃進了熱帶」，並且將其「內化」和形成了一種慣例和日常。愚趣園的創建和紅毛丹樹的種植為東南亞華人文人和知識分子銜接了中國南方和新加坡之間的空間。在這個空間內，紅毛丹（一種熱帶水果）被認為是荔枝（與紅毛丹屬於同一家族的亞熱帶水果）的植物「替補」，同時也是與水果有關的現存文學和區位連接的象徵。通過蘇軾這位歷史人物和他的詩作，韓槐準和他「雅集」之友人與訪者一同在這比海南島還「更偏南端」的地方重塑了南方文人社群的想像。

儘管韓槐準在南洋逗留一段很長的時間，他最終在一九六二年回到中國的舉動反映了他那一代移民與出生地重新「團聚」的潛伏性號召。除了他從事的植物學和文學工作，他最終對外銷陶瓷的研究讓他可以與中國的產物「連接」，進而可以回到中國。韓槐準是在新加坡

一九五九年取得自治後，卻可能將於一九六三年和馬來西亞合併的時空背景之下回到中國。他所居住和工作的新加坡北部地區逐漸進行了發展。他的果園旁建了一條新的主要道路——湯申路上段，一九六一年所舉辦的新加坡大獎賽（Singapore Grand Prix）賽道也環繞他的果園。這項活動在他回到中國的一年前，為原本幽靜的實里達下段（Lower Seletar）地區帶來了人潮和吵雜的車輛。

與韓槐準對比，我們可以觀察另一名在新加坡土生土長的華人文人——林木化的文學和藝術創作。儘管林木化接受「南洋」文化和傳統教育及熏陶，他對中國的「想像」連接卻沒有那麼濃烈。他一生中創作了許多有關新加坡景觀的畫，以及有關新加坡島生活情況的文章與漫畫，最終在二〇〇八年於新加坡辭世。林木化的《愚趣園圖》使用了中國畫的風格和傳統，但是他對景觀、元素和人物的處理是被他其他藝術媒介的技巧所影響，其中包括非中國畫形式。林木化從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四年間重塑了一幅有關新加坡知識史和富含植物學重大意義的紀念畫。這讓我們可以研究不同時代的華人群體（包括韓槐準和林木化），並探索他們複雜的自身和群體身分認同。

參考書目

Blythe, Wilfred (1969). *The Impact of 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in Malaya: A Historical Study.* London and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rown, Edwin A. (2007). *Indiscreet Memories: 1901 Singapore through the Eyes of a Colonial Englishman.* Singapore: Monsoon Books.

Buckley, Charles (1984). *An Anecdotal History of Old Times in Singapore.*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lunas, Craig (1996). *Fruitful Sites: Garden Culture in Ming Dynasty China.*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Groff, George Weidman (1921). *The Lychee and Lungan.* New York: Orange Judd Company.

Han Tan Juan (2008). "Han Wai Toon and the Legacy of the Sembawang Rambutan Garden". In Low Sze Wee and Chow Yian Ping (eds.), *Xu Beihong in Nanyang,* pp. 117-127. Singapore: Singapore Art Museum.

Jackson, James C. (1968). *Planters and Speculators: Chinese and European Agricultural Enterprise in Malaya 1786-1921.* Kuala Lumpur and Singapore: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Laing, Ellen Johnston (1968). "Real or Ideal: The Problem of the 'Elegant Gathering in the Western Garden' in Chinese Historical and Art Historical Records". I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Vol. 88, No. 3, pp. 419-435.

Ma Huan (Ming, 1970). *Ying-yai Sheng-lan: The Overall Survey of the Ocean's Shores,* translated from the Chinese

text edited by Feng Ch'eng-Chün, with an introduction, notes and appendices by J.V.G. Mill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itt Kuan Wah (1987). "From Plantations to New Town: the Story of Nee Soon". In Lim How Seng and Lim Guan Hock (eds.), *The Development of Nee Soon Community*, pp. 193-225. Singapore: National Archives Oral History Department.

Thomson, John Turnbull (1991). *Glimpses into Life in Malayan Lands*.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Trocki, Carl (2007). *Prince of Pirates: The Temenggong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Johor and Singapore 1784-1885*. Singapore: NUS Press.

Wang Gungwu (2005). "Within and Without: Chinese Writers Overseas". In *Journal of Chinese Overseas*, Vol. 1, pp. 1-15.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韓槐準（一九五三）。〈紅毛丹種植談〉。《南洋學報》（第九卷第二輯）。新加坡：南洋學會。

韓槐準（一九六〇）。《南洋遺留的中國古外銷陶瓷》。新加坡：青年書局。

連士升（一九五五）。〈神遊愚趣園〉。《南行集》，頁一〇〇至一〇四。新加坡：南洋商報。

李時珍著（明），漆浩主編（一九九四）。《白話本草綱目》。北京：學苑出版社。

瑪戈（許鍾祐，一九六二）。〈記韓槐準先生〉。《南洋文摘》（第三卷第六期），頁三七至三八。香港：南洋文摘社。

瑪戈（許鍾祐，一九六七）。〈愚趣園畫的題字〉。《明報》（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七日），頁四。

王振春（一九八七）。〈人去樓空的海南村〉。林孝勝、[illegible]源福主編，《義順社區發展史》，頁八[illegible]至九〇。新加坡：國家檔案館口述歷史館。

王潤華（二〇〇一）。《華文後殖民文學：本土多元文化的思考》。台北：文史哲出版社。

許雲樵（一九六二）。〈送別韓槐準先生〉。《南洋文摘》（第三卷第六期），頁七〇至七二。香港：南洋文摘社。

許雲樵（一九七〇）。〈追悼韓槐準先生〉。《東南亞研究》（第六卷），頁三七至四四。新加坡：新加坡熱帶經濟植物研究社。

姚楠（一九八四）。〈韓槐準與愚趣園〉。《星雲椰雨集》，頁七五至八〇。新加坡：新加坡新聞與出版有限公司。

註：此篇文章被許豐定（Koh Hong Teng）及胡勇輝（Oh Yong Hwee）改編為圖畫書《尋找愚趣園》（*The Garden of Foolish Indulgences*），英文版於二〇一六年由新加坡 Pause Narratives 出版，繁體中文版由台北季風帶文化於二〇二一年出版。





愚趣園 (1964) 48"·72" 赤宣

圖9-1：林木化繪於一九六四年的《愚趣園圖》。



圖9-2：韓槐準（左起第一位）與朋友在愚趣園中小聚。



圖9-3：二〇一七年被找到的愚趣園浴室。



圖9-4：愚趣園的素描圖，從主要道路通向台階，林木化繪。



圖9-5：林木化所繪的愚趣園鉛筆素描草圖。

在商業利益及多元種族之間：
檳榔嶼和新加坡的早期殖民地景觀構築

和很多前英國殖民地一樣，海峽殖民地和馬來半島從來就不只是定居著單一種族的土著，尤其在當地製造或提供更多有利可圖的經濟條件或機會後，更是迅速吸引鄰近及周邊國家的人口遷移到這個地區定居。在這篇論文中，我將嘗試追溯檳榔嶼（亦作檳城）和新加坡在十九和二十世紀之交開發之初，當地土著及新移民的定居及落腳地，以及為不同種族聚落的建築形式與新制定的殖民土地政策和城市景觀作一番對比。

新加坡和馬來西亞早期的多元種族面貌，早在多部文獻中皆有記載。羅蘭．布萊德（Roland Braddell）在其一九三四年的著作《新加坡之光》（*The Lights of Singapore*）中，記述早期出現在新加坡殖民地的「白人」包括了「英國人、愛爾蘭人、蘇格蘭人、威爾斯人、

澳洲人、紐西蘭人、加拿大人、美國人、比利時人、丹麥人、荷蘭人、法國人、德國人、希臘人、義大利人、挪威人、葡萄牙人、俄羅斯人、西班牙人、瑞典人、瑞士人及其他」。至於原住民方面，雖然可以用「土著」一詞來大致概括，但是布萊德依然給新加坡島上的非白人族群作了詳細的劃分：[2]

「馬來人」：「真正的」馬來人、爪哇人、波央人、亞齊人、巴塔克人、馬辰人、武吉斯人、達雅人、米南加保人、來自克林芝、占碑和巨港的人；

「吉令人」：淡米爾人、特魯固人、馬拉巴人；

「孟加拉人」：包括旁遮普人、錫克人、孟加拉人、印度斯坦人、普什圖人、古吉拉特人、拉吉普特人、馬拉地人、帕西人、緬人、廓爾喀人；

「亞洲人」：阿拉伯人、僧伽羅人、日本人、安南人、亞美尼亞人、菲律賓人、東方猶太人、波斯人、暹羅人及其他；

「華人」：福建人、潮州人、客家人、福清人、廣東人、海南人、福州人、廣西人。

班納迪克·安德森在《想像的共同體》一書曾經點明，馬來西亞普查區分種族的困難之處，這同時也意味著馬來亞本身的多元種族和多元文化特質：一八七一年的第一次人口普查過後，

「興都人」、「吉令人」和「孟加拉人」(Bengalees) 的分類[illegible]、「[illegible]人」、「孟加拉人」(Bengalis)、「緬人」還有「淡米爾人」的分類一路保留到一九〇一年的普查數據中。一九一一年的馬來聯邦人口普查則試圖把「按族群劃分的馬來人口」按照「馬來人」、「爪哇人」、「沙蓋人」、「馬辰人」、「波央人」、「曼代嶺人」、「克林芝人」、「占碑人」、「亞齊人」、「武吉斯人」及「其他」的類別來區分。

歷史背景

先來瞭解檳榔嶼和新加坡成為殖民地之前的歷史背景。公元一五一一年，葡萄牙占領馬六甲，終結已有一百多年歷史的「土著」馬六甲蘇丹政權，也一併拿下這片靠著興旺的區域及全球貿易躋身亞洲最富有國家的土地。一六四一年，荷蘭從葡萄牙手中奪走了馬六甲，過後在一八二四年簽署了《英荷條約》後把馬六甲拱手讓給英國，英國才得以在一八二六年整

1 Roland Braddell, *The Lights of Singapore*, pp. 43-45.
2 Ibid.
3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pp. 164-165.

合檳榔嶼、新加坡[4]和馬六甲，組建海峽殖民地。

自此，英國掌握海峽殖民地的經濟命脈，並以此抵禦法國和荷蘭在印度支那、印尼及摩鹿加群島的殖民利益。接著，英國和馬來半島各州蘇丹簽下保護條約，在承認蘇丹為州內統治者的基礎上，安插英籍參政司於各州行政機構中，藉此干預各州的貿易、發展及立法事務。下一步，他們把手伸入馬來半島腹地和東海岸：先是在一八七三到一八九五年間整合雪蘭莪、霹靂、森美蘭和彭亨，成立了馬來聯邦（俗稱「四州府」）；過後在一九〇四到一九一四年間，再把餘下的吉打、玻璃市、吉蘭丹、登嘉樓和柔佛囊括到馬來屬邦（俗稱「五州府」）之下。

喬治市開埠

獲得吉打蘇丹割讓檳榔嶼一開始只是原海軍上尉法蘭西斯・萊特（Francis Light）的私人計畫。早在一七七一年，已成為商人的他，就已經向他工作的蘇利文（Jourdain, Sullivan and de Souza）表明，他和吉打蘇丹的談判將獲得吉打蘇丹的讓步，為貿易公司取得把錫礦、蠟、胡椒、檳榔等商品銷往中國市場的交易。[5]英國歷史學家溫士德（R.O. Winstedt）認為，萊特有可能早早密謀扭曲他在談判中的說辭，一方面利用吉打蘇丹尋求外來勢力抵禦包括暹羅和雪蘭莪等潛在入侵者的需求，另一方面則藉助東印度公司意欲在孟加拉灣和馬來亞水域建

立防衛和貿易基地、壟斷香料貿易的野心，更為自己謀取利益。一七八六年八月十一日，萊特登陸檳榔嶼，在島上升起大英帝國國旗，通過一系列外交手段和兵事把吉打軍隊擋在門外；而在當吉打被暹羅占領、吉打蘇丹被驅逐而向萊特求助之際，矢口抵賴他在合約中答應下來的條文，推託他所屬的貿易公司並沒有協助他。[7]

在當時只有一片空曠海濱、一座堡壘和一個小市集的檳榔嶼，除了原居此地的馬來人之外，在短短一年內，就吸引了六十戶華人、幾戶基督教徒和若干馬拉巴人落戶。[8] 六年後的一七九二年，萊特當局便記載了喬治市多達一萬人口的數據，其中一千人是貿易公司員工及侍從、七千個「原居民」、一千五百個馬來人，其餘則是流動居民。[9] 儘管成功吸引可觀數量的定居者，但包括F. G. 史提文斯（F. G. Stevens）在內的評論者都認為，島上的管理成效可說是失敗至極，肇因是不明智的土地政策，以及無力製造更多收入。[10]

4 東印度公司分別在一七八六年和一八一九年，與吉打蘇丹及柔佛天猛公簽署條約後，才取得檳榔嶼和新加坡。
5 R. O. Winstedt, *A History of Malaya*, p. 173.
6 Ibid., pp. 174-179.
7 L.A. Mills, *British Malaya, 1824-67*, pp. 39-43.
8 Keppel Garnier, *Early Days in Penang*, pp. 5-6.
9 Ibid., p. 6.
10 F.G. Stevens, *Early History of Prince of Wales Island*, p. 378.

除了開埠前那場政治紛爭之外，開埠後萊特的一系列表現更是證明他不止沒有遠見，更管理無方。他劃分為定居區的土地就在沼澤之上，排水不暢，經常淹水，又被蜂擁而至的亞裔移民群擠得水泄不通；到一八〇五年才終於有一名醫生和兩名診所助手姍姍來遲地登島，以診治散播於外來人口，尤其是華人和歐洲人之間的熱帶疾病；一七九六年九月，第三位被英方派駐檳榔嶼擔任督導的麥唐納少校（Major Forbes Macdonald），便投訴當地除了一所海關、醫院和監獄之外，再沒有其他行政建築。[11]要建辦公室，只能向一名叫詹姆斯．史考特（James Scott）的商人租賃土地，因為所有土地已經收歸私用，沒有政府辦公室的容身之處。

萊特並沒有就土地用途立下任何準則或法規，只要求所有定居者和商人提出未來所有權的承諾，就可清理並擁有土地。他自己先在幾塊園丘和堡壘附近的精選地段帶頭實行這個做法，但是直到他逝世的一七九四年，只有極少量的土地所有權真的被頒布出去。[12]大多數的土地都握在商人——主要是與萊特亦商業夥伴亦密友的詹姆斯．史考特——的手中。到了一八〇五年成立新政府才發現，除了上面提到的零星規定以外，檳榔嶼沒有主管稅收的部門、沒有法律，只有寥寥幾則執法及維持治安的條規，公司還欠著一屁股債。[13]這屆新上任的政府官員中，包括一個名叫萊佛士（Thomas Stamford Raffles）的年輕助理祕書，他們試圖力挽狂瀾，並開始在島上開發更多道路、興建更多建築物。

萊特規劃的商業區就在海濱堡壘後面，被萊特街（Light Street）、土庫街（Beach

Street）、馬拉巴街（Malabar Street）、[illegible][illegible]牛乾冬街（Chulia Street）、椰腳街（Pitt Street）這四條馬路環繞。縱貫島上南北部的檳榔律（Penang Road）則是當時另外一條主要的通道。萊特於一七九四年逝世後，第一個被派駐的總督喬治・李特（Sir George Leith）在一八〇〇年抵達檳榔嶼。他在任期內修建了更多從堡壘和商業區通往外圍地區的道路，這些外圍地區當時是華人、暹羅人、南印度人和孟加拉人的聚落所在。[14] 一八一一年，一位名叫詹姆斯・沃森（James Wathen）的旅人這樣描述這片「雜亂無章」的景觀：[15]

> 「把目光往喬治市南邊挪，便看見港口。這小鎮裡不同聚落的建築物，風格五花八門，卻產生奇特的效果——歐洲人的別墅、印度人的洋房、馬來人的木屋、華人的宅子、緬甸人的棚廬，一致地相互混合，顯然也並不經過任何事先規劃，這批打頭陣登島的定居者，按各自國家的習俗，為自己建造家園……」

11 The City Council of George Town, *Penang Past and Present 1786-1963*, p.2.

12 F.G. Stevens, *Early History of Prince of Wales Island*, pp. 378-381.

13 Ibid., p. 384.

14 Ibid., p. 393.

15 As quoted in Mai Lin Tjoa-Bonatz, "Ordering of housing…", p. 126

很快地，華人便成為定居者中人口最多的族群，他們建造的聚落以親疏為衡量，再按各自所屬的方言群和姓氏來締結聯繫與築造建物。五個[16]壁壘分明的「公司」，作為南來同胞的互助協會，就落址於商業區的南邊。最大的是龍山堂邱公司，這是個外觀像堡壘的建築群，三面交界土庫街、打銅仔街（Armenian Street）和打石街（Acheen Street）。正中央是祠堂，祠堂前方是一個廣場，廣場盡頭有戲台，整個廣場被縱橫網布的店鋪和排屋團團圍繞，其中包括其他姓氏公會會址和較小的神祇。住在這些店屋裡的人全部姓邱，自成一個緊密聯繫的小社會，為同姓族人供書教學、營造社交、傳承文化和發放福利，至今仍如往昔。[17]以姓氏為別的例子還有：位於檳城海墘（Weld Quay）旁邊、五公司東邊、商業區南邊的姓氏橋碼頭。在這裡，以木頭一根根釘成的一條條走道，架在深深插入海床裡的木樁上，呈平行狀從陸地向海上延伸，走道兩旁滿是一幢幢木屋。一條走道就是一座姓氏橋，分別住著姓林、邱、陳、楊、李、郭的居民，還有一座則是雜姓橋。[18]這些姓氏橋的落成，就是用來安置檳榔嶼開埠後，在檳城碼頭替商船賣力的裝卸工及搬運工的安樂窩。

柔佛和新加坡的非英國人聚落

在檳榔嶼以姓氏劃分聚落的同一時間，南邊的柔佛和新加坡也出現相仿的姓氏聚落。在

英國開始建設新加坡後，從中國來的移民並不只是前往這兩灣的殖民城區，有許多人也朝柔佛海峽兩旁的江河流域前進，並踴躍與柔佛蘇丹交涉，以取得土地開發及園丘種植的機會。

許多在這樣的背景下應運而生的河濱聚落，今天已經消失無蹤。新加坡的蔡厝港、林厝港和楊厝港還在，但是鄧洛普（Peter Dunlop）的記載告訴我們，實里達河的曾厝港、克蘭芝河的朱厝港、萬禮河的劉厝港、小萬禮河的陳厝港，都是之前留存在新加坡的姓氏厝港。[19]柔佛方面，我曾經追溯到以張、謝、黃、楊、劉、洪、李、鄭、陳、巫許[20]的姓來冠名的厝港，但是後來這些地區的重新開發和命名，導致這些舊地名不再出現在地圖和日常用語中，而我是通過柔佛海峽兩岸相似的水系和景觀來確定各個厝港曾經存在。「厝」（chu）的意思是房子，而「港」（kang）的意思是河，來源語應該是潮州話，因為當時這片區域內的人口以潮州人為最大宗，而且潮州方言也是當時當地華人先賢的通用語。

16　更早期應該有更多，但是今時只有這五個比較顯著，分別是邱、林、陳、謝和楊，全都是福建籍貫的同鄉會。
17　三合會的發源有可能是形成這種聚落生活形式的另一個原因，因為各個公司都曾經動員參與檳榔嶼十九與二十世紀間最轟動的械鬥中。
18　Khoo Su Nin, *Streets of George Town Penang*, p. 170-172.
19　Peter Dunlop, *Street Names of Singapore*.
20　J.V. Cowgill, *Chinese Place Names in Johore*, pp. 224-247.

「港主」（Kangchu）或「河主人」（Tuan Sungai），意思都是「河的主人」，他們得到柔佛蘇丹的特別許可，在某條河域或支流上開發土地、組建聚落，以大量種植甘蜜和胡椒。[21]不管港主或其姓氏是否擁有港邊的所有土地產業，他們的主要職責就是在允許使用土地及種植作物的「抵押」（pajak）制度下，管理甘蜜及胡椒的種植和出口業務，確保有質量和公平的貿易；同時保護及照顧他「轄區」內的聚落人民，直到港主逝世或舉家離開「港」，這些特許權力才交還到蘇丹手裡。

蘇丹頒布給港主的授權文件讓這些港主作為蘇丹代理人，他們所享有的權力比真金白銀買下一塊地的地主還大。最早的港主授權文件是「港契」（Surat Sungai，意為河契），它名正言順地授予港主一塊位於兩條河中間、範圍不明確的土地。英國殖民地官員A．E．庫普（A. E. Coope）發現最早發出的港契年份是一八三三年，港是士姑來河。過後，在授權書和港主法令（kanun kangchu，一八七三年生效）出台後，港主的職責和這個名稱的含義被改變了。這時候的港主，可以全方位「掌控」港裡的大小運作，因為他們已經擁有可以讓貨物進出口的帆船，甚至是在新加坡的一間商店，以便向「港外的世界」獲取白米及其他民生物資的供應。授權書則授予港主經營賭場、當鋪的權力，以及壟斷酒水、豬肉和鴉片的銷售，還允許港主對胡椒和甘蜜出口、白米進口徵稅。港主法令同樣也闡明這些職責，但也更清楚地以七十八條條文羅列港主的象徵意義、照顧港民和維護法律的責任。

[illegible]住所就是「厝港」中所謂的「厝」。法令規定每個港必須有一戶代表柔佛蘇丹負責港內治安事務的馬來警察，他們的薪水由港主支付。

港主的住所通常坐落在「港腳」（kangkar，意為河的腳），也就是河的源頭附近。而「kangkar」這個詞，至今仍用作地名的前綴詞以命名地區，沿用在柔佛各地。這裡舉幾個比較顯著的例子：「Kangkar Tebrau」（現在是陳厝港）、「Kangkar Pulai」、「Kangkar Kim Kim」、「Kangkar Chemarang」、「Kangkar Papan」。

有些港直接和港主的全名同名，像是「Seah Ting Cheong Sin Kang」，但也不是所有的港都用港主的姓或名來命名。[22]多數的港都直接音譯原有的馬來地名，例如直接挪用 Sungai Ayam 的「Ayam Kang」、音譯 Sungai Bindu 的「Miang Lu Kang」；有些則取吉祥之意，例如 Yong Peng Kang（永平港，位於峇株巴轄的永平縣，意為永遠平安）、「Sun Tian Kang」（順天港，位於柔佛冷甲縣，意為順服天意）、新加坡的 Sengkang（盛港，意為豐盛的港）；有些以當地景觀特色或物產為名，例如「Cham Heung Kong」（沉香港，來自沉香木，在中

21 A.E. Coope, *The Kangchu System in Johore*, 247. 接下來的敘述文字都出自這篇文章，頁二四七至二六三。

22 各個港主的名字都出自：J.V. Cowgill, "Chinese Place Names in Johore", pp. 224-247.

國被用作藥材，在印度被用作熏香的一種香木）。就算有明文規定，各個港的內部運作卻有時大相徑庭：柔佛大素里里河（Sungai Sedili Besar）北邊的和平港（Kangkar Kambau）就發行了自己的一元和十仙貨幣，一直使用到一九三〇年代。

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主制度及其夾帶的職責和特權在蘇丹命令下宣告終結。原因有二：一、由於歐洲爆發戰爭，對甘蜜及胡椒的需求大跌，這兩種作物的出口價值大幅滑落百分之六十；二、柔佛政府發現許多港主並未善盡法令所規定的「職責」。事後柔佛政府向六十六名港主發放了賠償金，但當時大多數港已經停止運作了。

新加坡的城市規劃及建築設計

萊佛士（Thomas Stamford Raffles）扶搖直上的官運直令他的檳榔嶼前同事們萬分嫉妒又忌憚。一八〇八年，萊佛士在馬六甲休養時，曾向英國政府在印度的辦事處提呈一份報告，勸請英方不要放棄馬六甲的貿易港口，也不要把貿易樞紐轉移到檳榔嶼，因為要是馬六甲落入其他歐洲殖民國或當地勢力手中，將會損害英方的利益。這番論述令該辦事處總督對萊佛士印象深刻，隨即在一八一一年把年僅三十歲的萊佛士擢升為印尼爪哇的副總督。一八一八年，萊佛士受命到蘇門答臘亞齊，為英方開拓商機，再到廖內群島開設貿易據點，以利英方

進一步控制馬六甲海峽上的貿易活動。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萊佛士抵達檳榔嶼時，得悉廖內群島已經落入荷蘭手中，並無視與他敵對的檳榔嶼前同事們的挑釁，堅決地阻攔荷蘭的艦隊登陸柔佛。他繞過規程，放棄蘇門答臘，率領艦隊直直航向新加坡，終在一八一九年一月二十八日登陸新加坡島。他知道新加坡在未沒落的四百五十年前，曾是個繁華忙碌的地方，也多得他信任的馬六甲同事威廉・法夸爾上校（Colonel William Farquhar）從旁協助，因此很快在一月三十日便和柔佛天猛公簽署初步協議，要在新加坡設立「商業基地」（factory）。[23]

萊佛士深知英方在檳榔嶼、爪哇和印尼明古連的殖民統治制度中的缺陷，因此他更有鬥志要向英方證明他這次的開埠項目能夠取得利潤兼取得行政上的成功，以反駁和解釋當初放棄爪哇和明古連的決定。他主張成立一個小型而高效的治理機構，以利作出清晰、有效的管理決策。[24]只是當他一八二二年十月從明古連回到新加坡時，才發現他不在的三十九個月裡，作為英駐新加坡第一位參政司的法夸爾並沒有遵照他一開始的城市規劃行事，而是放任私人

23 這段敘述改編自：L.A. Mills, "British Malaya, 1824-67", pp. 60-69.

24 J. Jathirithamby-Wells, "Singapore and British Administrative Tradition …", p. 50-51. Also F.G. Stevens, "Early History of Prince of Wales Island", p. 385. He had suggested this manner of administration to his superiors for all of the British colonies in Southeast Asia.

界占用他原本保留給政府的新加坡北岸土地。[25]短短一個星期內，萊佛士就以「為來自不同背景的原居民提供舒適和有保障的定居地、杜絕未來的混淆與糾紛」[26]為宗旨，委任一個城市規劃委員會。萊佛士遭遇過檳榔嶼行政規劃與私有土地互相衝突的前車之鑑，這是他在新加坡成立委員會的初衷。

一八二二年菲利普．傑克遜中尉（Lt. Philip Jackson）制定「傑克遜計畫」（亦稱「新加坡城計畫」），除了為新加坡城鎮劃分區域、構畫建物外，也試圖為萊佛士所預見的多元種族人口構成作出一些安排。[27]萊佛士要求城市規劃委員會在規劃書中標示「屬各階層原居民的區域或範圍」，[28]而「傑克遜計畫」也確實標明，新加坡河南岸某一處要用來安置華人，[29]印度人的範圍則比華人的更靠近內陸一些。在新加坡河北岸，歐洲人住的小鎮就在毗鄰新加坡河的行政區的中間。

在倫敦於世紀之交認可新加坡開埠成功前，新加坡當局建造公共建築的資金一直相當緊缺。萊佛士非常謹慎地管理所有開支，除了他自己在拉浪安山（現為福康寧山）上的住所[30]之外，他只委託了在大草場（Padang）和濱海區旁邊興建一所學院（The Institution，一八二三年成立，現為萊佛士學院）和一座教堂（聖安德烈座堂，一八三五年興建）的建案。一八二三年，被萊佛士委任為參政司的約翰．克勞福（John Crawfurd）還是沒有能力在大草場周圍興建行政樓，但是在「新加坡城計畫」的指點下，他得以把土地出租給商人以在大草場周圍大

[illegible]接著在政府[illegible]和檔案室，[31]隨後還接連租用了羅伯特．史考特（Robert Scott）、詹姆斯．史考特．克拉克（James Scott Clark）、愛德華．布斯泰德（Edward Boustead）和威廉．蒙哥梅利（William Montgomerie）幾位英殖民政府官員在大草場周圍的房子，來充作住宅和旅館，直到市政廳（Town Hall，一八六二年建成，現為新加坡維多利亞劇院）、高等法院（Supreme Court）和

25 Lee Kip Lin. *Telok Ayer Market*.

26 Town Planning Committee, as quoted in T.H.H. Hancock, "Coleman's Singapore", p. 16.

27 李急麟注意到萊佛士早在一八一九年六月第二次來到新加坡時，就制定了把城鎮規劃成「社區」或「村落」（campongs）的計畫。出自：Lee, "The Singapore House 1819-1942", p. 17.

28 J.R. Logan, "Notices of Singapore", Journal of the Indian Archipelago, 1854, as quoted in B.W. Hodder, "Racial Groupings in Singapore", p. 27.

29 華裔聚落在一八八二年被遷移到內陸地區，以在毗鄰河流的土地上建立「重要商業機構」。出自：Lee Kip Lin, "The Singapore House 1819-1942", p. 19.

30 Farquhar's residency was at the foot of the hill near the river, at a corner of High Street. Lee Kip Lin, "The Singapore House 1819-1942", p. 149.

31 這棟建築後來被政府買下，一八七四年被J.F.A. McNair設計為法院，一九五四年被公共工程部的漢考克改用為國會大廈。出自：T.H.H. Hancock, "Coleman's Singapore", pp. 22-29.

政府大廈（City Hall，建於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九年間）這些行政空間陸續落成為止。[12] 這樣一來，英殖民政府的政權固若金湯，得以把新加坡全島未來發展建設的土地規劃措施給確立下來，這可從在一八三六年和一八四三年由喬治．D．科爾曼（George D. Coleman）和約翰．T．湯申（John T. Thomson）繪製的地圖中得證。

店屋

新加坡河兩岸行政區以外的範圍也隨著政府大樓的落成逐步成形，所建的主要是高密度的店屋單位。這些店屋在形塑城鎮的用途和設計都受一八二二年版本的「新加坡城計畫」所規範，只是起源和建築風格都是出於設計師的創意構想。[13] 萊佛士於該年十一月四日向城市規劃委員會發出的指示表明「不管是用磚還是用瓦建的店屋都要有類型一致的門面、一定寬度的前廊，作為連綿每條街道兩旁的有蓋行人走道」。[14] 除了為行人遮擋惡劣天氣，這種建築形式也讓諸如排水和垃圾處理在內的衛生服務更容易實施，當然更簡易了市政管理。而萊佛士制定下來的規則後來也被證明是既有遠見又實用的做法，因為這大大降低了大型房屋和商業區發生火災的風險。喬治市在一八〇八、一八一二、一八一三、一八一八年發生的幾起火災讓好幾個地區瞬間付之一炬，因為多數的建築物用的都是非永久性且易燃的建材，[15] 一八八一

年的一場大火也幾乎把整個[illegible]

蘇[illegible]才分別在一八二六年、一八九〇年和一八九三年通過法令來強制實施店屋前必有前廊（五腳基）的規定。

這些店屋通常有兩到三層，底樓是店鋪，樓上住人，每間店屋共享一堵磚牆。各個店屋都和木地板或屋頂橫樑還有屋脊等寬，大概六米，內部空間則呈線形排列，中間開出通風天井。最外層的磚牆和石膏牆有實木製的臥欞窗，環以壁柱的門，還有其他裝飾用的構造，如額枋和飾條。已故建築師李急麟指出，像馬六甲的早期店屋上所見的這些裝飾用途的構造一開始都是中式風格，但到十九世紀時就從「純中式」，轉而奢華地應用歐式風格中的經典細

32 Lee Kip Lin, "The Singapore House 1819-1942", pp. 148-149. The land where Scott's house stood was acquired to build Raffles Hotel by the Sarkies brothers.

33 Jon Lim 和麥琳都在各自的文章中討論了東南亞店屋設計靈感的可能來源，這來源形成的時候很大可能比歐洲人抵埗時還要早，而且也可能是從十五世紀起就累積下來的風格。Jon S.H. Lim, "The Shophouse Rafflesia", and Mai Lin Tjoa-Bonatz, "Ordering of Housing …"

34 Lee Kip Lin, *Emerald Hill*, p. 7 and T.H.H. Hancock, *Coleman's Singapore*, p. 21.

35 Mai Lin Tjoa-Bonatz, *Ordering of Housing* ..., p. 126.

36 同上，頁一二六至一二七。麥琳認為前廊的五英尺寬度規定，是由這個法令定下來的。

37 Jon S.H. Lim, *The Shophouse Rafflesia* ...., pp. 50-51.

節。[38]這個建築構思確保店屋這樣的建築形式得以在新馬兩地持續擴張，直到一九四〇年代為止，中間則歷經無數「風格」和用途的轉變。

「小坡」

一八二二年菲利普．傑克遜中尉制定的「新加坡城計畫」，為歐洲人聚落規劃了四條和新加坡河東北方平行的馬路，再以一條直路和一個廣場串連起四條馬路。這條直路應該就是密駝路（Middle Road，中間之意），因為這條路是蘇丹宅邸和市政區／新加坡河中間的分隔線。諸如教堂、學校在內的許多「歐洲」單位直到現在依然屹立在市政區外圍，證明當年這裡的確是歐洲人的聚落所在，只是過後的地圖才說明這是各方言群華人的定居地。

歐洲人之所以遷離這個地區並由華人取而代之，主要有兩個原因。一，被英方認為是「勤勞的民族」[39]而有利於英方經濟事業的華人移民急劇增加，從一八二四年的三千三百一十七人[40]快速倍增到一八八一年的八萬六千八百人；二十年後的一九〇一年，這個人口數字[41]又翻倍。除了最早定居新加坡河西南岸的福建、潮州和廣東人，其他華人方言群也開始在歐洲人聚落落腳。二，歐洲人當時紛紛移居到已經被華人甘蜜農夫開墾乾淨的內陸地區，[42]因此得以離他們的莊園近一些[43]，在綠茵中間建起氣派洋房，更得以遠離已經住滿市井商人和歐洲人的

「家僕」制而越來越雜民的市區景緻。

出於對河岸另一邊較早形成的華人聚落的尊敬，這後來才形成的新華人聚落一直被當地人稱為「小坡」，意為「較小的鎮」，以對應人口稠密且繁榮的「大坡」，意為「大鎮」。小坡的橋北路以北的各條平行馬路都是按數字順序一一命名，直到靠近蘇菲亞山的從趙街（Short Street）或「七馬路」為界。

38 Lee Kip Lin, "Emerald Hill …", pp. 7-8. 也有很大可能是因為歐洲或本地建築師開始參與店屋的設計工作，而他們的設計受到了建築式樣圖集書的限制。

39 J.R. Logan, "Notices of Singapore", Journal of the Indian Archipelago 1854, as cited in B.W. Hodder, "Racial Groupings in Singapore", p. 27.

40 Chan, Seng Kwee, "The Hainanese Commercial …", p. 48.

41 From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lan Associations in Singapore", p. 29.

42 甘密種植採用輪耕法，對土地傷害極大，因為需要砍伐森林以作為烹煮甘密葉的燃料。李急麟指出，截至一八四一年，島上共有大約五千英畝的甘密及胡椒種植地，主要由華人持有。

43 李急麟指出，最早在一八二二年，歐洲人就開始遷往"農村區"，分別是一八二二年占據了珍珠山（Pearl's Hill）的詹姆斯·帕爾（James Pearl），以及一八二七年占據了達士嶺（Duxton Hill）的查爾斯·萊恩（Charles Ryan）。出自：Lee, "Emerald Hill …", p. 1.

44 在現代學者及人民的觀念中，只有毗鄰新加坡河西南邊的那一區才是唐人街。在B·W·侯德（B.W. Hodder）在 *Racial Groupings in Singapore* 一書裡繪製的地圖上可以看見第一個唐人街的指涉區域，頁三十一圖五。

和大坡的聚落形式一樣，小坡的優勢和機遇也都和它在新加坡河東北岸的位置唇齒相依。這些華人少數方言群聚落的大小、與新加坡河之間的距離，表明了這些聚落的形成史：首先是海南人，接著是客家人，再來是福清人、福州人和興化人。[45]就這樣，小坡集齊馬來人（包括蘇丹的王室宗親和僕人、阿拉伯人和武吉斯人）、印度人、其他華人群（其他福建人、潮州人、廣東人）還有繼續定居此地的歐洲人，在新加坡河原始聚落的東北部形成了一個貨真價實的多元種族、多元信仰混居景觀。接下來的論文將探討在十九世紀下半葉形成的海南人聚落和日本人聚落。

海南人社群及聚落

在眾多定居新加坡河東北部地區的少數華人方言群中，只比第二多人口的客家族群稍微大一些的海南族群擁有最多的人口。他們應該就是第一個在這個地方落腳的方言群，因為他們所建的聚落正正相鄰教堂、軍營、萊佛士酒店等沒有隨歐洲人一起遷移的歐式遺跡。從河岸起，一路沿著美芝路往內陸西進到橋北路在內的範圍，都是海南聚落的地盤。[46]和這兩條路垂直相交的三條街：密駝路（海南人稱為海南一街）、巴米士街（海南二街）和余街（海南三街）都是當時眾所周知的海南人聚落。

根據記載，海南人的船艦曾經航行到新加坡以進行貿易，[47]最早的日期[illegible]一八二一年，而檳榔嶼則是在一八三九年有海南商船的蹤跡。第一個定居新加坡的海南人是林崇仁（Lim Chong Jin），他是在一八四一年入境新加坡的。[48]到一八八一年時，海南人口經已占全新加坡華人人口大約十分之一，共有八千三百一十九人。[49]由於抵埠得晚，也並不落戶於新加坡河邊主要碼頭區附近，因此多數的早期海南移民要不在園丘裡工作，要不就在商船上當水手，比較好的就是進入早期的服務業，[50]或是經營糧食貿易、船用雜貨供給及匯款服務、小型旅館

45 出自B．W．侯德（B.W. Hodder）在Racial Groupings in Singapore一書裡的地圖，頁三十五圖十，以及《新加坡華人宗鄉會館史》（"History of the Chinese Clan Associations in Singapore"），頁三十九。

46 一九五三年繪製的一張地圖顯示這個聚落曾經向西北方「拓展」到明古連街。B.W. Hodder, "Racial Groupings in Singapore", p. 35.

47 Chan, Seng Kwee, "The Hainanese Commercial …", p. 48. 貿易商品是蜜蠟、磚瓦、鞋子、雨傘、紙張、乾貨及中藥草。

48 同上，頁四十八。

49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lan Associations in Singapore", p. 29.

50 在B．W．侯德（B.W. Hodder）在Racial Groupings in Singapore一書中，他們「被觀察到從事侍應生、廚師、及家庭傭人的工作……」，頁三十四。Chan Seng Kwee, "The Hainanese Commercial …" 也提到這一點，頁四十八。

及茶室。而就是飲食[51]「行業」讓海南人聞名全坡。知名的「新加坡司令」琴通寧調酒是在一九一五年由原籍海南的華裔酒保嚴崇文（Ngiam Tong Boon）在萊佛士酒店研發的；海南人王義元（Wong Gong Chan，又稱王共產）調製出一道以白斬雞為佐料的飯食，在他的學徒莫履瑞開張「瑞記雞飯」[52]店後，這道雞飯從此聲名大噪，還以「海南雞飯」的名號「重新出口」回海南島和東亞；另外，海南人沖泡得一手稱霸東南亞的咖啡這件事也同樣街知巷聞。

海南人的第一個公會和宗祠[53]建物在一八五七年落成，位於馬拉巴街附近相連的三間店屋裡。和馬拉巴街平行的下一條街被指定為「海南街」（Hylam Street，Hylam 是 Hainan 的諧音）。儘管這條街在當時其實被稱為「日本街」，因為從日本過來的定居者都落腳在這一帶，而海南人都集中在密駝路的另一邊。一八七九年，海南會館和宗祠才搬到位於美芝路的現址，也就是海南人的聚落範圍裡。海南人一直自成一個聯繫非常緊密的社群，這可從海南會館和宗祠提供的服務及對新移民強制性的社交禮節和待遇，以及為整個社群提供的福利中得證。[54]除了美芝路上的主要海南會館和宗祠外，我也在海南聚落中的三條大街上發現了大大小小共二十一個姓氏公會，[55]以海南島上各縣或村，以及姓氏來區分。

海南社區占據了新加坡早期城市規劃中隨處可見的店屋街道，和馬路並肩的底樓用作做生意的店面，樓上則住人或用作其他用途。這個聚落以密駝路和新加坡河為界，設有突堤碼頭和其他公共設施，讓聚落內的居民得以在這塊區域裡安享榮景，直到一九八〇年代的市區

重建計畫讓這個聚落必須遷移他處為止。這時候，海南社群已經壯大，並和其他的華人社群一樣散居到全島各處的住宅區中。

日本人社群及聚落

二戰後，在新加坡定居的日本人口在新加坡人口構成數據中通常被歸類為「其他」，或是屬不被統計在主要組別中的外來類別，更不曾自成一類。一部分是因為日本人在二戰時的

51 這段資料出自"The Hainanese Commercial ...."所附錄的一九七六年份聯絡資料表，頁二〇九至頁二九六。我總結出這個聚落裡共有十九家咖啡店或餐廳及六間酒店。

52 這間餐館名氣太盛，以致新馬兩地各處都有雞飯檔口以「瑞記雞飯」為名。實際上原店是在密駝路五十一到五十三號的店屋。

53 這是在馬拉巴街六號店屋。和其他臨海地帶的華人一樣，這座廟宇主要供奉的神明是媽祖（或天后），保佑海航安全的女神。出自：Chan Seng Kwee, "The Hainanese Commercial ...", p. 9.

54 Chan Seng Kwee, "The Hainanese Commercial ...", p. 50.

55 這段資料出自「The Hainanese Commercial ...」所附錄的一九七六年份聯絡資料表，頁二〇九至頁二九六。這些規模較小的氏族公會是在一九二〇年中國民國政府解除海南婦女出洋的禁令後才開始成立。多數落址在佘街。

東南亞占領者角色，一部分也是因為多數不屬軍隊的日本人在戰後已經被遣返回日本。在新加坡成為一個新的東南亞國家之前，在小坡生活的日本人聚落，以及他們在戰前新加坡時期的貿易貢獻和生活面貌的紀錄都被掩蓋或移除，以改進新加坡在遭受「替代的」亞洲殖民者慘烈統治後的復甦進程。

在現代的新加坡出版物和通俗文學中，都還殘留一些戰前日本社群和他們曾經存在過這個空間，以及他們如何像其他較遲抵埠新加坡的華人社群一樣，在英國企業中貢獻新加坡社會和經濟的證明及跡象。新加坡建國總理李光耀針對兩組影響新加坡顯著的日本群體之間的差別以及早期移民之間的跨種族互動，做了這樣的描述：[56]

「同一天的晚些時候，一名日本士官和幾名兵士來到屋裡。他們把屋子前前後後檢查了一遍，發現只有我和長古兩人，就認定了這裡適合用作臨時軍營。這時候是噩夢的開始。我以前曾經在百勝路（又作勿拉士峇沙路）看過牙醫，他們的衛生水準及整齊程度真是到了一塵不染、一絲不苟的境界，密駝路上的十仙店（ten-cent store，類似日本百元店）裡頭的日裔服務員也是永遠那麼乾淨、整齊；但是，我卻對日本士兵身上惡臭的未洗軍服和體味猝不及防。」

儘管有記載顯示早在十七和十八世紀就有日本商船到馬六甲港口和其他東南亞貿易港口做生意，[57]但是根據新加坡日本社群的紀錄，第一個定居在新加坡的日本人是一八六二年入境的山本音吉（Otokichi Yamamoto），他於一八六七年在新加坡逝世。[58]一八六四年，宇田松田（Uta Matsuda）來到新加坡，和她的華人丈夫一起經營一家雜貨店，隨後她的阿姨安（Yasu）也來新加坡賣起香蕉。隨著一八七九年日本貿易領事館的成立、一八八四年日制人力車的引進及大型日本企業新加坡分部的開設，到十九世紀末時新加坡的日裔居民數量已經大幅增加。到了大正末期或二十世紀初期時，日裔移民已經遍布東南亞甚至南亞各地：新加坡和馬來亞有六千九百五十人，馬尼拉四千一百一十二人，曼谷兩百三十九人，巴達維亞兩千四百四十六人，泗水一千七百四十九人，仰光兩百八十二人，孟買四百五十六人。[59]

日本聚落規模發展之所以顯著，與日本妓院在新加坡河東部的開設緊密相關。一八六八年還沒有任何日本妓院的蹤跡，但世紀之交時，分布在海南街、馬拉巴街、馬來街和武吉斯

56 Lee Kuan Yew, "The Singapore Story…", pp.54-55.

57 Ishii, "The Junk Trade from Southeast Asia …"

58 Mikami, "Prewar Japanese Community in Singapore …", pp. 14-21.

59 數據及資料出自 Mikami, "Prewar Japanese Community in Singapore …"，頁二十六至二十七。

街的日本妓院開始取代先後由馬來人、華人和歐洲人在甘榜格南（Kampong Glam）經營的妓院。[60]不像牛車水的華人妓院只為華人服務，內部還分出不同的水準檔次，日本妓院來者是客，並不計較顧客的種族背景，只是也同樣劃出「高級和次級」的水準分級。[61]

這些從日本南來的妓女被稱為「karayuki-san」（中譯為「唐行小姐」）。她們的出現標誌了日本社群在東南亞生活的重要起點，也是這時期日本外匯的來源之一。娼妓生意在東南亞的興盛也連帶吸引了貿易商、商店老闆、醫生、錢莊老闆前來拓展商機以支撐日本的海外經濟發展，因為當時的日本雖然已經是個工業國，卻還不足以在西方占有一席之地。一九二〇年，娼妓行業被禁後，餘下的這些行業繼續在原本的妓院區擴張，並繼續維持這個聚落的存在，[62]更陸續有了自己的報紙（《南洋新報》，一九〇八年創刊）、墳場（一九一一年開闢）、學校（一九一二年創校）、俱樂部（一九一七年創立）。到一九二六年的時候，新加坡的日本聚落已經擴大到占據布連拾街（Prinsep Street）、梧槽路（Rochore Road）、橋北路和密駝路相連內的範圍，就在海南聚落的旁邊。

日本妓女把這個位於馬來街的妓院區稱為「suteresu」（大街之意），是英文「street」的諧音，這裡同時也是她們的住所和妓院的所在。馬來街是連接蘇菲亞山區到海邊的密駝路（日本人稱為Chuo Dori，意為中央通道）的下一條平行街道。而這時候，「suteresu」這個詞開始和當時的人們對這個地區的俗稱產生交集，並與另一個被認為是「日本人的」地方——位

於新加坡河河口和哥烈碼頭一帶，日本航運公司辦事處和代理機構林立的「gudangu」（英文godown的諧音）區別開。[63]和海南人一樣，日本人也自行使用一套取代英文官方街名的日文街名，但是和海南人不一樣的是，沒有一個日文街名[64]被英殖民政府正式沿用，來認可這個社群的存在。

不管是妓院還是商店，日本人都入住這個聚落所在街道的店屋裡，也把店屋的內部構造按自己的需求進行改造。而這些改動和空間用途的轉換，再一次展示了不同族群在店屋這個隨處可見的殖民建築中，對於空間便利性和變動性的巧思。詹姆斯．華倫（James Warren）一九九三年的著作《阿駒與唐行小姐：新加坡一八七〇年至一九四〇年間的娼妓行業》（*Ah Ku and Karayuki-san: Prostitution in Singapore 1870-1940*）記載了對suteresu的描述，早在一九一〇年就有一位不知名的日本記者這樣描述馬來街上的店屋：[65]

60 James Warren, "Ah Ku and Karayuki-san ...", pp. 44-46.

61 Ibid., pp. 50-51.

62 Mikami, "Prewar Japanese Community in Singapore ...", pp. 22-23.

63 ibid., pp. 28-29.

64 實際上，英殖民政府把海南街定址於被密駝路貫穿的日本聚落裡。因此，日本聚落生活在一個標記著各族共存證據的地區，除了有海南街之外，還有武吉士街、馬拉巴街、馬來街，或貫穿，或鄰近海南街地帶。

65 James Warren, "Ah Ku and Karayuki-san ...", pp. 41.

「九點左右，我去聲名狼藉的馬來街逛了逛。那裡的建築都是外牆漆成藍色的西式建築，陽台下掛著紅色的煤氣燈，燈上寫著諸如一、二、三的號碼，柳條椅一張張排列在燈下。上百個年輕的日本女郎坐在柳條椅上，向路過行人呼喚談笑……她們的身上都穿著色彩搶眼的浴衣。」

這些店屋的樓上被分隔出一個個房間或隔間，可是和唐人街上的華人妓院不同的是，每間日本妓院裡所容納的妓女人數較少，所以隔間比較寬敞，平均有六個榻榻米那麼大。[66]由此一來，店屋構造一貫的用途被顛倒了，樓上用來做生意，底樓則是宿舍、等候區或辦公室。每一層樓都有一個簡單的公共浴室，廚房則在店屋後方。華倫也記述了妓院會鑿開通往樓下或隔壁妓院的通道，以便讓妓女們可以在官員突然上門檢查時迅速逃走。

一九二〇年娼妓行業被禁後，妓院轉往地下經營，原本在日本聚落內用作妓院的店屋重新被用作商業用途，商店和辦公室進駐了和街道同一高度的底樓店面。這些店面都花了一些心思裝潢，當中表現最好的是一九〇八年在密駝路二十三號開張的越後屋（Echigoya）和服店。一開始它只是一間兩層樓的商店，一九一八年改建成兩間三層樓店屋，一九三七年再搬到門牌一三一號、有三個店面那麼大的店屋。從圖片可以看到，[67]越後屋的所有店面都採用簡潔利落的設計格局。沿牆的落地衣櫃用來收納及展示一捆捆的布疋和特殊的服裝產品，等腰

高的木框玻璃櫃整齊地擺放在中間，以挪出寬敞的走道和動線，中間安插了桌子和椅子，門口則擺個矮屏風稍作阻隔。這讓整個底樓的空間一覽無遺，只是簡樸的樓梯稍微打斷了這個無遮無掩的視野，讓視線通往樓上的店面。搬到更寬敞的店面後，越後屋的外觀格局和構造依然和密駝路上其他的店屋一樣，但內部用了柱子來取代隔牆，以營造暢通無阻的室內視野。這樣的空間應用和唐人街上的店屋截然不同，那裡每一間店屋約六米寬，主要用的是線形格局，由牆壁、屏風或天井隔開各個空間，再由界牆圍起來。

可惜的是，在一九七〇年代時，這整片聚落已經破舊，很多店屋已經被拆毀。而諷刺的是，一九八〇年代又有一家日本開發商買下這整塊地，重建起多數的店屋，卻在街道上的空間加蓋玻璃屋頂，打造了新加坡第一個有冷氣的拱廊街式「購物商場」。

過去和現在的多元種族社會

環球電影公司在一九四七年發行、由弗萊德．麥克莫瑞（Fred MacMurray）和艾娃．加

66 Ibid., p. 52. 華倫指出，日本妓院通常有五到七位性工作者，唐人街上的華人妓院則通常有十五到十八位。

67 Mikami, "Prewar Japanese Community in Singapore ...", pp.36-41 & 82-95.

德納（Ava Gardner）主演的電影《新加坡》（*Singapore*）在機緣巧合下體現了小坡的多元種族面貌。在這部電影中，艾娃．加德納飾演的角色去了梧槽河周邊地區找尋她以前的華人家僕。有一幕是她在一個周圍都是高腳屋的地方，與包括馬來人和華人在內[68]的當地居民交談時使用了完整的馬來語，暗示當時這個地區內的馬來人和華人社群住得很近。我們也有理由相信這是這部電影的製作人們在梧槽河觀察到的真實景象，進而把這景象完整地呈現在電影中，因為這部電影確實拼接了一些新加坡在一九四〇年代的真實錄影片段，而且他們也嘗試完整重現梧槽河地區的場景。還有另外一個酒店場景，相信也是以萊佛士酒店作為藍本搭建起來的。[69]

在這篇論文中，我嘗試描述了檳榔嶼和新加坡的早期華人方言群和姓氏聚落的形成，接著提到新加坡的日本人聚落，卻沒有論述到其他的種族。我這麼做不是為了要比較不同種族的論述地位，而是為了探究這些占移民群體多數的族群的建築景觀如何瓜分早期的殖民定居地。這些移民群體之間的互動和矛盾實際上一定更加複雜和自然，而他們所在的聚落也給這層關係提供了更多原因和背景。我之所以寫這篇文章，是希望這兩座城市的多元種族環境——不管是能操多語的唐行小姐，還是為伊斯蘭墳場雕刻墓碑的華人工匠——都能夠被看作是持續形塑檳榔嶼和新加坡的社會／文化景觀及歷史的力量和現象。

參考書目

Aiken, S. Robert. 1994. *Imperial Belvederes: The Hill Stations of Malaya*.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latas, Syed Hussein. 1977. *The Myth of the Lazy Native: A Study of the Image of the Malays, Filipinos and Javanese from the 16th to the 20th Century and Its Function in the Ideology of Colonial Capitalism*. London: Frank Cass and Company.

Anderson, Benedict. 1983.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Barlow, H.S. 1992.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Residency, Kuala Lumpur". In *Journal of the Malayan Branch,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65 Pt. 2, pp. 25-34. Kuala Lumpur: MBRAS..

Bastin, John, ed.. 1957. "The Journals of Thomas Otho Travers 1813-1820". In *Memoirs of the Raffles Museum*, No. 4, May 1957. Singapore: Raffles Museum.

---

68 這部電影的製作人試圖重現戰前和戰後新加坡的場景。在新加坡拍攝的真實鏡頭有：空中鳥瞰城市一景、萊佛士坊、唐人街的街道和種植園，這些鏡頭被被剪輯成四幕場景，以連接故事事件並暗示電影取景地的真實性。

69 電影中，弗萊德．麥克莫瑞飾演的角色點了一杯「gin sling」，那幕的布景和萊佛士酒店的內部裝潢十分相似。

Bassett, D.K.. 1965. "Anglo-Malay Relations, 1786-1795". In *Journal of the Malayan Branch,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38 Pt. 2, pp. 183-212. Kuala Lumpur: MBRAS.

Bastin, John and Gibson-Hill, C.A.. 1958. "Short Notes on Five Early Watercolour Sketches of Penang & Malacca". In *Journal of the Malayan Branch,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31 Pt. 1, pp. 163-171. Kuala Lumpur: MBRAS.

Bastin, John. 1959. "Historical Sketch of Penang in 1794". In *Journal of the Malayan Branch,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32 Pt. 1, pp. 1-32b. Kuala Lumpur: MBRAS.

Bilainkin, George. 1932. *Hail, Penang! : Being the Narrative of Comedies and Tragedies in a Tropical Outpost, Among Europeans, Chinese, Malays, and Indians*. London: Sampson Low, Marston & Co., Ltd.

Blythe, Wilfred, 1969. *The Impact of 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in Malaya: a Historical Stud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ogaars, George. 1956. "The Tanjong Pagar Dock Company, 1964-1870". In *Memoirs of the Raffles Museum*, No. 3, December 1956, pp. 116-274. Singapore: Raffles Museum.

Bonnet, R.. 1965. "Francis Light and Penang". In *Journal of the Malayan Branch,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38 Pt. 1, pp. 135-158. Kuala Lumpur: MBRAS.

Braddell, Roland. 1934. *The Lights of Singapore*. London: Metheun & Co. Ltd.

Brown, C.C., trans.. 1970. *Sějarah Mělayu or Malay Annals*.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ameron, John, F. R. G. S.. 1965. *Our Tropical Possessions in Malayan India*.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an, Seng Kwee. 1976. *The Hainanese Commercial & Industrial Directory, Republic of Singapore*. Vol. 2. Singapore: Hainanese Association of Singapore.

Chen, Voon Fee, ed. 1998. *The Encyclopedia of Malaysia, Volume 5: Architecture*. Singapore: Editions Didier Millet.

Chew, Ernest. 2002. "The Man Raffles Left Behind: William Farquhar (1774-1839)". In *Raffles Town Club Magazine*, Vol. 7 Apr-Jun 2002, pp. 4-9. Singapore: Raffles Town Club.

Chong, Lee Ngoh. 1973. "The History of Kongsis in Penang". In *Malaysia in History: Magazine of the Malaysian Historical Society*, Vol. 16 No. 1 June 1973, pp. 16-19. Kuala Lumpur: Malaysian Historical Society.

Choo, Chee Keong and Tan, Yeow Wooi, eds.. 2001. *Discovery: Leong San Tong Khoo Kongsi*. Penang: Leong San Tong Khoo Kongsi.

City Council of Georgetown. 1966. *Penang Past and Present 1786-1963: A Historical Account of the City of George-town since 1786*. Penang: City Council of Georgetown.

Collins, Dale. 1927. *Sal of Singapore: The Sentimentalists*. New York: Grosset & Dunlap.

Coope, A.E.. 1936. "The Kangchu System in Johore". In *Journal of the Malayan Branch,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14 Pt. 3, pp. 247-263. Kuala Lumpur: MBRAS.

Courtenay, P.P.. 1972. *A Geography of Trade and Development in Malaya*. London: G. Bell & Sons, Ltd.

Cowan, C.D.. 1961. *Nineteenth-century Malaya: The Origins of British Political Control*.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owgill, J.V.. 1924."Chinese Place Names in Johore". In *Journal of the Malayan Branch,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2, pp. 221-251. Kuala Lumpur: MBRAS.

Davies, Donald. 1956. *More Old Singapore*. Singapore: Donald Moore Publications.

Davies, Donald. 1956. *Old Penang*. Singapore: Donald Moore Publications.

Dunlop, Peter. 2000. *Street Names of Singapore*. Singapore: Who's Who Publishing.

Ee, Joyce. 1961. "Chinese Migration to Singapore, 1896-1941". In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Vol. 2 No. 1 March 1961, pp. 33-51. *Singapore: Department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Malaya in Singapore.

Garnier, Keppel. 1923. "Early Days in Penang". In *Journal of the Malayan Branch,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1, April 1923, pp. 5-12. Kuala Lumpur: MBRAS.

Gibson-Hill, C.A.. 1956."Singapore Old Strait & New Harbour 1300-1870" . In *Memoirs of the Raffles Museum*, No. 3, December 1956, pp. 10-115. Singapore: Raffles Museum.

Goh, Ban Lee. 1981. *Urban Landownership by Capital in Penang*. Unpublished dissertation for the Doctor of Philosophy in Urban Planning, UCLA.

Goh, Ban Lee. 1991. *Urban Planning in Malaysia: History, Assumptions and Issues*. Petaling Jaya: Tempo Publishing (M) Sdn. Bhd.

Gullick, J. M. 1956. *The Story of Early Kuala Lumpur*. Singapore: Donald Moore Publications.

Gullick, J. M. 1993, comp.. *They Came to Malaya: A Travellers' Antholog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all-Jones, John and Hooi, Christopher. 1979. *An Early Surveyor in Singapore: John Turnbull Thomson in Singapore 1841-1853*. Singapore: National Museum.

Hamzah Sendut. 1974. *Urbanization, Urban Form and Structure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State of Penang*. Text of paper delivered at the M.I.P. Seminar on Urbanisation and Urban Renewal on 25 October 1974 at Hotel Merlin, Penang. Penang: Malaysian Institute of Planners.

Hancock, T.H.H. and Gibson-Hill. 1954. *Architecture in Singapore: Notes on a Collection of Photographs by C.A. Gibson-Hill*. Singapore: Singapore Art Society and the Institute of Architects of Malaya.

Hancock, T.H.H.. 1986. *Coleman's Singapore*. Monograph no. 15 of the Malaysi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Kuala Lumpur: MBRAS.

Harper, T.N. 1999. *The End of Empire and the Making of Malay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odder, B.W.. 1953. "Racial Groupings in Singapore". In *The Malayan Journal of Tropical Geography*, Vol. 1 October 1953. Singapore: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University of Malaya in Singapore.

Hoops, A.L.. 1937. "The Oldest Straits Settlement: Glimpses of Penang a Century Ago". In *The Straits Times Journal 1937*, pp. 181-191. Singapore: Straits Times Press.

Hsü, Marco C.F. 1999. *A Brief History of Malayan Art. Originally* in Chinese (1963), translated by Lai Chee Kien. Singapore: Millennium Books.

Ishii, Yoneo. 1998. *The Junk Trade from Southeast Asia: Translations from the Tōsen Fusetsu-gaki, 1674-1723*.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Kathirithamby-Wells, J.. 1969. "Early Singapore and the Inception of a British Administrative Tradition in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819-1832)". In *Journal of the Malayan Branch,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42 Pt. 2, pp. 48-73. Kuala Lumpur: MBRAS.

Kathirithamby-Wells, J.. 1988. "The Johor-Malay World, 1511-1784: Changes in Political Ideology". In *Sejarah. Journal of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Malaya, No. 1 1988, pp. 35-61. Kuala Lumpur: Department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Malaya.

Khaw, K.H.. 1950. *Penang Information Guide*. Penang: K.H. Khaw and the Municipal Commissioners of George Town.

Khoo, Su Nin. 1993. *Streets of Georgetown, Penang: An Illustrated Guide to Penang's City Streets & Historic Attractions*. Penang: Janus Print and Resources.

Khor, Martin Kok Peng etal.. 1991. *Penang Hill: The Need to Save Our Natural Heritage*. Penang: Friends of Penang Hill.

Kohl, David. 1984. *Chinese Architecture in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and Western Malaya: Temples, Kongsis, and Houses*. Kuala Lumpur: Heinemann Asia.

Lee, Kip Lin. 1983. *Telok Ayer Market*. Singapore: Archives and Oral History Department.

Lee, Kip Lin. 1984. *Emerald Hill: The Story of a Street in Words and Pictures*. Singapore: National Museum.

Lee, Kip Lin. 1988. *The Singapore House 1819-1942*. Singapore: Times Editions.

Lee, Kuan Yew. 1998. *The Singapore Story: Memoirs of Lee Kuan Yew*. Singapore: Times Editions.

Leong, Kok Kee. 1981. "The Chia-ying Hakka in Penang 1786-1941". In *Malaysia in History, Journal of the Malaysian Historical Society*, No. 24, pp. 39-48. Kuala Lumpur: Malaysian Historical Society.

Lim, Jon S.H.. 1993. "The 'Shophouse Rafflesia': An Outline of its Malaysian Pedigree and its Subsequent Diffusion in Asia". In *Journal of the Malayan Branch,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66 Pt. 1, pp. 47-66. Kuala Lumpur: MBRAS.

MacKenzie, John M. ed.. 2001. *The Victorian Vision: Inventing New Britain*. London: V&A Publications.

Malcom, Howard. 1839. *Travels in South-Eastern Asia Embracing Hindustan, Malaya, Siam, and China: with Notices of Numerous Missionary Stations, and a Full Account of The Burman Empire*. Boston: Gould, Kendall, and Lincoln.

Marks, Tom. 1997. *The British Acquisition of Siamese Malaya (1896-1909)*. Bangkok: White Lotus Press.

Mikami, ed.. 1998. *Prewar Japanese Community in Singapore: Picture and Record*. Singapore: The Japanese Association, Singapore.

Mills, L.A., edited by C.M. Turnbull. Circa 1867. "British Malaya 1824-67". In *Journal of the Malayan Branch,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33 Pt. 3, pp. 36-85. Kuala Lumpur: MBRAS.

Mills, J.V.. 1937. "Malaya in the Wu-Pei-Chih Charts". In *Journal of the Malayan Branch,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15 Pt. 3, pp. 15-28. Kuala Lumpur: MBRAS.

Moore, Donald and Joanna. 1969. *The First 150 Years of Singapore*. Singapore: Donald Moore Press Ltd.

Nach, James, comp.. 1964. *Malaysia in Pictures*. London: Oak Tree Press, Ltd.

Netto, George. 1961. *Indians in Malaya: Historical Facts and Figures*. Singapore: Published by the author.

Ng, David. 1983. *Malaya: A Retrospect of the Country through Postcards*. Petaling Jaya: Star Publications (Malaysia) Berhad.

Ng, David. 1986. *Penang: The City and Suburbs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Penang: Georgetown Printers Sdn. Bhd.

Northcote Parkinson, C.. 1964. *British Intervention in Malaya 1867-1877*. Kuala Lumpur: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Orwell, George. 1934. *Burmese Days*. Orlando Florida: Harvest Books.

Peet, G.L.. 1956. "Back in the Twenties". In *The Straits Times* Annual 1956. Singapore: Straits Times Press.

Purcell, V.W.W.S.. 1928. *Early Penang*. Penang: The Pinang Gazette Press, Ltd.

Purcell, Victor. 1939. "The Big Five of Penang: Chinese Kongsis Past and Present". In *The Straits Times* Annual 1939. Singapore: Straits Times Press.

Purcell, Victor. 1946. *Malaya: Outline of a Colony*. London: Thomas Nelson and Sons Ltd.

Stevens, F.G.. 1929. "A Contribution to the Early History of Prince of Wales' Island". In *Journal of the Malayan Branch,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7 Pt. 3, pp. 377-414. Kuala Lumpur: MBRAS.

Stirling, W.G.. 1925. "The Red and White Flag Societies". In *Journal of the Malayan Branch,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3 Pt. 1, pp. 57-61. Kuala Lumpur: MBRAS.

Tan, Beng Luan, ed.. 1986.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lan Associations in Singapore*. Singapore: Singapore Federation of Chinese Clan Associations.

Tan, Yeow Wooi. 2001. Unpublished paper. *The Influence of the Chinese in the Development of Early Georgetown.*

Tarling, Nicholas. 1957. "British Policy in the Malayan Peninsula and Archipelago 1824-1871". In *Journal of the Malayan Branch,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30 Pt. 3. Kuala Lumpur: MBRAS.

Tay, Boon Hui. 1981. *Secret Societies in Singapore*. Singapore: New Culture Organisation.

Thorpe, M.J.. circa 1935. *Penang Information Guide*. Penang: Municipal Commissioners of George Town.

Tjoa-Bonatz, Mai Lin. 1998. "Ordering of Housing and the Urbanisation Process: Shophouses in Colonial Penang". In *Journal of the Malayan Branch,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71 Pt. 2, pp. 123-136. Kuala Lumpur: MBRAS.

Tregonning, K.G., ed.. 1962. *Papers on Malayan History: Papers submitted to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South-East Asian Historians. Singapore. January 1961*. Singapore: Department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Malaya in Singapore.

Vlieland, C.A.. 1937. "*The Eldorado of Southern Asia: Studying the Population Problems of Malaya*". *In The Straits Times* Annual 1937. Singapore: Straits Times Press.

Warren, James Francis. 1987. *At the Edge of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Essays*. Quezon City: New Day Publishers.

Warren, James Francis. 1986. *Rickshaw Coolie: A People's History of Singapore (1880-1940).*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arren, James Francis. 1993. *Ah Ku and Karayuki-san: Prostitution in Singapore 1840-1940.*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aterson, Roxana comp.. 1998. *The Architecture of South-East Asia through Travellers' Eyes.*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heatley, Paul. 1954. "Land Use in the Vicinity of Singapore in the Eighteen-Thirties". In *The Malayan Journal of Tropical Geography,* Vol. 2 April 1954. Singapore: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University of Malaya in Singapore.

Wild, Anthony. 1999.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e and Conquest from 1600.* London: HarperCollins Illustrated.

Wilkinson, R.J.. 1935. "Old Singapore". In *Journal of the Malayan Branch,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13 Pt. 2, pp. 17-21. Kuala Lumpur: MBRAS.

Winstedt, R.O.. 1935. "A History of Malaya" . In *Journal of the Malayan Branch,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13 Pt. 1. Kuala Lumpur: MBRAS.

Wise, Michael, comp.. 1996. *Travellers' Tales of Old Singapore.* Singapore: Times Books International.

Yen, Ching-hwang. 1995. *Community and Politics: The Chinese in Colonial Singapore and Malaysia.*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1	2
3	4

圖10-1：檳城喬治市海墘街姓氏橋。
圖10-2：檳城喬治市邱公司。
圖10-3：港腳地圖。
圖10-4：新加坡林厝港碼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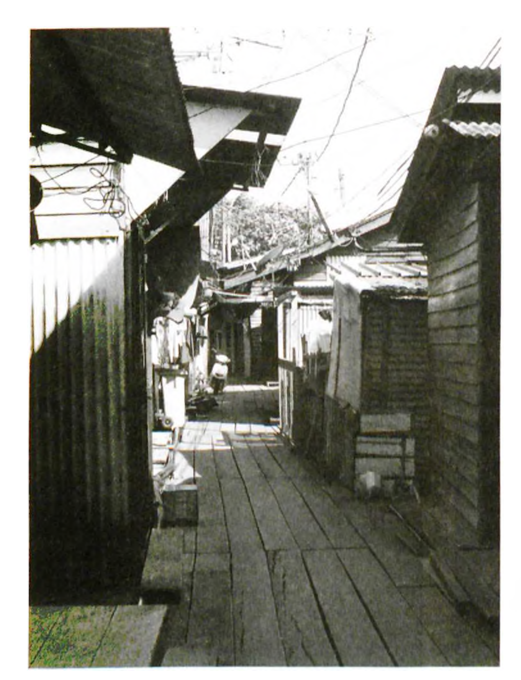


圖10-5：檳城喬治市姓氏橋走道。



圖10-6：新加坡林厝港農場。

鐵路祕境·回憶新加坡的鐵道與車站

二〇一〇年五月二十四日這天，新加坡總理與馬來西亞首相發表了一則聯合聲明，有關新加坡鐵路系統未來的轉變。新加坡終點站將於二〇一一年的七月份完全遷移至北邊的兀蘭站（Woodlands Railway Station）。原鐵路旁的土地在接下來的幾年間將由新加坡和馬來西亞雙方共同開發。二〇一一年五月份，丹戎巴葛火車站（Tanjong Pagar Railway Station）被列為國家遺產，而武吉知馬站（Bukit Timah Station）則被列為保留建築。這些是過去幾十年來談判所取得的成果。新馬兩國所達成的這項決定讓民眾開始聚焦於兩國背後的歷史交織，進而催生對鐵路系統的懷舊感。我們正好利用這個時機，回顧鐵路和車站的地理與歷史。

新加坡的鐵路歷史分為三個可辨別的階段，即一、新加坡—克蘭芝鐵路（Singapore—Kranji Railway）設立；二、柔佛和南部吉寶港鐵路的合併；和三、裕廊鐵路（Jurong

Railway）支線的建設。第一個階段發生在新加坡島上，但其餘兩個階段分別與馬來亞和馬來西亞歷史息息相關。要瞭解這段歷史，需要回顧新加坡的殖民史。新加坡城於一八一九年隨著英國人的到來而誕生。早期的開發只集中在兩條河流之間的東南沿岸地區。在半個世紀過後，前往梧槽河及武吉知馬路北邊的地區，仍由原始森林和次生林所占據。當時，這些地區因為是老虎或其他動物的棲息地，而被認為過於危險；一些地區中除了有胡椒和甘蜜種植園，還有幫派橫生。到了十九世紀中葉，前往新加坡島東部、北部和西北部的通車道路大部分是由印度囚犯勞工負責建設。這些道路被建設以通往各個村莊和種植園。

新加坡—克蘭芝鐵路

新加坡鐵路史的首個階段為殖民地政府所計畫和建設的新加坡—克蘭芝鐵路。在一九〇〇年四月十六日，當時任代總督的瑞天咸（Alexander Swettenham）為位於登路站（Tank Road Station）的鐵路建設舉行動土儀式。立法會於前一年批准了絲絲·金文泰·史密斯（Cecil Clementi Smith）在島上建設鐵路的計畫。雖然登路站成了「新加坡終點站」，但原有計畫將鐵路繞到福康寧山的另一邊，並開始烏節路（Orchard Road）尾靠近多美歌（Dhoby Ghaut）的火車服務。然而，這些計畫最終都被更改了。計畫的改變可能是因為鐵路建設所涉地區的

土地價格高昂所致。

鐵路建設在一九〇三年一月一日完成，而火車服務將新加坡站（登路站）與武吉知馬站連接起來。在同年的四月十日，鐵路服務被進一步擴展至兀蘭站。一般從新加坡站到兀蘭站需要耗時大約八十分鐘，而服務時間是每天早上七時至傍晚七時四十分。另外，也有來回兀蘭站和柔佛的蒸汽渡輪服務。從舊明信片中可以看到登路火車站呈一個T字型，由木材建造，並且在每一部分都有雙坡屋頂。在屋頂交集處建有一個鐘樓，高度堪比附近的店屋。其他的車站都屬於標準設計，其中包含三個傾斜的短雙層屋頂，以及相隔開、與線垂直對齊的直線木料部分。三者之間由另外兩個與線垂直對齊的雙坡屋頂連接起來。屋頂下面的空間供乘客等車和作為通道之用。

火車從新加坡終點站出發，穿越登路和歐思禮路（Oxley Road）之間的通道鐵路，然後上斜坡，在冷藏公司所在地（現為先得坊，Centrepoint）附近的架空橋上越過烏節路。接著通過另一條鐵道來到紐頓路（Newton Road），再於梁橋上越過武吉知馬水渠到達紐頓站。途經武吉知馬水渠一帶的車站有古魯尼路車站（Cluny Road Station）、荷蘭路車站（Holland Road Station）和武吉知馬車站，再轉一個大約一百二十度的彎道，則通往武吉班讓站和兀蘭站。在一九〇七年一月份，火車軌道被延長至巴西班讓（Pasir Panjang），沿途經過西貢島橋站（Pulau Saigon Station）（以及連接新加坡河岸市場）、丹戎巴葛站，以及亞歷山大路

（Alexandra Road）對面的巴西班讓站。在鐵路被拆除之後，取而代之的是從新橋路（New Bridge Road）通往顏開路（Yan Kit Road）的達士敦坪公園（Duxton Plain Park）（我們可以從該線性景觀回顧這段歷史）。

早期的鐵路遺產還包括陳旭年宅第資政第（目前為Amity Global Institute校址），位於檳城路（Penang Road）和克里門蘇大道（Clemenceau Avenue）交界。陳旭年在當時是一名非常成功的甘蜜和胡椒商人。這個宅第建於一八八五年，是該區所建的四所海外華僑四合院之一（也是僅存的一所）。他在豪宅建成後隨即就遷入內。但是，因為鐵道必須經過他的宅第後面，因此該土地被徵用。陳旭年在土地被徵用後便遷回中國，於一九〇二年在中國去世。後來，宅第先後成為登路站站長與一個主教的寓所，最後於一九三八年開始成為了救世軍（The Salvation Army）的總部。

在一九〇九年七月，昔加末（Segamat）通往柔佛的鐵路通車後，民眾可以使用公共交通來往新加坡與檳榔嶼。這是馬來亞歷史上的第一次。此交通聯繫被視為是透過提供基礎建設予沿著鐵道的種植園，將殖民地的經濟焦點從錫礦重新調整至橡膠。同時，這也給走向沒落的橡膠業帶來重振的希望。依據馬來半島的經濟地理，這也意味該地區對河流和港口城市的依賴開始減少，而鐵道以及道路系統旁的內陸種植鎮開始蓬勃發展。從馬來亞到新加坡的鐵路和鐵道，仍持續依賴淡米爾（Tamil）勞工來經營和維護。因此，鐵道每隔大約十六英里就

可以找到興都教神龕。十六英里是鐵道經營處之間的距離。

兩艘蒸汽渡輪（「柔佛」和「新加坡」）的設備，將海峽銜接起來，為新加坡島上的人民帶來了其他社會影響。新加坡民眾通常會湧上火車（特別是在週末的時候），以前往兀蘭站，接著到新山遠足和一日遊。但對大部分的人來說，這是到當地賭場轉換財運的好機會。一位「老前輩」追憶起他在一九二五年早期的到訪經歷：「如果賭客可以出示往返火車票，就可以向經營賭場的華人要求退還火車票價的兩塊錢。因此，我們都會保留著車票，一半白色和一半黃色的。」這項優惠吸引了許多人光顧賭場，而當時報紙上滿是失去傳家寶和男女賭客敗壞社會風氣的新聞。

柔佛與吉寶港的合併

在一九二三年九月十七日，連接新加坡和馬來半島的一點〇五六公里長堤正式開通予貨運列車使用。它擁有雙軌鐵路線和一條二十六英尺寬的車道。長堤在同年十月一日開始通行客運火車。這標誌著馬來聯邦鐵路局（Federated Malay States Railway）之下的馬來亞鐵路系統開啟最南端的直通車服務。隨著長堤的開啟，渡輪服務便被終止了。

在馬來亞半島部分，於一八九六成立的馬來聯邦（Federated Malay States）與在馬來亞

設立的馬來聯邦鐵路局，標誌著第二階段鐵路發展的開始。在之前的十年中，於馬來亞西海岸所建設，連接錫礦區與市鎮、負責載送錫的首兩條鐵路是：一八八五年建設的太平至砵威（Port Weld）路線和在一八八六年建設的吉隆坡至巴生鐵路線。在這之後，還增建幾條火車線路和系統，主要目的是為了促進殖民地經濟發展。在一八九六年，馬來聯邦鐵路局將先前所建設的所有四條鐵路線連接合併起來，並將火車服務擴展至貫穿霹靂、雪蘭莪、森美蘭和威省（Province Wellesley）。鐵路局接著將鐵路網建設擴張至馬來屬邦（Unfederated Malay States）地區，如玻璃市、吉打、吉蘭丹和柔佛，並最終將鐵路網與北部的泰國鐵路系統連接。馬來聯邦鐵路局在一九一三年購買了新加坡—克蘭芝鐵路，並在一九一八年將新加坡—克蘭芝鐵路屬下的資產和設施以四百一十二萬六千賣給了馬來聯邦政府。

從一九〇三年十月開始，季節性豪雨導致武吉知馬路的偶發淹水給新加坡—克蘭芝鐵路帶來不便。從當時的報章報導中，我們可以更深入地認識到這類淹水的嚴重性和影響。報導列出了因淹水而被迫關閉的火車站和道路。《海峽時報》（*The Straits Times*）在一九一〇年二月七日的報導中說道：「昨天早晨，水位逼近了（武吉知馬站的）月台，並且周圍的道路都被淹沒到腰之上……火車非常小心翼翼地駛過紐頓站。水一度幾乎要淹至車廂的地板上。火車繼續以相同的步調行駛直到逼近古魯尼站，一路的軌道都被水淹沒。」

這些有關豪雨和季度性水災影響鐵路系統的報導一直持續至一九一〇、二〇年代。

一九二六年一月初發生了一場特別嚴重的水患，導致兀蘭及武吉班讓、武吉知馬及紐頓之間的鐵軌被積水沖垮。這迫使搭客前往柔佛以趕上下一班的列車服務。這次淹水使得人們再度將原因歸咎於紐頓的鐵路梁橋阻擋武吉知馬水渠。這促使當局採取立法行動，將武吉知馬間的鐵路繞至計畫於丹戎巴葛興建的新終點站。當局隨後提出了九英里的轉向計畫，主要是為了減少多水患的武吉知馬路的交通流量。此外，當局在阿爾柏王園（King Albert Park）的高地興建新的武吉知馬站，並在舊的武吉班讓和兀蘭站前的武吉知馬水渠和道路之上興建一座一百五十英尺的鐵路橋。

轉向計畫也興建了兩座新靠站：火車從武吉知馬出發，途經東陵福站（Tanglin Halt）和亞歷山大福站（Alexandra Halt），然後經過甘榜峇魯（Kampong Bahru）地區，最終到達新終點站丹戎巴葛火車站。新的武吉知馬站是一座線性磚砌建築，車站內的候車區位於器材室和站長辦公室之間。車站還建有可以負責運載馬匹的火車設施，馬匹將被運往附近的（當時的）新馬場。車站旁的武吉知馬鐵路，讓人聯想起早期的鐵路歷史中，為了讓鐵路避開武吉知馬水渠所作出的巨大努力。在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七年間，登路至武吉知馬間的鐵路被拆除以興建新的路線時，有一部分原來的鐵軌變成了車道，其中包括克里門蘇大道（連接登路和紐頓圈的前鐵軌用地）。杜尼安路（Dunearn Road）的所在位置先前則為連接紐頓圈和金文泰路（Clementi Road）交界處的鐵軌用地。

轉向計畫在吉寶港的重要性日益增長時，計畫將最南端的終點站設在新加坡丹戎巴葛。在某些方面上，這類似於一九〇七年早期連接港口的鐵軌，以及丹戎巴葛船塢公司在一八六〇年代中期所提出（但未落實）以鐵軌連接慈民海灘（Pantai Chermin）和老巴剎（Telok Ayer Market）的計畫。當局購買了大約上千畝的土地作為轉向計畫和興建鐵路終點站之用。鐵路終點站則含括了丹戎巴葛的客運站、貨倉、列車停靠站、信號站和員工宿舍。鐵路局與市政當局以及其他機構合作列出了車站設計的細節要求，而最終在一九一六年末將合同頒給了雙麥嘉仁建築事務所（Swan & Maclaren Architects）。隔年，建築師負責夥伴——阿特金貝利（H. C. Atkin-Berry）先生到英國考察幾座火車站。火車站的興建在一九二九年五月七日動工。到了一九三一年八月，已經有超過六百三十樁混凝土樁被運抵工地。絕大部分的建築工作在一九三二年已經完成，而新加坡貿易展覽會（Singapore Trade Exhibition）於同年一月份在當地進行。

火車站首席建築師伯特必次（D. S. Petrovich）出生於塞爾維亞（Serbia，當時的南斯拉夫〔Yugoslavia〕）。他在一九一六年註冊成為英國皇家建築師協會（Royal Institute of British Architects）會員後，在一九二八年加盟雙麥嘉仁建築事務所。他在任職期間設計了許多著名的建築，包括烏節路的馬來亞汽車大廈（Malayan Motor Building）、萊佛士坊（Raffles Place）的必發大廈（Kelly & Walsh Building）和其他位於新加坡與馬來亞的建築物。車站本

身在當時就是一個工程壯舉，它充分地利用了鋼筋混凝土的有利條件，以建造一個七十二英尺高的巨型圓筒形拱頂。該結構在白天可以透氣透光，並且遮蓋中央抵達／候車大廳。在這個方形結構的三面分別是：入口柱廊、面向岌巴路（Keppel Road）的雙層高直線型辦公大樓，以及九百五十英尺長的覆蓋平台。車站的建築風格可以說是使用了裝飾藝術（Art Deco）的信條，也就是將優雅的幾何形狀或模塊作為設計的原則。

車站中央大廳的周圍是等候室、擁有電報設施的郵政局、餐廳、酒吧、髮廊、洗手間和行李存放服務。入口處附近的票務櫃檯和它對面的書報攤是使用堅實的柚木所建成的。一樓的地板原本是鋪上橡膠地磚。另外，拱形空間的天花板上，懸掛著兩個設計相似的箱燈，燈箱之下則是一個由四根電纜懸掛著的四面銅鐘。上兩層是一家擁有三十四間房的火車站酒店，內有單人及雙人間，走廊則面向大廳。該酒店也是馬來聯邦鐵路局所經營的三家酒店之一，另外兩家則位於吉隆坡（一九一〇）和怡保（一九一五）。這些設施為想暫時歇息，然後繼續旅程的乘客提供了便利。車站也提供轉乘停泊在吉寶港的客運或小船之服務。

車站的鋼筋混凝土的外層由砂封石膏（也稱為上海石膏或洗石子）所覆蓋。面向停車場的入口柱廊由四個柱台框著的三個弧形結構所組成，剩下的兩面則各有一個弧形結構。在四個脊飾之下寫著「F」、「M」、「S」和「R」的字母。在柱台的頂端有四個白色卡拉拉大理石（Carrara marble）寓言雕像。這是由安吉洛．瓦內蒂（Angelo Vanetti）在勞爾．畢卡

西（Raoul Bigazzi）位於佛羅倫薩（Florence）的工作室所雕塑的。每一個雕像代表著馬來亞殖民地時期的經濟支柱：農業、商業、運輸和工業。這種主題（theme）也在大堂內被繼續沿用和凸顯。大堂內對立的垂直牆壁上也有六幅三聯壁畫來代表割膠、水稻種植、錫礦、乾椰肉種植、航運活動和運輸。最後兩幅壁畫也強調了車站與丹戎巴葛港口的聯繫。車站和軌道的「轉向」在一九三二年五月二日由絲絲．金文泰總督（Cecil Clementi）揭幕。總督在大堂發表演說之前，便先在新軌道乘搭特別列車前往車站。

裕廊支線

第三階段的鐵路史始於馬來亞、新加坡、砂拉越和北婆羅洲（之後的沙巴）在一九六三年合併為一個初期戰後經濟體以及當時的馬來西亞地緣機體（Geo-Body）。幾個建設中的工業區展現出經濟互相聯繫的徵兆，包括靠近吉隆坡的八打靈再也（Petaling Jaya）和新加坡的裕廊。裕廊的規劃始於一九五〇、六〇年代，前後由日本和聯合國的考察團協助。這個計畫由隨後設立的經濟發展局接手持續下去。裕廊工業區的設計包括三個規劃區：沿海填土地區作為重工業之用，其中包括船塢和港口設施；沿海地帶後方為中型工業用地；再往北部則為輕型工業用地。

已故前財政部長吳慶瑞博士的願景是將裕廊建設成新加坡首要的工業區。這是基於下列幾個考量：其地點靠海，方便運輸原材料，並且該區大部分是鄉村及國有土地。位於裕廊附近山區的各個果園和農田遷移之後，可用於填沼澤地及填土造地。裕廊工業區的概念在當時是一個新穎的想法，因為其目標是建立一個「花園工業鎮」（Garden Industrial Estate）。這個概念在理論和運作上有別於先前提出的「花園城市」概念，涉及了工作和居住兩個部分。裕廊河岸的沼澤地帶被劃歸為自然保護區，如班丹自然保護區（Pandan Nature Reserve）。其中大部分的土地被發展成休閒公園或景點，如裕廊飛禽公園、裕華園（Chinese Garden）和星和園（Japanese Garden）。住宅區也以花園的形式設計和命名：達曼裕廊區（Taman Jurong）、德曼花園（Teban Gardens）和班丹花園（Pandan Gardens）等。

除了從裕廊通往市區運輸公路，計畫中的裕廊火車支線也將其與武吉知馬站連接。鐵路也可以連接馬來西亞半島，並往北部直通泰國南部（以滿足該區的需求和供應市場）。馬來亞鐵道局（Malayan Railway Berhad Company 或 Keretapi Tanah Melayu）獲頒五百五十萬元的項目，負責建造和維護二十四公里的鐵路。鐵路在一九六六年三月四日開通，而一部分的鐵路被保留至一九九〇年代。由於新加坡在併入馬來西亞的兩年後（一九六五年）退出馬來西亞，這條路線原來預計的客流量並沒有達到預期。因此，裕廊和當時留下來的鐵路用地被歸入為「馬來西亞」的土地，直到二〇一〇年二月為止。



圖 11-1：新加坡地圖上早期的鐵路線（虛線）和一九三二年的鐵路線。

隨著政府在二〇一〇年所作出的公告，位於新加坡的火車軌道和車站進入了自二戰以來的一個全新時期。一九四八年的馬來亞鐵路條例（Malayan Railway Ordinance）在實施以來，見證了馬來聯邦鐵路局（Federated Malay States Railway，簡稱 FMSR）將鐵路管理先後轉交予戰後的馬來亞鐵道公司與馬來亞鐵道局。在一九九一年馬來西亞鐵路法案的規定之下，馬來亞鐵道局在隔年（一九九二）被企業化，並成為馬來西亞政府的國營企業。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兩國代表於一九九〇年簽署《馬來亞鐵道公司在新加坡土地發展協議要點》，以解決所有鐵路和火車站相關的議題，但是有關雙方的要點得待二十年後才能作出最終的決議。



圖11-2：登路站是新加坡-克蘭芝鐵路的終點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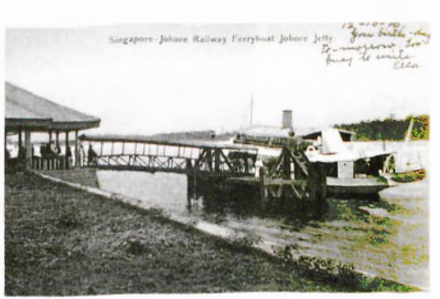


圖11-3：在新柔長堤建成前，連接兀蘭及柔佛的交通工具是渡輪。



圖11-4：二〇一一年一月二十二日，賴啟健與新加坡傳統文化學會的成員在武吉知馬火車站合影。



圖11-5：丹戎巴葛火車站。





圖11-6：（左）一九八八年的火車票和（右）二〇一一年六月三十日從馬來西亞到新加坡最後一班火車的火車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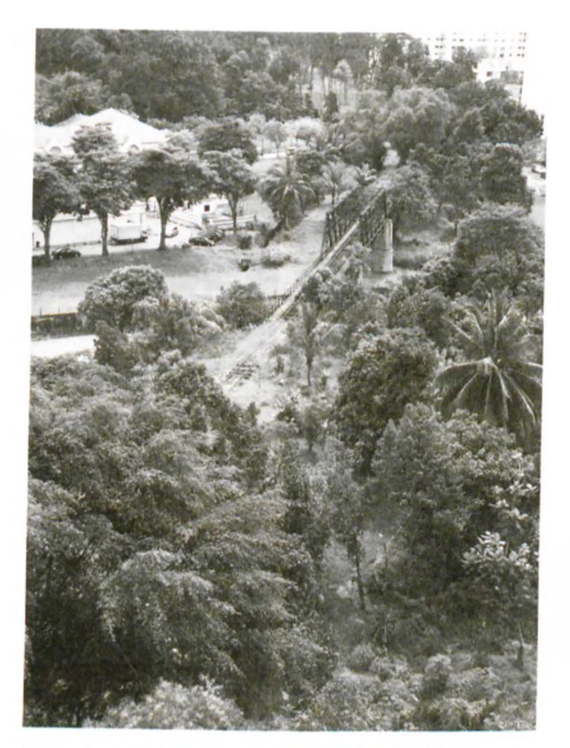


圖11-7：裕廊鐵路橫跨烏魯班丹河的鐵橋。



圖11-8：丹戎巴葛火車站月台的標誌。

新加坡私人住宅回顧

一九三九年七月十日，《馬來亞論壇報》（*The Malaya Tribune*）為擬建的阿爾柏王園莊園（King Albert Park Estate）宣布了一種新加坡地產開發的新方法。隨著郊區和農村地區逐漸被改建成住宅區，坐落於城市邊緣的小山丘上、主要道路銜接著柔佛州與新加坡市區、房地產的劃分方法及其地塊的銷售方式，這些都奠定了新加坡有地住宅物業未來更大規模的地塊開發的趨勢。

在當時，「現代化」的房子一般有著幾點關鍵特徵，如：銜接著房產全部三十一塊地皮的瀝青馬路、排水設備、化糞池和水電源供應。而這些都被囊括在由阿爾柏王園的發展商——比利時義品公司（Crédit Foncier d'Extrême-Orient/CFEO）所售賣的房產地塊（Plots）中。此外，他們同時提供以現金支付、貸款支付和抵押貸款等服務。如果屋主不想使用發展商已

僱用的建築師所提供的方案，他們也可以自行聘用其他建築師。至此，任何想購買土地的一方都仍需要與殖民政府或私人土地持有者協商並且另外需要支付如上述所提到的額外費用。

在比利時合併並同時擁有多家來自比利時與法國的銀行的支持的比利時義品公司（CFEO）在中國多個城市同時投資了許多土地與房產業，這其中就包括了設計和建造它們的業務。該公司在天津、上海、漢口、北京、濟南和香港都有分部。其於一九二七年在新加坡註冊為一家同時為住房、貸款銀行、房地產和住房代理的多向性公司。一九三四年，比利時義品公司建設了包括在荷蘭山莊（Holland Hill）、洛陽（Loyang）、加立克道（Garlick Avenue）、阿爾柏王園、愛士女皇園（Queen Astrid Park）、甘登園（Camden Park）、禮敦園（Leedon Park）、伊麗莎白女皇地產（Princess Elizabeth Estate）、明才園（Binjai Park）、富蘭克園（Frankel Estate）、奧匹拉園（Opera Estate）、南利園（Namly Park）等的房產項目。該公司在中國大陸的資產於一九五五年被國有化之後，便只在香港和新加坡運營，最終於一九五九年清盤。該公司曾是本地私人住宅開發商中非常重要的一員，就如武吉三巴旺——Bukit Sembawang（1968）——在那之後建造的實里達山（*Seletar Hills Estate*）的兩千五百所房子和三巴旺山住宅區（*Sembawang Hills Estate*）所建造的一千所房子一般。

除了新加坡的私人房屋發展商外，另外兩個殖民時期的房屋機構也參與了住宅區的開發和建設，即建築協會（building societies）和合作式房屋社（co-operative housing societies）。

其中較大的兩個建築協會早在一九五〇年就成立，並在當時被稱為聯邦與殖民地房屋協會的馬來亞與婆羅洲建築協會（一九五六年）。殖民政府當時為了解決低收入族群的住房問題而將聯邦與殖民地建築協會設立的計畫囊括在其財政計畫中。該計畫分別在詩內特園（Sennett Estate）和實龍崗花園（Serangoon Gardens）建造了一千兩百和九百所房子。同時，該機構也提供抵押貸款服務。截至一九六五年，它們一共累計了來自一萬六千零五十六個賬戶的兩千七百二十萬新元貸款額。隨著新馬分家，該協會於一九六九年被拆分成 Singapura Building Society Ltd. 和 Malaysia Building Society Berhad。新加坡的公司如今已更名為新加坡金融公司（Singapura Finance）。

成立於一九四八年的新加坡公務員房屋合作社有限公司（Singapore Government Officers Co-Operative Housing Society Limited/SGOCHS）開發了另外一種私人房屋的形式——合作式房屋。新加坡的合作社運動始於一九二五年，它們通過建立社團來幫助為殖民服務的貧困群體，其主要方式包括了節約開銷和提供貸款。在新加坡獨立後，它依舊得到了良好的延續，更在一九六〇年代達到了巔峰——擁有超過一百個已註冊的社團。巔峰時期的新加坡公務員房屋合作協會有限公司（SGOCHS）擁有著五千名會員，其會員能以七千五百至一萬六千七百新元的價格購買包括該協會建設的永久產權型地產在內的房屋。它們的第一個排屋項目是位於數布拉山路（Pulasan Road）的六間房子，其次是位於劍橋路（Cambridge Road）的二十一間

房子。它們的第一個房產項目則是巴耶利峇公園（Paya Lebar Gardens），隨後建造了湯申路莊園（Thomson Road Estate）和美花園（Mayflower Gardens）。很遺憾的，它們的最後一個計畫——樟宜合作花園（Changi Co-op Gardens）——最終未能完成，這甚至導致了SGOCHS於一九七九年關閉。巴耶利峇的主要道路——羅奇代爾路（Rochdale Road）——是以於一八四四年成立的第一個合作社——羅奇代爾公平先鋒協會（Rochdale Society of Equitable Pioneers）——的名字命名的。

新加坡教師聯盟（Singapore Teachers' Union）於一九六八年在湯申路上段（Upper Thomson）所開發的教師園（Teachers' Estate）則算是合作式房屋的一個特例。儘管該莊園距離城鎮有些偏遠，但許多教師依舊得以在此計畫中獲利。工會的領導人們在低於主要道路且地形不平坦的地區購買了一塊土地，並著手僱用自己的承包商和建築師。之後，那些房子根據其類型和地理位置以兩萬四千至兩萬六千新元的價格售賣給會員們。該工會的大樓也被設立在該莊園內，其中該莊園的許多道路都以如泰戈爾、李白、杜甫、奧馬爾．海亞姆、迦梨陀娑、伊克巴爾和文西．阿都拉等文學大家的名字命名。除了餐廳外，該處也設有洗衣店、麵包店，以及提供食物供給、雞蛋批發等服務的店鋪。當然，該莊園同時也設有讓人活動的公園。

不難看出，私營和民營的發展商都為新加坡永久產權的有地住宅的建設做出了貢獻。雖

然現在看來，這些早期的房屋地塊中有不少都被歸類為高級獨立式洋房，但總體來說這些建設還是造就了二戰後的新興中產階層擁有現代化房屋的事實。如此看來，我們必須得承認合作式房屋和房屋協會在住宅供給問題上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戰後，出於政治的不穩定因素，房產交易也出現了許多不確定性。四處充斥著「茶錢醜聞」，建築和其材料成本波動不定；於是，準政府便向其成員和購買者保證，獲得房屋所有權的途徑將被常規和結構化。

儘管新加坡改良信託局（Singapore Improvement Trust）和建屋發展局（Housing Development Board）提供了許多可居住房屋，私人房屋還是在緩解房屋需求上扮演了重要角色。而要想建造這些莊園，土地就需要被清理和重塑，好讓建設工作得以進行。由此，新加坡開闢了其在郊區的「內陸地區」。原是凹凸不平且占地四百一十三英畝的椰子種植園在一九四六年被CFEO開發成現如今的弗蘭克爾庄園（Frankel Estate）。為了讓莊園更加宜居，一些如現代化的衛生設施、符合標準的馬路、排水系統和電力供應等服務也一一相應的被建造。這些發展也有助於處理那些在房屋建設前就早已非法定居於此的居民和其造成的問題。因此，一九五一年時，CFEO不得不為非法占屋的居民於弗蘭克爾庄園建造一百六十所房屋，好讓該建設工程得以早日完成。SGOCHS則因無法驅逐那些非法占屋的居民而導致最終無法完成樟宜合作花園的項目。由於SGOCHS不像CFEO般，擁有流動性強的資源和作為半公有機構的優勢，與占屋者的糾紛最終使其被迫清盤。

同時，這些住宅區也提供如學校、鄰里俱樂部、包括教堂在內的宗教場所和郵局等設施。許多日常需求所需的設施和服務如雜貨店、超級市場、電影院、理髮院和麵包店等也被囊括在住宅區的建設計畫內。那些綠色空間和公園為我們的後代提供了許多景點，其中或許也包括最近剛被拆除的倫多河（Lentor Stream）。合作式房屋的居民一般都來自特定的社會階層，如公務員；或是居住在教師園的教師們。如此的因素造就了其他鄰里住宅區難以找到的和諧融洽與友好的氛圍。基於該住宅區較為偏遠的事實，他們早期也為附近村莊和甘榜的居民提供如嬰兒看護、園藝服務的兼職工作，或為流動銷售和小販。

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我們或許可以視這些在新加坡範圍內的住宅區為一種保持低層區域以抗衡公共組屋和私人公寓等作為高樓大廈不可抵擋的絕對趨勢的存在，也許這是下一代的規模遺產。

參考書目

Chua, Yong Hwee. *Co-operative Housing for Singapore.* Unpublished dissertation submitted to the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2013.

Daniel, R.O. *Co-operative Societies in Singapore 1925-1985.* Singapore: The Singapore National Co-operative Federation Limited, 1987.

Rajasakran, Thanaseelan. *Building Society: the MBSB Story.* Kuala Lumpur: Editions Didier Millet, 20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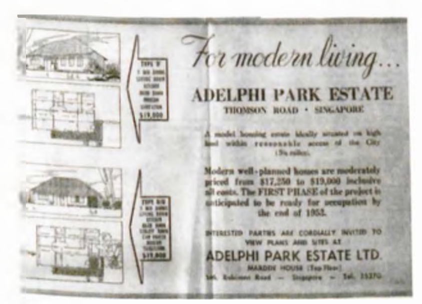
Singh, Penu Mohan. "Promotion of Private Homeownership for the Lower Income Group". *In the papers for the Afro-Asian Housing Congress.* Cairo: Afro-Asian Housing Organization, 19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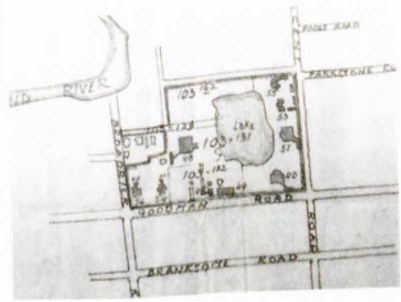
Tan, Kevin Yew Lee. *The Singapore Co-Operative Story 1925-2015.* Singapore: Singapore National Co-operatives Federation, 2015.

Yzelman, Leon. *Changing Face of Serangoon Gardens: A Study of the Evolving Character of Serangoon Gardens.* Unpublished dissertation submitted to the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2013.













1	2
3	4
5	6

圖12-1：阿爾柏王園（King Albert Park）開發廣告。
圖12-2：開發中的阿爾柏王園鳥瞰圖。
圖12-3：阿德菲公園莊園（Adelphi Park Estate）廣告。
圖12-4：位於月眠路（Goodman Road）的中正中學房地產銷售計畫。
圖12-5：富蘭克園（Frankel Estate）椰子種植園的非法住宅。
圖12-6：為了開發奧匹拉園（Opera Estate）而進行的清野行動。

新加坡的合作社房屋

從一九四八年到一九七〇年代中期，「合作社房屋」專為新加坡人提供家園。房屋合作社的成立可追溯至新加坡的兩個歷史發展，即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住房情況和新加坡合作社運動。

戰後的住房情況

一九四八年，新加坡房屋委員會報告稱，九十三萬八千的人口只有三萬八千五百間住宅。市政府首席建築監督員達德利·愛德華·西登斯（Dudley Edward Siddons）先生指出，糟糕的住房情況是由於戰爭期間數千棟建築物被毀，其他建築物無人照管和維修。高昂的建築材

料與勞動力短缺，加劇了住房情況。他例舉兩種房屋形式——店屋和板屋或亞答屋，空間擁擠且容易引發疾病，也沒有適當的光線、通風和衛生設施。[1]

與此同時，私人房產領域滿足了那些有能力的購屋者。在組屋和傳統住宅的建設上，新加坡改良信託局所做的並不足以解決嚴重的短缺問題，對工作者和下層社會群體而言更是如此。為遏制房屋租賃的高昂費用，殖民政府於一九四七年重新實施了《租金管制條例》，類似的條例早在一九一七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就已頒布。[2]在一九四七年的條例下，所有建於一九四七年九月七日之前或當天的房屋均受租金管制，將其限制在一九三九年八月一日的市價。

租金管制造就了兩級化的房地產市場——租金管制地區的低租金住宅和商業樓宇，非管制地區的則依市場租金和售價而定。租戶受到保護，他們只有在特別情況下才能被驅逐。[3]低租金促使房東不願維護或修理房產，導致其隨著時間惡化。這促使茶錢勾當在房地產市場上氾濫。

茶錢是租戶支付的溢價，作為授予、更新、轉讓或續租的條件，[4]索要的金額預估範圍從五百新幣到三千新幣。[5]在租金管制條例上，它雖被明確禁止，但仍盛行於房地產交易中，而且沒有被上報。對於想遷入或正居住在受控房產的租戶，這類行徑更是司空見慣。[6]租房者寧願支付茶錢以享受更低的租金，也不願在公開市場上搜索。[7]

市政府首席建築監督員西登斯最早公開呼籲成立建築協會，以緩解住房問題。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十八日，他發表了題為「為人民建房」的演講，討論了戰後的建設條件和挑戰，並

---

1 "S' pore Hovels a Menace to Health of Inhabitants – Formation of Housing Societies Suggested". In *Malayan Tribune*, 31 Dec 1947, p. 5. 這當中的許多建築容易著火。

2 Tommy T.B. Koh, "Rent Control in Singapore". In *Malaya Law Review*, Vol. 8, No. 1 (June 1966), pp. 32-45. 一九一七年的《租金增加(戰爭限制)條例》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作為緊急措施制定的。這在一九二〇年連同兩個較早的修正案一併被廢除。

3 租戶只有在未能支付凍結租金，允許房屋作非法或不道德活動，或按其所付租金的百分之一百一十轉租時，才能被驅逐。"The Ddays When Tenants Needed Protection from Their Landlords". In *The Straits Times*, 7 Oct 1988, p. 22.

4 Tommy T.B. Koh, ibid. 這有時被稱為「押金」或「補償金」。

5 *The Singapore Government Officers' Co-operative Housing Society Limited First Anniversary Souvenir*, p. 5.

6 "Rent Collector Tells Jury What is Tea Money". In *The Singapore Free Press and Mercantile Advertiser*, 26 May 1921, p. 12.

7 例如，房屋建造成本為四千至五千新幣，租金將介於八十至一百新幣，外加最高一千五百新幣的茶錢。"Stop This Tea Money Racket!". In *Sunday Tribune*, 1 Aug 1948, p. 6.

提議成立住房協會以改進情況。[8] 西登斯引用了英國住房協會的成就，他們成功創建了如韋林（Welwyn）、萊奇沃思（Letchworth）和伯恩維爾（Bournville）的田園城市，促使一九三六年的《住房法案》認可住房協會。該住房供應管道「讓工薪階層有機會積極地自主，而不是等待當局為他們提供住宅」。[9]

三年後的一九五〇年，倫敦的殖民發展企業在新加坡成立了聯邦與殖民建築協會。十八世紀的歐洲建築協會建造房屋，但到了下個世紀，建築協會主要充當金融機構。新加坡銀行直到一九六〇年代中期才提供定期住房貸款，因此協會彌補了市場上的一個重要缺口。[10] 聯邦與殖民建築協會主要提供房屋貸款，同時也與兩個大型住宅區的開發商和承包商合作，即阿爾科夫花園（後更名為信立民房）和實龍崗花園住宅區。一九五三年，阿爾科夫花園為一千個家庭提供了家園，實龍崗花園則建造了七百套住宅。[11] 該協會於一九五六年更名為馬來亞與婆羅洲建築協會；一九六九年新加坡脫離馬來西亞後，更名為新加坡建築協會。[12]

新加坡的合作社運動

合作社（co-op）由自願參與者組成，為達成基於互助及共享利益和／或利潤的特定需求而成立。十八世紀許多國家都存在合作形式，一八四四年的羅虛戴爾公平先驅社（Rochdale

Society of Equitable Pioneers）被視為當今的合作典範。新加坡的合作社運動始於一九二四年《海峽殖民地合作社條例》的頒布，該條例一九二五年開始生效。多年來不斷修訂，其最新形式是二〇〇九年修訂的一九七九年《合作社法》。

與《租金管制法》一樣，新加坡合作社的歷史也可追溯至第一次世界大戰，因為合作社的引入是為了緩解商品的高成本與過高的貸款利率。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四十三個儲蓄和貸款協會成立，以此幫助公務員和低收入者。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形成了更多類型的合作社，包括消費合作社和多功能合作社。一九七〇年代，隨著工會成立合作社，合作社運動得到了

8 演講全文作為文章發表。"S' pore Hovels a Menace to Health of Inhabitants – Formation of Housing Societies Suggested". In *Malayan Tribune*, 31 Dec 1947, p. 5. 除了擔任首席建築監督員，西登斯還是市政服務聯盟的主席。他在一九六〇年代成為新加坡住房合作社有限公司的主席。

9 "Co-op Plan for Housing". In *The Singapore Free Press*, 8 Dec 1947, p. 5.

10 當時新加坡還有一個建築協會，即成立於一九三八年的馬來亞建築協會。一九八〇年代成為華僑銀行的子公司。另一家是成立於一九二七年的公司義品放款銀行（Crédit Foncier d' Extrême-Orient），以提供房屋貸款而聞名，但後來的開發商身分更廣為人知。

11 Thanaseelen Rajasakran, *Building Society: The MBSB Story*, pp. 18-32.

12 新加坡建築協會於二〇〇二年更名為新加坡金融。

顯著性發展。目前在新加坡註冊的合作社有八十七家。[13]

一九四七年的演講中，西登斯討論了四種類型的住房協會，合作社房屋就是其一。他建議在新加坡成立這樣的協會，以儲蓄與貸款合作社和商店合作社為民服務的準則為基。自一九四八年起，先後成立了三個房屋合作社。這種協會的關聯性似乎一直延續到獨立後的時代，但最終在一九八〇年代減弱。[14]

在新加坡註冊的三個房屋合作社是新加坡政府公務員房屋合作社（成立於一九四八年）、新加坡房屋合作社（一九五六年）和新加坡全國房屋合作社（一九六四年）。新加坡房屋合作社由新加坡合作聯盟有限公司贊助，註冊於一九五六年六月十五日，為非政府公務員服務。曾多次嘗試開發項目，但都沒有實現。最終，它的主要功能是為成員提供房屋貸款。[15]另外兩個房屋合作社從一九五〇年代到一九七〇年代規劃和創建了項目。

新加坡政府公務員住房合作社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政府公務員創立新加坡政府公務員住房合作社。成立前，十五名成員組成了委員會，並由合作署署長批准了一套章程。它是當地第一個成立的住房合作社，資金來自政府的長期貸款、成員的儲蓄、其他合作社的長期貸款以及其他合作社成員的短期貸

款。[16]成員每人投資十新幣的股份，並在第二年獲得分紅。[17]

該協會通過兩種方式協助成員擁有住房：協助成員在自己的土地上建造房屋，或購買協會開發的住宅區房屋。不論是哪種購房形式，在獲得房屋貸款前都須要先將八分之一的金額付與協會，其餘部分則以分期付款的方式償還（包含利息），期限最長為二十年，貸款的最高限額為兩萬新幣。購買者還需承諾，在未經協會許可下不得轉讓所有權或轉租房屋，若想出售或轉讓，協會可在前六年內回購土地和房屋。

到一九五〇年代末，它取得了相當大的進展，緩解了許多中低收入政府公務員的住房需

13 Singapore Institute of Labour Studies Information Series, *The Co-operative Movement in Singapore* and Kevin Y. L. Tan, *The Singapore Co-operative Story, 1925-2015*.

14 一九六七年，隨著組屋計畫邁入第二個五年階段，組屋地產官員建議，作為公共部門的房屋提供者，除了銀行、保險公司、房地產開發商和金融公司之外，還可以通過建築協會和合作社的協助獲得私人領域的房屋所有權。Prem Mohan Singh, "Promotion of Private Home Ownership for the Lower Income Group". pp. 2-7.

15 R.O. Daniel, *Co-operative Societies in Singapore 1925-1985*, p. 25. 於一九八二年一月十四日更名為新加坡合作社房屋與房屋代理有限公司。

16 「姊妹協會」包括新加坡政府公務員合作儲蓄貸款協會、警察合作儲蓄貸款協會和海關儲蓄貸款協會。*The Singapore Government Officers' Co-operative Housing Society Limited First Anniversary Souvenir*, p. 5.

17 Singapore Co-op Union, *Silver Jubilee Souvenir on the Singapore Co-op Movement 1933-1958*, pp. 17-18.

住宅區名稱	年份	房屋類型	數量	價格（新幣）	首付（新幣）	項目成本（新幣）
布拉山路	1950年竣工	單層房	6	11,500	?	?
劍橋路住宅區	1950-1951年	單層房	19	11,000-12,000	1,250	30萬
巴耶利峇合作住宅區	1957年竣工	雙層排屋	44	15,000	?	150萬
		雙層半獨立屋	16	17,250	?	
		雙層店屋	9	?	?	
		平房	3	20,000	?	
湯申住宅區	1957-1961年	三房式雙層排屋	105	10,000	1,250	?
		二房式單層排屋	47	7,500	950	
		商店和公寓	6	?	?	
		半獨立屋	2	29,000	?	
巴耶利峇合作住宅區（二）	1961-1962年	三房式雙層排屋（體積更小，土地更少）	86	10,000	1,250	?
		三房式雙層排屋	70	16,700	2,000	
美花園	1967-1969年	半獨立屋	兩種類型的總數：200	31,000	?	550萬
		排屋		24,000	?	
樟宜合作花園（項目被放棄）	1969-1971年（計劃）	半獨立屋	兩種類型的總數：400	31,000	?	1400萬（計劃）
		排屋		22,000	?	

求。這包括協助兩百一十二名成員建造自己的房屋及完成三個房屋項目。一九七九年關閉之前，該協會計畫了許多建設項目，但最終只完成了三個大型住宅區與兩個較小的項目。

協會的前兩個項目針對的是二級和三級政府公務員，計畫為每間房屋提供道路、後巷、現代衛生設施與基本需求服務。[18]第一個完成的項目是布拉山路南端一排六間的單層排屋，當時也被稱為「軍營房」。每個地塊的尺寸為六米乘三十米，入口處有花園和一個有頂棚的短門廊。房子的平面圖有兩個縱向間隔區。客廳、用餐區、廚房、傭人房、浴室和廁所從前到後占據了一個隔間，兩間臥室（一間帶浴室／廁所）和一個面向裡屋的開放區域占據另一隔間。[19]

房子的主要空間由雙坡屋頂覆蓋，共同的屋脊作為橫跨六間房屋的相連線。兩端房屋的前臥室由主屋頂遮蓋，中間單位則由另一組較低的雙坡屋頂覆蓋。廚房區、傭人房、浴室和廁所都有一個共同的混凝土平屋頂。前門和窗戶上方裝有嵌板，而面向屋前的牆壁具有通風孔。

18 *The Singapore Government Officers' Co-operative Housing Society Limited First Anniversary Souvenir*, pp. 6-7.

19 一九五〇年107/50建築平面圖裡的146-9和146-10地段由黃柏岑（Wong Puck Sham）簽署，並由建築師黃（Wong）、鍾（Chung）及其合夥人設計。布拉山路和劍橋路房屋的承包商皆爲宋楊建構公司（Soong Yang Structural Company）。

隨著布拉山路房屋竣工，協會於一九五〇年宣布在劍橋路和卡萊路再建十九間排屋，八間沿著劍橋路，卡萊路則有十一間，背對背的兩排由一條共同排水溝隔開。這些單位的尺寸為七米乘二十點五米，其平面布局與布拉山路的一樣。[20]除了整體尺寸外，劍橋和卡萊路（Carlisle Road）的房屋臥室比另一隔間的房間更寬。主區域由相似的雙斜屋頂遮蓋，但前屋簷邊緣裝有L形混凝土嵌板，其延伸至所有排屋正面的前方。

隨著這兩個項目竣工，該協會投機建造了一個完整的住宅區，在一九五〇年代中期收購了大片土地，就在城市邊界外，沿著巴耶利峇路上段，靠近巴特禮路的東端。被稱為「政府合作住宅區」的房屋分成兩個建造階段，即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二年間，分別為中和低收入的政府公務員所建。第一階段建造的兩條道路被命名為「羅奇代爾路」和「儲蓄路」（Rochdale Road／Thrift Road），以此紀念合作社的歷史面貌。[21]基於類似的目的，第二階段的道路以馬來文命名：Jalan Gotong Royong（互助）、Jalan Kurnia（禮物／祝福）、Jalan Usaha（努力／勤奮）、Jalan Korban（禮物／犧牲）和Jalan Mahir（技能）。沿著羅奇代爾路，協會辦公室坐落於九號，而有段時間合作商店在十七號。

巴耶利峇路上段的住宅區的兩個階段都有多種房屋類型。第一階段有雙層排屋、雙層半獨立屋、雙層店屋及單層平房。第二階段只有兩種類型的雙層排屋，與第一階段的排屋相比，地塊面積普遍較小。第二階段的兩種房屋設計相似，但其中一種體積較小、占地更少，臥室

有兩間而非三間。[22]與它們相比，第一階段房屋的上層前陽台面積更大，住戶包括高級校長、教師和護士。[23]

在巴耶利峇路上段的住宅區的兩個階段期間，該協會於一九五七年至一九六一年建造了湯申住宅區。其主要大道以行星命名，如木星路和金星路；支路則以星座命名，像天秤座路、摩羯座路和獅子座路。湯申住宅區具有不同類型的房屋，和巴耶利峇路上段的第二階段一樣，它們的目標群體是工資較低的公務員。這包括三房式雙層排屋、二房式單層排屋、店屋和半獨立屋。

一九六七年至一九六九年開發的美花園住宅，只有半獨立屋和排屋兩種類型，共約兩百個單位。它們的售價翻了一倍，分別達到三萬一千新幣和兩萬四千新幣。與前兩個住宅區獨特的街道名稱不同，其道路均以不同的後綴命名為「美花園」。在宏茂橋鎮規劃和建成之前，

20 一九五〇年 403-7 地段的建築平面圖 256/50 和 628/50 亦由黃（Wong）、鍾（Chung）及其合夥人設計。這兩個平面圖共顯示了十九個單位，而不是普遍的二十一個。

21 這兩條道路最初被命名為「合作大道」和「紅利之路」，但在農村委員會的反對下更改了。"You'll Never Have to Live in Co-operative Drive".In *The Straits Times*, 28 Aug 1957, p. 8.

22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與 Jalan Usaha（努力／勤奮）的前居民，梅爾文·梁（Melvin Neo）先生的交流。

23 Mun Chor Seng. *Those were the Days*, p. 136.

該住宅區是最早在西邊三巴旺山住宅區和東邊實龍崗花園之間開發的私人住宅區，位於村莊和種植園之間。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協會宣布了迄今為止最大的項目，落於樟宜路上段十點五英里處六十三英畝之地。[24]項目名為樟宜合作花園，計畫建造概括半獨立式屋與排屋的四百四十間住宅，售價分別是三萬一千新幣和兩萬兩千新幣。[25]該莊園估計耗資一千兩百萬新幣，於一九六九年至一九七一年間建造。

在項目進行中，協會面對諸多挑戰。一九七〇年六月，據報導，一群擅自占地者拒絕從協會已購的土地上遷出，進而拖延了清場工作。七個月後，協會官員因涉嫌貪污而被傳喚調查，最終一名前書記因挪用協會資金而被定罪。[26]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另一家合作企業職總英康的領導人提出與協會合作建造公寓，而非執行原有計畫，然而在協作下還是無法挽救該項目。[27]

一九七一年到一九七八年，因在樟宜的提案失敗和挪用案件的負面新聞，四千七百六十六名成員中的三千兩百六十二名退出協會。儘管向離職成員逐步支付了三百萬新幣，隨之而來的資金流動問題仍無法解決。合作社註冊處處長下令該協會在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前關閉，以此結束了為政府公務員提供住房的三十年服務。

新加坡全國住房合作社

新加坡全國住房合作社，更廣為人知的名稱是 Syarikat Bekerjasama Perumahan Kebangsaan Singapura（SBPKS），註冊於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十日，當時擁有二十名成員。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一日，它在芽籠的全馬來穆斯林傳教會的會議上成立。新加坡的所有馬來人都可成為會員，會員費為五新幣，並通過分期付款以每股五新幣的價格購買五十股。新加坡當時是馬來西亞的一部分，該協會從馬來西亞聯邦政府獲得了兩百萬新幣的貸款，以此計畫購買三百套公寓，再轉售給會員。[28]

到一九六五年五月提供第一筆四十二萬五千新幣的貸款時，會員已增至數千人。國家

24 Mukim XXII Lots 190 and 191. Untitled letter to the editor from "Cheated". In *The Straits Times*, 16 Feb 1971, p. 17.

25 "Squatters Holding up $12m Co-op Housing Project". In *The Straits Times*, 18 Jun 1970, p. 5.

26 "Officials of co-op quizzed." *The Straits Times*, 18 Feb 1971, p. 1.

27 "Now It's Flats in Changi Instead". In *New Nation*, 30 Dec 1074, p. 4.

28 "Malays in Singapore Launch $2m Homes Society". In *Straits Times*, 2 Nov 1964, p. 11. 它的英文名是新加坡全國住房合作社。報告還指出，該協會的成立是由馬來西亞農業合作社部長基爾·喬哈里(Khir Johari)在一九六四年九月的社區騷亂之後提議的。

發展部將八十三個組屋單位（第三座）分配給協會。[29]第三座是芽籠士乃的四座大樓中第一個建造的，商店單位坐落於十層大樓的底層。協會最終在那裡占據了一個單位，以每單位四千七百新幣的價格出售了其他單位。

根據與家人同住在該街區約十五年的卡立．易卜拉欣老師（Cikgu Khalid bin Ibrahim），街區位於繁華的芽籠士乃，處於中心地理位置，交通便利。[30]舊芽籠士乃市場就位於他們的公寓下，他妻子每天都去那裡買食材，芽籠路對面還有兩個市場。附近有幾座回教堂，如卡立回教堂（Khalid Mosque）、阿米娜回教堂（Aminah Mosque）、瓦丹戎回教堂（Wak Tanjung Mosque）以及其他回教堂。每月的租金由協會收取，水電費則付予建屋發展局。

一排商店也位於舊阿砂戈夫街（Jalan Alsagoff）的公寓對面，包括一家咖啡店、唱片店、裁縫店、金匠店、理髮店和兩家書店。[31]在公寓下方，還有一排售賣物品和食物的拉茶小吃攤位。每逢週四傍晚，第二座樓開放區會有夜市。

第三座呈線性形式，每層有九個單位，共享一條走廊。兩個樓梯支起樓房，一部位於末端的電梯最靠近芽籠路。走廊上設有裝飾性的間隔通風板塊，面向走廊的窗戶下面是鋁板百葉窗，上面則是玻璃。每個公寓單位都是L形的。[32]客廳和廚房橫跨樓房的寬度，每個單位的單人臥室都是從客廳或靠近廚房的區域進入的。在客廳和廚房區之間設有一間廁所／浴室，可從廚房區進入。

新加坡全國住房合作社最初計畫在芽籠、丹絨禺、麥波申和文達鎮，用剩餘的貸款購買更多的公寓。一九六五年八月，該協會向建屋發展局申請購買麥波申區的兩座公寓樓房，以轉售給成員，但沒有獲批。在此之前，也曾申請芽籠士乃區的兩百二十個組屋單位，同樣未通過。兩個月前的一九六五年六月，林金山先生（國家發展部長）答覆拉哈馬・科納先生（Rahamat bin Kenap）（芽籠士乃議員）的提問，指出他的部門將不再專門為新加坡全國住房合作社分配公寓單位。[33]該協會隨後轉向私人房地產市場，協助成員購買房屋。[34]

多年後，新加坡全國住房合作社在巴耶利峇街B座購買了十五個公寓單位，於一九七五年左右轉售給成員。[35]每個單位售價為兩萬八千新幣，購買者必須預付一萬一千新幣作首付，其餘的在十年內分期支付。[36]五層樓高的建築，每個單位有三間臥室和一個大廳，建於

29 "Malays Don't Like Flats? Nonsense, He Says". In *The Straits Times*, 21 May 1965, p. 5.

30 二〇二二年五月二十四日對卡立・易卜拉欣老師（Cikgu Khalid bin Ibrahim）的採訪。

31 第三座組屋對面的這段阿砂戈夫街（Jalan Alsagoff）現被稱為芽籠士乃（Geylang Serai）。

32 來自艾達・卡立（Aida binte Khalid）女士於二〇二二年五月二十三日所描繪的草圖。

33 "Flats: Lim Explains." In *The Straits Times*, 17 Jun 1965, p. 4.

34 "Malay Housing Co-op Seeks Purchase of Macpherson Flats". In *The Straits Times*, 27 Aug 1965, p. 8.

35 "Ko-op Mahur lLabur Hartanah." In *Berita Harian*, 15 Jul 1987, p. 3.

36 "SBPKS Jual Semua 15 Flet yang Dibina di Paya Lebar". In *Berita Harian*, 25 Oct 1975, p. 2. 一九七五年初售

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七四年間。一九七三年建造時，排水系統有些受損，但後來修復了。[37]

然而，這次的投機面對許多問題。斯里再也私人有限公司（Sri Jaya Sdn. Bhd.）是B座和A座三十二個單位的原業主，因無法向奇華承包商私人有限公司（Chip Hua Contractors Pte Ltd）支付公寓的建設費用，便於一九七五年六月授出三十二個單位的一百九十九年租契，對價為九十一萬兩千新幣。奇華隨後將A座的三十二個單位賣給了不同買家。但斯里再也早些時候已將該房產抵押給了興業銀行（當時為合眾銀行），以獲得一百五十萬新幣的貸款建造公寓。[38]

斯里再也與奇華因租賃協議發生爭議，斯里再也與興業銀行之間因抵押協議中的矛盾也引發爭議。在幾起訴訟之後，興業銀行於一九九四年五月以六百五十萬新幣，將這些公寓一併出售給最強投資私人有限公司（Win Supreme Investment (S) Pte Ltd），迫使居民遷出公寓。[39]新加坡全國住房合作社本身作為第三方處理了一個涉及單位購買者的法庭案件，直到二〇〇二年才了結。[40]

協會在二〇〇三年接獲更多壞消息。芽籠士乃的各個住宅大廈，包括鄰近的芽籠士乃市場，都根據「選定的整體重建計畫（SERS）」重建。協會向成員宣布了有關第三座樓的消息，並在補償和遷入新房方面協助他們。[41]與此同時，協會停止所有規劃的建設和轉售房屋的項目。

後來，它主要以信用貸款的方式運作。一九八七年，協會宣布，除了向會員提供貸款

修繕房屋或搬家，還會提供購買家電、家具和教科書的貸款。[42]會員的一般貸款高達六千新幣。[43]

教師園

除了上述提及的住房合作社外，也需記錄新加坡教師工會類似的合作住房過程，以此作為部分成員獲得住房的其中一種管道。

出十一個單位，一九七五年六月售出其餘四個。

37 "11 Unit Flet yang Dibina oleh SBPKS Sudah Dijual kepada Anggota-anggota." In *Berita Harian*, 2 Apr 1975, p.2.

38 https://www.supremecourt.gov.sg/docs/default-source/module-document/judgement/2000-sghc-206.pdf and https://www.supremecourt.gov.sg/docs/default-source/module-document/judgement/2001-sghc-273.pdf

39 Ibid.

40 SBPKS Annual Reports No. 26 (26 Oct 1997) and No. 31 (29 Sep 2002)

41 SBPKS Annual Report No. 32 (6 July 2003)

42 "Ko-op Mahu Labur Hartanya". In *Berita Harian*, 15 Jul 1987, p. 3.

43 NAS interview with Tan Sri Syed Esa Almenoar on 19 Oct 1983, Acc No. 000321. 他表示，該協會為較貧困的成員子女提供助學金。

在戰後時代，許多學校以英語為媒介語，但也有很多使用華語、馬來語和淡米爾語進行教學。當時，很多學校都不是由政府經營或管理的。新加坡教師工會成立於一九四六年，主要為英校的教師和教育官員提供福利。自一九五〇年代以來，工會領導層一直冀望建立一個俱樂部，以擴大工會的活動範圍。

與此同時，華校教師也在一九四七年成立了自己的協會，即新加坡華校聯合會。[44]經過八年多的一系列籌款活動，於一九五八年九月在東海岸路八英里處，購置了一棟海濱別墅。該別墅作為協會俱樂部，用於「週末探訪、放鬆休憩和運動娛樂。休假期間，這裡也可以是老師們為年輕學生組織游泳和划船活動的場所」。[45]

在一九六八年的中央委員會，新加坡教師工會俱樂部的話題再次浮出檯面，繼而為此成立了一個五人委員會。市中心位置被認為是負擔不起的，同時工會也希望能確保設施得以充分使用。委員會最後決定聘請發展商，通過建立住宅區解決該問題，而區內的部分土地將預留作俱樂部。[46]

最終，委員會聘請了發展商聯合（Lian Hup）負責該項目，聯合推薦並購買了湯申路上段和楊厝港路交界處的一塊土地。建築師鄭秀梅（Tay Siew Mui）女士設計了兩款普遍的兩百五十六個單位；[47] A型為雙層排屋（每間售價兩萬四千五百新幣），B型為三層排屋（每間售價兩萬八千新幣）。角落單位則介於兩萬六千五百新幣到三萬零五百新幣之間。

儘管房屋以低於市場的價格出售，大多數教師都發現仍無法負擔，而且在新加坡脫離馬來西亞後的一段時間內，住房貸款並沒有如期而至。參與職工總會的委員之一勞倫斯・謝（Lawrence Sia）找了蒂凡那（Devan Nair）（職工總會秘書長）後，安排委員會與林金山先生會面。[48]他們為教師提供高達百分之八十的貸款，利息為百分之六，為期十五年。儘管如此，教師最後占據的單位只有大約百分之七十，其餘的則出售給政府公務員和大眾。[49]林金山先生於一九七一年十月十九日為住宅區舉行開幕。

區內九萬平方英尺的一塊土地用作俱樂部，更名為教師中心，其建設資金通過隨後的籌款活動和會員費湊集。教師中心建於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三年，一九七五年由吳慶瑞博士（Dr.

44 如今被稱為「新加坡華文教育學會」。

45 梁秉賦（Neo Peng Fu），《新加坡華校聯合會史綱：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1946-1956》，頁五、四十三、四十四。該地址重編為 460A，東海岸路上段。俱樂部最終出售給相鄰的華宇威餐廳（Hua Yu Wee Restaurant），作為員工宿舍。

46 "Fulfilling the Dream of a Clubhouse". In *60 in 06: the Teachers' Union*, pp. 44-45. 該委員會由卡里姆・巴古(Karim Bagoo)擔任主席，楊明周(Yeoh Beng Cheow)擔任秘書，勞倫斯・謝(Lawrence Sia)、阿夫塔・辛格(Avtar Singh)和賈吉特・辛格・桑杜(Jagjit Singh Sandhu)為會員。

47 Building plan 820/67 of 1967.

48 "Teachers' Estate Built by Many, Not Just One Man". In *Straits Times*, 26 Sep 1995, p. 30.

49 "Friendly estate – Shining Example of Neighbourliness". In *New Nation*, 28 Aug 1973, p. 4.

Goh Keng Swee）開幕。它包含一個多功能廳、辦公空間、圖書館、食堂和數個多功能房，還有一個遊樂場和泳池及數個壁球場。此外，也成立了居民協會，為居民組織活動。[50]

區內的道路以文學人物命名：羅賓德拉納特．泰戈爾（Rabindranath Tagore）、歐瑪爾．海亞姆（Omar Khayyam）、卡利達薩（Kalidasa）、文西．阿都拉（Munshi Abdullah）、穆罕默德．伊克巴爾（Muhammad Iqbal）、李白和杜甫。雙排排屋背對背排置，一個大溝渠將其隔開。A型和B型排屋的設計相似，只是B型房屋多了一個地下層。汽車門廊從主路通向入口前的中間區域，預製混凝土護牆與十英尺（三米）高的內部底層隔開。後面的區域是起居和用餐區。

樓梯位於底層約三分之二的平面深度，沿著房子寬度的一側延申。底層的四個梯級通向一個平台，之後用戶轉一百八十度登上剩餘的台階。底層的樓梯底部作為一個小型存儲空間，一樓的兩間臥室的櫥櫃（九英尺／二點七四米高）橫跨樓梯的著陸區，以此善用空間。

底層平面圖的其餘三分之一用於容納廚房區、廁所和大型儲藏室。樓上有三間臥室：兩間在前，另一間在樓梯後面。一間前臥室有一個面向馬路的陽台，而另一間臥室可從側面看到馬路。浴室和廁所位於後臥室附近，住戶們共用。B型單位則從廚房區延伸出一個平台，螺旋樓梯通向下面的覆蓋層。這層建造在比入口車道更低的地面，面相斜坡，至少有八英尺六英寸（約二點五九米）高。

屋頂結構由固定間隔的木桁架支撐，覆蓋粘土屋頂瓦片。雙坡屋頂的坡度為十五度，屋脊沿排屋單位的中央對齊，以牆隔開。由於房屋沒有空調，每個房屋的房間天花板附近都裝上了木質百葉窗，以達到自然通風。窗戶是平開窗或玻璃百葉窗。

一九八四年，工會在調查中獲得成員的積極回應後，計畫在武吉知馬的一塊土地上開展另一個房屋項目。要求開發商建造七十間排屋，每間約有兩千平方英尺的永久土地。可惜的是，另一位買家捷足先登買了土地，該項目就被擱置了。[51]

獨立後的發展

新加坡合作社法令從實施到國家獨立，殖民政府以貸款幫助協會，並通過合作社部門監管。第二次世界大戰和非殖民化之後，合作社運動在許多亞洲國家持續進行。在新加坡，一九六九年後職工總會及其附屬工會創立了各種合作社，這是該運動的重大進展。一九七〇年至一九七九年，為了形成「合作社聯合體」，十三個合作社被創立。[52]這些協會龐大的會員

50 *Op. cit.*, "Teachers' Estate Built by Many, Not Just One Man."

51 "Longer Wait for a Teachers' Housing Estate". In *Singapore Monitor*, 6 Mar 1984, p. 3.

52 三個早期的職工總會（NTUC）合作社的首字母縮略詞都帶有「com」：NTUC Income（職工總會聯營保

基礎及多年來不斷擴大的規模，讓其得以持續為會員和公眾提供各類服務。一九八〇年，一個名為「新加坡全國合作社聯合會」的頂端組織成立，以作代表促進合作社運動。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當住房條件惡劣且不足時，住房合作社幫助公務員和大眾獲得房屋。通過這些計畫開發了不同類型的住宅，包括新加坡全國住房合作社的公寓樓。新加坡政府公務員住房合作社的第一個項目是只有一排的六間排屋，之後才擴展成大型規模。隨後的兩個房地產項目嘗試了不同類型的房屋。巴耶利峇合作住宅區和湯申住宅區有店屋、排屋、半獨立屋和平房。開發這些住宅區的同時，協會不得不擱置其他建造項目，如「多層獨立公寓」，甚至是「擁有工業的衛星城」計畫。[11]

新加坡政府公務員住房合作社與職總英康在一九七〇年代，協作開發樟宜合作花園的嘗試頗有趣，它預示著前者的消亡與後者合作社的興起。在某種程度上，它也標誌著新加坡合作社房屋發展的終結。

參考文獻

R. O. Daniel. 1987. *Co-operative Societies in Singapore 1925-1985*. Singapore: The Singapore National Co-operative Federation Limited. 1987.

Ee Boon Lee, ed., 2006. *STU: 60 in 06: Singapore Teachers' Union.* Singapore: Singapore Teachers' Union.

Lim Tay Boh, 1950. *The Co-operative Movement in Malay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un Chor Seng, 2020. *Those were the Days.* Singapore: Marshall-Cavendish Editions.

梁秉賦，二〇一八。《新加坡華校聯合會史綱：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1946-1956》。新加坡：新加坡華文教育學會，二〇一八。

Thanaseelen Rajasakran, 2012. *Building Society: the MBSB Story.* Kuala Lumpur: Editions Didier Millet.

The Singapore Government Officers' Co-operative Housing Society Limited, 1950. *The Singapore Government Officers' Co-operative Housing Society Limited First Anniversary Souvenir.* Singapore: The Singapore Government Officers' Co-operative Housing Society Limited.

The Singapore National Co-operative Federation, 2019. *Singapore Co-operatives Singapore Stories.* Singapore: The Singapore National Co-operative Federation Limited.

The Singapore Co-operative Union, 1958. *Silver Jubilee Souvenir on the Singapore Co-op Movement 1933-1958.*

險企業有限公司）、NTUC Comfort（職工總會員工聯營運輸有限公司）和 NTUC Welcome（職工總會消費者合作社）。

53 "New Co-op Homes are Sold Out". In *The Straits Times*, 6 May 1961, p. 4, and "Two New Housing Estates in Singapore Will Cost $3m". In *The Singapore Free Press*, 2 Aug 1958, p. 5.

Singapore: The Singapore Co-operative Union.

The Singapore Co-operative Union, 1964. *The Co-op Recorder*, No. 19 (Mar/May 1964). Singapore: The Singapore Co-operative Union.

The Singapore Government Servants' Co-operative Thrift and Loans Society Limited, 1989. 64th anniversary public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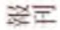
The Singapore Government Servants' Co-operative Thrift and Loans Society Limited, 1990. 65th anniversary publication.

Singapore Institute of Labour Studies, 1996. *The Co-operative Movement in Singapore*. SILS Information Series Research Programme.

Singapore Teachers' Union, 2006. *60 in 06: the Teachers' Union*. Singapore: Singapore Teachers' Union.

Penu Mohan Singh, 1967. "Promotion of Private Home Ownership for the Lower Income Group". In *Afro-Asian Housing Congress conference proceedings*, Document 3-2. Singapore: Afro-Asian Housing Congress.

Kevin Y. L. Tan, 2015. *The Singapore Co-operative Story 1925-2015*. Singapore: Singapore National Co-operative Federation.



Berita Harian

Business Times

Malaya Tribune

New Nation

Singapore Free Press

Singapore Herald

Singapore Monitor

Singapore Standard

The Straits Tim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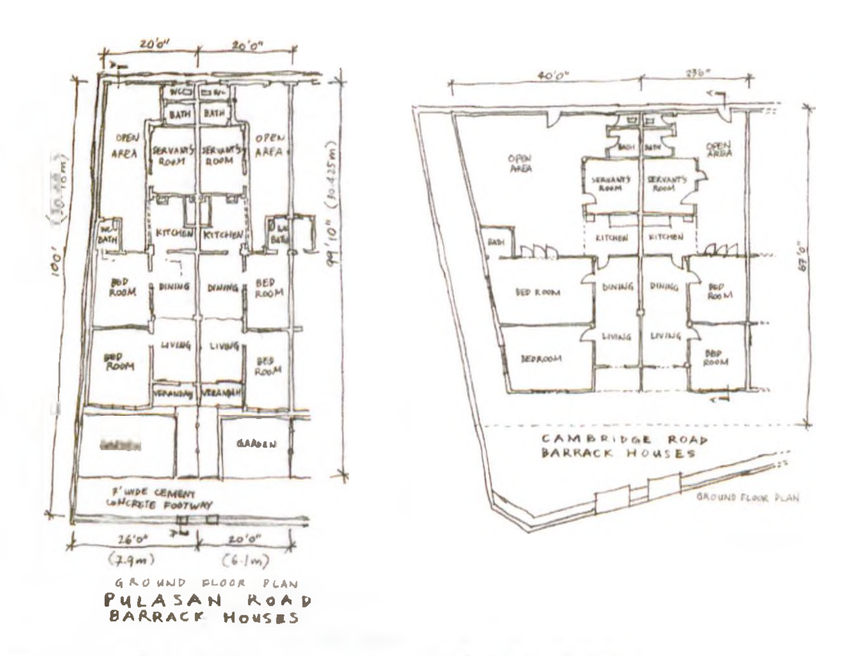


圖13-1：（左）布拉山路（Pulasan）排屋的房屋平面圖。

圖13-2：（右）劍橋莊園（Cambridge Estate）的房屋平面圖。



圖13-3：湯申路莊園單層排屋。



圖13-4：巴耶利峇（Paya Lebar）第一期排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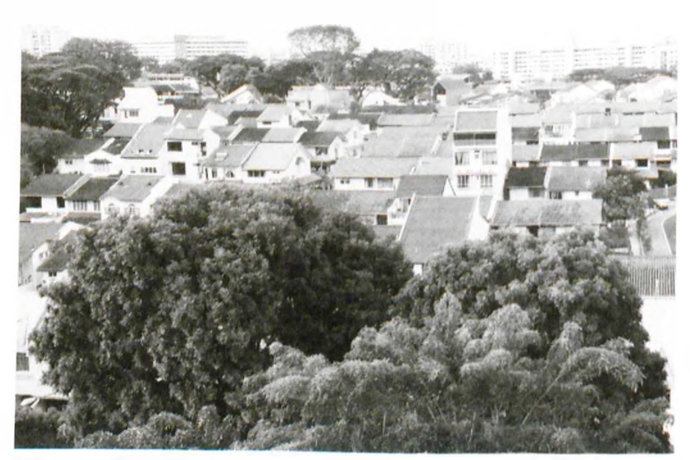


圖13-5：美花園（Mayflower Gardens Estate）鳥瞰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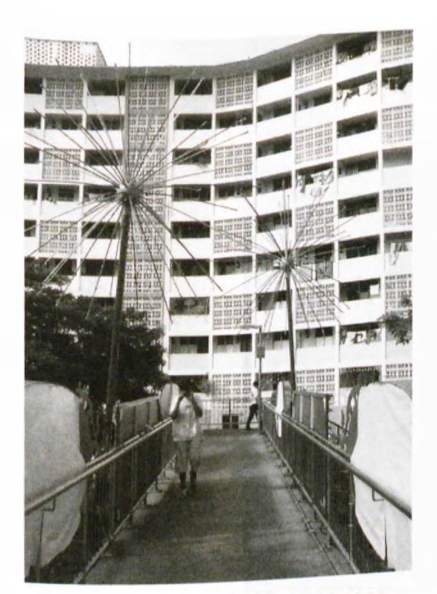


圖13-6：芽籠士乃的第二座組屋。其正面與第三座組屋單位相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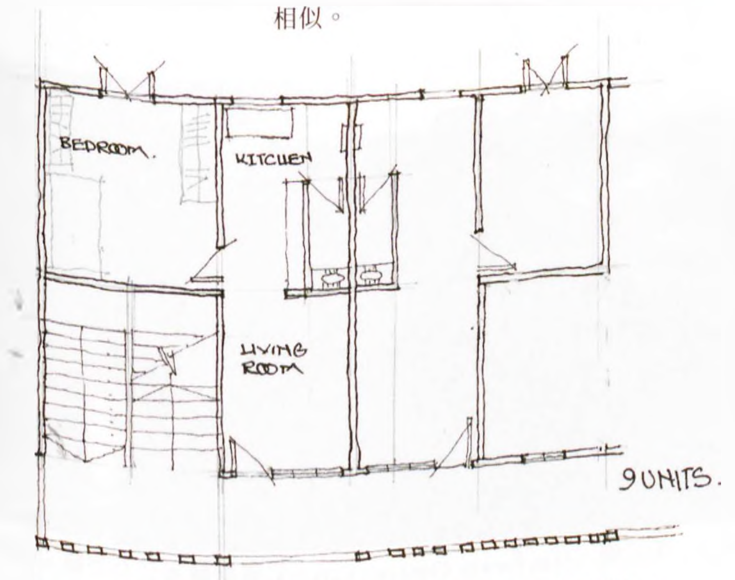


圖13-7：第三座組屋單位平面圖（艾達·卡立的素描圖）。

輯三　文化研究



哲學饒舌與詩詞歌曲

——中華文化中兩種跨界的文本

前言

近幾十年來，流行音樂已經滲入了當代華人、亞洲海外華人以及世界各聚居地離散者的生活中，其中年輕人更是不可忽視的一環。這種形式的音樂首先在台灣和香港開始發跡並發展成蓬勃市場，但在中國、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等次級市場，流行音樂也正在興起並在相關產

業中日益重要。大多數中文流行歌曲的主題都涉及異性戀[1]，其中也不乏提及當代情境和生活中的問題。

在這篇論文中，我想探討兩類中華古代文本，兩者都多次被融入並重現於二十世紀後期中文流行音樂文化的表演之中。該文本包括了：記載了孔子哲學的《論語》、《大學》，和公元一〇七六年蘇軾創作的宋詞——《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第一個文本被引用並作為饒舌歌曲的主要參考，第二個文本則整體被作為流行歌曲的歌詞使用。之所以選擇這兩部作品作為探討對象，是因為將中國的古典作品作為素材，且成功地跨界用於流行文化的案例並不常見。透過將這些歌曲與原作以及原作者的思想和哲學理念進行比較，可以對這些跨界作品的取材態度有更清晰的瞭解。此外，我也想探討新演藝工作者的角色與個性，以及這兩部作品對現代中華流行文化的影響。

中華文化中的文字與跨界

文字在中華文化的歷史和發展進程中扮演了核心且關鍵的角色。中文裡的「文化」一詞的意思是「文字的演化」。文字是由象形文字演化而來的，雖然曾有多種樣式，但在中國歷史上很早就建立了統一的使用形式。由這個書寫系統開始，在接下來的幾千年裡發展了記錄、

文學作品和科學制度，並通過其他系統化形式確立了一個正式的官僚系統，且確保整個朝代有大量文人。

古代時期，文字的使用方式嚴格遵守一套形式，即每個短語有指定的字符數。將一定數量的短語結合起來，便形成一個文本，並通常以書面形式作為文集出現。由於每一個字都有一個音節，因此閱讀這些古文本時是自帶節奏的，且便於記憶和背誦。這些時代的許多詩詞在「吟誦」之時，更像是以「唱」的方式來闡明文本中的每個短語。

文字本身與聲音相關，且由抽象的圖像組合而成。除了各帶有其固有的含義外，具有相似讀音的不同文字也可以互換使用，以表示含義、寓言或隱藏的含義。這種文字上的使用也可以透過字畫雙關的形式延伸到建築領域，形成中華美學的一部分。舉例來說，在建築裝飾中常見的倒蝙蝠符號表示「福氣自天而到來」，而通向園景花園的花瓶形大門則是對通過它的人表達「平安通道」之意。古往今來，文人雅士或出於必要或想展示自身文字造詣，在文本裡採用了暗號、字謎、多重含義和隱喻等書寫方式。

字謎的例子在歷史上有跡可循。清代流傳了一個故事，講述雍正如何通過修改康熙皇帝

---

1 Fang-Chih Irene Yang（楊芳枝教授），"A Genre of Popular Music in Taiwan", p. 98. 她提及了近百分之八十的歌曲以此為題材。

遺詔中的文字，將皇位從指定的繼承人（十四阿哥）轉移到自己（于四阿哥）身上，從而成為皇帝。東漢時期，丞相曹操視察相國府的修建進度，在門上寫下「活」字。士兵們百思不得其解，幕僚楊修卻知道曹操的心思，因為「活」在寫在「門」之內，就成了一「闊」字，曹操是在嫌棄門修得太闊。

饒舌歌曲《子曰》

《子曰》由台灣知名藝人卜學亮演唱，在亞洲的華語觀眾都親切地稱他為「阿亮」。他是熱門電視節目「超級星期天」的常駐主持人，並出演了台灣眾多的電視劇和戲劇。《子曰》這首饒舌歌曲是他於二〇〇〇年五月發行的第一張專輯中極具標誌性的主打歌。

儘管主題中出現了「孔子」的字眼，但該作品僅在前四行歌詞描述了儒家思想的概念。演唱者透過饒舌，將孔子的儒家思想濃縮成幾句歌詞，並圍繞它帶出了當下生活中種種常態與變化莫測的情境。因此，接下來的四行歌詞描述了饒舌歌手自身的「哲學觀」以及如何在現代城市生活中找到出路的見解。其中藉由女聲唱出的副歌，詢問如何通過生活來回應這些「生活中的問題」。此副歌出現了兩遍，夾在兩段主歌之間，其中第一段描繪了生活中的挫折、成功的象徵、情境和願景，而在第二段中則提出了應對或緩解它們的可能性策略。此歌曲的

結尾處則用回了第一段主歌中，孔子哲學的名句和饒舌歌手自身的哲學觀作為對比。

社會背景與內容

此饒舌歌曲的副歌由曾寶儀演唱，彼時她也與卜學亮共同擔任了電視節目「超級星期天」的主持人。歌曲中的女聲用於呼應卜學亮的演繹，但在她的三句歌詞中，她也同時就生活裡普遍遭遇的問題，提出了詢問：「人生多美？愛情多痛？」尋求這些答案的同時，她也會響應饒舌歌手第一段主歌的號召——「要打破砂鍋問到底」。而饒舌部分的第一段第六句則那麼唱道：「搞不懂就問人，搞得懂就答人，沒有人懂，還可以問神。」

然而，曾寶儀每次都回以：「Oh My God！我聽不懂、看不懂、學不懂、都不懂。」彷佛要質疑第一段主歌中卜學亮的號召。雖然「Oh My God!」在西方社會的英語會話中是通俗慣用的口頭禪，但在此歌曲中加入此語句，看似祈求神明的幫助，好讓這些惱人的問題有所

2 阿亮在「超級任務」片段中扮演著最「有用」且最受觀眾喜愛的角色，他每週都為節目嘉賓，從台灣乃至世界各地尋找失散多年的朋友、親戚、愛人等。他僅憑模糊的線索，艱苦地展開搜索並向觀眾展示了沿途的不幸經歷。

解答。緊隨其後的兩段主歌（各兩節）因此起到了構建當代生活問題，然後試圖提出解決方案。

可以推測的是，卜學亮在主歌中所描繪的「逆境」確實發生在中華人民占大多數的高度城市化地區，其中也包括了台北。這些歌詞描述了通過擁有房子、擁有汽車、獲得財富和地位及創建自己的圈子或人脈派系，以建立社會地位的必要性，以及隨之而來的後果：為貸款而勞累一生，還有從著迷到醒悟後的倦怠。雖然這些描述與都市生活極為貼切，但主歌中也提到了面子、地位意識和象徵意義的藝術；並援引四大學者（孔子、孟子、老子和莊子）隱射這當下的中華社會背景。

然而，卜學亮通過饒舌的方式，在第二段主歌裡提出了建議和解決方案，宛如孔子在幾個世紀前言傳身教一樣，此舉具有說教意義。那些建言似乎源自一個穿著破舊但經驗豐富的都市居民，列出了一系列「該做」和「不該做」的事情，同時表明人們應該注意權衡這些事物的價值。「該做」的包括：要懂得推理、要心存懷疑、要充滿好奇、要鉅細靡遺、要打破砂鍋問到底。「不該做」的：不要評判、不要激進、不要恐嚇、不要偽裝、不要諂媚等。最後再以副歌結尾，採用了「我只想要簡單的快樂」結束整首歌曲。

語言的使用

《子曰》是一部藉由歌詞展現了創作者文學功底的作品，是饒舌界的成功標誌[3]。雖然以中文為主，但主歌和副歌中穿插了英文詞組，而在兩段主歌中的每兩行對連結束處使用了台灣常用的「民間」語言——方言閩南語。透過穿插借用了不同的語言媒介，歌曲中使用了許多英語嘻哈裡很常見的英語短語，這可能是對饒舌起源的致敬。在前曲伴奏中的「嘿……喲……嘿……喲」旋律，以及兩大主歌各由「Here we go」和「Break it down」作為開端，凸顯了嘻哈元素。

然而，這首饒舌作品與主流中文流行音樂的歌詞或早期中文饒舌作品的不同之處，在於其中文運用上所展現的博大精深與創意。這首歌的中文名稱《子曰》包含了「孔子說」和「亮子說」的雙重含義——後者指的是歌手及其創作者投射於作品裡的個人哲學觀[4]。歌名中的「子」字通常被理解為「孔子」的意思，儘管「子」與其他中文字組成詞組時至少還有十個其

3 理查德．舒斯特曼（Richard Shusterman）收入《Pragmatist Aesthetics》的篇章："The Fine Art of Rap"對此有所探討。

4 有關該標題的許多英文翻譯以及第一段主歌的構成都表明了此觀點，該主歌將兩種哲學逐一進行了比較。

他詞根含義。在四段主歌中很巧妙地印證了這個事實，其中「子」這個字一共出現了一百〇六次，多用於四字短語後。在玩轉「子」字的文字遊戲上體現了各種元素彼此間可以相互連結，從孔子的哲學觀，更深層次地延伸到後來對日常人物、情境和事物的描述，一切都囊括在在九百多字的歌詞之中。

饒舌音樂傳入台灣／中國

儘管美國團體所演繹的英語作品進入亞洲音樂市場已有好些時日，其錄製上架的錄像帶與光碟在亞洲各個城市隨處可見，但饒舌音樂作為一種音樂類型直至近年來才開始滲入中華文化。饒舌音樂於一九九二年傳入台灣的緣由，與兩名美籍華裔兄弟和他們的堂兄在暑假期間返回台灣發展演藝事業有關。身穿簡單T恤和牛仔褲的他們自稱「L.A. Boyz」，引進了諸如饒舌和嘻哈等美國風格的舞曲，搭配閩南語、中文和英語演唱歌曲[5]。雖然L.A. Boyz的音樂起源於美國的街頭青年亞文化，但卻避開了顛覆性或叛逆的色彩，採用幽默詼諧的歌詞。因此，他們的作品不僅受到台灣年輕人喜愛，也深討父母輩的歡心，父母們開始接受L.A. Boyz所展示的實例——兼顧課業學習和唱歌演藝，也能養活自己。這一大成功不僅為流行音樂點燃了一種新的音樂形式，也鼓勵了許多美籍華裔人才跨越太平洋，帶來其他風格的音樂並尋求

致富之路。

台灣與東南亞中文界裡的新藝人們，無獨有偶地演繹著饒舌歌曲，由此可見饒舌的火紅程度。台灣總統陳水扁在二〇〇〇年競選造勢期間便採用饒舌的方式表達了他的競選宣言。同是前台北前市長的陳水扁總統以此方式把自己描繪成一個平凡的英雄，成功凝聚了台灣民眾的心，最終擊敗了另兩位候選人宋楚瑜和連戰。

然而在海峽對岸的中國大陸，新形式的音樂和外國藝人難以被接納，儘管饒舌音樂通過李小龍[6]近來的努力才剛剛站穩腳跟。中國首張饒舌專輯的主打歌《美麗的姑娘》將一首熟悉的民歌添上歌詞，改編成饒舌歌曲。然而，目前尚不清楚數以百萬計的中國青年和其他演藝工作者是否會像台灣一樣，開始喜歡上這形式的音樂。它被接納的程度，可能就像台灣 L.A. Boyz 作為案例所展示的那樣，取決於它能夠在多大程度上說服更多的民眾表明它不會對正當的青年文化或媒體構成威脅，並不會將年輕人聚攏起來引發革命。

5 Eva Tsai, "Chinese American Pop StarsDiscovered in Taiwan", www.taipei.org/teco/cicc/currents/11-1297/11-1297.htm (26 Nov 00).

6 From Carrie Gracie, "China Rap", www.bbc.co.uk/radio3/china/chineserap.shtml (26 Nov 00).

儒家思想的「仁」

孔子是公元前六世紀最著名的中華哲學家／老師。他的語錄體散文集《論語》是亞洲最具影響力的書籍之一，其內容廣泛，涉及自律、維護家庭和國家的建議，以及與他人的相處之道。連同與他相關的其他著作《中庸》和《大學》，他的教義在這兩千多年裡協助塑造了中國的歷史、社會、政治、文學、音樂和哲學。

在孔子的理想社會中，人與人之間可以相互聯繫，同時以最好的方式扮演不同的角色。這樣的社會可以通過採用互惠的哲學觀，並同維持制度、教育、禮儀、文學、建築和音樂等形式來實現永續性。在這裡，祭祀中使用的音樂也是一種維護宇宙秩序的方式，因為音樂得以透過外界「觸動人心」[7]。所以，音樂被用以修身養性，正如建築用於構建和諧的空間一樣，唯有如此理想社會才會得以成型。

許多學者承認「仁」是儒家學說的核心思想，其他四種思想包含了「禮」、「義」、「信」和「智」，這些是形成一個烏托邦社會所需的要素[8]。「仁」的概念很複雜，它可以體現許多其他美德和品質，如仁、愛、利他、仁慈、慈善、同理心、寬恕、完美的德行、善意、人性、人與人之間的情誼[9]。

在卜學亮的饒舌中，前兩行精簡扼要地引用了「仁」的戒律。他在饒舌時著重於實現儒

家「仁」的思想，即個人的責任感及建立互惠的和諧關係。《中庸》[10]一書中有描述如下：「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11]《中庸第十三章》

在孔子的著作中，許多儒家格言皆以「該做」和「不該做」的方式呈現，最好的例子是「對別人做，你想讓他們對你做的事」和「不要對別人做，你不希望他們對你做的事」（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雖然看似說教和規範，但早期學者沿用了這方法用以傳達這些社會互惠的思想，並要求身體力行參與其中，從而實現理想的社會。此外特別需要注意的一點，這些想法是在國家間戰事不斷，社會動盪不安的時期出現的，在當時該理想社會的概念是極具吸引力的。

因此，作為自身的角色與代表，其意義對於儒家社會觀念來說是極為重要的。孔子期望人們主動思考[12]，並教導說，人們憑藉個人在社會禮節中所扮演的角色都具有其人格尊嚴，這

7 林語堂《孔子的智慧》，頁一二九。

8 Thomas Cleary (p. 3), Raymond Dawson (pp. 37-52) 和林語堂 (pp. 99-101) 探討了「仁」的重要性。

9 Raymond Dawson, “Confucius”, p. 37-8.

10 林語堂著《孔子的智慧》。此書之名也被譯為“Central Harmony”。

11 引用自：Archie Bahm, “The Heart of Confucius”, pp. 35-6.

12 如 Thomas Cleary, “The Essential Confucius”, p. 3. 所表達的。

能使自身超越軀體、生物本能，成為一名文明人。在儒家的觀點中，社會之大，莫過是一個體現「人類公約和道德義務」[13]規範的禮節舞台。

在饒舌作品中，創作者借鑑了上述儒家思想「該做」和「不該做」的表述風格，以呈現一種旨在緩解當代生活的「新哲學觀」。兩段主歌充滿了該做或不該做的事，強調雖然世間萬物皆有形，但必須要立下根基，擁抱「真實」和「有意義」之事。兩段主歌在自我鼓勵做出行動的同時，也認清了「何必怨歎，這個時代」（第一段歌第六行）。歌詞中對於理想社會並無更廣探討，因此歌詞中的建議可作為「應對」日常生活的方法，以便一個人可以「歡樂人生，逍遙自在」（第一主歌第八行）。

《但願人長久》

中文流行歌曲《但願人長久》[14]的歌詞出自宋代詩人蘇軾於一〇七六年中秋節創作的一闋詞。梁弘志於一九八〇年代，在保留此闋詞的原有形式下，逐字逐句為這闋詞編曲。[15]此作品一經發行就大受歡迎，受到好評的原因有三：一首古闋詞罕見地跨界再現；新伴奏曲如詩一般絢麗；台灣歌手鄧麗君演繹此歌曲。當鄧麗君於一九九五年在泰國突然去世時，另一位流行天后王菲於同年將鄧麗君所演唱的歌曲收錄在自己的專輯作為致敬，包括了《但願人長久》。

《但願人長久》這首歌的名字，來自這首闋詞的倒數第二行。這首闋詞本身沒有明確的標題，它在其他翻譯中可被命名為《水調歌頭》或《明月幾時有》[16]。闋詞前半段寫道：「丙辰中秋，歡飲達旦，大醉，作此篇，兼懷子由。」原文如下：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

轉朱閣，低綺戶，照無眠。不應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這首闋詞以一個提問作為開端：「明月幾時有」。在接下來的幾句中，詩人以酒為媒介，與月亮對話，描述了兩個不同時間和空間的分歧：身處地球上的詩人和那高掛「天宮」的月亮。在「我欲乘風歸去」（第五句），詩人表達了他樂於活在人間，並感歎月色之優美——「起

13 Henry Fingarette, "Confucius – the Secular as Sacred", pp. 75-9.
14 此處用的標題是由 Burton Watson 所翻譯的 "Bright moon, when did you appear?"。
15 此曲的 MiDi 版本可在 www.fayemusic.swsites.net/WishingManLasts.html 收聽。
16 In Vincent Yang's "Nature and Self", and Burton Watson's "Selected Poems of Su Dong-p'o"

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第九至十句）。

在詞的下闋，詩人質疑月亮理想的象徵含義，為何在中秋節期間特別明亮圓潤，是否暗示著朋友家人的團圓。一〇七六年的中秋節，詩人蘇軾與其胞弟蘇轍（子由）已分開了兩年，所以詞中提及「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詩人自知事態，在懷有對月色之美的仰慕之情下，以「千里共嬋娟」作為結尾。

蘇東坡（蘇軾）

蘇軾（一〇三七年至一一〇一年），或曰蘇東坡（這名字似乎更廣為人知），是中國文學史上最偉大的文學家之一，也是宋代首屈一指的大詩／詞人。他在科舉考試中表現出色，在朝廷中擔任職務，卻因公開反對變法，而多次遭貶謫，以致其政治生涯遠離政治中心開封。他不僅是優秀的詩／詞人，散文也寫得好，在繪畫上更是開創了新的畫派，並熱衷鑽研草藥、煉金術，更是一名學士。[18]蘇軾曾任職於各個州府，發起了法律程序和市政機制，在大江南北建設了無數個公共項目，如修建橋樑、解決饑荒、防範洪災、疏湖和挖井等。

儒家語境下的中國宋朝

蘇軾所在的中國宋朝時代（九六〇年至一二七九年），儘管孔子已經逝世千年，但當時朝廷與整個社會氛圍仍舊深受儒家思想教義與實踐的影響。此時，儒家思想的框架已經融入中國社會，形成了以科舉、學經包括儒家文學為基礎的階層式朝廷和教育體系，並通過這些制度，確保有大量可以統治或教育的官僚。而蘇軾所受的教育則略有不同，從小父親施以綜合方式教育，這讓蘇軾不僅飽讀包括孔子等名家的著作，還涉獵了道教和佛教[19]的宗教思想。

然而，他的生活方式、學術和政治觀體現，乃至形上學和宗教哲學觀，都超前於新儒家學派[20]，甚至新儒家是在他死後才會出現的學派。在他的整個官場生涯中，他反對王安石宰相發動的改革，大部分時間都在遠離京師之地任職，在人生不同階段的十一年裡各別被調遣到

17 在一九九〇年代，此流行歌曲因與分離、渴望和愛情有所關聯，而成為了卡拉OK的榜上點播熱門金曲。演唱者們抒發的情感傳達了共有的愛意，而並非原著中對胞弟的思念之情。

18 Michael Fuller, "The Road to East Shore", p. 1.

19 ibid., p. 44.

20 這種形式的儒家思想發展成為一個綜合了形上學、倫理學、社會理想、政治抱負、個體紀律和自我修養的完整的哲學體系。

三個不同地方。因此，蘇軾的立場和官職使他在他有生之年中，有別於當時盛行的宮廷意識形態與世俗條規。

蘇軾創作的宋詞

作為詩／詞人，蘇軾留下了大量優秀的作品，現存有他從一〇五九年至一一〇一年間創做的約兩千四百首詩詞[21]。他在這一時期創作了各種形式和題材的作品，皆反映了他的思想、行為和情感。由於蘇軾在他的大部分詩詞裡都有標注日期並講述背景，因此後來的研究者可得知他創作風格的演變、他的政治生涯、他的「自然之理」哲學觀以及佛教對他創作上的影響。

在他的大部分作品中，每首詩詞都可被視作是一個時期或一個情境的昇華，字裡行間記錄了詩人的情緒和心境。它們從不超過詩詞的段落，因此可以被視為獨立存在的簡潔表達。此外，這些作品也可以被理解成蘇軾通過學術形式所記錄的人生日記或個人筆記。作品涵蓋了洗頭、墊枕、散步、吃飯等日常事件，也少不了那些特別事件，如參觀寺廟、牢獄之災、貧困潦倒、與兄弟朋友的重聚。

許多詩歌都標誌著特殊時節的所思所想。除了這些佳節留痕之外，他在一些詩詞中還運用了直喻抑或隱喻的手法描述了他遠足旅行的經歷。下面這首寫於一〇七二年的詩主要展示了

詩人的雅興：

人老簪花不自羞，花應羞上老人頭。
醉歸扶路人應笑，十里珠簾半上鈎。

《但願人長久》是眾多作於中秋節的詩詞之一。中秋節是個少不了美酒、慶賀和沉思的日子，這首詞帶有隱喻之餘卻不失張力，這可能是它在改編後成為流行歌曲的原因。

蘇軾詩詞中的「無心」

蘇軾對治國之事一直躬行仁政，詩詞中對眾生的描寫，都讓研究者們在他身上觀察到「仁」的體現，但這種「仁」並非來自儒家思想，而是佛教[23]。在他的詩詞中，可以發現他描

21 Burton Watson, "Su Tung-p`o: Selections from a Sung Dynasty Poet", p.14.
22 Vincent Yang, "Nature and Self", p. 12.
23 Ronald Egan, "Word, Image and Deed in the Life of Su Shi", p. 148-9.

述了一生中到訪過的許多寺廟，以及禪宗佛教思想和觀念的表達。特別有趣的是「無心」和「空心」的狀態，這種無私的境界消除了蘇軾的一己私利之心，使他對外界世事更加敏感，並沉浸在世俗事務中。該信念的教誨為，如果內心不受束縛，它可以自由且無私地應對任何人事物和所有現象[24]。

在蘇軾的大部分詩詞中也體現了自然界裡的元素和現象。除了上述對世間眾事物的同理心之外，由於官職調遣以及旅行遠足，令他在遊歷各地時，能持續地以各種形式與大自然對話。研究者們認為，他晚年對大自然的抒寫，緩解了他在追求傑出的京城官職生涯與對田園生活的渴望[25]之間糾結的緊繃情緒。

恰逢這一年一度月亮最圓且最亮，也是傳統上親朋好友相聚歡慶的時刻，蘇軾透過《但願人長久》，再次與大自然對話。當時蘇軾把酒對月歌，可惜身邊卻沒有兩年未見的弟弟陪同。他透過這首詞與月亮建立了一層關係，一個月亮所屬的獨立世界和他在地球上的另一個世界。他將自身的願望和渴望投射到這層關係中，反映在遠方寒冷的「高處」[26]，接受自己那悲歡離合的處境。然後，他以「此事古難全」感歎自古以來難有十全十美之事[27]。詞的最後兩句，蘇軾以能與其弟子由同時注視並欣賞的月亮作為心靈與時空的紐帶，祝願子由平安健康[28]。

中國海峽對岸的台灣流行音樂產業正蓬勃發展，盛行將古文改編並以新形勢再現。儘管目前中國與台灣正處政治僵局，但中國和台灣都共享著古代文獻、文學和哲學等中華遺產。孔子的教誨、蘇軾的詩詞等古代著作，在兩地和海外華人中廣為流傳。然而，由於美國、日本等影響因素[29]，再加上台灣在音樂產業上更悠久的歷史，台灣的流行音樂文化在與中國大陸相比時，顯得更加前衛和多樣化，這一點是大眾公認的。

《但願人長久》這首歌先後由兩位女藝人錄製，分別是一九八〇年代的鄧麗君和一九九五年的王菲。雖然聽眾所聆聽的歌曲是以蘇軾詞作的原文為歌詞，但由於這首歌是由女歌手演繹的關係，所以最後兩句歌詞常被詮釋為男女之間的感情。歌曲一經推出就很受歡迎，這得

24 Ibid., p. 158.

25 Vincent Yang, “Nature and Self”, pp. 11-12, 24.

26 這或許是蘇軾身為學者的一部分，或不得不與之相關的在宮廷地位的反映。

27 Watson 的翻譯省略了一行「此事古難全」，意思是「自古以來，完美是一件難事」。

28 詞曲創作者詮釋的「但願人長久」，指的是廣大群眾，但由於前奏中所提及的奉獻而在此處被理解為子由。

29 Fang-Chih Irene Yang（楊芳枝教授），“A Genre of Popular Music in Taiwan”, p. 87.

益於歌手的巨星地位和該歌曲的優良品質。它被認為是一首「感傷的歌曲」，除了偶爾在廣播電台播放之外，也作為亞洲各地卡拉OK酒吧中的熱門點播歌曲，繼續了它的第二春。

鄧麗君和王菲兩位歌手有著不同的公眾形象。被稱為「台灣女歌手」的鄧麗君在她的整個職業生涯中保持著無醜聞、品貌兼優、健康優良的形象，直到一九九五年她去世前，在台灣、香港、日本、東南亞和美國都很受歡迎。王菲是華語樂壇天后級的歌手，她憑著獨特的嗓音和拒絕順應潮流的風格收穫了不少粉絲。兩人基於不同的原因演繹《但願人長久》：鄧麗君透過此抒情歌曲練就清亮悅耳的音色；而一直以來崇拜著鄧麗君的王菲，則是為了致敬偶像的「頹廢音樂」。因此，王菲一反常態地[30]以讓人聯想到鄧麗君的「清亮悅耳的音色」演繹自己版本的《但願人長久》。

關於儒家思想的饒舌作品，最初是作為戲劇《又一夜他們說相聲》中的一個場景演出的。該劇於一九九七年在台北國家戲劇院上演，由賴聲川導演領銜的台灣劇團表演工作坊構思。《子曰》的演唱者卜學亮在劇中飾演補習班老師一角，頂替劇情裡缺席的中國哲學大師出席華都西餐廳[31]的晚宴。其餘五幕劇的部分涉及了傳統概念以及老子和陰陽學等。這部戲的結尾傳達了一個模棱兩可的信息，即當代人可能無法理解古代哲學，但在某些方面他們已經吸收了它們[32]。

劇中大師寓言般的缺席是對當代中國社會傳統哲學觀念消失的寓意：這是該劇團以相聲

為媒介推出的現代劇場系列中的第三部。一九八五年和一九八九年時，該系列的早期戲劇探討了傳統和古代藝術形式的喪失[33]。而在一九九七年的劇本中，卜學亮作為補習班老師的角色則描述了世人試圖糾正這種文化消失的情況。

因此，戲劇和饒舌中的卜學亮頂替了哲學家，他必須使儒家思想的信條與當代觀眾相連，並確保其合乎當下時代。劇中，饒舌被選為最適合的相聯媒介，因為它在語言的形式上發揮了極大作用，尤其是對年輕觀眾更為顯著：在饒舌表演中，卜學亮穿著低調以識別「時髦群眾」。雖然該劇在一九九七年僅獲得了部分觀眾的青睞，但該饒舌作品在發行後的短時間內就廣受普羅大眾的好評，可是之後隨著音樂界浮現的新面孔和新流行歌曲，其流行度逐漸消退。

本文描述的兩部跨界作品是由華裔知名藝人以饒舌或歌曲形式演繹呈現的。鄧麗君和王菲被視為歌壇天后，她們演唱過的歌曲種類繁多；而卜學亮則以主持人和演員的身分聞名。相較於更為年輕且激進的歌手們因需要積攢粉絲群而持續演繹相似的作品，這些成名藝人即

30 王菲的演唱風格在與 Bjork 和 Cranberries 相比之下，被形容為「獨立搖滾／硬地搖滾」。

31 「華都」的意思是「中國都市」，或許是對華人世界的一個隱喻。這裡的「西餐廳」一詞，意為「西洋式的餐廳」。

32 參考自 Cyberstage Taiwan. www.cca.gov.tw/theater/twall/drama/framep03-v2.htm

33 相聲，是由兩個或兩個以上表演者進行的詼諧幽默的對話，本身就是一種在中國和台灣消失的藝術。

使創新實驗性地採用古文融入自己的作品中，也不會對他們現有的事業產生不利影響。

結論

如之前所述，中國古詩文中的節奏與韻律使其可輕易地被改編為樂曲，或以其他聲音媒體表達。然而，鮮有古文被重塑並出現在流行音樂市場上的例子，這可能是因為年輕的華語聽眾對這些文本及其歷史背景的意義興致缺缺。或者也極有可能是因為他們對歌曲主題所產生的共鳴，更多的是源自於與他們的生活和需求息息相關的題材。在本文中，我各選一首饒舌作品和流行歌曲，它們在過去和現今之間建立了有趣的文化與哲學聯繫，對比了這些跨界文本的原始作者——孔子和蘇軾的立場和目的，還有之後演繹了新版本作品的演出者們。



Bahm, Archie I., 1969. *The Heart of Confucius: Interpretations of Genuine Living and Great Wisdom*. Asian Humanities Press, Berkeley

Cleary, Thomas, 1992. *The Essential Confucius: The Heart of Confucius' Teachings in Authentic I Ching Order*.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New York.

Dawson, Raymond, 1981. *Confuciu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Egan, Ronald C., 1994. *Word, Image and Deed in the Life of Su Shi*.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Monograph Series 39,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Massachusetts

Fingarette, Herbert, 1972. *Confucius – The Secular as Sacred*. Harper & Row Publishers, New York.

Fuller, Michael A., 1990. *The Road to East Slope: The Development of Su Shi's Poetic Voic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California.

Heng Chye Kiang, 1999. *Cities of Aristocrats and Bureaucrats: the Development of Medieval Chinese Cityscapes*.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Singapore

Le Gros Clark, Cyril Drummond, 1931. *Selections from the Works of Su Tung-p'o*. Jonathan Cape, London.

Li, David H., 1999.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A New Millennium Translation*. Premier Publishing Company, Maryland.

Lin YuTang. 1943. *The Wisdom of Confucius*. Random House Inc., USA.

Shusterman, Richard. 1992. "The Fine Art of Rap". In *Pragmatic Aesthetics: Living Beauty, Rethinking Art*. Basil Blackwell, Oxford.

Watson, Burton. 1965. *Su Tung-p'o: Selections from a Sung Dynasty Poet*.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Watson, Burton. 1994. *Selected Poems of Su Tung-p'o*. Copper Canyon Press, WA.

Xu, Yuan-zhong. 1982. *Su Dong Po – a New Translation*. The Commercial Press, Hong Kong.

Fang-Chih Irene Yang. "A Genre of Popular Music in Taiwan". In *Popular Music and Society*. Vol. 17:2, Summer 1993, Bowling Green State University Popular Press, Ohio.

Yang, Vincent. 1989. *Nature and Self: A Study of the Poetry of Su Dongpo with Comparisons to the Poetry of William Wordsworth*. Peter Lang Publishing Inc. New York.

音樂專輯

卜學亮（阿亮），二○○○年。《子曰》，收錄於《我愛阿亮》專輯，由台灣的豐華唱片發行。

鄧麗君，二○○○年。《但願人長久》，收錄於《懷念五年．鄧麗君逝世五週年紀念集》，由環球音樂發行。

王菲，一九九五年。《但願人長久》，收錄於《菲靡靡之音》，由台灣新藝寶唱片發行。

網絡資源

Eva Tsai, "Chinese American Pop Stars Discovered in Taiwan", from www.taipei.org/teco/cicc/currents/11-1297/11-1297.htm (26 Nov 00).

Carrie Gracie, "China Rap", from www.bbc.co.uk/radio3/china/chineserap.shtml (26 Nov 00).

Nai Hong Ng, "Wishing Man Lasts", from www.fayemusic.swsites.net/WishingManLasts.html (12 Dec 00).

Cyberstage Taiwan, www.cca.gov.tw/theater/tvwall/drama/framep03-v2.htm (12 Dec 00).



好萊塢膠卷中的新加坡

早在一九二八年，新加坡已成為好萊塢電影的題材。《新加坡之雪兒》（*Sal of Singapore*）是目前所知首部以新加坡為名的好萊塢電影。從那時候到上世紀七〇年代，好萊塢拍了十三部以新加坡為背景的影片，其中幾部的片名中還出現新加坡（Singapore）字眼。

新加坡曾是英國殖民地，不少英國與西方作家曾途經而留下遊記，或寫下小說，如喬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薩默塞特・毛姆（Somerset Maugham）、諾維・考沃（Noel Coward）、魯德亞德・及布林（Rudyard Kipling）等。他們記錄下新加坡的風土民情，以及本地或歐洲社群生活景象。這些文字在西方頗受歡迎，也成為英語世界讀者接觸新加坡的入門。

此類文字雖然難免帶有殖民色彩，可是描述當地人與殖民者的關係，卻與其他殖民地地

區不同，不是簡單的主僕黑白關係。這或許是因為，與其他殖民地不同，英國人取得新加坡控制權的過程中不需要動用暴力。

美國人與英國人的視角不同

早在十九世紀，來自世界各地的商人和移民已經在新加坡島上組成一個多元文化的城市。美國人在這個英國所統治的島嶼上，扮演的是商人或旅客角色，所以好萊塢眼中的新加坡，又與英國人的視角有所不同。

電影《新加坡之雪兒》改編自戴爾．柯林斯（Dale Collins）在一九二七年的小說《多愁善感的人》（*The Sentimentalists*）。劇情描述名為雪兒（Sal）的白人少女，乘帆船來到東南亞，旅途中與兩男發生戀情。

電影完成於一九二八年，隔年上映。有聲電影在當時是新鮮事，這影片中僅部分有聲對白。最引人注意的是，埃利奧特．克勞森（Elliot Clawson）在一九三〇年獲提名角逐第二屆奧斯卡劇本獎。

十三部影片中三成的片名與女性有關

第二部片名中有「新加坡」字眼的好萊塢影片是《新加坡之蘇兒》（Singapore Sue），拍攝於一九三一年，是部黑白歌舞短片。劇情圍繞新加坡一家酒吧，男主角是著名影星加里・格蘭特（Cary Grant），飾演美國水手，不斷向賣布娃娃的華人少女調情。這是紅星格蘭特的銀幕處女作。

兩片中都出現一些「當地人」。《新加坡之蘇兒》開場是酒吧外街景，有不同種族的人，很多元文化。雖然前一部影片女主角是洋人，後者是亞洲人，可是在片名中以地名與女人名字相連，明顯帶有男性與帝國主義視角，這是好萊塢在以「非西方」地區為題材時常用的手法。

截至一九七〇年代，在十三部以新加坡為背景的好萊塢電影中，有三成的片名與女性有關，除了以上兩部，還有一九四一年的《新加坡女人》（*Singapore Woman*）、一九四一年的《來自新加坡的金髮女郎》（*The Blonde From Singapore*）、一九六七年的《新加坡之戀》（*Pretty Polly*）。

電影在十九世紀末出現，正是殖民主義高潮期。它與地圖、攝影一起，成為人類學者、傳教士及其他殖民代理人「發現」、記錄與控制殖民地文化的工具。百多年來，電影改變角色，成為全球性娛樂事業，可是主要生產地還是在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國，所以難免繼續戴著有

色眼鏡。這裡就以三部電影為例，看看好萊塢膠卷中的新加坡。

這三部有關新加坡的電影，拍攝於一九四〇年至一九七八年間。前兩部片名中也有「新加坡」字眼，第三部則是首部完全在新加坡拍攝的好萊塢電影。選它們為例，一來因為在美國錄像帶市場上還不難找到，二來拍攝時間正好介於二戰開始與越戰結束之間，是一段重要的歷史時期。

《新加坡之路》——美國人遁世思想的投射

一九四〇年拍攝的《新加坡之路》（*Road To Singapore*），劇中男主角馬倫（由賓·克羅斯比〔Bing Crosby〕飾演），原是船務王國繼承人，他卻拋下一切與好朋友南立坎（鮑勃·霍普〔Bob Hope〕飾演），登船航向新加坡。

他們沒有抵達新加坡，卻到了虛構的凱昆島（Kaigoon）。在島上，他們救了一個女人美瑪（多蘿西·拉莫爾〔Dorothy Lamour〕飾演）。美瑪後來搬去與他們同住，還管教起他們。馬倫的父親與未婚妻隨後追來，把他帶回國。多年後，馬倫再訪東南亞，在一個現代港口（指的是新加坡）與南立坎和美瑪重逢。

《新加坡之路》在一九四〇年上映，票房大賣，成為該年十大賣座影片之一。克羅斯比、

霍普和拉莫爾的組合，或許是票房保證，可是美國經過大蕭條，經濟才開始復甦卻又即將捲入歐陸戰爭，不少美國人心中想必有遠離文明，遁入遙遠陌生世界的念頭。

片名上有「新加坡」純屬偶然。籌劃時，影片原是*Road To Mandalay*，開拍時才改成新加坡，製片人說那聽起來更「驚險」。其實主要是為了不與另一部《通往曼德勒之路》（*On The Road to Mandalay*）撞名。哥倫比亞電影公司當時也籌拍名為《新加坡》的史詩影片，雙方為了《新加坡》這名字還作了交涉。哥倫比亞的影片後來卻沒拍成。

影片是想帶觀眾「逃離」美國，馬倫與南立坎到凱昆島後，卻未丟下美國。他們帶來美國人的觀念、道德、娛樂，嘲笑當地人沒見過雪，還要他們以美元交易。當他們窮途末路時，卻塗上泥巴，穿上紗籠，扮成當地人騙吃一頓，可見融入當地社會不是能不能，而是需不需要的問題。

《新加坡》展現不同殖民勢力的交鋒

一九四七年的《新加坡》（*Singapore*），主角高登（弗萊德·麥克莫瑞〔Fred MacMurray〕飾演）於二戰前專門在新加坡走私珍珠。戰後他回到新加坡，尋找為躲避英軍及日軍而埋藏起來的珍珠。想不到卻發現戰前女友琳達（艾娃·加德納〔Ava Gardner〕飾演）

還活著，患上失憶症，而且已嫁給另一洋人。高登努力尋回珍珠，琳達努力尋回記憶。琳達被人綁架，被高登救出，卻受傷昏迷。高登終於放棄尋找珍珠，乘飛機回美國，琳達卻突然醒來並恢復記憶，趕上飛機，有情人終成眷屬。

為了使畫面看起來更道地，影片穿插了一些戰前戰後新加坡景象的真實影片，如加冷機場鳥瞰鏡頭、萊佛士坊、牛車水等。他們也搭建梧槽河邊的場景，片中的酒店也以萊佛士酒店為樣本。影片中其他的新加坡場景，實際上是由虛景實境組構出來的。

琳達為尋回記憶，到梧槽河尋訪戰前女傭。鏡頭隨著她，觀眾看到華人和馬來人雜居的社區，河邊有磚屋與浮腳樓，當然，當地人穿著都較破爛。片中的英國人，不是警察總監就是牧師，被塑造成殖民地主子。琳達雖是白人，她能說馬來話，獨自在島上自由活動，其實她也代表「當地人」。她與兩個白人（一美國人，一歐洲人）的關係，或許反映不同殖民勢力的交鋒。

有趣的是，影片中，美國人最後贏得美人歡心，取代了歐洲人。而且琳達在就要嫁給高登時突然失憶，後來當他回來，她才記起「生命中那段最快樂日子」。兩年前美國投下原子彈使日本投降，結束太平洋戰爭，兩年後拍攝的《新加坡》，或許是要提醒大家：「別忘了是誰帶來和平。別忘了，我們美國人一向與當地人友好相處。」

《聖徒傑克》（Saint Jack）是一九七八年的作品，根據保羅・索魯（Paul Theroux）同

名小說改編。主角傑克（本．加薩拉〔Ben Gazzara〕飾演）於五〇年代來到新加坡，白天在碼頭船上售賣船需品，晚上拉皮條。影片從頭到尾全在新加坡取景。

影片在美國上映沒引起注意，卻在一九七九年威尼斯影展上奪得評審大獎。它沒有在新加坡上映，根據導演彼得．博格達諾維奇（Peter Bogdanovich）所說，新加坡當局雖然知道影片在當地拍攝，過程中卻不知道影片如何描寫新加坡。影片被禁映，主要是因為片中有成人性表演鏡頭，以及影片把當地性行業與越戰扯上關係。

一九七〇年代，代表殖民最後勢力的英軍在一九七一年完全撤離新加坡。作為獨立國，新加坡在外資進入及越戰背景下，踏上經濟建設之路。

傑克是「紅毛」，卻為華人頭家打工。他左右逢源，公司靠他接觸當地人打不進的洋人圈子，他也趁機會為外國人提供當地女人。

片中的英國人被描繪成待在已不屬於他們的土地上的滯留者。俱樂部中有一群醉醺醺，談無聊話的英國人，他們後來也光顧傑克在武吉知馬開的妓院。有一場戲，英國人罵華人侍者說，英國人把這島嶼搞繁榮，當地人卻絲毫無感激之情。

傑克的妓院被敵對華人團夥縱火後，在美國老闆協助下，搞起專供越戰美軍花天酒地（R & R）的「逍遙窟」。戰爭快結束時，老闆要他設圈套陷害一名美國將軍。他在最後關頭良心發現，將性醜聞照片丟入新加坡河，這也粉碎了自己回美國的希望。

傑克很吃得開，有很多朋友和門路，他既是外國人也是當地人，這與前兩部影片中洋人形象很不一樣。影片結尾時，傑克從李德橋（Read Bridge）走入克拉碼頭，沿途與人打招呼，漸漸融入人群。

從加里·格蘭特到本·加薩拉，這些好萊塢紅星演出了所謂表現新加坡的好萊塢影片，在西方觀眾腦海中留下印象，也帶動塑造及影響了他們對新加坡的看法。三部影片的場景由虛變實，而「當地人」角色也從「土族女性」逐漸由「紅毛男性」取代，說明西方通過電影對異地的認識有所改變。隨著經濟關係凌駕歷史的政治關係，傑克所代表的已不再是過去的那種簡單的「種族與性別」視角。

雖然編劇與導演有一定的政治與商業動機，卻通過傑克這角色表現了新加坡的多元種族多元文化特性。值得一提的是，新加坡的這種多元性在好萊塢眼中並非曇花一現，而是早從一九二八年首部與新加坡扯上關係的影片就開始存在了。



圖15-1：一九二八年《新加坡之雪兒》（*Sal of Singapore*）電影劇照。



圖15-2：一九四〇年《新加坡之路》（*Road to Singapore*）電影劇照。



圖15-3：一九四七年的《新加坡》（*Singapore*）電影海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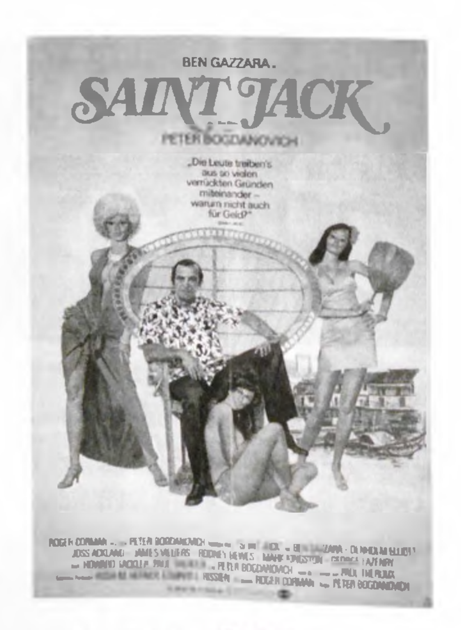


圖15-4：一九七八年好萊塢電影《聖徒傑克》（*Saint Jack*）德語海報。



圖15-5：《聖徒傑克》（*Saint Jack*）電影劇照。

想像南洋：王家衛電影中的香港及東南亞

王家衛是具有獨特風格的電影導演。在他執導的電影中，其中三部出現了同樣名字的角色，不得不讓學者視它們為「三部曲」。按發布順序排列，這些電影是《阿飛正傳》（一九九〇）、《花樣年華》（二〇〇〇）及《2046》（二〇〇四）。其中一位主角蘇麗珍，在前兩部電影中由張曼玉飾演，在第三部電影則由鞏俐飾演。雖然只在第一部電影的結尾以無名露面，報人周慕雲（梁朝偉飾演）卻是後兩部電影中的另一個主角。

儘管三部曲以香港作為電影的主要場景，我想探討電影中所含括的一九六〇年代東南亞華人（Chinese diaspora）之推論性構造。在這篇文章中，我將論證這三部電影共同記錄了處於殖民歷史時期的香港，以及東南亞之間的空間和環流。電影製作人在這些電影中對情節詳細描述的關注，使得思想、民眾、產品跨越南中國海移動傳播，進而促成戰後國際大都會網

絡中的歷史性、地理性、社會性與空間性世界。通過引用戰後時期的作品——王家衛的「三部曲」、現存文學作品及其他媒體形式，我將進一步論證該時期東南亞與香港華人之間的不可分割性。

東南亞華人

在《海外華人百科全書》（*The Encyclopedia of the Chinese Overseas*）（一九九八年）中，一個題為「代表各類型華人的符號」的圓形圖表，被用以視覺化地描繪中國大陸與其移居範圍的關係。[1]圖表的中間是一個代表中國大陸的內圓圈，而內圓圈被三個同心圓環圍繞著。第一個圍繞「中國大陸」的同心圓環由四個等弧部分組成，分別標記為「香港」、「台灣」、「有抱負的商人」及「學生」，而最外圍的第三個圓環則代表那些長期定居在外地且已被同化的。在第一與第三個圓環之間的粗圓環，被標記為「海外華人」（Overseas Chinese），粗度間接表明其人口數量大於另外兩個圓環。在第二和第三個圓環、第一和第二個圓環之間，標有多對方向相反的箭頭，以闡釋不同圓環之間的人口流動與關係。代表「中國大陸」的核心圓圈與第一個同心圓環的所有象限之間則沒有箭頭，間接表明兩者的「親近」關係。

在一定程度上，該圖表闡明了現今不同類別的移居者（diaspora），而非大部分學術研究

中引用的、常被合併為單一的「海外華人」身分。然而，我們需要留意該圖表無法描繪與呈現不同歷史時期裡的圓環粗度波動，以及某些區域的人口流動之受限。代表「海外華人」的圓環也不會在地理上進一步增大，因為遍布全球一百四十個國家的海外華人中，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僅集中定居於東南亞的十個國家中。

王家衛的電影在表面上破壞了上述圖表的易讀性。他的電影敘述從香港開始，再貫穿日本、越南、柬埔寨、菲律賓、新加坡及美國的移居者社群。比如，《春光乍洩》中，梁朝偉與張國榮所飾演的伴侶爭執不休，之後一同在布宜諾斯艾利斯（Buenos Aries）生活，而梁朝偉所飾演的角色最終去往台北。《重慶森林》中，我們能看到何志武（金城武飾演）的父親——重慶大廈管理者——是個口操閩南語的移民。在《阿飛正傳》、《花樣年華》及《2046》的三部曲中，移居者的角色再次被塑造，且尤其著重於東南亞的移居者。在前兩部電影的三分之二劇情中，主角從香港分別前往菲律賓或新加坡；在第三部電影中，這些空間則是被同時展現的。

《阿飛正傳》中，阿飛（張國榮飾演）發現自己的親生母親居住在菲律賓，便拋下香港的一切前往菲律賓。當自己被生母拒絕會面後，他躲避到馬尼拉（Manila）的唐人街，卻弄

1 Lynn Pan, *The Encyclopedia of the Chinese Overseas*. Singapore: Editions Didier Millet, 1999, p. 14.

丟了自己的隨身物品，最終在菲律賓死去。《花樣年華》中，周慕雲是個到新加坡尋找新工作的作家。他之所以離開香港，是為了避開那些關於自己婚姻狀況的流言蜚語。《2046》中，三角部分（香港、菲律賓、新加坡）的敘述情節將透過周慕雲的角色得到證實：周慕雲遇見露露，而露露的男朋友便是英年逝世的菲律賓華人（《阿飛正傳》）；周慕雲向露露坦白自己在香港時，曾躲藏在酒店裡撰寫武俠小說（《花樣年華》）；一九六九年，周慕雲回到新加坡尋找另一個蘇麗珍（鞏俐飾演）。

在王家衛的電影中，角色都經歷了移居、安頓、生活於離散空間的困難。《阿飛正傳》中，由劉德華飾演的水手超仔抵達馬尼拉，對一家據稱香港人常光顧的酒店的接待員說華語，但他之前在香港生活時只說粵語。《花樣年華》中，周慕雲透過人脈找到了新加坡報刊——《星洲日報》的工作，並在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六年間居住在一棟無電梯公寓。他與知己阿炳能在路邊攤自在地用餐，也能融入街道上的日常生活。來新加坡探訪周慕雲的蘇麗珍能找到他的居處，更能進到他的公寓內。這些空間網絡中的流動是很流暢的。

香港的東南亞

在地理位置上，香港處於南中國海的北部邊緣，與東南亞連接。在眾多東南亞國家中，

香港最靠近菲律賓，故被其颱風及氣候情況影響。[2]歷史上，菲律賓人很早便開始移居到香港海岸，目前則有十四萬名菲律賓人在該地居住與工作。菲律賓國家英雄扶西．黎剎於十九世紀被流放至該地，而第一面菲律賓國旗正是在香港設計與製造的。

由於香港與其他東南亞國家同樣經歷了漫長的歐洲列強殖民期，以及相似的戰後經濟情況，兩者的政治史亦相互連接。十六世紀初，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法國及美國在東南亞各地開拓殖民地。基於西班牙、英國、荷蘭及美國的殖民利益，「馬來世界」（Malay World）被分配成菲律賓、汶萊、馬來西亞和印尼。一九四五年後的去殖民化過程促成了這些國家的獨立及自治，但在冷戰時期，當地及跨國社群就已立即強調獨立自治，以爭取建國的合法性。然而，香港沒有與這些國家享有同樣的命運，它的命運在一九九七年之前繫於不列顛，之後也將在二〇四七年繫於中國。

一九四九年後，中國成為共產國家，而香港與東南亞的政治、經濟、社會及知識空間便交織在一起。兩個重要的影響隨之產生：首先，各種中國社群移民到香港、東亞及東南亞；其次，香港及東南亞海外華人開始關注並探尋共同的南洋身分，這是因為兩者之前與中國的聯繫已經被不同程度地拉緊、抽離或切斷。南洋華人身分在香港的發現、連接或創造，對香

2 《花樣年華》中，蘇麗珍的辦公業務因菲律賓颱風而中斷。

港人創造相應的身分認同有所幫助，這類似於東方主義如何描述西方的身分。[3]有關第二個影響，我們可以再回顧一九五〇年後的美術、文學、音樂和電影中的南洋身分探尋。比如，「南洋藝術風格」是畫家去往峇厘後，在新加坡所命名的。這是為了要正式化繪畫或創作題材處理的新角度。在這個時期裡，娘惹女人——當地化、性別化、混血的東南亞居住者——在香港電影中的不同主觀表達方式裡被刻板化。[4]

基於兩個主要原因，新加坡和香港的電影業已在一九五〇年代連接。第一，兩次大戰之間，三大電影製作公司——邵氏、國泰、光藝都把總部設在新加坡。羅卡（Law Kar）寫道：「陸運濤、邵氏、何氏是海外華人和真正的多國籍人士……在未來的十年與以後，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參與將加速香港電影業的工業化、現代化及文化多元化。」[5]第二，一九五二年中國關閉市場後，東南亞（除了台灣）成為香港電影的主要「賺台」。新加坡和馬來亞成了香港電影製作與傳播的基地，因為兩地的海外華人人口眾多，而東南亞各國逐漸崛起的國家主義讓政府推廣本地語言與發展本地電影產業。[6]

張建德指出，光藝製片公司製作的「南洋三部曲」把「南洋」描述得等同於新加坡與馬來亞，這是「指涉一種同樣受不列顛管治，既屬英國殖民地又擁有龐大華僑人口的共同經驗」。[7]然而，隨著邵氏兄弟於一九六七年關閉新加坡的製片廠，以及國泰克里斯公司（Cathay-Keris）於一九七三年逐漸撤回生意，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本地電影產業在一九六〇

年代末開始走下坡。光藝製片公司也在一九六〇年代後減少其粵語電影。

一個時代的水果

為了以動盪的一九六〇年代作為三部曲的時代背景，王家衛將三個紀錄片片段拼接到他的「虛構敘事」中，以描繪出一個區域仍沉浸於殖民主義優先及冷戰結束後的一段時期裡。《花樣年華》片尾中，法國總統夏爾．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於一九六六年九月訪問金邊的片段，被用以與報人周慕雲（可能是到柬埔寨去報導該事件）對著吳哥窟牆壁洞口悄聲傾訴祕密的片段進行對比。戴高樂於柬埔寨的首都發表了精彩的演講，聲明不支持美國參與越戰，

3 有關「東方主義」的討論，見愛德華．薩依德（Edward Said）的同名書籍《東方主義》（*Orientalism*）。

4 這些電影包括《娘惹》（一九五二）、《娘惹與峇峇》（一九五六）及《娘惹之戀》（一九六九）。

5 Law Kar and Frank Bren. *Hong Kong Cinema: A cross-cultural View*. Lanham: Scarecrow Press. 2004, p. 164.

6 Chu Yingchi. "Hong Kong Cinema as Chinese Diasporic Cinema, 1956–79". In *Hong Kong Cinema: Colonizer, Motherland and Self*. London: Routledge Curzon. 2003, pp. 22–41.

7 張建德〈新加坡銀幕記憶：光藝「南洋三部曲」〉，黃愛玲編《現代萬歲——光藝的都市風華》（香港：香港電影資料館，二〇〇六年），頁一四五。在另一部電影《椰林春戀》（一九六九）中，主角去到柔佛、馬六甲、吉隆坡、檳城和太平，儘管電影的主要情節取景於新加坡。

並呼籲美國撤軍。《2046》的片頭植入了兩場似乎在香港發生的暴動，兩者都與殖民主義分裂有關。一九六六年的天星小輪加價暴動和一九六七年的親左派暴動都可歸咎於香港人對殖民統治的不滿。這三個片段都在暗示著南中國海周邊尚未結束的政治輪替。

對香港城鎮的觀眾來說，能讓他們辨別香港與南洋電影空間的，即是赤道氣候中銘刻的「熱帶特質」與意象，以及南洋加工處理的水果和產品。這些森林、種植園、花園及熱帶水果（如榴槤、椰子或鳳梨）都被當作空間或過渡隱喻的替代。從一九五〇年代開始，許多電影的名字或取景地點都提示或描繪了展現南洋風格的果樹。[8]這些隱喻神祕地回到王家衛的三部曲中：《阿飛正傳》的電影片頭是一個五十秒的追拍——從火車車廂望向椰子種植園的慢鏡頭，配以羅絲印第歐斯（Los Indios Tabajaras）《常駐我心》（Always in My Heart）的配樂。[9]公路和鐵路通行的種植園，是可在東南亞各地見到的殘餘殖民地空間。種植園在以前是基於殖民利益及需求而建立的，現在卻因其長久存在的幾何形狀而受到牽連。

《花樣年華》中，椰樹再次被引用。爪哇小曲《美麗的梭羅河》（Bengawan Solo）的旋律伴著一棵在藍天中構成剪影的椰子樹，幕間字幕的引言寫道：「新加坡，一九六三」，介紹了周慕雲處在的城鎮與赤道城市。《花樣年華》中，吃熱帶水果——榴槤的一幕被拍攝下來：王家衛拍攝了梁朝偉抵達新加坡後吃榴槤的一組鏡頭，但之後被剪輯刪減了。配合該鏡頭的字幕如是寫道：

> 「那是抵達新加坡的第二個星期，他走去『山芭』一個遠親的家裡，那遠親在山芭設農場為生。他在那個農場裡看到不少榴槤樹，也聽到不少關於榴槤的傳說。他的遠親告訴他：榴槤是水果之王，喜歡吃榴槤的新客不會回唐山去……」[10]

熱帶水果的攝取與南洋熱帶的適應劃上了等號。在香港，無論是新鮮或醃製的熱帶水果，在一般人家中及食肆都很有名。如梁文道所言：「那時候的香港，街上的冰室會賣咖央多士，家裡的零嘴少不了椰子糖。」[11]王家衛也曾在電影中引用水果：《重慶森林》中，警察二二三（何志武）為快要過期的鳳梨罐頭投入太多的意義。有者認為王家衛引用熱帶水果及植物的行為，指向早期香港和南洋之間的認知與物質關係。

8 比如《馬來亞之戀》（一九五四）、《雲裳豔后》（一九五九）、《椰林月》（一九五七）或《榴槤飄香》（一九五九）。

9 這段配樂在電影中還有再出現兩次：其一是阿飛走在一個種植園裡時，其二是他在火車車廂內奄奄一息時。

10 這段文字改編自《花樣年華》的靈感來源——劉以鬯《對倒》。

11 梁文道〈南洋香港〉，刊於《蘋果日報》（二〇一三年一月二十五日），取自：http://www.commentshk.com/2013/01/blog-post_25.html（瀏覽於二〇一三年四月十五日）。「咖央」是一種由椰漿、雞蛋和糖等材料製成的抹醬。

上海—香港—新加坡

當三部曲展現及空間化華人的所在地網絡後，有三座城市常被連貫稱呼：上海、香港及新加坡。除了十九、二十世紀間的人口和經濟流量，三者的組合也透過文化與政治條件而得到強化。上海在一八四二年《南京條約》簽訂後被西方列強統治，而香港和新加坡分別在一八四二年和一八二四年成為大英帝國的殖民地。西方和亞洲文化在世界大同主義、現代性及都市性的口碑，取決於他們在那些日子中的實驗、共同的選擇與生產。從東亞來看，由於兩座城市之間的相互影響和移民遷移，上海和香港「接近成對」的關係在一九九七年後仍被倡導很長一段時間。然而，上述兩座城市和新加坡的聯繫則降至較少的程度了。當時的金融機構會在這三個地點設有主要據點，而這些據點之間的聯繫有賴於頻繁的運輸傳播路線，以及跨國公司的設立，如建築事務所。[12]

一九四九年後，上海至香港的移民及定居潮更強化了兩座城市之間本就密切的關係。雖然許多上海人選擇移民到新加坡及其他區域的城市，卻不比移民至香港的上海人密集。博茨—伯恩斯坦（Botz-Bornstein）認為王家衛在《阿飛正傳》和《花樣年華》中明確地建立了上海—香港的連結。[13]來自上海的麗貝卡（Rebecca，潘迪華飾演）是《阿飛正傳》中的主要配角，而她也再次出現在《花樣年華》中，扮演與主角住處相鄰的公寓的其中一位住戶，顯示香港

的確有不少上海移民。《花樣年華》和《2046》中，上海人身穿的旗袍能在視覺上顯示出她們的地位。在三部曲中，其他電影情節也與東南亞建立起關係網：與新加坡的文本聯繫，以及與菲律賓的音樂聯繫。

文學網絡

如張建德所認為的，王家衛電影構想中有很多文本的引用與改編，比如曼努埃爾．普伊格（Manuel Puig）的《心碎的探戈》（*Heartbreak Tango*）、劉以鬯的《對倒》與太宰治的《斜陽》。在三部曲的電影空間裡，還有一個新的文本——《2047》誕生。[14] 那是周慕雲在東方酒店二〇四七號房居住時所創作的，他在電影中的對白陳述道：「裡面都是我生活上的點點滴滴，我將很多在我生活裡出現的人物，都放在小說裡。」

12 這些建築事務所包括凱司洋行（Keys and Dowdeswell）及巴馬丹拿（Palmer and Turner）。

13 Thorsten Botz-Bornstein, *Films and Dreams: Tarkovsky, Bergman, Sokurov, Kubrick, and Wong Kar-wai* (Lanham: Lexington Books, 2007), pp. 74–5. 博茨—伯恩斯坦也強調一九三〇年代末，上海至香港的移民是日本占領所導致的。

14 Stephen Teo, *Wong Kar-wai* (London: British Film Institute, 2005).

周慕雲在香港和新加坡擔任作家和報人，對電影中的香港和新加坡敘事很重要。我們說回劉以鬯，他是來自香港的報人，出生於上海，曾逗留在新加坡（《益世報》，一九五二年）和吉隆坡（《聯邦日報》，一九五三至一九五七年）工作。這與周慕雲的角色人設相似，因為《2046》和《花樣年華》的靈感來源都是劉以鬯的長篇小說。[15]

香港、新加坡和上海的中文新聞業和學術界是互相聯繫的。除了劉以鬯，許多報人也來到新加坡，包括文學造詣頗高的郁達夫，在一九三八至一九四二年間來到新加坡就職於《星洲日報》。邱菽園於一八九八年在新加坡創立報刊《天南新報》，同時也在香港和中國的報刊工作。[16]這樣的聯繫一直延續至一九六〇年代後期，來自香港的查良鏞（金庸）與梁潤之於一九六七年在新加坡創辦了《新明日報》。

研究新加坡早期報刊的陳蒙鶴留意到：自從一八六九年蘇伊士運河（Suez Canal）開始通航，便有傳教雜誌的印刷資料從新加坡運往中國，但在新加坡島成為現代中國新聞業的接受者後，兩者的角色便互換了。[17]新加坡的第一份華文報《叻報》由薛有禮於一八八一年出版，而他是仿造上海或香港的華文報，而非當代新加坡本地的英文報。《叻報》部分的新聞來源更是香港、上海或其他中國城市報章所刊登的新聞全文或其摘要。後來，基於將東南亞新聞翻譯予中國讀者及訂閱群的興趣，新加坡有更多華文報刊出版。

鄭健廬在《南洋三月記》中書寫他花了三個月，在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蘇門答臘

和爪哇的各個城市旅遊的故事。當時，中華書局母公司委派他一個任務，即是到這些地方的文學場景做調查，以瞭解該地的市場情況。鄭健廬寫道，自己於一九三三年的到訪被兩大報刊報導——《南洋商報》（一九二三年創刊）及《星洲日報》（一九二九年創刊）。一九二三年，即在香港設立分部的四年後，位於上海的中華書局母公司於新加坡設立分部。其於上海的主要競爭對手——商務印書館，則早於一九一二年設立了新加坡分部。除了中國的專著和出版物，兩家出版社的書局皆有布置一個陳列空間以展出中國的畫作或印刷品。兩次大戰期間，這些書局也與新加坡本地書局合作，如上海書局（一九二五年創立）及大眾書局（一九三六年創立），兩者及上海與／或香港之間都有聯繫。

柯雪潤（Sharon Carstens）認為，二十世紀的馬來西亞和新加坡華文出版可分為三個時期：一九〇〇至一九四六、一九四六至一九六六，以及一九六六至一九八〇年代。[18] 她留意

15 劉以鬯，原名劉同繹。其撰寫的小說《酒徒》（一九六三）及《對倒》（一九七二），是王家衛電影的創作靈感及人物原型來源。這些作品是劉以鬯的半自傳體小說，承載了他在吉隆坡和新加坡的生活時光。

16 王慷鼎：〈丘菽園與香港《華字日報》〉，楊松年、王慷鼎合編：《東南亞華人文學與文化》（新加坡：新加坡亞洲研究學會，一九九五年），頁 73–74。

17 Chen Mong Hock, *The Early Chinese Newspapers of Singapore 1881–1912*. Singapore: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1967, pp. 32–5.

18 Sharon Carstens, "Chinese Publication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in Singapore and Malaysia".

到，二戰前的一段時期中，新加坡、馬來西亞和中國大陸城市存在著知識分子、社會與政治的緊密聯繫。儘管本地的定期出版刊物不足，戰後時期仍是出現了許多出版品的種類，包括休閒讀物如《星期六週刊》及《星洲週刊》，兩者都是參考了上海類似讀物的形式、內容與設計。青少年文學如《兒童樂園》、《南洋兒童》或《世界兒童》，都是一九六〇、七〇年代年輕人的標準精神糧食。[19]這些刊物主要出版於香港，而香港也出版其他種類的雜誌，主打年輕人、女性、電影迷及文學圈子的客戶群。除了月刊和雜誌，香港出版的中文課本、地圖及教材也直通南洋市場，能在東南亞海外華人的課室、辦公室、住家和日常生活中找到。[20]廣為流傳的月刊《南洋文摘》（一九六〇至一九七三年出版於香港）亦為讀者整理了有關南洋的重要新聞報導、文學研究與作品。

班納迪克．安德森提出的「印刷資本主義」（print capitalism），創造了海外華人在新聞及文學世界中的想像空間。在這個情況裡，所涉及的範圍已超出小說和報紙，含括了著名和學術性的印刷媒介，以連接移居者。戰後時期，香港與新加坡、馬來亞的連接特別緊密，而涉及的社群又擴展至包含區域內的其他城市。比如，我們可以在青少年雜誌的雙頁版面上找到來自仰光（Rangoon，現為Yangon）、砂拉越和香港的學生作品，也可看見電影有獎問答的得獎名單中有來自不同地方的得獎者，以及徵筆友的欄目等等。他們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南洋報紙社區給予肯定。在冷戰期間新興的國族主義的背景下，這樣一個報紙社區的特

性編織於去殖民化的東南亞。然而，南洋印刷文化在激進國家主義的強固後衰弱。柯雪潤指出，一九六六年後南洋印刷文化的衰頹，歸咎於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國家教育政策的改動。在新加坡，對以英語為媒介語的教學之注重，減少了華語學校的入學率；在馬來西亞，截至一九八三年，改動的政策使得華裔生在華語中學的就讀率降至百分之十二而已。[21]

音樂與娛樂網絡

除了出版物，王家衛的三部曲也有關香港和東南亞之間的音樂與娛樂世界邊界之互聯性。電影中的主角與配角可能被置放在這個聯繫點中，包括阿飛的親生母親（一個「社交界名人」）、露露（舞女）、阿炳（報人）、白玲和鞏俐所飾演的蘇麗珍。他們都能透過那些網

In *Changing Identities of the Southeast Asian Chinese since World War II*, Jennifer Cushman and Wang Gungwu, eds.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77–90.

19 《世界兒童》半月刊創刊於新加坡，但之後刊物的生產地遷至香港。

20 陳蒙志《上海書局歷史中的時代印記》，《學文》第二期，二〇一二年，頁六九。陳蒙志〈上海書局歷史中的時代印記〉，《學文》第二期（二〇一二年）：頁六九。

21 Carstens, "Chinese Publications", pp. 90. 新加坡於一九六九年（一九七四、一九七六）頒行簡體漢字，而香港與台灣則保留繁體漢字。

絡穿越東南亞各地。《2046》中，周慕雲欲登記入住東方酒店，酒店老闆在知道他來自文藝圈後便毫不猶豫地答應了，因為老闆本身曾是歌劇男高音。

《花樣年華》的手記中，與梅林茂（Shigeru Umebayashi）一起創作電影原曲的麥可．葛拉索（Michael Galasso）寫道：電影配樂是在「製造一個一九六〇年代的香港聲音世界」。這個聲音世界有著複調性的身分和來源，從中國歌劇音樂、發展中的華語和粵語流行曲、跨大西洋（trans-Atlantic）流行曲，到拉丁美洲音樂。如此的想像還有另一個例子，由葛蘭主演的《青春兒女》（一九五九）中有一個組曲表演，依序由《蒂珀雷里在遠方》（It' s a Long Way to Tipperary）、《虹彩妹妹》、《大偽裝者》（The Great Pretender）和《女人善變》（La Donna e Mobile）組成，展現了世界各種不同曲風調和成的大雜燴。葉月瑜和王湖認為王家衛電影中的特定歌曲使用「連接與融合了分散的地理與差別顯著的歷史」。他們以《花樣的年華》為例，這是「一首能在聽覺上過渡到殖民上海的歌曲」，而王家衛所拍攝的新加坡場景配以《月兒彎彎照九州》則暗示著「中國文化融入東南亞」。[22]《花樣年華》的電影名稱其實即是周璇演唱的著名歌曲《花樣的年華》。

一九五〇、六〇年代，拉丁美洲音樂和舞蹈在東亞與東南亞被捧紅，而香港和菲律賓則作為首要的「換能器」（transducer）地點。只要將那個時代的電影配樂排成一列，便可發現其中許多原曲源自拉丁音樂與歌曲。其中的舞曲風尚，包括恰恰（Cha-cha）、弗拉曼柯

（Flamengo）、森巴（Samba）、卡利普索民歌（Calypso）、曼波（Mambo）、探戈（Tango）等，即作為當時所傳播的世界大同主義和現代性的變調。王家衛曾說：「那時候，我們在香港有很多西方音樂，而大部分的樂隊樂師來自菲律賓，所以當時也有很多拉丁音樂。」[23]管弦樂隊如澤維爾·庫加特（Xavier Cugat）、提托普提（Tito Puente）及羅絲印第歐斯（Los Indios Tabajaras）製作了標準曲目，比如《背叛》（Perfidia）、《喜好（祕魯邵比亞音樂）的人》（El Cumbanchero）及《或許，或許，或許》（Quizas, Quizas, Quizas）。再舉例，《阿飛正傳》片尾曲的原曲是澤維爾·庫加特的《叢林之鼓》（Jungle Drums），而歌詞則翻譯成「是這樣的」（梅豔芳演唱）。[24]

如同《花樣年華》中，報人周慕雲到新加坡的過渡；《阿飛正傳》裡，阿飛尋找生母的旅途讓他跨越南海來到菲律賓。如同上述王家衛所言，電影中阿飛行走的慢鏡頭畫面之所以配以《常駐我心》的配樂，是為了將音樂與導演築造的一九六〇年代世界中的菲律賓進行連接。在十九、二十世紀末，菲律賓樂師在上海、香港及東南亞的其他地方之間遷移。在一八九〇年

22 Emilie Yeh and Hu Lake Wang, *Transcultural Sounds: Music, Identity and the Cinema of Wong Kar-wai*, David C. Lam Institute for East-West Studies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69, 2007, pp. 11–12.

23 王家衛〈導演手記〉，收錄於《花樣年華》電影原聲帶。

24 原調曾在電影《四千金》（一九五七）中出現，意味著對西式音樂與舞蹈的接納。

代，他們在馬來亞的州樂隊及警察樂隊演奏、柬埔寨的皇家法院及夜總會表演，以及擔任越南菁英分子的音樂老師，因而他們很早就建立起良好的口碑。[25]他們從一八八〇年代開始去往上海，再從一九〇〇年代開始去往香港。在上海的菲律賓樂師會在舞廳、外國夜總會和咖啡廳表演。據估計，截至一九四二年，有一百四十三名菲律賓樂師活躍於上海；截至一九五八年，有一百二十名菲律賓樂師活躍於香港。[26]

一九四九年後，原本在上海工作的菲律賓樂師遷移至香港或台灣，他們的加入實現了隨後電影中的內容轉型。[27]著名詞曲家黃湛森（筆名黃霑）留意到，由於中國政治變革，一九五〇年後的電影製作需要找尋新方向。[28]他認為歌唱劇的推行推進了電影業，而《桃花江》則是歌唱片的領跑者。在該部與接下來的電影中，音樂總譜皆由菲律賓樂師編寫。菲律賓樂師也在之後成了音樂界的旗手：

「菲律賓樂師水平，一向在東南亞馳名。單看東南亞各地娛樂場所及大酒店，紛紛聘用菲人樂隊駐場的事實，就可知大概。而且這是持續數十年，一直沒有改變的現象。假如菲律賓樂師和樂隊水平有所改變，這現象就萬難保持。菲籍樂人的視奏能力極高，而風格接近美國與西班牙音樂，演奏流行音樂，往往比正統音樂學院出身的樂手奔放，因此更勝一籌。他們的編樂家，技巧靈活，有時或嫌原創性不足，但往往順手拈來，俱

成妙諦，所以亦有實用的好處。而且大多數有捷才，一首中型樂隊十餘樂器的總譜，兩三小時內一揮即就，特別適合香港的製作環境。」[29]

然而，這樣的情況沒有長久維持下去。如沃特金斯（Watkins）所言，他們作曲、編曲的技巧只在一九七五年之前備受尊敬。[30]在那之後，夜總會或其他僱主更傾向於聘請「被認為是音樂創始者的黑人或白人樂師」。與香港和南洋之間的文學聯繫相似，香港和菲律賓之間的音樂聯繫及模式在一九七〇年代後減弱。

25 Stephanie Ng, "Performing the 'Filipino' at the Crossroads: Filipino Bands in Five-Star Hotels Throughout Asia". In *Modern Drama* 48, No. 2 (2005): pp. 273–74.

26 Lee Watkins, "Minstrelsy and Mimesi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Filipino Migrant Musicians, Chinese Hosts, and the Disciplining of Relations in Hong Kong". In *Asian Music* 40, No. 2 (2009), p. 80; and Ng, "Performing the 'Filipino' ", p. 274.

27 Watkins, "Minstrelsy and Mimesis", p. 80.

28 黃湛森《粵語流行曲的發展與興衰：香港流行音樂研究（1949–1997）》（博士學位論文，香港大學哲學系，二〇〇三年），頁四九。

29 黃湛森《粵語流行曲的發展與興衰：香港流行音樂研究（1949–1997）》，頁四九。

30 Lee Watkins, "Brown, Black, Yellow, White: Filipino Musicianship in Hong Kong and their Hybridized Sociability". In *Humanities Diliman* 7, No.1 (2010), p. 71.

結論

王家衛的「香港三部曲」展現了選擇性的東南亞移動地點：露露在菲律賓遇見周慕雲後前往新加坡、蘇麗珍（張曼玉飾演）的老闆給了她一張去新加坡旅遊的船票、蘇麗珍（鞏俐飾演）從金邊去往新加坡當職業賭徒，以及白玲在與周慕雲幽會後決定去新加坡。[31]電影中利用了紙媒、音樂、收音機、火車、輪船及飛機的元素，讓電影中的角色和場景透過相遇與命運進行連接，也為他們描繪了一個「世界圖像」（world picture）。德國現象學家馬丁·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闡述道：如此可啟用的觀念（世界圖像），有賴於技術、媒介及傳播的出現、可得性與宣傳。[32]在這個例子中，所連接的「世界」是東亞及東南亞的華人世界，但只限於特定的時期。

綜上所述，我們能推斷出一九五〇、六〇年代時，香港是南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隨著中國的「缺席」，東南亞成為香港相關身分構造的實質空間。香港不只是國際大都會移動及移民的其中一個空間，它也透過出版物、音樂作品及電影等媒介，與其他區域活躍地共同製造那關係網的組成部分。最初的刻板印象化，到之後對南洋事物、民眾、風景及食物的熟悉，提升了這些相遇與身分的層次。王家衛三部曲中的東南亞空間再現，是他的回憶與那些所創造的親近和愛意的描繪。一九七〇年代以後，電影的聯繫最終逝去，且伴隨著華人文本、聽覺、

物質網絡的衰落，導致香港逐漸從南洋地區中的社會和經濟領域中分離出來。

阿克巴·阿巴斯（Ackbar Abbas）曾論證新香港電影業的系列——尤其是王家衛的電影——與一種難以解釋的概念有關，即「錯失感」（Déjà Disparu），一種一直以來的新奇特別的感覺已經不在了，所剩下的只有一堆陳詞濫調，或者一堆從未有過的回憶。[33]王家衛的三部曲與他在一九六〇年代所想像的香港空間與社會的消失有直接關係，這能透過電影中香港本地人和上海人社群的觀察及鏡頭窺探而出。在此章節中，我論證了一九五〇、六〇年代的香港與東南亞之間曾存有緊密且無法分割的聯繫，而這個聯繫讓兩者在相互重疊的領域中一起製造出南洋的觀念和關係網。在那個時期的「錯失感」中，東南亞與香港的空間、時間的消失是平行發生的。

31 《花樣年華》的其中一個剪輯鏡頭中，身在新加坡的周慕雲透過香港電台點了一首《花樣的年華》給蘇麗珍。

32 Martin Heidegger, "The Age of the World Picture". In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and Other Essays*, trans. William Lovitt.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7, pp. 115–54.

33 Ackbar Abbas, *Hong Kong: Culture and the Politics of Disappearanc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7, pp. 25–26 and 48–62.

參考書目

英文書目

Abbas, Ackbar. "Wong Kar-wai: Hong Kong Filmmaker". In *Hong Kong: Culture and the Politics of Disappearance*, 48–62.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7.

Anderson, Benedict.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1983.

Botz-Bornstein, Thorsten. *Films and Dreams: Tarkovsky, Bergman, Sokurov, Kubrick, and Wong Kar-wai*. Lanham: Lexington Books, 2007.

Brunette, Peter. *Wong Kar-wai*.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5.

Carstens, Sharon. "Chinese Publication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in Singapore and Malaysia". In *Changing Identities of the Southeast Asian Chinese since World War II* , edited by Jennifer Cushman and Wang Gungwu, 74–95.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88.

Chen, Mong Hock. *The Early Chinese Newspapers of Singapore 1881–1912*. Singapore: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1967.

Chow, Rey. "Sentimental Returns: On the Uses of the Everyday in the Recent Films of Zhang Yimou and Wong Kar-

wai". In *New Literary History* 33 (2002): 639–54.

Chu, Yingchi. *Hong Kong Cinema: Coloniser, Motherland and Self* London: Routledge Curzon, 2003.

Heidegger, Martin. "The Age of the World Picture". In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and Other Essays*, translated by William Lovitt.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7.

Law, Kar and Frank Bren. *Hong Kong Cinema: A Cross-Cultural View*. Lanham: Scarecrow Press, 2004.

Ng, Stephanie. "Performing the 'Filipino' at the Crossroads: Filipino Bands in Five-Star Hotels Throughout Asia". In *Modern Drama* 48, No. 2 (2005): 272–96.

Pan, Lynn, ed. *The Encyclopedia of the Chinese Overseas*. Singapore: Editions Didier Millet, 1998.

Tan, Eng Kiong."Hong Kong cinema and the portrayal of the Nanyang Chinese in the 1950s and 1960s". In *Journal of Chinese Cinemas* 4, No. 2 (2010): 155–68.

Teo, Stephen. *Wong Kar-wai*. London: British Film Institute, 2005.

Watkins, Lee. "Minstrelsy and Mimesi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Filipino Migrant Musicians, Chinese Hosts, and the Disciplining of Relations in Hong Kong". In *Asian Music* 40, No. 2 (2009), pp. 72–99.

Watkins, Lee. "Brown, Black, Yellow, White: Filipino Musicianship in Hong Kong and their Hybridized Sociability". In *Humanities Diliman* 7, No. 1 (2010), pp. 58–84.

Yeh, Emilie Yueh-yu and Hu Lake Wang. *Transcultural Sounds: Music, Identity and the Cinema of Wong Kar-wai*. David C. Lam Institute for East-West Studies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89, 2007.

中文書目

陳蒙志〈上海書局歷史中的時代印記〉，《學文》第二期（二〇一二年）：頁69–89。

黃湛森《粵語流行曲的發展與興衰：香港流行音樂研究（1949–1997）》，博士學位論文，香港大學哲學系，二〇〇三年。

梁文道〈南洋香港〉，刊於《蘋果日報》（二〇一三年一月二十五日），二〇一三年四月十五日瀏覽於：http://www.commentshk.com /2013/01/blog-post_25.html。

劉以鬯《對倒》，香港：獲益出版事業有限公司，一九七二年、二〇〇〇年。

麥欣恩《再現／見南洋：香港電影與新加坡（1950–65）》，博士學位論文，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二〇〇九年。

韓康《曖昧的品位：王家衛的電影世界》，北京：金城出版社，二〇〇八年。

王慷鼎〈丘菽園與香港《華字日報》〉，楊松年、王慷鼎合編《東南亞華人文學與文化》，新加坡：新加坡亞洲研究學會、南洋大學畢業生協會、新加坡宗鄉會館聯合總會，一九九五年，頁56–76。

張建德〈新加坡銀幕記憶：光藝「南洋三部曲」〉，黃愛玲編《現代萬歲——光藝的都市風華》，香港：香港電影資料館，二〇〇六年，頁145–59。

鄭健廬《南洋三月記》，上海：中華書局，一九三五年。

參考影像

《阿飛正傳》，導演：王家衛，一九九〇年，香港：鉅星，一九九一年，DVD。

《重慶森林》，導演：王家衛，一九九六年，紐約：米拉麥克斯有限責任公司，二〇〇二年，DVD。

《2046》，導演：王家衛，二〇〇四年，日本：索尼影業，二〇〇五年，DVD。

《花樣年華》，導演：王家衛，二〇〇〇年，法國：TF1／Ocean，二〇〇一年，DVD。









圖16-1：香港美都餐室。
圖16-2：泰國曼谷亞特蘭大酒店。
圖16-3：菲律賓馬尼拉的馬車。
圖16-4：舊明信片中的萊佛士坊景觀。

藝術與建築中的「馬來亞」

前言：馬來亞（Malaya）、馬勒西亞（Malesia）及馬來西亞（Malaysia）

一九四八年，馬來亞聯合邦（Federation of Malaya）在賦予各個蘇丹主權，卻不給予構成聯合邦的各個族群平等公民權的情況下成立。在一九五七年宣布獨立前，聯合邦從一九四八年開始進入為期十二年的緊急狀態，以制止共產黨的叛亂。儘管越戰長期以來被強調為東南亞的主要冷戰場域，學者目前已贊同馬來亞所發生的事件及隨後馬來西亞的成立具有更大的重要性。馬來亞為韓戰供應錫與橡膠，進而資助一九四八至一九六〇年間半島的共產黨叛亂鎮壓活動，減少了東南亞南部區域的「威脅」。一九六三年，馬來西亞在地理上形成一個孤立的

區域，既對「自由世界」（Free World）積極響應，亦在空間上將印尼從印度支那（Indochina）的場域中「隔離」開來。

一九六三年，「馬來西亞」（Malaysia）一詞被用以命名一個在「馬來亞」（Malaya）的基礎上擴大之新政治領域，取代了博物學家、民族主義者及離散社群的既有用法。在二十世紀之交，自然史的描述以「馬來西亞」代表一個大於馬來半島的區域。英國博物學家阿爾弗雷德．拉塞爾．華萊士在區域內花了十年時間研究其植物與動物品種，最終於一八六九年出版《馬來群島》（*The Malay Archipelago*）。他論證了一個透過生物地理學連接的毗鄰區域，即便其構成地形——包括半島、西里伯斯島（Celebes）及新幾內亞島——被海域區隔開來（華萊士，一八六九，vi）。

一九五〇年，茂物植物園（Bogor Botanical Gardens）的馮斯蒂尼斯出版一本名為《馬勒（來）西亞植物誌》（*Flora Malesiana*）的植物學百科全書，是「一本關於馬來西亞植物的插畫各論」（C.G. G. J. van Steenis, 1950, xiii）。他在第一卷冊中向植物學家前輩致敬，並提到了「馬勒西亞」（Malesia，即「馬來西亞」的拉丁語）的最早使用者是瑞士植物學家佐林格。他於一八四五年發表了相關課題的論文，並於一八五七年進一步地詳述。馮斯蒂尼斯或許是被其英國同胞影響，在百科全書中完全使用「馬來西亞」這一術語，並標出由九個部分組成的研究區域，包括整個菲律賓。一九三〇、四〇年代，包括弗雷德里克．N．查森在

內的各個英國博物學家都發表了在「馬來西亞」發現的生物研究及列表，而「馬來西亞」被認為是「東方區（Oriental Region）中的亞區，包含馬來半島、蘇門答臘（Sumatra）、婆羅洲（Borneo）、爪哇（Java）及所有鄰近小島」（Frederick N. Chasen, 1940, v）。之後，歐洲自然科學家便劃定了一個被認為是「馬勒西亞」或「馬來西亞」的地理區域，雖然兩者所提出的輪廓並不一致。

馮斯蒂尼斯並不是區域內唯一使用該術語的學者。菲律賓民族主義者文切斯勞．溫森斯（Wenceslao Q. Vinzons），在一九三七年嚮往著一個「從馬來半島北部末端，延伸至波利尼西亞（Polynesia）最邊遠的島嶼海岸，統一的馬來西亞」。他於其著名的文章〈未收復的馬來西亞〉（Malaysia Irredenta）提出一個統一海洋國家的願景，即「在（我們）文明祖先的家園被海浪吞噬前，馬來西亞的原本狀態」（Salazar, 1998, 112–113）。早在十九世紀，菲律賓民族主義者扶西．黎剎便將其國人稱為「菲律賓不幸的馬來人」，而他在逝世後被奉為「偉大的馬來亞人」（the Great Malayan）或「馬來族的驕傲」（Pride of the Malay Race）。

除了菲律賓人，「馬來西亞」一詞從十九世紀初就被離散到東南亞生活的華人所採用，以代表「南洋」的概念。「南洋」描述了一個地區，或是一個想像的海外華人商業、社會及文化的運輸網絡。比如，一個於一九二九年在吉隆坡成立，推廣學術文化及藝術形式的協會——「南洋書畫社」。其創辦人將協會的英文名稱註冊為「馬來西亞藝術家聯合會」（United

Artists Malaysia）。就這樣，「馬來西亞」被民族主義者、博物學家或離散社群使用，作為一個大於馬來亞半島的區域想像。「馬來西亞」一詞在一九六三年被東姑阿都拉曼（Tunku Abdul Rahman）定為新國家的名稱之前，就已經被廣泛使用。一九六三年後，為避免與政治實體混淆，大部分自然史在描述生物地理區域時都使用回「馬勒西亞」。

馬來亞建築

一九六三年九月十六日，馬來西亞成立，含括了馬來亞半島、砂拉越、北婆羅洲（沙巴）及新加坡。由於這個新政體的行政命令是從吉隆坡傳遞出去的，因此許多新興政策仍是以「馬來亞」的概念作為基礎，而非以「馬來西亞」的概念做考量。馬來西亞成立隔日，即九月十七日，最高元首在一場兒童及青少年集會中致辭，呼籲他們（孩子們）重新確認對新馬來西亞的信念與信心。接著，他列出馬來西亞獨立建國的七個標誌，為扮演未來公民的孩子們講述其基礎的象徵意義（Tunku Abdul Rahman 1977, 114）：

一、國會大廈作為議會民主制信仰的紀念建築；

二、國家回教堂作為信仰自由的紀念建築；

三、大學學院及學習機構作為對人民教育及啟蒙的信念；

四、默迪卡體育場（Stadium Merdeka）及國家體育館作為健康心智源於健康身體的象徵；

五、國家英雄紀念碑作為捍衛國家的犧牲精神；

六、國家語文出版局作為豐富文化遺產及國語特殊地位的象徵；

七、國家博物館作為國家文化發展的聚焦點。

最高元首並未將所例舉出來的項目直接作為獨立的理想或素質來闡述，反而把它們與各個建築物可能承繼或體現的象徵性功能聯繫起來。這些被提及的建築物全都坐落於吉隆坡——這座自殖民時期至一九五七年八月三十一日馬來亞宣布獨立後，在歷史上一直以首都之姿示人的城市。在最高元首致辭時，許多被提到的建築物已竣工，或正在吉隆坡周圍的工地上被施工建造著。從他的角度來看——或是新國家的角度來看——國家建築計畫是新馬來西亞的投射，儘管大多數人都把國家主體的確立視為每個東南亞後殖民國家的國家文化工程所交出的成績單（成績各不相同），其中就包括了馬來西亞。吉隆坡的國家建築，以及其中一些建築裡的壁畫，都在嘗試具現代化國民的轉變。它們是全國目光共同指向的主要視覺符號。如此一來，一個國族共同體（national community）便得以被積極地想像出來。當建築成形於國家獨立的「初期」，人們透過報章對國家建築的追蹤報導，以及參與建築工程的竣工和開幕儀式，

就可以察覺到這個共同體的「成長」。這能透過報紙報導的追溯，以及他們在計畫順利完成和開幕儀式的參與中察覺到。這些建築上的壁畫是委託藝術家創作的，也有本地藝術家參賽的得獎作品，這些畫作或許是衡量「馬來亞」如何被描繪或被當成一個急需解決的問題之最佳場域。

在吉隆坡，國家建設項目的視覺消費（visual consumption）並沒有侷限於目光所致的建築實體上。即使正在興建中，這些建築物已被轉變為印在郵票、鈔票、學校課本上的圖像，以及照片、電影與電視影像。印有這些圖像的新郵票系列會在國家建築的紀念日推出，而硬幣和紙幣的正面也印有這些建築的蝕刻畫或素描——第一套硬幣全都蝕刻著國會大廈的遠景。早期本地電視廣播的第一幕和最後一幕都會出現國會大廈的圖像。這些圖像透過日常使用、視覺消費和個人的回憶，逐漸融入到國民的生活中。

吉隆坡的戰後建築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吉隆坡逐漸超越馬六甲和怡保的地位，先後成為馬來半島及馬來西亞的第一大城市。在一九五七年宣布獨立以後，作為一個戰後國家，國家的發展通過設置必要的政治與物質的基礎設施、城市規劃以及建築設計，使吉隆坡得以超越馬六甲和怡保。吉隆

坡繼續被指定為一國之都，保證了它作為行政管理的政治中心之地位。在二十年內，吉隆坡的居住人口呈指數式的增長（非常迅速地增長），到了一九六〇年代末，其人口已超過五十萬人。

獨立後，首都在國境內提供了一個空間配置（spatial configuration），使之可以集中地、概要地、顯著地體現出國家的治理才能。以首都為中心，政府的各個方面被延伸、被伸展到國內的其他城市、村莊和空間。而這些被最高元首所例舉出來的國家建築作為首都的關鍵建築物和代表國家的空間，也將會被概念化並從吉隆坡散播出去，作為思想（ideas）、期望（aspirations）、榜樣（embodiments）和圖像（imagery）。第一座建築——默迪卡體育場，是第一個被創建出來的全國性觀眾共同體，因為它與全國觀眾一起見證了國家宣布獨立的儀式典禮，見證政權被實際地、直觀地移交給東姑阿都拉曼和他的內閣。一九六三年，最高元首唸出建築名單的集會也是在默迪卡體育場舉行的，這時候是為了確認民眾對馬來西亞的忠誠。

位於吉隆坡的國家建築共同形成了戰後建築史的有趣案例，因為它們隱含的現代主義特色，並不像印度和孟加拉那般由西方建築師直接引進。在馬來西亞，這樣的設計是由具有建築學專業知識的建築界居中促成的。這個建築界在一九五〇年代以前，僅由外籍建築師和工程師組成，後來發展到外國求學歸來的本地建築師和工程師也能在公共和私營領域占有一席

之地。一九六〇年代，吉隆坡技術學院（Kuala Lumpur Technical College）開設了全國第一個建築學課程。在此之前，該學院僅培訓出相關專業的技術人員，學院畢業生大部分都受僱於公共工程局。

二戰前，公共機構的大部分建築工程都是由公共工程局建造的。一九四五年後（二戰後），該部門開始進行重建工作，並在國家實現獨立的同時，先後承擔了建設基礎設施和建築工程的任務。公共工程局逐步合理化、優化工作程序，識別私營領域內有能力的建築承包商和供應商，並確保常規和特殊的建築工程可以採購到最好的施工材料和工具。史坦利．裘斯（Stanley Jewkes）成立了一個設計與研究部門，以保證工程設計和建築實踐是合格、高效且前衛的。裘斯在他工作以外的時間完成了兩個體育館及國家獨立公園（Merdeka Park）的設計，並在之後擔任公共工程局局長時，確保最優秀的建築師和工程師（包括私營領域的）能被選來實現國家建築。

許多從海外學成歸來且具有專業知識的建築從業者，以及外籍從業者成立了許多顧問公司和事務所，促使工程和建築學科的專業化也在私營領域中形成。材料、設計和建築流程的標準化及模塊化，以及新建築產品和系統的引進是同步進行的，建築界也努力對它們進行轉換，並使其適於應用在馬來西亞當地的環境中。特別是在這個時期裡，鋼筋混凝土技術得到最大程度的探索和測試，使公共和私營領域得以創造出供人們工作、集會和舉辦紀念活動的

大跨度空間。後來被最高元首列出的國家建築，皆受益於這樣的建築風氣。在最終建成的國家建築中，當時的建築界所討論的是國家博物館作為超大型「馬來民居」（Malay house）的必要性，而不是討論其他現代主義如何具有更多的可能性去反映時代的進步。儘管國家回教堂主要為穆斯林所建，但大部分人民接受了它的建築形式，甚至也接受了後來的作品，例如梳邦國際機場（Subang International Airport）創新性的建築風格。

族群及後殖民的公民權

作為一個國家，族群問題在馬來西亞的歷史和政治中一直是重要的考量因素。歷史學家謝文慶（Cheah Boon Kheng）曾描述戰後馬來亞的最初幾個領袖——特別是拿督翁嘉化（Dato' Onn Jaafar）及東姑阿都拉曼——如何在政治上搖擺於馬來民族主義（Malay nationalism）與更具包容性的多種族／多元國族主義（multi-ethnic/ plural nationalism）之間（Cheah，2002, Chaps 1-3）。英國殖民者創造了不同種族的類別，如「馬來人」、「華人」及「印度人」，以便為殖民地貿易指定勞工，同時通過空間隔離與區別對待的社會政策來控制各個群體。這些類別自然不足以說明其中所存在的子群體（sub-groups）的多樣性，也沒有將混血兒的情況考慮在內。

二戰之後，英國殖民政府即將離開之際，他們於一九四六年嘗試成立馬來亞聯邦（Malayan Union），並試圖給予所有居民同等的公民地位，但這個聯邦體制被馬來群體否決了。這引發了馬來民主主義的第一次覺醒，進而催生了一個馬來族政黨——巫統（UMNO，United Malays National Organisation，中文全名為馬來民族統一機構）的成立，並宣稱馬來族在公認的「馬來人的土地」（Tanah Melayu）上擁有首要的主權地位。然而，馬來人最先定居於馬來半島的這一主張必然會受到質疑和挑戰。土著（bumiputera，也稱為大地之子）這一身分的推出，預示著馬來人與有關身分的其他申索人——長期並持續生活在內陸森林和山區裡的「原住民」（Orang Asli）——的關係將會變得緊張。而且在馬來半島北部的考古挖掘中，也發現了西北和東北的海岸早在公元二世紀就已經有印度化聚落存在的證據。

一九五五年，東姑阿都拉曼升任多元政黨「聯盟」（Alliance Party）的領袖，並參與了馬來亞的首屆聯合選舉。他領導的巫統與馬來亞華人公會（Malayan Chinese Association，簡稱馬華公會）、馬來亞印度國民大會黨（Malayan Indian Congress，簡稱國大黨）聯合代表這片土地的三大族群。聯盟在選舉中獲得壓倒性勝利，東姑阿都拉曼（1957.4）在宣布出任國家第一任首相時說道：「沒人能說這是一個馬來政府。這是一個全體的政府，一個馬來亞人民的縮影。」這聲明揭示了在國家的核心問題中，種族問題備受關注，同時平息了某些領域對馬來沙文主義將成為這個新興國家本土施政基礎的指控。

通過將新加坡及其以華裔占多數的人口併入馬來亞聯合邦組成馬來西亞，馬來西亞將得以共享新加坡島上既理想又具優勢的港口和防禦設施，並消除前英國殖民地潛在的共產主義威脅。然而，這樣的合併也會使華裔在國內的人口比例增加至百分之四十四，高於馬來裔人口的百分之四十二。這一問題的緩解方法，就把婆羅洲的汶萊、北婆羅洲和砂拉越吸納進來，作為「東馬」（East Malaysia），使馬來裔的人口比例增至百分之四十一點五，而華裔人口則占百分之三十八。同時，有更多的原住民群體，如卡達山杜順（Kadazandusun）、伊班（Iban）和達雅族（Dayak）加入其中。此時期後，在不斷變遷的地理景觀中，族群分布圖（ethnic mapping）變得愈加複雜，尤其在一九六五年新加坡脫離聯合邦的情況下。

雖然組成聯盟的三個政黨仍然維持著同盟關係，但在種族和操作上卻有著很大的不同。除了作為政治黨派和組建內閣的成員之外，這三個政黨在確保全國各階層的民族融合方面做得很少。聯盟政黨分別代表不同族裔社群的正當性經常受到質疑，導致後來的政黨分裂並出現新的分支。由於殖民地實施的隔離政策，在吉隆坡的地貌上也反映出種族劃分的情況。在十九世紀中葉，首都這座城市最初主要是由華裔礦工建立的，多年來華裔人口急速增加，成為住在這座城市的主要族群。鄰近城鎮和種植園的馬來聚落、城市中心邊緣的各種巫裔聚落，以及歐洲殖民者後裔等其他少數族裔，都不斷補充這座城市的人口數量。一九六〇年代末，這座城市的人口超過五十萬，但族群的比例並沒有顯著的改變。

這個新生國家已存在的族群分歧，以及馬來西亞首都的族群劃分格局，後來加劇了不同族群間潛伏著的緊張關係。一九六九年五月十三日，在全國大選之後，首都爆發了種族暴動，造成一百多人死亡和大量的財物損失。在種族暴動的影響下，馬來西亞國內的其他幾個城市也發生了類似的衝突事件，但最激烈的衝突在吉隆坡發生了好幾天，政府因暴動而陷入癱瘓，所以無法及時遏制暴力和破壞的發生。一九七一年二月，隨著首相的替換，國會才恢復運作。不久後，新經濟政策（New Economic Policy）作為大馬第二計畫（The Second Malaysia Plan）的一部分被推行。有關政策的各種原則對馬來西亞的社會和政治具有廣泛的影響力，至今仍影響著這個國家。

一九五七年至一九六九年間的馬來西亞史研究，對瞭解東南亞國家的去殖民化和國族主義的程度與框架至關重要。如法農（Fanon, 1963, 220）所提出的，國家早期的國族文化生產是「一個充滿活力的風格，富有節奏感，以綻放的生命堅持下去……充滿色彩，（但也是）古銅色的、被曬乾的和暴力的」。在馬來西亞，這些表達形式是什麼，而它們是如何描繪或投射出這個國家的群體呢？

獨立的馬來亞藝術及建築表達

在〈獨立產生藝術，是嗎?〉（Merdeka Makes Art, or Does It?）一文中，薩巴帕迪（T. K. Sabapathy, 1994）概括了這時期馬來西亞藝術創作領域中的各種競爭力量。其中一派喜歡抽象表現主義（abstract expressionism）所給予的情感宣洩、自由表達以及跟現代性的聯繫，被譽為「先鋒派現代藝術」（avant-garde modern art）。另一派則採用繪畫的現實主義（realism）以進行轉化，如薩巴帕迪（1994, 57）所提到的：「將新興國家應該體現英勇意象的世俗信念，變成神話般壯麗輝煌的畫面。」在國家贊助的壁畫空間裡，受委託或贏得比賽的藝術家必須直面國家或機構的期望，並將社會和政治的思想加以調解和轉化到大型的畫布上。不論種族背景或藝術派別，這些藝術家都在使用某種形式的具象繪畫或其他方式來響應國家的號召，藉此呈現和描繪出新興國家的公民及其群體的各個方面。

從某個層面上來看，圖畫形象的融入及其被使用的程度，揭示了現代主義的建築從業者不願意為了符合正統的現代主義美學、形式和空間，而抹去這些形象化的描繪和裝飾。從另一個層面來看，這顯示了新的國族文化和身分要完全擺脫前殖民地或前現代的具象和圖像是多麼的困難，尤其是當這些表現形式已是難以磨滅的歷史遺產。作為藝術和建築之間的交叉媒介，壁畫確保我們理解到，它在馬來西亞國族發展的關鍵時期是可以大量表達的一種形式，

用於記錄新興國家的「無意識能量」（unconscious energies）。

東南亞早期的前現代史中，對於公共藝術和建築的具體形象是有先例可循的。興都教—佛教（Hindu-Buddhist）建築如婆羅浮屠（Borobudur）、吳哥窟（Angkor Wat）與巴揚寺（Bayon），顯著地結合雕塑與信仰元素，以頌揚社會、宗教和政治的遵從。在殖民統治下的馬來亞，具體的形象化描繪早已出現在宗教建築裡，如佛教寺廟裡佛陀生平故事（Jataka）的繪畫、華人宗祠的壁畫、興都廟的人像雕塑，以及基督教或天主教大教堂裡的彩色玻璃鑲板。英國殖民者也串通一氣，在馬來亞和新加坡的市政建築上繼續進行類似的描畫，其中包括了兩地火車總站的淺浮雕、壁畫和雕塑。國家壁畫不同於其他種類的壁畫，它的具體形象不再只是支持宗教或經濟的意識形態，現在也被用來投射「國族」的意識形態。

在關係到一個現代「馬來亞」建築發展的專業論述和辯論裡，圖像及裝飾的融入與排除成了一個議題。涉及這些爭論的，主要是海外受訓過的從業者和本地化的外籍人士。他們自然而然地把目光投向當時流行的跨大西洋的模型上，並注意到這些模型被二次傳遞（secondary transmittance）到發展中國家，是發展中國家渴望獲得進步和西方現代性的必然結果。關於形式的詮釋、對當地氣候和條件的關注，以及設備和工藝應用的議題，都在論述中排名頗高。在「極端現代主義」（high modernism）時期後，即使是極端現代主義最熱情的操作者柯比意，也「陷入」在圖像的使用中，從傳統的參照物中移植／提取具象，或是以壁畫、雕塑的形式

安裝在世界各地，並將這種方式視為能夠緩和現代主義建築令人感到刺眼的外環，或改善現代建築讓它能融入當地社會環境的方法。陳國明（Tan Kok Meng, 2000）在撰寫到一九六三年新加坡大會堂（Singapore Conference Hall）和職工會大廈（Trade Union House）的設計時，描述了有關建築內色彩斑斕的玻璃馬賽克內牆，是以馬來人用露兜樹（pandanus）葉編成的蓆墊織品上的抽象圖案為基礎的，而這就是設計師在完善自己對體積、平面和環境空間的理解中所得到的成果。這座建築是由在英國培訓的本地建築師所設計的，他們回到馬來亞和新加坡並且在私人執業和建築教育的領域裡領導這個行業，儘管受到西方的過濾篩選，也毫不畏懼地被認為是現代主義建築風格的最佳擁護者。陳國明（2000，22-23）覺察到，這種情況是一種「他者」的存在，它反抗了現代建築語言的工具因素，也預防了有關新加坡和馬來亞獨立後建築特性的討論被強行終止。

作為國家藝術項目的壁畫

我們可以透過壁畫製作來探討戰後馬來亞民族被描繪的情況。一九六〇年代時，人民識字能力相對較低，吉隆坡的壁畫為各種目的發揮作用，包括將機構或國家的「信息」投射予更多的指定公眾。第一幅公共壁畫可能是獨立前一年，由寶林歐（Pauline Old）在建於

一九五六年的新街場機場（Sungei Besi Airport）所創作的壁畫。隨後，政府或與藝術理事會相似的機構也為城市的主要建築（比如銀行、商業公司甚至學校和宮殿）安排委託和籌辦比賽。本文欲探討的國家壁畫，是已裝置在國家建築——國家語言出版局、國家體育館、國家博物館和國會大廈——上的四幅壁畫或壁畫組。在壁畫被視為國家給公民傳播信息的載體之熱潮中，這些壁畫都是在國家的委託下誕生的。

第一幅裝置在吉隆坡國家建築的巨型公共壁畫，是一九六一年由依斯邁．穆斯坦（Ismail Mustam）為國家語文出版局所創作的作品。聯盟政府首先於一九五六年成立出版局（Balai Pustaka），再於次年按照憲法制定馬來語為國語。該機構的設立是為履行一九五五年首次聯合邦選舉的競選承諾，旨在恢復、發展和推廣馬來語的使用，使之成為文學、藝術與文化的國語。在英國的殖民統治下，英語在行政和教育上占主導地位，而非馬來語。因此，獨立後採取補救方法被認為是有必要的。

這建築有一個T形的設計，在形式上連接一個能容納一千人的禮堂／文化廳，以及一座六層樓的直線狀行政大樓。行政大樓內設有圖書館和閱覽室、檔案室，以及翻譯、編輯、語言推廣的辦公室。該長形大廈（slab block）具有強硬的現代主義風格，以其垂直分割的正立面及模塊化的鑲板和窗戶，被比喻為「小型的聯合國大樓」。儘管這座融入「馬來特徵」的建築是一個令人有些尷尬的結合，但它仍被引介給全國民眾：一個由棚子遮蓋的樓頂花園象

徵了「展開的雨傘和國家的尊嚴」，禮堂兩側構築了抽象的三角形和矩形圖案，與傳統紗籠（sarong）的樣式相似（*Malay Mail*, 23 August 1961, 4）。

這幅寬六十五英尺、高二十五英尺的釉面馬賽克壁畫，是在比賽中獲勝的依斯邁所創作的。由於壁畫被顯眼地裝置在建築物的正立面，並面朝一個交通圈，所以建築和壁畫都成為了地標。這幅壁畫的官方標題是「馬來亞的生活方式和國語」，試圖傳達該機構的功能與抱負。壁畫的中心畫有一組五個半抽象的站立人像，名義上是描繪錫克人、印度人、馬來人、華人和歐亞人共同閱讀一本攤開的書籍，書上有一個非寫實的棕櫚葉（daun lontar）。這組中央人像被置放在不規則的綠色背景上，該背景從中心沿著對角線擴散至四個邊角，將圖像空間劃分成四個區域。而這些被劃分出來的區域則用於投射多元種族在宗教、文化、教育、農業、工業和技術活動中的融洽相處。這信息很容易理解：儘管馬來西亞公民來自不同的族群背景，但只要使用一種共同的語言就能實現馬來西亞理想化的國族空間。

下一組繪於國家體育館室內的壁畫，以類似方式探索新國族的形象塑造。一九六一年十二月，當體育館的建設接近尾聲時，藝術理事會舉辦了一場比賽，以徵集體育館正門入口處的門廳上部的大壁畫（長三十二英尺，寬八英尺），及側門前廳的兩幅較小的壁畫（長十八英尺，寬七英尺）。前者的主題定為馬來亞民俗，後者則是體育運動。兩位華裔藝術家——余君明（Yee Chin Ming）和潘寶鴻（Phoon Poh Hong）贏得了較大橫向壁畫的委託。他們兩

人嘗試透過在圖面空間裡繪滿不同族群的人像（依照人像的服裝斷定），以刻劃馬來亞的生活和文化。余君明的壁畫由細白線平均分隔成八個垂直的板塊。於此，二十五個半抽象的人像分布在板塊的空間裡，描繪出正處於經濟和社會活動中的三大種族。另一方面，潘寶鴻的二十二個人像則顯示在參與文化活動，這些人像棲息在一個看似毗連的背景裡，透過重疊的矩形把整幅壁畫的橫向空間連接在一起。

若仔細查看，關於壁畫人像的其他觀點也是顯而易見的。兩位藝術家似乎忠實地透過刻劃人像以描繪出馬來西亞當時的族群比例，其遞減的百分比從小到大，依次為馬來人、華人，然後是印度人，而少數族群如原住民、海峽華人（又稱土生華人，即是俗稱的峇峇娘惹）和歐亞人則是缺席的。兩幅壁畫的各個人像群都是集中在各自的種族裡，而不是相互交流互動的。因此，從視覺上就可把壁畫上的馬來人、華人和印度人辨別為不同的群體。余君明壁畫的四個中央板塊描繪了馬來人，華裔和印裔人像則被置於「馬來」群體兩側剩餘的四個板塊上。在潘寶鴻的作品中，「馬來」人像則占據壁畫的左半部分，而右半部分則是其他兩族。

一九六二年六月，首相署舉辦了另一場比賽，為國家博物館甄選兩幅壁畫，每幅壁畫長一百一十五英尺、寬二十英尺。。建築師何國豪（Ho Kok Hoe）設計了兩幅由義大利玻璃馬賽克製成的裝飾壁畫，以裝飾面向主要道路的展覽廳外牆。張禮棠（Cheong Lai Tong）的參賽作品，最終從被預選的藝術家所呈交的五份作品中脫穎而出。壁畫的主題是描繪「馬來亞

歷史片段」和「馬來亞工藝品與工匠」。一開始，藝術家們就得到了一份歷史「片段」的清單和一組歷史照片作為參考。另一個以「工藝品」為主題的板塊在題材方面則沒有較具體的需求，但仍要求參賽者在壁畫中描繪馬來亞文化。

以「歷史」為主題的壁畫所描繪的歷史事件與發生的年份如下：

北馬來亞的興都教—佛教（Hindu-Buddhist）時期，十二世紀。
海軍上將鄭和來訪馬六甲，一四〇九年。
漢都亞（Hang Tuah）與漢惹拔（Hang Jebat）決鬥，約一四七五年。
葡萄牙攻打馬六甲，一五一一年。
武吉斯的武士王子在柔佛，一七二〇年。
北馬來亞—泰國關係，一八四〇年。
邦咯條約（Pangkor Treaty）簽署，一八七四年。
首個鐵路火車抵達吉隆坡，一八八六年。
馬來聯邦的橡膠種植初期，一九〇〇年。
日本占領，一九四一年。
獨立，一九五七年。

當「歷史」壁畫最終被裝置，圍觀者將會按時間順序從右至左地閱讀這些歷史事件，就像閱讀伊斯蘭或中文的古典文本一樣。博物館館長——穆斌夏帕德（Mubin Sheppard）參與了國家歷史「章節」的查明和記寫，並為選定的事件提供數字日期。值得注意的是，所選內容是從印度東部各邦的興都教—佛教移居者定居半島北部開始，而非馬六甲蘇丹國的歷史。張禮棠在每一個歷史片段中，都描繪出一群忙於活動的人像，這些人像所進行的活動全是與該片段的主題有關的，並賦予相關及附帶的圖像。張禮棠在他的「工藝品」板塊的最終設計中，描繪了從事「手搖紡織機編織、籃筐、銅器、馬來短劍及銀器、木雕、木工、陶藝、皮革製品、蠟染和裝飾風箏」製作的半抽象人像，這靈感源自他在比賽前和比賽期間到訪馬來半島東海岸所親睹的類似場景（FMSA, 1964, 14）。

作為國家建築的一組壁畫，若詳細解讀其具象及其相對代表的國家歷史和文化，則會再次發現一些問題。當多元族群的角色——包括英國人和日本人——被用來重建歷史敘事中的時間時，另一壁畫上的民族文化生產（如「工藝品」）卻只包含來自東海岸，尤其是吉蘭丹和登嘉樓沿海地區的馬來文化。因此，國家對國家歷史和民族文化的制定與代表性聲明，似乎是由不同的族裔群體所撰寫的。

新國家博物館即將竣工之時，身為博物館館長的夏帕德開始為其策劃內容，以充實被個別分配在「歷史」和「文化」主題下的兩個展覽廳。「歷史」展覽廳現已分為兩個展區，以闡

明政治和經濟的歷史，這與未分化的一九五七年展覽有所不同。在一九五七年展覽的基礎上，新標題的展品被添加到清單上，但跟原先的一九五七年展覽一樣，歷史展區仍是以吉隆坡的發展作為結束。之前被省略的室利佛逝（Sri Vijaya）、柔佛—廖內（Johor–Riau）和霹靂文明加入了馬六甲、檳城和吉打三個「前殖民地的展品」（一九五七年的展品六號、七號和九號）。這些展品的前面，還有兩個考古展品和兩個農業聚落展品。相較於一九五七年的展覽對橡膠和錫的關注，博物館的「經濟史」展區包含了銀器、黃銅、林業、漁業、稻米和紡織業等新展品，並以木雕、席墊和籃筐作為補充。這個展區的盡頭，是通向一個獨立展廳的入口，獨立展廳所展示的是原住民的生活與人工製品。因此，雖然博物館「歷史」展覽廳的外牆壁畫上列出了馬來亞歷史事件的年表，館內實際展品所描述和顯示的，卻是略有不同的版本。

漢都亞——所屬族群一直備受爭議的地方英雄——在「歷史」展覽廳內作為特徵，占有重要地位。早在一九六二年一月，一個固定在木框（長寬八英尺）裡的浮雕上，高七英尺的漢都亞塗銅石膏像便被構思為國家博物館的主要特徵之一。它位於「政治史」展區末端與馬六甲蘇丹國歷史部分的中央，意味著（引用夏帕德所寫）「主導……馬來亞歷史」（Sheppard, 1964, 56）。「真人大小」的漢都亞立式人像面向進入展覽廳的觀者，他右手緊握腰部的馬來短劍劍柄，彷彿隨時準備採取行動；同時左手握住另一把短劍的劍鞘。人像周邊的場景被葉狀圖案的邊框圍了起來，而英雄身後膝蓋的位置，另有一條類似的葉狀圖案所形成的線條，

橫向地把畫面劃分成兩段。浮雕背景的上半段顯示著奧菲爾山（Mount Ophir，又名金山）的山頂，而下半段兩邊較小的浮雕則顯示這位英雄的人生重要片段：左邊是五名青年在奧費爾山的洞穴中隨著大師一同鍛煉，右邊則是五人抵抗兩個發瘋的男子，保衛村莊免受破壞。在人像背景的頂部，邊框的下方，刻寫了出自漢都亞之口的一句話：「馬來人不會從世界上消失。」[1]（Ta' Melayu Hilang Di Dunia.）

在夏帕德一九四九年的著作中，漢都亞的第一個視覺插圖被認為樣貌「太溫和」了。為了博物館的展覽，夏帕德從第一馬來步兵團（First Malay Infantry Regiment）裡找到理想的模特兒。他需要塑造一個可刻劃出「馬來人誠信、忠誠和有幹勁的性格」之形象（Sheppard. 1979, 228），以作為一種理想的人格投射來教育參訪的公眾。他安排了第一馬來步兵團在營地的閱兵場集合，並與指定的雕塑家韋弗尼．詹金斯（Waveney Jenkins）一同審視每個士兵，以找出適合的臉部特徵。最後，兩名被選上的士兵為詹金斯擺好姿態，讓詹金斯把他們的特徵合併成一個綜合體，作為漢都亞的人像。

各個顧問和博物館的工作人員為合適的服裝款式和圖案設計，以及特別飾品如頭巾和馬來短劍等的選擇提供意見。當詹金斯完成構圖後，夏帕德要求做他進一步的調整，包括緊鎖的雙眉和鷹鉤鼻，讓漢都亞的形象「更兇猛」些。雖然張禮棠在博物館外牆的「歷史」壁畫描繪了漢都亞和漢惹拔的戰鬥，但館內這特別委託製造的漢都亞肖像則突顯了官方對漢都亞

的偏愛。

一九六三年即將竣工的新國會大廈是目前為止馬來西亞所建造的，最具權威的政治民主象徵。負責設計的建築師——艾弗．希普利（Ivor Shipley），從一開始就試圖把壁畫及雕塑融入建築設計中，並計劃把一幅主要的壁畫裝置在下議院議長平台上方的室內山牆上。他委託了定居於檳城，並以結合蠟染印花技術的一種創新畫種而聞名的藝術家蔡天定（Chuah Thean Teng），為那寬六十英尺、高八十英尺的三角形山牆設計幾個備選方案。被選定的設計以作品中描繪的五十二個人像為特色，穿著特定服裝並從事各種文化活動。壁畫中的人像或人像群分布在赭色的背景中。儘管壁畫中有大量穿著馬來服裝的人像，但壁畫中的種族構圖似乎也畫出了馬來亞日常的種族多元的複雜性，而這種複雜性很快就會在一九六三年馬來西亞成立後進一步增加，因為包括了新加坡和婆羅洲的人民。壁畫中有易於辨識的華裔和印裔人像，也有人像穿著原住民、泰國人、伊班人與達雅人的服裝。所有人像都在演奏音樂、跳舞與移動，好似在壁畫的共同空間內同步共振。不幸的是，這幅壁畫連同其他精心安排的藝術作品及雕塑，最終都沒有裝置在國會大廈內，因為遭到一個決定藝術適當性的外部委員會反對。把壁畫設計的優點擱置一旁，這讓人禁不住猜想：為何如此強而有力的視覺與族群表現，不被採

1 英文原版編者註：這句話有幾種解釋，但這是最普遍的版本。

用在最具國族意義的空間裡。難道蔡天定的壁畫所描繪的一九六三年，展現真正的、多元種族的馬來西亞人民與國家，是過於可怕和真實的嗎？

結論

如我們所見，二戰後建造的馬來西亞國家建築，總體來說是在外被全球大眾、在內被新興市民視覺性地消費的現代工程。除了一些建築似乎具有馬來特權的含義之外（如回教堂和博物館），它們主要預示著馬來亞或隨後成立的馬來西亞的狀態。在馬來語成為教育與行政的主要溝通語言時，一些國家建築上的壁畫已作為社群視線的共同媒介。在這個情況下，形象化的照片比紙媒更好，正如班納迪克．安德森所論證的，為「想像社群」製造一個可以在國族空間中流動的替代語言（Anderson, 1991, 15）。無論是在壁畫或是視覺媒體上，這些圖像試圖喚起類似的「平行的世俗，橫向的時間」（horizontal-secular, transverse-time）及營造民族熱情。

在國家建築項目上發現的四組壁畫中，我們可以察覺到它們依賴人物圖像作為題材，以便捕捉或描繪國家投射的意識形態於建築物上。國家語言出版局的壁畫不僅讚揚了馬來語的重要性，也展現了馬來語最終在多元社會中的主導地位。體育館的壁畫試圖刻劃三大族群，

最終卻以官方比例進行分組，並顯示出在空間上區別和分隔。國家博物館簡化了涉及不同族群的歷史，但在文化上卻只推介特定的馬來群體。為國會大廈下議院提議的壁畫，則嘗試表現出熱情洋溢的種族多元性，唯壁畫最終沒被安裝。總的來看，這些不同的壁畫組及其內容也許支撐了謝文慶的觀點，即從一九五七年至一九六九年的過渡期間，馬來亞搖擺於兩個政治立場之間——主張馬來人主權的馬來民族主義，以及更具包容性的馬來亞國族主義。如文中所說，這些壁畫也許是馬來西亞獨立及大馬來西亞（Greater Malaysia）開始後，未來馬來西亞政治競爭及歷史的「不祥之兆」（writing on the wall），因為馬來民族主義最終遮掩了馬來亞國族主義。

致謝

這篇論文最初於二〇一四年八月二日至三日在吉隆坡暨雪蘭莪中華大會堂舉辦的「重返馬來亞：政治與歷史思想」學術研討會上發表。隨後於二〇一五年刊登在期刊《亞際文化研究》（*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第十六卷第一期，並由張敏華翻譯後收錄在《重返馬來亞》（文運出版社，二〇一九）。

參考資料

Anderson, Benedict. 1991.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Revised Edition. London: Verso.

Chasen, Frederick Nutter. 1940. *A Handlist of Malaysian Mammals: A Systematic List of the Mammals of the Malay Peninsula, Sumatra, Borneo and Java, including the Adjacent Small Islands.* Singapore: Raffles Museum.

Cheah, Boon Kheng（謝文慶）. 2002. *Malaysia: The Making of a Nation.*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Fanon, Frantz. 1963.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New York: Grove Press.

FMSA (Federation of Malaya Society of Architects). 1964. *BINA: Journal of the Federation of Malaya Society of Architects*, Vol. 5 No. 1. Kuala Lumpur: Federation of Malaya Society of Architects.

Sabapathy, T. K. 1994. "Merdeka Makes Art, or Does It?" In *Vision and Idea: ReLooking Modern Malaysian Art*, edited by T. K. Sabapathy, 51-76. Kuala Lumpur: National Art Gallery.

Salazar, Zeus A. 1998. *The Malayan Connection: Ang Pilipinas sa Dunia Melayu.* Lunsod Quezon: Palimbagan ng Lahi.

Sheppard, Mubin. 1964. "Treasure Trove". In *The Straits Times Annual 1964*, 54-57. Singapore: Straits Times Press.

Sheppard, Mubin. 1979. *Taman Budiman: Memoirs of an Unorthodox Civil Servant*. Kuala Lumpur: Heinemann.

Tan, Kok Meng（陳國明）. 2000. "Critical Weave: Inter-woven Identities in the Singapore Conference Hall / Trade Union House of 1965". In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Architecture*, 4 (1): 17-24.

Tunku Abdul Rahman. 1957. "On the Road to Nationhood". In *The Straits Times Annual 1957*, 2-7. Singapore: Straits Times Press.

Tunku Abdul Rahman. 1977. *Looking Back: Monday Musings and Memories*. Kuala Lumpur: Pustaka Antara.

Van Steenis, C. G. G. J. 1950. *Flora Malesiana—being an Illustrated Systematic Account of the Malaysian Flora, including Keys for Determination, Diagnostic Descriptions, References to the Literature, Synonymy, and Distribution, and Notes on the Ecology of its Wild and Commonly Cultivated Plants*. Jakarta: Botanic Gardens of Indonesia, Bogor.

Wallace, Alfred Russel. 1869. *The Malay Archipelago: The Land of the Orang-utan, and the Bird of Paradise. A Narrative of Travel, with Studies of Man and Nature*.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圖17-1：上圖為潘寶鴻所作的壁畫。
圖17-2：下圖為余君明所作的壁畫。



圖17-3：漢都亞淺浮雕，由韋弗尼．詹金斯雕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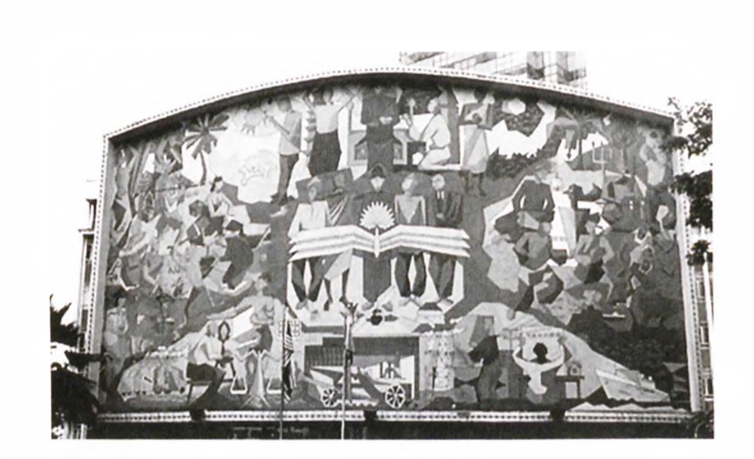


圖17-4：馬來西亞國家語文出版局的壁畫，由伊斯邁・穆斯坦設計。



圖17-5：馬來西亞國家博物館的壁畫設計，由張禮棠設計。



圖17-6：馬來西亞國會大廈下議院山牆壁畫的草圖，由蔡天定設計。

圖畫中的空間：

勘察新加坡國立大學博物館收藏裡的建築與風景

於一九二七年出版的德文版《作為象徵形式的透視法》（一九九一年的英文譯本）中，藝術史學家歐文・潘諾夫斯基（Erwin Panofsky）將中心透視法解釋為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世界觀的一種象徵形式。他認為，這是在歷史中形成的慣例體系，用於構建、呈現和表達當時畫作中的圖像空間。該作品在多方面被視為創新。其要點在於他以跨學科的方式審視畫作，同時重新接觸和認識畫作本身，包括它們與世界以及影響其構思、構造和構建的環境。在這情況下，世界必須被看作與藝術作品的產生和作品本身，以及社會反應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繫。

畫作解讀在辨別背景上或許會有所收穫，但也有另一種可能性。在《觀看的方式》（*Ways*

of Seeing）中，約翰·伯格（John Berger）警示我們以弗朗茨·哈爾斯（Franz Hals）作品進行討論的畫作主題與背景和他所謂的「疑惑之處」，還包括我們對某些藝術權威和機構的依賴。儘管存在著這些隱患，最近的學術研究仍產生了一些像潘諾夫斯基（Panofsky）那樣的詳盡論述，使我們更進一步理解畫作圍繞的背景和世界。例如，愛德華·薩依德（Edward Said）《東方主義》（*Orientalism*）許多版本的封面都使用了讓·萊昂·傑羅姆（Jean-Leon Gerome）一八五四年的作品《耍蛇人》（*The Snake Charmer*）。它被認為是描繪薩依德（Said）呈現東方主義的最佳例子，因畫作中的耍蛇人和印度長笛演奏者都不被允許出現在回教堂內，實際上也不被允許在回教堂內裸體。傑羅姆（Gerome）在構建「東方主義」場景方面很隨性。然而，其「表演」的地點被鑑定為開羅藍色回教堂內部相當「科學」的記錄，並用於隨後的回教堂重建。在另一篇名為《豐饒之地：中國明代的園林文化》的研究中，克雷格·克魯納斯（Craig Clunas）考察了蘇州明代園林的畫作，並雄辯地將中國園林從主要是學者自我塑造、想像和居住的空間觀點中分離出來：園林也是經濟資源，植物產量和經濟作物支持他們的日常生存。

在這篇文章中，我想描述三幅畫作，以此建議對新加坡一九五〇和六〇年代某些景觀發展的可能性解讀，然後討論已構建的景觀共同展覽的前提基礎。如展覽標題所示，展覽的重點是新加坡景觀：陳列於博物館空間中的作品，除了與解讀新加坡相關，它們之間也存有相

互比較的可能性。

三部作品分別是鍾泗濱（Cheong Soo Pieng）的《聖安德烈教堂》、黃光才（Wee Kong Chai）的《火災後》和林木化（Lim Mu Hue）的《花柏山觀》。

每部作品大概相隔五年，從一九五五至一九六六年製作而成，即新加坡宣佈獨立後的一年。

三部作品

鍾泗濱的《聖安德烈教堂》是一幅值得我們更深入探討的作品。在圖畫的左上方，被引為主題名稱的聖安德烈教堂尖頂清晰可見。如圖所示，教堂的正面朝向並提示我們這幅畫的主要空間是哥里門街、橋北路和禧街所包圍的區域。一系列或多或少平行的對角線貫穿畫作，以連接中間和右側一組低層結構的屋簷。作為集體，從右邊描繪逐漸縮小的建築結構表明，大教堂處在遠方，且一部分被該建築群遮擋了。最接近觀眾的單層街區角落，是一個在直立長方形框架內的拱形開口，它邀請我們探查前景中剩餘的空間。

殖民時期的大教堂是鍾泗濱的畫作主題嗎？它出現在標題和作品上端，但名義上是為了暗示圖片其餘部分的位置。藝術家將背景中的天空渲染成一種藍色框架，把整組結構連接起

來。圖畫中的空間是為了讀取位置，而不是為了聚焦大教堂。前景中的開放區域因其描繪方式而引人入勝。左中間有個暗黑的鋸齒形狀擋住了大教堂的底部，而在它前面的是彩色的堆疊物——可能是碎片或瓦礫。畫作中心是一堵形狀不規則、色彩參差不齊的牆，而某些牆壁缺失的灰泥曝露了底下的磚牆。該空間的地面用綠色、紅色和灰藍色的筆觸和淡黃色的斑點繪製。其描繪的空間不是一條車道或一個預設的開放區域，而可能是一個前結構被拆除和移走後留下的空地。這樣的創造空間揭露了大教堂和其他相鄰建築物的局部視野：若原本的建築仍存在，它們在視線上會被遮擋。

黃光才（Wee Kong Chai）的《火災後》記錄了新加坡以重大破壞性火災為標誌的歷史時期。其題寫的日期表明該環境可能是一九六〇年中峇魯大火的殘餘結果。景觀形式中最突出的視覺元素是曾經占據該地的土丘，而位於這些暗斑中的是各種樹堆。去了樹葉的燒焦樹幹現形成了垂直元素，劃分畫作中的空間：它們的層次和大小標誌著空間的深度，同時也表明了它們與先前城郊聚落的共存，作為遮蔭處、地點標記或僅是自然景觀的一部分。隨著我們進一步探索排序和組織，我們可以辨別出道路、車道、建築物之間的間隙以及更大的開放區域——聚落模式。沿著前景長度形成平緩弧線的道路，還有在頂部邊緣限制視覺、凹凸不平的丘陵輪廓，促使我們將空間的範圍和內容視為相互關聯的元素來解讀。

對土墩空間的進一步研究提供了住宅狀況的其他信息：從頂柱搖晃的黑色橫樑標誌著可

能的天花板高度和結構框架的範圍，殘層的不同紋理暗示著房間的劃分，未燃盡的圓筒、桶、矮牆和其他物件則暗示著平台區域的功能。這是在事件發生後進行的「災後」分析。儘管畫作隱含著荒涼的感覺，而且它描繪的是實體的損失，但在某種程度上，它可被視為存在於市中心外、許多戰前人類定居地的空間記錄，而中峇魯只是其中之一。與新加坡藝術家的其他幾幅火災畫作一樣，它也捕捉了新加坡房屋歷史的轉折點，即這種住宅形式（被指為「貧民窟」）被視為對發展有害，以此作為替代該地房屋形式（如轉為高層公寓樓）的前提。

在林木化一九六六年的《花柏山觀》中，前景展示了通往花柏山頂峰的台階和道路。在觀景台上，幾個背對著觀眾的人注視著下方的海港和大海。中間一層厚厚的平行帶與吉寶碼頭的建築物、碼頭區和儲藏建構的輪廓相連，背景則是一條較薄的紋理帶，附有幾艘離岸船隻的輪廓。那四個人的位置暗示一個有利的地勢，邀請我們從該處觀看散布在山葉下的海港。新加坡獨立一年後，考慮通過跨越海陸的發展中港口城市的特點取得發展。從十九世紀中葉作為新加坡貿易框架的延伸而在殖民地建立的新港，到港口和碼頭營運權移交給當地菁英，現代化的要求與衡量以及在發展中國家建立一席之地，一直都與新加坡的南部邊緣相互關聯。

作品的主題地點——花柏山和吉寶碼頭，不斷地以各種形式被描述，包括文字記錄、歷史繪畫、地圖、照片和電影。中國商人王大元（Wang Da Yuan）沿舊新加坡海峽的「龍牙門」、丹戎巴葛碼頭公司的新港地圖、一九六〇年的黑白電影《獅子城》，現與林（Lim）的畫作和

其他兩部作品參與了這次的展覽：查爾斯．戴斯（Charles Dyce）的《帆岩》（*Sail Rock*）與另一幅名為《武吉寶美的外觀變化》（*The Changing Look of Bukit Purmei*）的林木化畫作。總的來說，這些可能為理解該地點的地方歷史提供了一個時間範圍，它可跨越漫長的時間段，而非作為殖民或民族記錄。這類互文考察可能會延伸至其他地方，如聖安德烈教堂地區或中峇魯，即本文中其他兩幅畫作提到的地區，或就此而言新加坡的其他地方。

新加坡畫作（一九五〇至八〇年代）

新加坡國立大學博物館二〇〇二年首屆展覽的出版目錄中，薩巴帕迪（T. K. Sabapathy）討論了它的東南亞收藏對藝術史和東南亞研究的重要性。展覽品包括雕塑、紡織品、陶瓷和畫作，展覽突出了這些層面，並展示了該收藏的許多重要組成部分。為該展覽撰寫的文章中，他還詳細介紹了馬來亞大學藝術博物館（一九五五至一九七三年）收藏的起源，還有其創始人邁克爾．蘇利文（Michael Sullivan）所扮演的角色。一九五五年也是東南亞第一所中文大學——南洋大學的成立年，隨後建立了李光前藝術博物館（一九七〇至一九八四年左右）。一九八〇年，國家決定將南洋大學與新加坡大學合併，這包括了兩個博物館的館藏，過程相當費力。一九六六年早期，大學藝術博物館的藏品被當時的策劃人威廉．威利茨（William

Willetts）分成兩部分，分別作為新加坡大學和位於吉隆坡班台谷馬來亞大學的藏品。這是一九六二年馬來亞大學一分為二的慘痛後果，也是新加坡和馬來亞（後來的馬來西亞）這兩個戰後國家之間產生分歧的早期預兆。

儘管該收藏品的歷史艱辛，但我們可以注意到，兩個博物館重疊的時間跨度是一九五〇至八〇年代。在此期間，博物館通過募捐、收購和購買在新加坡工作的藝術家作品增加館藏。包括戰前成名的鍾泗濱和陳宗瑞（Chen Chong Swee）等藝術家，以及六〇至八〇年代非常活躍的黃光才和林木化等藝術家。巧合的是，這四十年也是新加坡因政治轉變，而發生巨大物質和社會變革的時期。從本文所選取的三幅作品可看出，城市更新、火災、拆除、建設等過程成為了藝術家的主題。該藏品的畫作為景觀解讀和對其背景的理解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在薩巴帕迪的文章中，他還向策展人提出挑戰，要求他們「探索利用這個收藏作為大學研究項目的可能性」，就如他為首屆展覽所做的那樣。這個當前的展覽可被視為一種回應。它試圖從不同角度提供對新加坡的看法，包括選擇、主題和空間的布局。這些畫作也將用於建築系有關新加坡和東南亞的兩個教學單元。除了講座和輔導課程，還會組團參觀博物館以及作品中提到的新加坡遺址。希冀以後能有更多的展覽用於教學。

致謝

在此感謝薩巴帕迪（T. K. Sabapathy）先生在本文的撰寫和展覽策劃中分享的見解和建議。

參考資料

Berger, John. 1972. *Ways of Seeing*. London: Penguin Books.

Clunas, Craig. 1996. *Fruitful Sites: Garden Culture in Ming Dynasty China*.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Lim, Irene. 2003. *Sketches in the Straits: Nineteenth-century Watercolours and Manuscript of Singapore, Malacca, Penang and Batavia by Charles Dyce*. Singapore: NUS Museums. Lu Yaw. 1990. Lee Kong Chian Art Museum: collection of Chinese ceramics, bronze, archaic jade, painting & calligraphy in the light of recent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Panosky, Erwin. 1991. (Original German edition 1927). *Perspective as Symbolic Form*. New York: Zone Books.

Sabapathy, T.K., ed. 2002. *Past, Present, Beyond: Re-nascence of an Art Collection*. Singapore: NUS Museums.

Said, Edward. 1978. *Orientalism*. New York: Pantheon.



圖18-1：鍾泗濱，《聖安德烈教堂》。板面油畫，58.5 x 68.5公分，一九五五年。



圖18-2：查爾斯·戴斯（Charles Dyce），《帆岩》（*Sail Rock - The Old Straits of Singapore*），一八四六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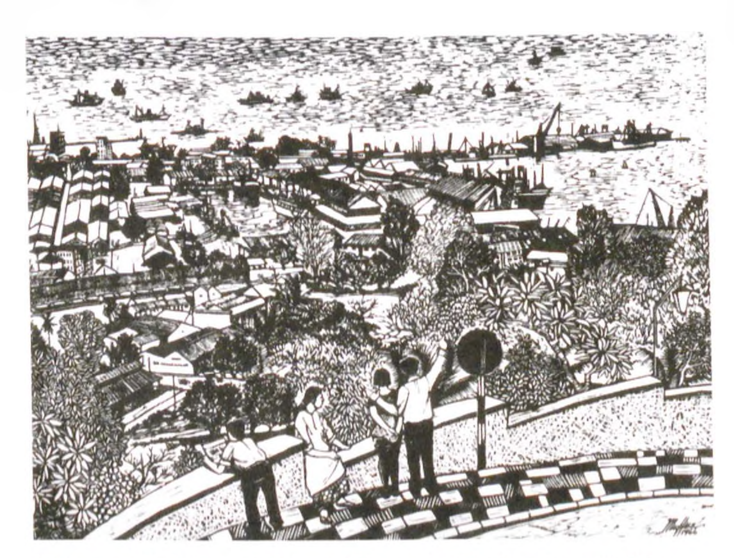


圖18-3：林木化，《花柏山觀》，木刻版畫，18 x 24吋，一九六六年。

輯四　國族之形成

三大國家建築項目

在以下論文中，我考察了一九四五年後三大由國家開發和建造的項目。它們分別是：一、巴西的首都巴西利亞（Brasília）；二、印尼雅加達由蘇卡諾一手操辦的建國時代建築；以及三、位於美國紐約的聯合國大樓。我不僅想對這些國家項目與人民之間的關係作出描述和討論，還想更進一步將其和兩個「世界」機構與這些建國史在世界史進程中作出關聯，亦就是：聯合國（或其前身為「國際聯盟」）和國際現代建築協會（CIAM）。

我之所以選擇論述前兩個項目，除了因為現有已發表的材料唾手可得，還因為它們離歐洲相對較遠，而「國家」、「國際聯盟」和「國際現代建築協會」的發源地是歐洲。這兩個例子可以讓人們對「民族」、「國家」和「現代性」等概念作出超脫大都會的想像、詮釋和

解讀，並通過建築項目來檢查這些概念傳播的成敗，尤其是那些引用現代主義或「國際風格」掛冠的建築項目。巴西和印尼的項目是由本土菁英來啟動和建造，因此，建築師和規劃師在被劃為「發展中國家」的本國所扮演的角色，是對其進行更複雜的意識形態或形式轉換。

其次，選擇聯合國大樓建築群進行討論是因為迄今為止，聯合國仍然是與全球政治、法律、機構、政策和實踐掛鉤的最大和最重要的「完成式」和「進行式」，而其話題性可以說是從一九五一年建築的落成後就開始。在本文的第三個案例研究中，我想勾勒出國際現代建築協會的創始實際上是如何與國際聯盟交織在一起，以及為聯合國選擇建築項目和「適當的建築語言」的政治，以及全球代表的問題是如何以類似的主角和思想的流通再次重演。

柯比意（Le Corbusier）在參與聯合國總部建築選址和建議書提案中寫道：「一九二八年，國際現代建築協會在瑞士的拉薩拉（La Sarraz）城堡中誕生。我們可說是聯合國真正的先驅，本會調和了這些在世人眼中被稱為建築和城市主義的「異議者」，並用了二十年時間完善了建築和城市主義的學說。」[1]這群來自國際現代建築協會的「建築師聯盟」，將是柯比意召集以反擊一九二六年取消他在一項國際賽事競賽資格的聯盟，爾後更是他用以在全世界推廣他的建築和規劃理念的組織。儘管國際現代建築協會聲稱有全球權威代表，但其會員資格仍然有限。一九五六年，在國際現代建築協會會議進入末代和「消亡」之前，只有區區來自十五個國家的兩百五十名代表。[2]然而，一九二八年國際現代建築協會的第一份宣言裡，曾呼籲國

際聯盟立法制定新的空間營造標準，意旨能通過國際聯盟開發一種通用技術語言，將所有建築標準化和規範化，在全世界強制教授，實現於城市裡的每一磚每一瓦，每一沙每一礫。[3]

此歐洲建築師菁英會的形成，為全世界各地引起一波的效應，首先是中歐和東歐的相關業者。匈牙利建築師弗拉卡斯．莫爾納爾（Frakas Molnár）在一九三六年於巴黎舉行的第五屆國際現代建築協會大會中，提議在這些由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蘭、南斯拉夫和希臘組成的「巴爾幹半島國家」的建築師，組織「東國際現代建築協會」（CIAM-East〔CIAM-Ost〕）。[4]到一九三八年，柯比意在巴西有了一批追隨者，他拉攏了盧西奧．科斯塔（Lúcio Costa）、卡洛斯．萊昂（Carlos Leon）、阿方索．雷迪（Alfonso E. Reidy）和奧斯卡．尼邁耶（Oscar Niemeyer）為「里約國際現代建築協會」（the CIAM group of Rio）。[5]一九四五年五月，德國投降後，西格弗里德．吉迪恩（Siegfried Giedion）試圖建立一個正式的「德國國際現代建築協會」。然而，自一九三四年華特．格羅佩斯（Walter Gropius）移居到英國之後，

1 Le Corbusier，由 Eric Mumford 引用，"The CIAM Discourse on Urbanism…", p. 160.
2 Eric Mumford, Ibid., p. 6.
3 Le Corbusier, "The Radiant City", pp. 18-29.
4 Monika Platzer, "From CIAM to CIAM-Ost, 1928-37", p. 229.
5 Stamo Papadaki, "The Work of Oscar Niemeyer", P.J.

此協會就沒有德國代表。[6]直到一九五一年，國際現代建築協會第八次大會上才見南亞和東亞代表身影，他們分別是來自印度的巴克里希納・多西（Balkrishna Doshi）和來自日本的丹下健三（Kenzo Tange）。[7]

近期的學術皆試圖探討何以國際現代建築協會所提倡的各種本質化、去語境化和去歷史化的宣言與其在國家上的應用有何密切關係，更重要的是，評估這些項目落成後帶來的後果和影響。詹姆斯・霍爾斯頓（James Holston）在他的作品《現代主義城市：批判巴西利亞的人類學》（*The Modernist City: An Anthropological Critique of Brasilia*）中寫道，這些提議的簡單、還原和決定論的性質正是許多國家採用它們的原因。由於國際現代建築協會模式建築和城市已經成功地將許多頗具差異的國家利益統一起來，其專屬的現代主義品牌已經開始主導全球開發的各個項目。這種「高度現代主義」的引用也跨越了不同形式的國家意識形態和政治光譜。以巴西利亞為例，霍爾斯頓描述了這座城市如何「左翼自由主義者規劃，由共產黨人設計，被發展主義政權建設，並由官僚專制獨裁統治鞏固，每個人都聲稱自己與這座城市有獨一無二的關係」。[8]

在著作《國家的視角：企圖改善人類生活的特定計畫為何失敗》（*Seeing Like a State: 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中，詹姆斯・史考特（James Scott）將高度現代主義的建築和城市規劃中的簡化和本質化作為眾多國家項目形式

中的其中一種，並將質量問題轉化成數量問題。除了使用巴西利亞和昌地葛（Chandigarh）作為案例研究之外，史考特還具體地研究了科學林業、永久業權、集體農場、農村定居點和工業化農業，並展示了社會進程或事件少不了的錯綜複雜，而非任何前瞻或回顧的圖式所能投射和設計。他認為，大多數此類計畫形成於各國或邦的前社會主義陣營，或革命性的在第三世界環境中產生，是因為缺乏可挑戰此類專制提案的機構或組織而導致的結果。通常因為這裡曾發生過戰爭、革命、經濟崩潰蕭條或新獨立的事件，而導致抗衡系統的真空。他認為，這些計畫與早期專制君主的制度之間的關鍵區別在於：這種威權主義和專制主義被轉移到打著「進步、解放、改革」的旗幟，在治國方略、人口普查、地籍圖、身分證、護照、學校、城市和大眾媒體等等的工具和技術中一覽無遺。[9]

以下案例研究揭示的關鍵問題可能是，與其從「國家」或「國族」的單一角度探討民族形態，包括其身分和構建形式，還應強調從「有溫度的」人民角度去探討。為達到此，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所描述的面面俱到的倒置望远镜視角可能有助於定位和

6 Eric Mumford. *op cit.*, p. 162.

7 Ibid., p. 204.

8 James Holston, "The Modernist City…", p. 40.

9 James Scott, "Seeing Like a State…", pp. 342-343.

澄清各種想法、結構、立場和修飾。希望在形成這種看法的過程中，讀者也能因此理解國家和人民之間，國家因地理位置而和鄰國與人民之間產生的變化作用。正如史考特所警告的那樣，邏輯上，國家和民族的計畫和動力似乎深具中心化和集中化，但它實際上卻散布各處實踐，乃至超脫國邦，值得深思（他稱之為「mētis」，而不是「認知」〔episteme〕和「知識」〔techne〕），這在觀察人類狀況帶來益處，但通常也具有風險。或許讀者可以大膽地對這些概念、地點和民族作出同步思考。

一、巴西利亞，巴西

「我們在那裡待了幾年，近乎與世隔絕。在那裡，旱季時，渺茫曠地被紅色的微塵覆蓋之餘，也滲入皮膚；抑或雨季，這些毫無防備的大地被奔騰直下的雨水沖刷，讓你寸步難移。夜晚，杳無人煙的荒蠻之地被寂靜籠罩。但是熱忱戰勝了一切，儒塞利諾．庫比契克（Juscelino Kubitschek da Oliviera）以其永續的熱忱為我們樹立了榜樣。建築物開始拔地而起，宮殿和公寓，街道的線條，以及自由揮灑的空間，盧西奧正一點一滴地為我們創造了幾個新都會的輝煌天堂。」[10]

——奧斯卡．尼邁耶，有關他在巴西利亞設計的經歷，約一九八五年。

「當我著手設計公寓時，他們告訴我，所有人，無論貧富，都有能力居住在裡頭。但現在彷彿只有富人才能住在裡面。窮人負擔不起。距巴西利亞二十英里以外的地方，那裡的人一貧如洗。**他們只能通過雙筒望遠鏡遠眺巴西利亞的美景**。在最初的團結宣言中，巴西利亞的孩子們似乎可以在純淨無暇的環境下成長，然而它如今已成為巴西最具歧視性的城市。」[11]【作者標明】

——奧斯卡．尼邁耶，約一九八零年回首巴西利亞。

一九五四年，由瓦加斯領導的巴西政府在腐敗指控和軍方壓力下面臨垮台危機，也成為了總統自殺的導火線。總統職位陷入四角戰，儒塞利諾．庫比契克以「以五年換五十年躍進」的競選宣言獲勝，直擊民心的是希望這個發展中國家經濟獲得刺激性的進步。在他某次的競選拉票活動上，有人詢問他，假如他當選，可會修訂憲法，將聯邦首府遷移到中央高原地區，讓巴西高原成為巴西的心臟地區。基於他當時已經宣讀了政治綱領，當下的他就答應了，即便他不記得自己曾經唸過此條宣言。[12]這偶然的挑釁成為了庫比契克日後對創建巴西

10 Oscar Niemeyer, in Helio Penteado ed., "Oscar Niemeyer", p. 74.
11 Oscar Niemeyer, interview with Alex Shoumatoff, "The Capital of Hope…", p. 35.
12 Alex Shoumatoff, "The Capital of Hope…", p. 29.

利亞新首都的偏執。巴西利亞被認為是本世紀最大膽的城市項目之一，諾瑪．埃文森（Norma Evenson）稱其為「一座具有爭議性的規劃城市，猶如在漠地上蓋溫室，還要迫使溫室開滿花一樣存在」。[13]【作者標明】[14]

庫比契克對內陸首都的狂熱想像，事實上可追溯回較早前的歷史。長期以來，居住在大西洋沿海地區的巴西人皆認為，中央平原的野生自然區域是屬巴西人所擁有。一八一七年的一場共和革命（伯南布哥人起義）的主要人物之一，若昂．里貝羅神父（João Ribeiro）曾敦促建造一座城市中心，「國會和政府樓必須建在不少於海岸線三十至四十里格之內」。爾後的一八二一年，在一場位於葡萄牙的代表會議（Portuguese Côrtes）（按：內有貴族、神職人員和資產階級代表出席的集會），巴西代表曾提呈一份建造此一座城市的建議報告書。一八九一年的憲法為此計畫圈定了具體規定，並計畫在一萬四千四百平方公里的內陸區域為政府設立新首都。[15]由於巴西政治之前所犯下的錯誤仍然記憶猶新，這項從固有首都里約熱內盧遷移到新地址的計畫，也被視為將政府從繁文縟節和貪污腐敗官僚機構中解放出來的努力，並立志帶來一個更高效、更為集中管理的新核心區域，也讓理想更為接近現實。

庫比契克意識到，他必須在他五年任期內完成巴西利亞的工作，因為他無法名正言順地續任，而且巴西政客不會去瞭解和延續前任政府的項目。[16]最終，他的計畫在一九五六年在國會內勉強通過，並立即創建了兩個機構：NOVACAP，負責建設新首都以及遷都計

畫；同時還成立了發行債券的區域銀行，為該項目全權分配資金。[17]隨後六個月內，有項競賽公開徵收適當的規劃和設計提案，參賽者得提交兩份文件：按照一比兩萬五千的比例和包含各個城市基礎設施在內的藍圖，以及相關輔助報告，到一九五七年三月。陪審團包括擔任 NOVACAP 建築總監的奧斯卡．尼邁耶、代表巴西建築師協會的保羅．里貝羅（Paulo Antunes Ribeiro）、來自美國的奧爾塔（Horta Barbosa）、史塔莫．帕帕達基（Stamo Papadaki）、來自法國的安德烈．西夫（André Sive）和來自英國的威廉．霍爾福德（William Holford）。本次比賽共吸引了二十六名參賽者，其中不乏巴西最傑出的建築師。[18]

當盧西奧．科斯塔那份符合所有遴選條件的第二十二號計畫獲頒一百萬克魯賽羅的首獎時，陪審團點評為：「一個毫無疏漏的項目，這座城市將通過其清晰而漸進的次第變得宏偉。」「作為聯邦首都，這是一個能將都會不朽元素與日常生活完美結合的項目。」這條四

13 Norma Evenson,"Brasilia: Yesterday's City of Tomorrow", p. 471.

14 這一提法與扶西．黎剎（José Rizal）在《不許犯我》（*Noli Me Tangere*）中提到的溫帶氣候下的玻璃溫室花朵有著不可思議的關聯。

15 Norma Evenson, *op cit.*, p. 472.

16 Ibid., p. 475.

17 Alex Shoumatoff, *op cit.*, p. 31.

18 Norma Evenson. *op. cit.* p. 477.

英里長的「紀念軸」核心區域，是一條軸線與三角形相交的弧形，始於住宅區，終於一個包含政府大樓的三角形廣場。科斯塔後來宣布，該方案「點子來源於普遍上人們在指向某處，或宣示主權時皆會做出的手勢：當繪製兩條相互成直角的軸，乃是十字符號。這個標誌隨後結合了地勢，以及自然排水系統並完美展現其最佳定位。」[19]

科斯塔以「十字架」作為他設計草圖的五張索引卡主題，從而將一個神聖的標誌投映到巴西內陸地區，為具有深厚宗教情操的巴西人做出了神聖降臨的姿態；對里約熱內盧人而言，他們的每一天都生活在一個十字架狀、巨大的耶穌標誌俯瞰之下。作為第一個「十字架」草圖，科斯塔引用的符號意識是如此強大，以至尼邁耶本人在開始為國會大廈繪製第一幅畫時就如出一轍地複製了這一章。[20]

科斯塔、尼邁耶和柯比意的「聖靈」

在進一步闡述新首都的設計之前，這裡可能有必要描述一下庫比契克、科斯塔、尼邁耶之間的密切聯繫和淵源，以及柯比意作為巴西現代建築發展「有名無實的領導者」的角色。作為里約熱內盧國立美術學院（Escola Nacional de Belas Artes）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一期間的院長，科斯塔曾試圖修改其先前在法國美術學院（Ecole de Beaux Arts）修讀建築課程時候的

一份功課藍本。年輕的尼邁耶於一九三〇年進入該校就讀，畢業後在科斯塔的辦公室工作。[21]隨後科斯塔用其影響力再次把柯比意帶到了里約熱內盧。一九三六年，科斯塔帶領一個巴西建築師團隊設計教育和衛生部大樓，柯比意同時也受邀作為該設計方案提呈的顧問。[22]經過多次交流，巴西團隊在尼邁耶提出的意見下，修正了柯比意的設計，建築北側用遮陽板（brise-soleil），這或許是有史以來首次如此大規模的使用；其南側的鑲板則以玻璃來呈現。

其實，在巴西利亞之前，科斯塔和尼邁耶曾攜手建造了另一座重要的建築。一九三九年紐約世界博覽會巴西館的設計競賽中，評審團正在尋找一個能代表國家的當代建築。他們將科斯塔的設計選為最能展示「巴西魂」（espirito de brasilidade）的設計，頒予首獎，並肯定尼邁耶作品的技術價值而給他頒了二等獎。縱然如此，科斯塔邀請尼邁耶參與他設計的一

19 Ibid., pp. 478-481.

20 科斯塔這兩把斧頭的設計也被描述為鳥、蜻蜓、飛機或弓箭。From Flavio Conti, "The Focus on Democracy", and Alex Shoumatoff, "The Capital of Hope".

21 Norma Evenson, *op cit.*, p. 481 and Oscar Niemeyer, in Helio Penteado (ed.), "Oscar Niemeyer", p. 71.

22 該團隊由科斯塔、尼邁耶、阿方索・雷迪、卡洛斯・萊昂、豪爾赫・莫雷拉和埃納尼・瓦斯康塞洛斯（Costa, Niemeyer, Afonso Reidy, Carlos Leão, Jorge Moreira and Ernâni Vasconcelos）組成。該過程的描述可以在吉拉・德克爾（Zilah Deckker）《打造巴西》（*Brazil Built*）一書中尋獲。柯比意也曾在一九二九年於巴西授過一堂有關里約熱內盧未來計畫的課。

份能夠融合「現代化」和「民族精神」的新提案，一個評審團希望以此將巴西展示到世界眼前的新建築計畫。[23]

早在一九四二年，當庫比契克還是貝洛奧里藏特的市長，曾推動了一個名為潘普利亞（Pampulha）的郊區湖濱開發項目。尼邁耶受委託參與了幾座建築，包括庫比契克私人「週末別墅」（weekend house，度假屋）在內的設計，並在一九四三年竣工。[24]因此，毫無懸念可言，十三年後，庫比契克欽點了尼邁耶為其新首都動工。根據美國作家亞力克斯·舒馬托夫（Alex Shoumatoff）的說法，庫比契克就任總統後不久的某日午後，他和尼邁耶一起開車在里約熱內盧轉悠，問道：「你願意當我的米開朗基羅嗎？」尼邁耶欣然接受。[25]而早在一九三六年就已經與柯比意接觸的尼邁耶，爾後更是通過科斯塔汲取了柯比意的建築理念。隨後在一九四七年，他與柯比意更是聯手設計和建築位在紐約的聯合國大樓（見本文第三節）。柯比意在巴西利亞落成後曾到訪，多年後，尼邁耶回憶起他為這些建築付出的艱辛點滴，說：「一切都因為柯比意某日在國會的坡道上對我說：『這裡必定會有讓人眼前一亮的作品。』」[26]

巴西利亞「紀念軸」將從西部的電視塔一直延伸到東部的三角形廣場，這鼎立東方三角是象徵三權的政府宮、最高法院和國會大廈。其他政府樓或主要建築，如劇院、大教堂、體育中心、酒店和商業區，都位於這條軸線上。由尼邁耶設計的國會大廈，高二十八層的雙子塔——乃是眾列樓宇中最高——以及與此塔相鄰的兩個立法會議廳，儼然成為這座城市的著名地標。[27]正如麻省理工學院城市研究與規劃系教授勞倫斯．威爾（Lawrence Vale）所描述，細長的板塊形同聯合國祕書處的塔樓。他說：「像由一條臍帶般的人行道相連的連體嬰。」[28]

23 Zilah Deckker, "Brazil Built…", p. 56.

24 Norma Evenson, *op cit.*, p. 476 and Stamo Papadaki, "The Work of Oscar Niemeyer", pp. 108-109.

25 引述自亞力克斯．舒馬托夫（Alex Shoumatoff）的說法，頁三十一。除此之外的聯繫：在陪審團中，史塔莫．帕帕達基（Stamo Papadaki）早先在一九五〇年製作了一本尼邁耶作品的專著，其中有盧西奧．科斯塔（Lúcio Costa）的前言。Stamo Papadaki, "The Work of Oscar Niemeyer".

26 Oscar Niemeyer, in Helio Penteado (ed.), "Oscar Niemeyer", p. 74.

27 Norma Evenson, op. cit., p. 485, and Alex Shoumatoff, *op cit.*, p. 57.

28 Lawrence Vale, "Architecture, Power, and National Identity", p. 121.

巴西利亞的城市規劃還有一個焦點，就是一條連接巴西南北的新內部高速公路系統，破天荒的建立了一道從內部連接國土各地的地面交通系統。在首都內，有一條貫穿住宅軸線的高速公路為中樞，再由各個交通接駁通向各個住宅區。在道路軸線（*Eixo Rodoviário*）的每一側，八百平方英尺的超級街區（*superquadra*）在很大程度上遵循了科斯塔曾用之參賽的設計，其中包含一系列十八棟擁有塔板塊的公寓樓，每棟樓高六層，底部僅用柱子，如同踩著高蹺（*pilotis*）的建築物，並各以直角對立著。[29]超級街區被認為是一個自給自足的迷你社區。為了灌輸「地方特色」和「歸屬感」，科斯塔建議在每個超級街區種植不同種類的樹，每四個超級街區將有一所小學、一座教堂、一家百貨商場、五金店、麵包店、超市、精品服裝店等小購物區。

最近的學術研究報告已經推翻這些為首都建築的設計師在建築功能上主張的烏托邦和平等主義。值得一提的是諾瑪・埃文森和詹姆斯・霍爾斯頓（James Holston）。在他的作品《現代主義城市：批判巴西利亞的人類學》（*The Modernist City: An Anthropological Critique of Brasília*）中，描述了超級街區的居民對每個單位肅穆的內部空間規劃感到不舒服，貌似房間（*sala*）的客廳必須具備多功能以滿足巴西社會各個規範要求。當他們無法改變公寓樓的外型，許多高官搬出公寓，紛紛到湖的另一邊建造獨立的房子。許多社會菁英在發現理應尊卑有別的社會卻「過著一樣的生活」，而無法容忍這失序的社會狀況後，也都搬離了這裡。[30]

霍爾斯頓和埃文森也批評了住宅區內所建設的公共空間。儘管鄰里商店被刻意設計成面向超級街區而不是公路，但實際上，自古以來，店主會偏好將他們的櫥窗面向街道，千姿百態的店面就是傳統特徵。[31]舒馬托夫還表示，儘管社區規模較小且生活質量理應更好，它依然是一個自給自足的「中世紀城鎮」。但實際上，這個首都並未像巴西或其他相對較老的城市那般，可以為社區建立彼此之間的聯繫，亦就是說，能為居民打造許多社交空間和便利設施。[32]霍爾斯頓指出，以宗教來治理的確能幫助建立巴西社區，例如傳統上的「社區」（*bairro*，葡萄牙語）就是通過家庭和公共空間緊密結構來維持家庭和鄰里關係，但顯然的，這理念並未在這樣「向上發展」的環境中於居民身上彰顯。[33]

隨著城市建設的進展，巴西利亞大量的就業機會自然地吸引了來自巴西各地的工人。基於此，貧困農村地區人口遷移至大多數主要城市而導致城市人口膨脹的模式，也在新首都上演。許多人跳進開往自由鎮（*Cidade Livre*）擁擠的吉普車裡，這個位於邊境、距離科斯塔

29 Norma Evenson, *op cit.*, p. 471 and p. 495.
30 James Holston, *op cit.*, p. 24 and p. 181.
31 Norma Evenson, *op cit.*, p. 486, and James Holston, *op cit.*, p. 24.
32 Alex Shoumatoff, *op cit.*, p. 39.
33 James Holston, *op cit.*, pp. 170-171.

實驗計劃幾英里外兩條小溪匯合處的小鎮，也就隨此計畫而蓬勃。這是一個臨時定居點，專為到此工作的人提供了免費土地。一九五六年十一月，當庫比契克第一次到此視察工作營時，現場只有兩百三十二名工人。到了一九五七年一月，這個數字增加到兩千五百；一九五九年，自由鎮估計已有一萬一千五百六十五人，而其中的六千一百九十六人住在另一個臨時定居點。到一九五八年，自由鎮已經開發兩千六百家商業機構，包括幾十家廉價旅館。[34]

科斯塔和尼邁耶最初所設想的擁戴平等主義之城，最終逆向發展成為僅能收容中上階層人士的住房。較貧窮的階層隨後被安置在距離城市十到二十英里以外、各個外圍衛星城鎮當中。巴西利亞不僅保持了普遍存在於其他城市的階級差異現象，更是強調了巴西或其他任何地方所沒有的物理隔離，霍爾斯頓將這種情況描述為「雙重否定」。[35]

憑藉歷史的教訓，後人將能輕而易舉地提出城市其他各個層面的弊端。巴西利亞從新都動工到城市落成，總共投入了估計六億美元的總成本，截至一九六六年，額外支出的費用估計高達十億美元。巴西利亞的建設年份恰逢通貨膨脹急劇上升時期，而該國的巨額外債幾乎翻了一倍，生活成本則增加了兩倍。[36]該項目在歷史上將被視為讓巴西其他地方在此時期經濟停頓、工業和基礎設施發展停擺的主要原因。然而，埃文森和城市規劃師埃德蒙·培根（Edmund Bacon）分別引用巴西利亞作為建築師和規劃師反面教材例子，尤其是，一個缺乏生態學家、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攜手合作的建築方案，必定無法及早的看出問題癥結所在，

並以環境學和社會學的方法提供解決方案。[37]

最後，人們或許會回到資本所產生的具有象徵性的價值，在眾負面層面中力挽狂瀾地作出一些挽救。畢竟，庫比契克和其他巴西利亞的設計師們，因政治因素而能夠在短時間內實現了巴西人和他們的領導人得花上好幾代才能想像而出的計畫：也就是通過核心建設來團結一個國家。拔地而起的這座新城市不僅吸引了全球建築界的想像，也吸引了整個世界的想像，這可在舒馬托夫的報導中見端倪。[38] 最近從外太空返回地球表面的尤里．加加林（Yuri Gagarin）說：「我感覺自己好像剛剛登上了另一個星球，而不是回到地球。」弗蘭克．卡普拉（Frank Capra）則將其譽為世界第八大奇跡。來自歐魯普雷圖（Ouro Preto，俗稱「黑金城」），旅居巴西利亞的奧爾德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在一九五八年寫道：「這是一段跨越時間和歷史、充滿戲劇性的旅程。從昨天到明天，從結束中重新開始的旅程。」在親

34 Norma Evenson, *op. cit.*, p. 490, and Alex Shoumatoff, *op. cit.*, pp. 45-46.

35 See James Holston, *op. cit.*

36 Flavio Conti, op. cit., p. 168, and Norma Evenson, *op. cit.*, p. 488.

37 Norma Evenson, *op. cit.*, p. 476, and Edmund Bacon, "Design of Cities", p. 235.

38 亞力克斯．舒馬托夫（Alex Shoumatoff），pp. 53-54. 舒馬托夫還提到了參觀者當中不乏各個世界領袖：伊麗莎白女王、理查德．尼克松、菲德爾．卡斯特羅、教皇保羅六世、納爾遜．洛克菲勒，以及義大利、葡萄牙、墨西哥和巴拉圭的總統。

身前往此處勘查之後，他改變了之前的想法，並告誡人們對其建築的輕率譴責。[39]更重要的是，人們還要容許它作為一個華麗的國家象徵，持續為巴西人服務。諷刺的是，在一九六〇年代這般的背景條件，它卻是其他「發展中國家」發展的象徵。正如威廉・霍爾福德所寫：「對於〔巴西〕的窮人和文盲而言，這是他們有目共睹和共同理解的象徵。」儘管存在著諸多爭議，巴西利亞已合法地成為民族自豪感和想像力的來源。

二、印尼雅加達的國家建築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七日上午，蘇卡諾在他位於雅加達的住所外，向一小群人宣讀了《印尼獨立宣言》。不久之後，此聲明通過日本新聞社道明（Domei）和印尼各個廣播及電報網絡，從雅加達向印尼群島其他地區廣播。[40]在那次演講之前的六個月裡，蘇卡諾和哈達領導的民族主義組織人民權力中心（Poesat Tenaga Rakjat）獲得日本人支持，以推翻荷蘭和盟軍的盟軍。蘇卡諾通過日本人在村莊和城市廣場建立的無線電網絡，定期發表演講，並要求全體人民收聽這些官方廣播。歷史和政治科學家喬治・凱亨（George Kahin）留意到，這以印尼語為媒介的演講頗具「潛台詞和外交辭令」，在蘇卡諾不間斷地與公眾互動的內容中，百分之七十五包含「國族主義」和「反帝國主義」信息。[41]六月一日那天，蘇卡諾通過同樣的媒介

傳播了他創造的「建國五項原則」（*Pantjasila*），作為統一印尼的政治哲學，並於八月鼓勵印尼人在所有公共建築上懸掛國旗。[42]

這成為了印尼的國家歷史上很重要的一章，因為這些廣播向該國各個島嶼上的居民勾勒了一個「憑空想像的共同體」，而且，也因為這些來自中央電台的廣播，這些人民開始熟悉這把遠在爪哇島的雅加達、他們未來總統的聲音。在話語中產生了熟悉感，其力量抵達之處，從亞齊一端到望加錫周邊地區。[43]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在聯合國主導的談判會議中，蘇卡諾成為其第一任總統，國家的主權最終從荷蘭人移交給國族主義者手中。[44] 然而，直到

---

39 Edmund Bacon, Ibid., p. 235.

40 George Kahin, "Nationalism and Revolution in Indonesia", p. 136. 當時廣播網絡仍由日本人運營，一些印尼員工甚至在當權者「神不知鬼不覺」情況下播放。

41 Ibid., p. 108.

42 Ibid., p. 122 & p. 137. 早先的民族主義者於一九二九年十二月採用印尼語作為國語，並設計了國旗和國歌。From Kahin, p. 97.

43 在這裡，我引用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術語「想像的共同體」來表示一個民族作為一個想像的共同體，其認同只有通過某些手段，如語言的調解才有可能。From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44 Susan Abeyasekere, "Jakarta: A History", p. 161.

一九五七年至一九五九年過渡到「指導式民主」（Guided Democracy）後，他才不再是有名無實的領導者，並開始控制國家，因為在此之前，這個由群島組成的國家各個地方皆有各自的憲政民主。然而，正是蘇卡諾在此期間塑造了雅加達，並負責調適和建設雅加達的大部分國家項目。其中包括國家紀念碑、伊斯蒂克拉爾回教堂（Istiqlal Mosque）、朋卡諾體育場（之前為史納延體育場）、印尼酒店、第一家百貨公司、雅加達交通各個旁支通路、史納延四葉形交通交匯處。[45]

正如阿比丁．庫斯諾教授和其他人所指出，蘇卡諾的雅加達設計，在內部為印尼其他城市立下典範，對外則為國際社會引來關注目光的「燈塔」。[46]這種將印尼與世界其他地區平肩的見地，是他還是一名建築系學生時就秉持著的信念。[47]一九五〇年和一九六二年期間，他分別發表了以下聲明：

> 「沒有協調，任何『中央政府』都無法持久。沒有集權制度，就不可能存在所謂的『中央政府』。俄羅斯有莫斯科，美國有華盛頓，英國有倫敦。滿者伯夷則有 Wilwo Tikto（按：現今的特洛武蘭地區）。」[48]
>
> 「如果埃及能夠將開羅建設為首都，或義大利的羅馬，或法國的巴黎，還是巴西建設為巴西利亞，那麼印尼也必須自豪地將雅加達作為對外開放的窗口。」[49]

蘇卡諾將雅加達視為一座擁有摩登建築的現代化大都市，或許他以巴西的巴西利亞作為模版。隨後，一九五五年，他在爪哇城市萬隆舉辦了不結盟運動的首次會議，並於一九六二年讓首都成為亞運會東道主，這提高了他世界領導人的地位（或形象）。[50]建設這些項目的資金大多來自外國援助和貸款，這或許也解釋了何以他的首都外貌像一個世界大雜燴。印尼酒店由日本資金建造，史納延亞運會綜合體育場由俄羅斯資金建造，雅加達旁通道則由美國資助。[51]

45 Ibid., p. 167, and Benedict Anderson, "Language and Power ...", p. 173.

46 See Abidin Kusno, "Modern Beacon or Traditional Polity?", or Benedict Anderson, "Language and Power...".

47 For an elaboration, see Rudolf Mrázek, "Engineers of Happy Land".

48 Speech by Sukarno, 1950, as cited in Abidin Kusno, "Modern Beacon and Traditional Polity", p. 33.

49 Speech by Sukarno, 1962, as cited in Abidin Kusno, "*Behind the Postcolonial...*", p. 54.

50 一九五五年四月十八至二十五日舉行的萬隆會議是由二十九個非洲和亞洲國家的領導人組成的「不結盟運動」聚會，領導人考慮如何相互幫助彼此因人口眾多而造成貧困，以實現社會和經濟福祉。除了蘇卡諾，著名人物還有印度總理賈瓦哈拉爾·尼赫魯、黃金海岸（後來的加納）總理夸梅·恩克魯瑪、埃及總統納賽爾、中國總理周恩來和胡志明，越南總理。From Richard Wright, "The Color Curtain".

51 Susan Abeyasekere, *op. cit.*, p. 178.

國家紀念碑

在荷蘭殖民政權遺留下來一個占地九十萬平方米、被稱為「*Koningsplein*」（按：荷蘭語「廣場」的意思）的遺址，蘇卡諾將此草地中心命名為獨立廣場，並豎立了一座國家紀念碑。廣場以南延伸的新大道將成為他「建國」標誌性建築的重點舞台。[52]紀念碑是一個高大的石碑，上面有金色的「火焰」，嵌在一個平頂的底座上。底座非常大，大得足以在裡頭展示各個愛國浮雕和畫面，還有一些所謂的「國家傳家寶」。[53]

豎立這樣一座石碑，對蘇卡諾和該國其他地區都意義非凡。它旨在喚起古代爪哇藝術的林伽和瑜尼（*lingga-yoni*）。據報導，蘇卡諾曾開玩笑說，這座紀念碑正體現出他自己和印尼永不枯竭的男子氣概。[54]它也被稱為蘇卡諾的埃菲爾鐵塔，或他的杵臼，並讓不同層次的意義融到同一紀念碑裡：既可以是國際地標，也可以是日常不過的廚房用具。[55]因此，這座紀念碑不僅能夠利用傳統來呈現對未來的願景，而且還可以隨時秒換成為國際表徵。

最重要的是，打造這麼一座紀念碑同時也豎起了一個象徵性的中心，就像滿者伯夷帝國早期的統治者用磚砌出他們的神龕一樣。正如庫斯諾所闡述的那樣，這座紀念碑的建造及其核心位置在雅加達這個事實，與讓爪哇／東南亞空間和權力成為權威中心的想法吻合——既是神聖的帝王權力，也是神聖空間的體現。[56]班納迪克．安德森進一步指出，很少人能觀察

得知這紀念碑實際上是一種無聲的講演。[57]在我看來，蘇卡諾和雅加達皆與國家紀念碑的象徵性中心如出一轍，從那裡發出的權力和聲音，就像他獨立前的一場又一場的廣播那樣，如斯橫跨著整個印尼的時空。

蘇卡諾一次又一次地提到了十四世紀的滿者伯夷帝國。正如奧利弗・沃爾特斯（Oliver Wolters）所釐清的那樣，爪哇島是滿者伯夷最初的曼荼羅（mandala），但它的地理帝國（或用通猜・威尼查恭（Thongchai Winichakul）的術語，*geo-body*〔地緣機體〕。譯按：*geo-body* 用以形容近代國族意識中的領土想象。）逐漸開展到包括爪哇、蘇門答臘的大部分地區和大部分群島以外的地方。[58]其統治者還聲稱「保護」了包括新加坡島在內的東南亞大陸大部分地區，並與馬六甲和越南等政體建立邦交。[59]因此，它的偉大歷史足以成為有用的參考，

52 Abidin Kusno, "*Behind the Postcolonial* ...", p. 55.
53 Benedict Anderson, "Language and Power⋯", p. 174.
54 Ibid., p. 175.
55 See Susan Abeyasekere, *op. cit.*, p. 169 and Kusno, "Behind the Postcolonial⋯", p. 63.
56 Abidin Kusno, "*Behind the Postcolonial*...", pp. 25-26, 31.
57 Benedict Anderson, "Language and Power⋯", p. 174.
58 Oliver Wolters, "History, Culture, and Region⋯", pp. 34-35.
59 Ibid., p. 28 and p. 144.

實際上它也是印尼統一的地理概念，甚至可能體現對鄰國（現已被定義為二戰後國家）的霸權想像。值得一提的是，蘇卡諾的家鄉比利塔爾（Blitar）位於東爪哇，靠近滿者伯夷帝國的首都。蘇卡諾將滿者伯夷作為楷模，而不是三佛齊（Srivijaya）或中爪哇帝國，他同時也讓他在東爪哇的出生地區合法化。在某種程度上，這些原因可能回答了庫斯諾的疑問，即為什麼蘇卡諾在選擇傳統元素時如此的執著，以及為什麼他在為國家建築繪圖時沒有利用中爪哇的特色，如爪哇式屋頂（*Joglo*）或四根連通屋頂的支柱（*sokoguru*），而是在某種程度上依賴傳統的圖像和概念。[60]

國家回教堂（伊斯蒂克拉爾回教堂）

到一九五〇年代末，蘇卡諾發表了以下宣言：

「我希望與這裡的伊斯蘭社區一起建造一座讓大家星期五來此祈禱的回教堂，它要比開羅的穆罕默德．阿里回教堂大，甚至比薩利姆回教堂更大。……我們要建的回教堂，不用瓦片，而是用鋼筋混凝土……用大理石建成、用大理石鋪地、用青銅鑄門。不只是鋼筋混凝土、青銅、寶石這些材料而已，也一定要夠大氣輝煌……我們要建的回教堂，

一定得是世界上最大的回教堂。」[61]

猶如庫斯諾所建議的那樣，最終的「現代主義」回教堂（伊斯蒂克拉爾回教堂）除了其規模外，還成為了境內的建築楷模。蘇卡諾需要擺脫當地回教堂固有的傳統形式，並將這個國家回教堂擺上國際舞台，作為國家發展的舉證。[62]與國家紀念碑一樣，「現代主義」這優美用語被全球許多地區在其二戰後建築運動中一而再地提起。該項目的建築師是印尼人。弗雷德里希．西拉班（Freidrich Silaban）是最早在巴達維亞皇家威爾海米娜學校（KWS）接受教育的首批印尼建築師之一（*avant-garde*，法文）。一九三一年畢業後，西拉班的整個建築生涯都為政府工作，儘管他一九五〇年在荷蘭學習了一段時間。在一九六五年他榮休之前升任為茂物（Bogor）公共工程部主管一職。儘管當年蘇卡諾被推翻，[63]西拉班的存在極其重要，這也是我稍後在關於荷蘭管理的印尼群島發展中的建築文化的討論中，再度提起他的原

60 Abidin Kusno, "Modern Beacon or Traditional Polity?", p. 25. 此文後半部將談及為何不使用其他白話形式的原因。

61 Sukarno, circa 1960, as cited in Abidin Kusno, "*Behind the Postcolonial...*", p. 1.

62 Ibid., p. 2.

63 Budi Sukada, "The Architecture of Early Independence", pp. 128-129.

因。

這座首府其他重要國家建築包括史納延體育場和通往它的交通通道。蘇珊・阿貝雅斯柯勒（Susan Abeyasekere）描述了蘇卡諾希望某些國家議題成為全民活動，包括在雅加達頻繁舉辦大型集會和政治運動。這座城市頻繁舉辦大型會議以展示印尼在平定和釋放西伊里安查亞（West Irian Jaya）成為自治區後的統一，同時也劍指馬來西亞，因為當時的馬來西亞被視為英國的「新殖民地」。然而，這座城市讓全民共襄的盛會是分別於一九六二年和一九六三年舉辦的亞運會和新興力量運動會（Ganefo）。地點無他，就是史納延體育場。這裡可以輕易挑起十萬人的情緒，為蘇卡諾提供了一個新的平台，繼續以他獨具魅力的聲音講演。[64]

城市裡的鄉村

若以雅加達與其他地方作比較，這座首都城市在引導式民主這段期間人口迅速激增。官方數據顯示，該市人口從一九四八年至一九五二年間翻了一倍，從八十二萬人增加到一百七十八萬人，並在一九六五年增加到三百八十萬人。蘇珊・阿貝雅斯柯勒指出，在此期間，居民往市中心遷移的人數很多。一九五二年和一九六一年進行的兩份調查報告顯示，分別有百分之七十五和百分之四十九的雅加達居民不是「本地人」。[65]這座城市來不及提供足

夠的居所，許多貧民窟開始在城市周邊、乃至城市內出現。頻繁的火災使成千上萬人無家可歸，這更加劇了住房短缺的窘境。[66]

一九五六年，一個由聯合國贊助的規劃師小組受雅加達市政府委託，為振興城市以及緩解城市擁堵而制定一項整體規劃。該總體規劃涉及工業化、住房和基礎設施，如道路系統、水供、排污和電力供應。這項計畫被認為不僅對雅加達至關重要，它更是旨在成為印尼其他城市的典範。儘管該計畫已經於一九六〇年敲定實施，但它依然還是紙上談兵。或許正如庫斯諾所建議的那樣，這是因為蘇卡諾志不在此，他是要建設其他那些能讓人對他歌功頌德的項目。[67]其他興起的政治派系因此挑戰政府。顯然的，雅加達不曾緩慢的人口增加和過度推進的城市化，相對的忽略了社會和經濟需求，終將讓蘇卡諾這個印尼領導人在一九六五那一年被罷免。

64 Susan Abeyasekere, op. cit., p. 207. 在阿卜杜勒拉曼・瓦希德（Abdulrahman Wahid）短暫的總統任期內，該體育場最近更名為朋卡諾體育場（或蘇卡諾體育場）。

65 Ibid., p. 171.

66 Ibid., p. 175.

67 Abidin Kusno, "Modern Beacon and Traditional Polity ...", p. 27.

戰前的建築教育和文化

我想在這裡討論印尼的戰前建築文化，看看這些在蘇卡諾掌權之前，所有與印尼有關的建築辯論和關注點的蛛絲馬跡／伏筆，並辨別他在上任後是如何主導和影響了這些建築。我想爭辯說，蘇卡諾使用了東爪哇和現代主義建築風格，極可能是他在修學建築系期間的理想實現，或他所熟悉的特定環境有關。

蘇卡諾於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六年間在萬隆理工學院（Bandoeng Technische Hoogeschool）學習。該學院的設院理念主要是為了培養「本土」建築和工程專業人士，以維持荷蘭的殖民進程及其帝國霸權。一九二六年，他受僱於公共工程部（B.O.W.）。同年，他為西爪哇的攝政王安瓦里（Ir. M. Anwari）設計住宅。不久之後，加入了另一家建築公司，建築師包括蘇克莫諾（Soekmono）和羅斯諾（Roosseno）。[68]由於接觸過伊斯蘭和西方教育的歷史，他被稱為「能夠將西方和伊斯蘭概念結合之餘，又能綜合具有印度佛教影響的爪哇神祕主義，有一氣呵成的異稟天賦，並將複雜的綜合體翻譯成市井皆能懂得的語言。」[69]一九二七年六月四日，蘇卡諾成立了印尼國民黨（印尼民族黨），令他往政途更上層樓。[70]

一九三八年，蘇卡諾在《新座駕》（*Poedjangga Baroe*）雜誌上撰文，評價了印尼建築的過去和未來：

「曼都寺（Mendoet）、巴旺寺（Pawon）和塞烏寺（Sewoe）寺廟群中的各大大小小的寺廟，整體概念讓我（相對地）滿意，而婆羅浮屠（Boroboedoer）只有細節讓我滿意。而且還有一個問題：婆羅浮屠（所謂的寺廟）的整體構想是不是個敗筆？

我不是悲觀主義者，但我認為我的觀點是正確的。我是一個樂觀主義者，即便在建築領域也是如此。相對於其他社會，可以得出結論：印尼的建築可以是非常立體的。我的樂觀有跡可循！」[71]【作者標明】

蘇卡諾對寺廟的早期分析，表現出他對「整體概念」的偏執，以及它們要「滿足」他自己的主觀看法。當他純粹基於形式製作及在「正確性」的觀點上批判婆羅浮屠寺廟群時，同時也暴露了他的無知或未能理解各個社會、世界觀、政治和環境環環相扣的細節解讀，他還用了這般單純主觀來解讀荷屬印尼群島。他如此偏見的見解，極大可能是因為這些被他引用

68 Rudolf Mrázek, "Engineers of Happy Land", p. 248.

69 George Kahin, *op. cit.*, p. 90

70 Ibid.

71 Rudolf Mrázek, *op. cit.*, p. 61.

的「禪邸」（*candi*），不管是曼都寺、巴旺寺、塞烏寺或婆羅浮屠，都位於爪哇中部。在這裡，他所提出的在「其他社會」中可能出現在印尼的新「三維立體」建築，興許不過是他參考了他在技術學院接觸到的歐洲現代主義建築而已。

如果我們進一步研究建立於殖民時期的荷蘭建築文化，我們可能會發現它們並非草草不恭的殖民企業之作。大多數荷屬印尼建築師都非常跟得上當代歐洲建築的潮流步伐，並不斷地以他們在此設計和建造歐洲同化的建築之餘，也審查自己。荷蘭和印尼著名且具爭議和批判的建築師貝爾拉格（H. P. Berlage）曾在到訪殖民地後警告說，這些樹立在荷屬印尼群島的歐亞風格可能會衰敗成「鬆懈的文藝復興……紛紛在當地建築不倫不類地掛上興都－爪哇的裝飾品。」[72]一九三〇年代，「高層公寓」概念的提出，使得歐洲前衛的鐘聲再度於荷屬印尼群島回蕩。當時阿姆斯特丹、鹿特丹和其他歐洲城市最進步的社會建築師正在以高效和安全的方式將工人階級安置在現代公寓樓中。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出版的建築學報《Tecton》（希臘文「工匠」意思）中，有篇文章直言，有人認為在荷屬印尼群島上，土著居民居住的鄉村（*kampungs*）應該讓路給這樣的住宅區，並制定了一項為土著居民執行的計畫。[73]

或許也可以這麼說，這樣的想法正滲透到當時的學術界，以及在萬隆理工學院的建築系主校裡。荷屬印尼群島建築師這鮮明派系的出現，恰恰對比了畢恭畢敬的殖民企業文化。他們期望通過評估印度帝國建築傳統，以證明只有舶來建築和空間概念才能在殖民地發揮

作用。[72]這派系的「教主」，同時也是年輕的蘇卡諾的指導老師——沃爾夫・舒梅克（C. P. Wolff Schoemaker）曾對傳統建築的實用性做出了以下批判：

「在爪哇，不再存有本土建築傳統可以作為任何現代印尼帝國建築風格的楷模。在一些離島，如尼亞斯島、蘇拉威西島和蘇門答臘島的部分地區，仍有一些建築傳統的好例子，**但不能指望這些標本能在爪哇貧瘠的土壤中萌芽**。」[75]【作者標明】

舒梅克和他的追隨者熱切地吸收了當時所有的現代和前衛的養分，這些人來自「世界各地」：來自美國的法蘭克・洛伊・萊特（Frank Lloyd Wright）、來自德國的包豪斯派系（Bauhaus）和來自荷蘭的寶文派系（Niuuwe Bouwen）。[76]他們專注於設計和構思明確的「現

72 Ibid., p. 64.

73 Ibid., p. 68.

74 Ibid., p. 63.

75 Huib Akihary, "Architectuur en Stedebouw in Indonesië", p. 38. 由姆拉澤克翻譯，頁六十三。在這裡，值得注意的是對有價值的爪哇建築傳統的「貧困宣言」。這種建築被認為存在於其他島嶼上，但在雅加達、萬隆和泗水所在的主島上卻沒有。

76 Rudolf Mrázek, *op. cit.*, p. 63.

代主義」建築模式，希望能成為符合時代要求的新建築。我認為，這不同的「學派」幫助發展了蘇卡諾關於建築傳統和現代的立場，但諷刺的是，這也在他的政治權衡考量中滅音了。根據一九五七年指導式民主時期提出的國有化計畫，萬隆理工學院的荷蘭講師被遣返回國，並由印尼本土教師取代。正如印尼建築師布迪・蘇卡達（Budi Sukada）所告知的那樣，許多第一代印尼講師曾在美國、德國、英國和荷蘭留學，他們繼續傳承那些荷蘭前輩所提出的現代主義議程。[77]

要解釋蘇卡諾為何利用現代主義建築來振興首都雅加達，或許猶如庫斯諾所說，這是因為象徵知性的現代主義建築一方面可以砸碎傳統之餘，也可以在精神層面上建立新生代。這種烏托邦式願景，並非新古典印尼帝國風格或傳統印尼建築可以提供的。[78]通過上述討論，我想建議這也可能是因為蘇卡諾在接獲建築教育啟蒙時留下根深蒂固的信念和印象，當一群獨立的民族主義建築系學生提倡了鮮明的風格作為國家代表，新的後獨立印尼建築風格也可能悄然而生。

這種排他性的手法，為形成印尼的民族想像而剔除中爪哇的風格以及來自周圍群島的傳統建築風格，對蘇卡諾的繼任者來說是非常管用的。正如庫斯諾在他的書中繼續闡明的那樣，於一九六五年接任的蘇哈托充分利用了這些建築傳統，在印尼歷史翻章時期（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九八年），使他的領導合法化之餘，也設立屬於他的新秩序政策（New Order）。

三、美國紐約聯合國總部大廈

儘管遭到法國、荷蘭和英國的反對，聯合國執行委員會還是於一九四五年九月投票通過將其總部設在美國的議決。[79]首任正式上任的祕書長特呂格韋．賴伊（Trygve Lie，或「李哲之」），敦促「世界新的重心是大西洋的西北部」。[80]該決定讓不同的美國城市爭相提出投標，盼能獲青睞成為聯合國最終落成處。剛剛在一九四五年四月份舉辦舊金山會議以成立聯合國的舊金山先拔頭籌，代表們親眼目睹了由威廉．沃斯特、西奧多．貝爾納迪和歐內斯特．伯恩設計的聯合國中心圖樣。一九四六年二月，大會投票決定將地點鎖定在紐約市附近，並成立了一個委員會來審核其周邊的五個地點。由於所有地點都不符合，而費城似乎頗有機會，但是紐約的權貴在最後一刻發動「政變」，成功說服聯合國總部委員會接受他們在曼哈頓河東

77 Budi Sukada, "Modernism and the International Style", p. 126.

78 Abidin Kusno, "*Behind the Postcolonial*...", p. 68.

79 George Dudley, "A Workshop for Peace...", pp. 8-9. 法國和英國投票支持日內瓦，而俄羅斯則主張將選址設在美國，以減少美國在歐洲的影響力。

80 Ibid., pp. 8-9.

第四十二街和第四十六街之間，沿線提供一塊十七英畝土地的獻議。當該地點於一九四六年十二月被敲板定案時，法國駐聯合國總部委員會的代表柯比意立即認同這地方的豐碩潛力——儘管它看起來嬌小玲瓏，確實擁有部分能夠實現他在一九二二年所立下的「擁有三百萬居民當代城市」願景。[81]

建築師華萊士・哈里森（Wallace K. Harrison）在紐約的新報價談判中發揮了核心作用。作為致力於將聯合國設在他屬意的紐約市昆斯區的法拉盛草坪公園，同時也是受房地產大亨威廉・澤肯多夫（William Zeckendorf, Sr.）聘用的建築師，哈里森成功說服澤肯多夫放棄原本想在東河（East River）地塊上開發一座名為「X城」的混合用途住宅的策劃，換成支持聯合國的提議，並通過支持此計畫的紐約競標者——洛克菲勒家族（Rockefellers）的八百五十萬美元「獻禮」購買了此片土地。此時，物色合適地點的動作持續拉拔了一年多，卻被洛克菲勒家族、哈里森和一些地方領袖雷厲風行的行動下，這項屬紐約與聯合國之間的協議簽署在幾天之內就達成了。一九四七年一月二日，賴伊任命哈里森為該項目的策劃總監，並成立了一個國際設計委員會及一組特別諮詢委員會，來作為即將開動計畫的協調單位。一組建築師內包括澳洲的塞樂（GA Soilluex）、比利時的布蘭福（Gaston Brunfaut）、巴西的奧斯卡・尼邁耶、加拿大的歐內斯・特科密爾（Ernest Cormier）、中國的梁思成、法國的柯比意、瑞典的斯文・馬克柳斯（Sven Markelius）、蘇聯的尼古拉・巴斯科夫（Nikolai Bassov）、

英國的霍華德．羅伯特森（*Howard Robertson*），以及烏拉圭的胡里奧．維拉馬霍（Julio Vilamajo）。這裡大多數的建築師曾在一九三九年世界博覽會上參與展館設計，或者是由哈里森推薦。然而，展館建築師裡的阿爾瓦．阿爾托（Alvar Aalto）沒有被欽點，因為芬蘭當時還不是聯合國成員，而密斯．凡德羅（Mies van der Rohe）和華特．格羅佩斯（Walter Gropius）也未能被選中，因為他們源自「剛剛才樹立的敵人」——德國。[82]

柯比意的角色

早在一九四六年十月之際，總部委員會在給代表大會的報告提呈上，詳細說明了各個委員會、遴選地點的基建和選擇標準。柯比意作為「法國代表」提交的報告，在第十九至三十九頁中占據突出位置，作為附件一。[83]當中，他援引了國際現代建築協會在一九三三年

81 Victoria Newhouse, "Wallace K. Harrison, Architect", p. 115.

82 以上敘述摘自：George Dudley, "A Workshop for Peace", pp. 8-31; and Victoria Newhouse, "Wallace K. Harrison, Architect", pp. 104-115.

83 "Report of the Headquarters Commission …", pp. 19-39. 除了代表聯合國行事的技術專家外，報告中沒有提及建築師或國家代表的其他報告。

提出的雅典憲章（Athens Charter），作為「城市化的原始功能」的「世界首都」設計原則，即一項闡述「居住、工作、身心文化和交通」的概念。[84]接著，他提出了一個單獨的辦公大樓和一個低搭板塊的大樓作為祕書處大樓和大會大廈的建築計畫。在我看來，這最早期宣的建築形式是影響著最終結果的重要決定因素，其層面之廣，不僅影響了總部委員會的成員，還包括接下來參與「設計工作坊」行列的一眾建築師和顧問。在解釋這些選擇時，他還狠狠地對聯合國的前身聯盟總部和建築作出了抨擊：

> 「矗立在日內瓦的萬國宮，完全是個妥協、墨守成規和失敗之作——無論是在倫理還是在建築——其問題在於定期推進的解決方案過於理性。更多的時候，這些方案被專橫的學術界所壓制。但技術人員拒絕認承自己被打壓，還日復一日，任由這些公共建築的設計不斷重複。」[85]

國際聯盟競賽

或許在勾勒出柯比意之前在參加國際聯盟的宮殿和蘇維埃宮的挫敗情境後，就能理解他的「積怨之深」。柯比意輸掉了這兩場比賽，令他特別惱火的是，贏得蘇維埃宮競賽的鮑里

斯・約凡（*Boris Iofan*），在他眼中是格外受社會主義國家青睞的「與西方唯物主義相關的理想化古典主義」。[86]

於一九二六年，一項備受爭議的日內瓦總部（萬國宮）國際設計比賽由國際聯盟舉辦，此比賽共收到了三百七十七份參賽作品。這一次性評審制度的比賽，評審團共有九人，[87]並宣布了九名一等獎獲得者、九名二等獎和九名三等獎獲得者。這樣的遴選結果反映了評審團強烈的分歧，並折騰著所有參賽者。柯比意的參賽作品因技術問題——他沒有為他的圖紙著墨——而被取消資格，評審團最終將這個項目授予了尼諾（Nénot）和弗萊根海默（Flegenheimer），並認為修改後的作品更為合適，同時也頒發了由布羅吉（Broggi）、勒菲弗（Lefèvre）和瓦戈（Vago）三人共享的次等獎。[88]

84 Ibid., p. 20.

85 Ibid., p. 30.

86 Mardges Bacon, "Le Corbusier in America", p. 257.

87 John Ritter, "World Parliament …", p. 17. 陪審團包括維克多・奧爾塔、貝爾拉格、約翰・伯內特、查爾斯・加托、約瑟夫・霍夫曼、查爾斯・勒馬雷斯基爾、卡爾・莫澤、阿蒂里奧・穆賈和伊萬・滕博姆（Victor Horta, H. P. Berlage, John Burnet, Charles Gato, Joseph Hoffman, Charles Lemaresquier, Karl Mozer, Attilio Muggia and Ivan Tengbom）。

88 Ibid., p. 17.

根據約翰・里特（John Ritter）的估計，此次比賽的參賽作品當中，有三分之一是歷史主義的，許多作品參考了布雜藝術風格（Beaux-Arts style，或「學院派」），大量運用了幾何形式或對稱性的建築規劃和執行。[89]提案中多見合併式的塔或「方尖碑」（obelisks）。[90]正如埃里克・芒福德（Eric Mumford）所假設，如此重要意義的建築竟然採納這種「新古典主義語言」來建造，是讓柯比意和齊格弗里德・基迪翁（Siegfried Giedion）團結起來，發起一場推翻判決的國際運動導火線，並加入國際現代建築協會。[91]瑞士的ABC建築師就是早期由國際現代建築協會發起的革命性運動，它製作了一張以斜線橫切在得獎作品的圖像，以示否決這部「不正確」的建築作品。

柯比意一手包辦的參賽方案一度被許多當代學者譽為本應獲勝的方案。柯林・羅（Colin Rowe）和羅伯特・斯拉茨基（Robert Slutzky）將其描述為一個在穿越它的同時也能營造穿越感知空間透明度的新管道，並且通過將置放各種直線方塊來表達「自信和明確」的空間維度。[92]肯尼斯・弗蘭普頓（Kenneth Frampton）甚至表示，柯比意在《邁向建築》（*Vers une architecture*，法文）提出的建築與美學方案無疑是先驅，但同時也嵌入了互文隱喻，以及引用了新古典主義、帕拉第奧甚至巴洛克元素。[93]何以柯比意的直角橫向和直線的板塊最終成為聯合國大樓的提案？我不得不提一提在同場比賽裡，由漢斯・邁耶（Hannes Meyer）和漢斯・維特爾（Hans Wittwer）共同提交的另一份重要方案。

除了柯比意因參賽資格被取消而引起的爭端之外，勾起話題的還包括邁耶和維特爾獨特的方案，在眾參賽作品中譁然奪目。它曾經（現在仍然）是令人驚歎的「現代主義」作品，並且似乎「前無古人、無任何形式上或審美先人之見」的新穎設計。[94] 此設計圖明顯劃出兩個部分，大會主樓大廈和祕書處大樓：前者以鋼筋混凝土為骨架，後者則是以鋼骨架建立。每一層皆以「H」形塔樓中的橋樑互通，連接到主樓，其中心有一個具備環繞音響的蛋形房間。在其設計聲明中，邁耶宣稱：

「沒有為疲憊君主準備待客用的無柱子接待室，而是潔淨、為忙碌的人民代表提供

89 Ibid., p. 18.

90 我注意到以下方案和塔樓有關：Mears and Wilson（英格蘭）、Fahrenkamp and Deneke（杜塞爾多夫）、Eliel Saarinen（美國）、Josephson（斯德哥爾摩）、Van Laren 和 Naef，在 Huygh，Bakker & Van Herwijnen，Tjeenk，Friedhoff，Luthmann & Wouda 的設計中有類似方尖碑的塔樓。摘自：Ron Herron, "The Palace of the Leagues of Nations ..." 及 John Ritter, "World Parliament ..."。

91 Eric Mumford, "The CIAM Discourse on Urbanism, 1928-1960", pp. 10-11.

92 Colin Rowe and Robert Slutzky, "Transparency: Literal and Phenomenal", pp. 174-175.

93 Kenneth Frampton, : Le Corbusier's Designs ...", pp. 57-63.

94 John Ritter, "World Parliament", p. 22. 里特也形容此為「純粹的建構主義」(purely Constructivist)。

的工作場所；沒有讓人鬼祟交頭接耳的外交後廊，而是供誠實的人進行公開談判的開放視野玻璃空間。……作為一座有機建築，它毫不掩飾地表達了它存在的目的是促成為分工和合作的空間。這座建築並沒有通過園林藝術人造公園環境作為人與人之間的虛線聯繫。作為人類精心設計的作品，它與大自然形成了合理的對比。這座建築既不漂亮也不醜陋。它值得被評估為一項結構性的新發明。」[95]

因此，當柯比意為聯合國項目採用了雙建築的模式，仿如巧妙的引用了邁耶和維特爾在二十年前舉辦的一場競賽中，具有相同的功能和美學邏輯推廣的提案。參加了相同的比賽，也經過同場賽制洗禮的柯比意，一定知道他們倆的計畫。擁有相同觀察的還有肯尼斯·弗蘭普頓（Kenneth Frampton）。一九三一年，柯比意為莫斯科蘇維埃宮設計的參賽圖同樣也是受到了邁耶和威特沃的影響，以及對於他後來是如何發展出這通過「機械移動和升降侷限而形成的相互作用」為「分類設備」概念，那麼我們對科爾布的引用就不會那麼覺得難以置信。[96]正如吉拉·德克爾（Zilah Deckker）披露的，柯比意後來也承認了「這座（他與巴西建築師一起設計的教育和衛生部大樓）的辦公大樓，即祕書處大樓本身，變成了一個垂直的建築，而不是一個水平橫向，帶有玻璃牆和遮陽板的建築物，史無先例。」[97]

策劃總監：華萊士．哈里森

華萊士．哈里森是於一九二〇至一九二一年間在巴黎高等美術學院（Ecole des Beaux-Arts）學習期間接觸到柯比意的著作和概念的美國建築師之一。一開始，柯比意和洛克菲勒家族是認識的，而他之所以能夠打進聯合國計畫的圈子，是在一九三五年，他到訪美國時曾與尼爾森．洛克菲勒和哈里森共進晚餐。[98] 洛克菲勒非常熱衷於柯比意的諸多作品，以及其中表達的概念闡述，例如他在一九四七年的著作《當大教堂是白色的時候：膽怯人民的土地之旅》（*When the Cathedrals were White: A Journey to the Land of the Timid People*）。並通過他們隨後的交流，柯比意贏得了哈里森對其專業萬二分的敬意。

大部分學者都認同，哈里森在他領導設計諮詢委員會和實施各項計畫時，發揮著舉足輕

95 Meyer, in Charles Schnaidt, "Hannes Meyer: Buildings, Projects and Writings", p. 25.
96 Kenneth Frampton, "Le Corbusier's Designs…", pp. 66-67.
97 Le Corbusier, as quoted in Zilah Deckker, "Brazil Built…", p. 174.
98 Mardges Bacon, "Le Corbusier in America", p. 14 and pp. 54-55.

重的作用，儘管柯比意在團隊裡引起各項騷動。[99]實際上，哈里森並沒有積極參與設計過程，而是在建築師之間擔任調解員，以及在設計過程中擔任許多爭議和問題衍生時的裁決者。然而，柯比意一而再再而三的考驗著哈里森，並挑戰他作為策劃總監的角色。在哈里森努力尋求共識並試圖保持團隊共同參與的情況下，柯比意卻試圖在他的設計和作者聲明上宣示主權。一九四六年八月，柯比意想與尼邁耶、恩特維斯（Entwhistle）和韋思曼（Weissman）成立並「主導」自己的工作室，卻向哈里森澄清說，他在此團隊中只負責「行政」事宜。[100]其他國際建築師開發的方案大部分都「胎死腹中」，而他們留在團隊繼續的對其他作品評頭論足。例如，梁思成堅持採用中國古代規劃原則的計畫頻頻遭到反對。梁的原始方案是類似四合院的方形布局，朝向街區，而中心是中國花園，像極了一座寺院。後來，梁「依然故我地堅持著信念，即每座建築都沿著東西軸線——這是中國人遵循了三千年的傳統」，[101]這一選擇當然也沒有在東河見到。

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二日，也就是設計諮詢委員會向大會提交其方案後的第二天，哈里森在《紐約先驅論壇報》（*New York Herald Tribune*）上看到了費里斯（Ferriss）為柯比意繪製的修訂方案草稿時，他勃然大怒。[102]在哈里森的圈子裡，這舉動儼然是柯比意通過媒體力量試圖取代設計諮詢委員會的方案。爾後，猶如紐豪斯（Newhouse）在她關於哈里森的傳記中所描述的那樣，他與柯比意的問題持續延燒到日後設計過程的所有細節。為了讓最大程

度的自然陽光照射進入祕書處，委員會決定在整個東西立面處上釉。一如既往，柯比意則推薦了他在里約熱內盧使用過的百葉窗式遮陽板（brise-soleil）。初步調查顯示，如果使用該設備，額外的鋼材和框架將大大地推高成本，更嚴重的是，經歷嚴酷寒冬的紐約，此遮陽板將成為冰雪堆積處而構成危險。哈里森專業地將此問題交給了機械工程師，在多番測試之後，證明藍綠色的多層隔熱玻璃（Therma-pane）能夠解決百葉窗遮陽板所帶來的問題，雖然只有向西的側面有此需要，最終，建築東面也見此多層隔熱玻璃。

一九四七年八月，建築落成，每位國際建築師皆收到了為數五千美金的稿勞／設計費，並紛紛返回自己的國家。柯比意卻不願離開，堅稱若是沒有他，該項目無法正常進行。當祕書長向他明確表示，此設計已經無法容忍他繼續參與，他便離開了。[103] 該項目的大多數文件記錄者都將此高效率的建築完工歸功於哈里森。他只用了不到三個月的時間就匯聚了一群最

99 團隊包括哈里森的設計助理兼設計過程的記錄者喬治．杜德利（George Dudley），曾為哈里森專著出力的維多利亞．紐豪斯（Victoria Newhouse）以及撰寫柯比意在美國經歷的瑪吉斯．培根（Mardges Bacon）。

100 Victoria Newhouse, "Wallace K. Harrison, Architect", p. 120.

101 Ibid., p. 117-120.

102 Ibid., p. 121.

103 Ibid., p. 139.

難搞的和最有主見的國際知名建築師，並不可思議地完成了這個項目。除了讓建築項目在指定時間內不逾時完工之外，他還極具遠瞻的，事先與美國勞工聯合會談判，達成不罷工協議，使建築材料供應和勞動力在整個合約及施工期限內未曾中斷，從而顯示出他超然的遠見卓識。[104]

方案的最後一哩路

打從設計諮詢委員會的第一次會議以來，這個因為柯比意最初在總部委員會提呈的長型大廈形式，以及他事後在設計團隊中的堅決而逐漸模糊。喬治・杜德利（George Dudley）報導了柯比意在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一日分別編號二十三和二十三A的設計草圖，是如何的「烙印在哈里森的腦海裡」。這兩份草圖皆將大會大廈和祕書處大樓分開，在這兩座建築之間是曠地，哈里森和諮詢團隊開始看見這計畫的雛形。[105]

尼邁耶的加入讓整個設計更上一層樓。團隊中每一人無不欽佩尼邁耶的魄力，然而，如同紐豪斯所報導，尼邁耶著實被他以前的老師和僱主們嚇壞了，以至於他很少敢在演示板上公然展示這些項目。事實證明，尼邁耶提出的編號三十二的草圖是一項突破性的設計：他將祕書處大樓與大會大廈完全分開，並將議會之前在草案中大部分的會議室和理事會議廳轉移

到河邊與第三個建築之中。柯比意勉強承認了這方案，而他的「工作室」最終同意採用了此方案。[106]因此，編號二十三／三十二的方案最終被延用，成為了設計方案四十二G的基礎圖，由哈里森辦公室親自制定，並於一九四七年七月一日提呈大會。[107]

由於賴伊無法從國際銀行和美國國會獲得八千五百萬美元的資金，因此，該計畫不得不進行修改。哈里森指示祕書處大樓從四十五層減少到三十九層，大會大廈從兩個內部大廳減至一個，四個會議室或委員會議廳從二十二個減少到十八個，多餘的流通區域被削減，停車設施從兩千個減少到一千五百個。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一日，國會終於批准了六千五百萬美元的無息貸款。[108]哈里森的辦公室得以繼續進行建設，並還為整個項目的運行提供了一些行政費用。

104 Ibid., pp. 140-141. 紐豪斯表示，他從參與世界博覽會中學習到很多東西，並意識到領導力和領導權威能讓工作完成得更好，流程則確保工作能按進度完成。

105 Dudley, *op. cit.* pp. 68, 70 & 252.

106 Ibid., pp. 125-127. 這是尼邁耶第二次完善柯比意的設計。一九三五年，他在里約熱內盧的教育和衛生部建築項目中，重新設計了柯比意笨拙的形態設計。

107 Mardges Bacon, "Le Corbusier in America…", p. 308.

108 Victoria Newhouse, *op. cit.* p. 138.

有關綜合大樓的輿論

毫無意外地，紐約聯合國總部的位置和建築引起了美國各地的興趣及評論，尤其是紐約人。在此，我想提出以對公共大樓的論點而聞名的社會學家劉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的看法。

「我們每個人，光是就國家身分而言，只是半個人。而另一半得與整個廣闊的世界聯繫在一起。這麼一個新的世界核心的建築落成，卻戲劇性地讓此宏景實現。我們必須創造的不僅僅是政府的工具：我們必須勾勒出新的生活。」[109]

對芒福德而言，聯合國總部大樓與紐約市物理上的新景象和社會精神層面的新貌密不可分。他在建築完工前後，在各種論壇上發表了自己的看法和批評。勞倫斯．威爾在他的著作《設計全球和諧：劉易斯．芒福德和聯合國總部》（*Designing Global Harmony: Lewis Mumford and the United Nations Headquarters*）中勾勒出芒福德對新世界核心的期望：此計畫應該出現在一個占地一千到三千英畝的大都會裡，卻以一個合法獨立的自治市管轄，並沿著「田園城市」進行規劃。常住人口應保持在兩萬五至五萬人之間，並被設計為「鄰彼此的

新秩序典範，以清晰的設計概念，處理方式日益統一，保有個人獨立空間，堅決避免華麗和浮誇，堅持在每一個措施和目的保有設計的元素」。他設想了一系列七或八個類似的中心分布於主要大陸及次大陸，以向世界展示這「基本社會相對性原理」。[110]

當聯合國大樓完工時，芒福德批評設計師「錯誤強調了技術功能」，並認為「我們是為了讓一些**低等人士**過上美國生活」的傲慢態度是創造恐懼和仇恨的象徵。[111] 他指出，大樓的設計和規劃絲毫不人性化，缺乏私人和公共空間的私密互動，並聲稱秘書處大樓四面皆鑲滿玻璃無疑讓建築「實際上……不如無窗」。[112] 芒福德還責備設計師們「天真的審美觀」，將唯一的禮堂置放在大會大廈那梯形平面最窄的部分，並認為這「以鉛鑲銅的泡狀圓頂設計」的傾斜式屋頂，「太小了，根本沒有視覺效果可言」。[113] 他建議大會大廈的建築師何不「大

---

109 Lewis Mumford, "A World Center for the United Nations", 引自：Lawrence Vale, "Designing Global Harmony …", p. 267.

110 Lawrence Vale, "Designing Global Harmony …", Pp. 259-260.

111 Ibid., p. 264 and p. 270. 楷體字是我所強調，以示芒福德（Mumford）不恰當的措辭。

112 Ibid., pp. 264-265.

113 Lewis Mumford, "From the Ground Up", p. 56. 依我猜想，圓頂或球狀是華萊士．哈里森（Wallace Harrison）的設計癖好，從他早期在世博會周邊、X城（X City）的中半球圓頂和聯合國提出的紐約法拉盛草地公園（Flushing Meadows）原圖可見一斑。

臍地使用圓柱形或半球形的形式，以吸引眼球，甚至可能讓人癡狂」。[114]威爾批評芭福德的看法非常極端，建築秩序足以為世界政治和社會秩序產生積極影響，並稱他對聯合國建築的功能和象徵意義的解釋與他的民族主義背道而馳，絲毫不見泛人類主義傾向。[115]我認為，這結果也許是源於二人對世界秩序的看法之不同而產生的根本性衝突。柯比意受國際現代建築協會「全球城市願景」影響（或許還有邁耶／威特沃的影響），與芭福德近乎烏托邦和普遍的「土壤與文明」社會和建築信仰產生對立。

儘管如此，紐約和華盛頓特區各個戰後政治家、主流媒體和其他專業人士普遍上支持其設計及其視覺意義。菲力普・強生（Philip Johnson）稱這是他見過的「最好的現代規劃」的曠世之作。[116]威爾在其著作中舉出豪斯和卡登（House and Garden）為其專題圖片的標題寫道：「聯合國建築物在紐約市一片雜亂無章的建築中鶴立雞群，同時也意喻著其成員希望達致的秩序。」[117]在《建築實錄》（*Architectural Record*）的一篇文章中，建築師亨利・丘吉爾（Henry Churchill）甚至對此建築作品讚不絕口：

> 「聯合國小組極其清晰和別具一格的規劃是一項勝利，令人近乎難以置信的組合並重整各種元素和功能。這也是屬技術技能、結構能力和機械工程上的勝利。幾乎在機能和設備上物盡其用，提高建築物用戶的舒適度，加快通信速度，快速準確地傳播信息。

換句話說，**這是美國建築技巧史上最完美的例子**。」[118]【作者標明】

此文的前章，他更是將大會大廈描述為：「……世界希望的核心象徵，……未出生的世界柱式大廳，她是帕台農神廟，她是太和殿，她是政府崛起的象徵。」[119]

最終，就其在振興城市地區以及後來通過其存在而推進的各項改造的作用而言，聯合國總部大廈的落成為紐約市帶來的益處遠比華盛頓特區、乃至是美國本身更大。就像大蕭條時期的洛克菲勒中心一樣，聯合國總部大廈可以說是這座在二戰後各種經濟和社會問題浮現的城市，最為重要的建設項目。聯合國總部為這座城市帶來世界政治資本的希望，並在此過程中使紐約人成為一個新的世界公民村——儘管只是想像而已。當房地產大亨澤肯多夫於

114 Lawrence Vale, *op. cit.* pp. 278.

115 Ibid., pp. 267-268.

116 Philip Johnson, *New York Times*, 13 August 1947, 由紐豪斯所引用, *op. cit.* p. 142.

117 As quoted in Vale, *op. cit.*, p. 263.

118 Henry Churchill, "United Nations: a Description and Appraisal", p. 121. 本人強調，表明國際設計過程也可以被「美國化」。

119 Ibid., p. 120.

一九四五年為他的「X城」物色並購下這片地時，該地點包含一列幾座的屠宰場，其惡臭如此強烈，以至人人稱這裡為「血巷」。[120]短短六年，它原則上已經變成為世界做決定的核心處。

近六十年內，這個「世界政府」的命運，以及紐約這座可以說是舉足輕重的「國家組織的建築計畫」的地標，目前正面臨著最關鍵的危機。六十年來，各項議決、法律、專門機構如聯合國兒童基金會、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聯合國難民事務處（難民署）等，及其維和部隊，一直於全球各地斡旋、緩解緊張局勢和問題，並維護其作為聯合國的權威。除了地理位置外，它在世界上各個霸主眼中僅存無餘的地位，正如同劉易斯．芒福德早些時候的呼籲，將受到「國」和「土」之間唇寒齒亡的困擾，以至於曾經是祕書長的科菲．阿南（Kofi Anan）不經意地在美國主導對伊拉克「戰爭」和稱其有致命化學武器時，將喬治．布什（George W. Bush）稱為「總統」（the president），而不是「美國總統」（the U.S. president）。聯合國實際地位漸同虛設。

此外，正如愛德華．薩依德所說，聯合國無法有效率地應對無數的區域和全球性衝突。他認為，聯合國採用的那種「全球思維」似乎更傾向於「重現世界霸主、冷戰、地區、意識形態或種族競爭，遠比核時代和後核時代來得危險，正如南斯拉夫的恐怖事件所證明的那樣。強者只有變得更強大和更富有，而弱者則會變得更弱更窮」。[121]我們屏息靜氣，等待全球境內哪一個霸權國家還是民族在不久的將來會採取什麼樣的新姿態，呈現什麼樣的新局勢。

120 Victoria Newhouse, *op cit.*, p. 104.

121 Edward Said,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p. 2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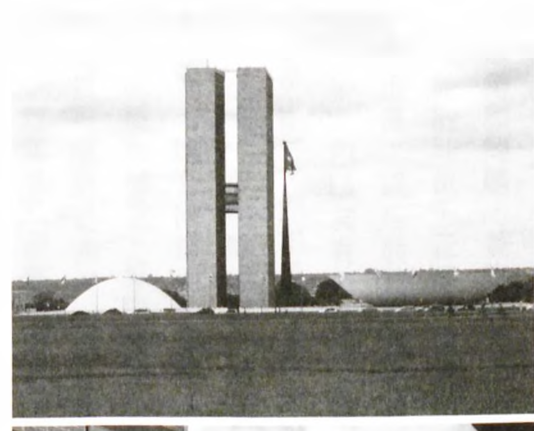


圖19.1：巴西利亞的國會大廈外觀。



圖 19.2：巴西利亞的超級街區（*superquadr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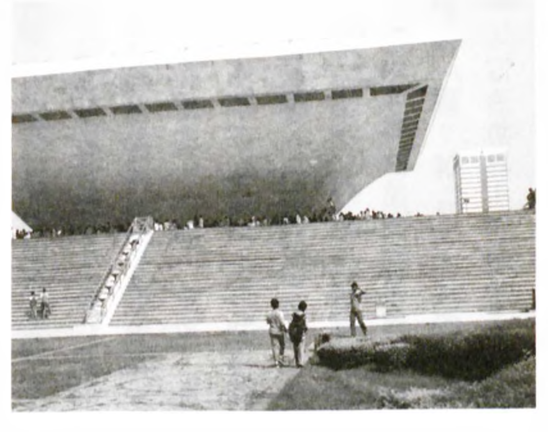


圖19.3：通往雅加達國家紀念碑的台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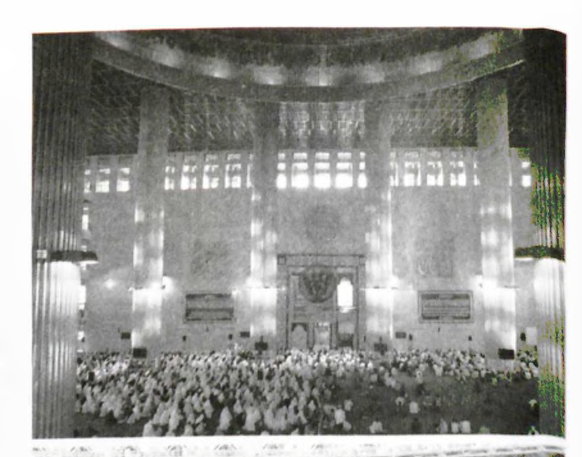


圖19.4：雅加達國家回教堂內部一隅。

圖19.5：雅加達國家體育場內部一隅。



圖19.6：美國紐約聯合國大會。



圖19.7： 里約熱內盧的衛生和教育部大樓。



圖19.8： 美國紐約聯合國總部大廈。

帶著天氣同行：
英聯邦研究所中的馬來西亞展館

摘要：

在一九六九年的選舉及發生於同年五月十三日的種族騷亂之後，馬來西亞國會已凍結了好幾年。在恢復正常狀態之後，由敦阿都拉薩領導的新內閣試圖恢復與其他國家的外交關係。其中一個外交任務，就是找來建築師，設計一個設置在倫敦英聯邦研究所的馬來西亞展館。

這個展館展出了馬來西亞的新治理方向和發展目標。政府委任了建築電訊學派（Archigram，著名的建築倡導者，提出諸如「步行之城」在內的建築構想）來設計展館空間和展品。本文將探討建築師們所提出的最終設計形式及展館所傳達的空間訊息。

馬來西亞在第三屆大選結束的幾天後，於一九六九年五月十三日爆發涉及三大種族（華人、馬來人和印度人）的衝突事件，造成多人死亡、數百人受傷。大量的房屋和財產遭到燒毀和破壞，整個首都「惶恐地顫抖」，國會也在兩年後才重新召開。[1]在一切終於重回正軌後，由敦阿都拉薩領導的新政府開始積極在國際間營造聲勢，宣告馬來西亞的政局四平八穩，更重要的是，向全世界營造馬來西亞的社會建設和經濟運作也正在迎頭趕上的形象。其中一種方式就是在倫敦的英聯邦研究所設立展覽館，就像其他英聯邦國家一樣。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各國對英聯邦——一個前英國殖民地成員組成的國際組織——還有其旗下方案的認可，藉此通過英聯邦旗下方案獲取資金或融資援助，以促進各方面的發展。

帝國研究所／英聯邦研究所

帝國研究所（Imperial Institute）一開始被規劃為更長期的殖民地產品展覽空間，於一八八七年動工。此前幾年舉辦了一系列展覽，展示了印度和其他殖民地的商品，並在隨後的幾年成為大英帝國的代表，向倫敦大都會的公眾宣揚帝國風采。在一八八六年的殖民地及印度博覽會中，海峽殖民地總督瑞天咸（Frank Swettenham）安排了五種「馬來房屋」模型在海峽殖民地館展出。展覽結束時，這些房屋和四百一十七塊木材一起被分配給帝國研究所。[2]

同樣的，在一九二五年「大英帝國展覽會」結束後，沒被借出的展品也捐贈給帝國研究所和其他六所機構。[3]

這個建築物由托馬斯・科爾科特（Thomas Collcutt）設計，定址於南肯辛頓。這座長二百一十三米的建築有數個翼樓，以一座八十七米高、兩側有銅製圓頂的塔為中心。除了展示從領地和殖民地採集的產品，還配備了研究設施來評估這些農產品或礦物，以便能從特定的殖民地採集到品質最好的產品，像是來自南非的鑽石和肯亞及錫蘭（斯里蘭卡）的茶葉。但是到一九六〇年代中期，大部分的建築被拆毀，並成了倫敦帝國理工學院的校址。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許多英殖民地逐漸實現政治獨立，隨後在原本的領地上建國，再組成英聯邦，以各自國家的名義參與其中。[4]從這個意義上說，英聯邦只是大英帝國的替代品，

1 Tunku Abdul Rahman, "May 13: Before and After," p. 6.

2 CO275，海峽殖民地總督移交給帝國研究所的物品清單，一八八七年二月十四日，C10頁。清單中包括一座歐式洋房模型，以及各種礦物的標本。其餘的展覽文物多數由瑞天咸轉交給他的一個熟人E.J. 德拉科瓦（E.J. de la Croix），德拉科瓦隨後把它們寄存到當時的舊特羅卡德羅宮（Musée du Trocadéro），現在則是在巴黎人類展覽館（Musée de l' homme）。摘自 Henry Barlow, *Swettenham*, p. 344.

3 Andrew Caldecott, *Report on the Malaya Pavilion*, pp. 23-29.

4 加入英聯邦的決定權在於各國政府的「自願」意志，因此有些國家並沒有立刻加入，有些則在退出後又重新加入。英聯邦的原名是「British Commonwealth」（「英屬共和聯邦」），但是在成員國提出「平等地位參

雖然確實會舉辦論壇、簽訂協議，但是英聯邦的祕書處並不像聯合國一樣設置憲章和法律，來確保成員國遵守協議。

這樣的態度轉變，也許和當時英國政府委託英聯邦研究所（Commonwealth Institute）來取代帝國研究所（Imperial Institute）的法案有一樣的想法。以往帝國研究所由英國政府全權控制的慣例，也由法案中規定的獨立理事會取而代之。[5]新的英聯邦研究所距離帝國研究所並不遠，位於西邊約一英里處，與肯辛頓大街和肯辛頓路相連，建在荷蘭公園南端一塊三點五英畝的地皮上。

英聯邦研究所被定位成讓大眾認識英聯邦成員的永久展覽空間，讓人們可以通過展覽和展館瞭解英聯邦成員。它還收藏這些國家的書籍，並舉辦文化活動和講座。如今，它的功能稍微轉變為「在倫敦打造形象鮮明、有建設性的英聯邦實體，無關政治與貿易，單純以英聯邦真正實力所在的人文精神為賣點」。[6]

英聯邦研究所是由羅麥莊馬建築設計集團（RMJM, Robert Matthew Johnson Marshall）的建築設計師設計的。[7]參與了初期階段的人員有工程師A.J. 哈里斯和J.D. 哈里斯（A.J. and J.D. Harris）、展覽設計師詹姆斯．加德納（James Gardner）。他們採用了「公園裡的帳篷」的概念。[8]一個規則雙曲拋物面的中心殼在四個側面上分布有相似建築衍生但曲率不同的外部經線，形成了類似「雙峰帳篷」的屋頂結構。[9]屋頂跨度為一百八十三平方英尺，覆蓋了鋁面

底座中的內部空間。西側毗鄰的樓層有行政辦公室、接待中心和用餐區、餐廳、可容納五百人的電影院、圖書館和閱覽室、美術館和臨時展覽館以及附屬室。[10]

主樓保留了三個樓層來給個別國家設置展館。位於中央的開放式中庭設有圓形夾層樓，與樓梯相連，用作特別活動的場地。除了加拿大展覽以外，其他展覽都是由加德納統籌的。加德納是一九五八年布魯塞爾世界博覽會英國展館的設計師，並與其他設計師一起從該展覽中獲得了打造英聯邦研究所的靈感。每個英聯邦成員都會在英聯邦研究所設置展覽，由各自

與權」的要求後，除去了「British」（「英屬」）字眼。Stephan Chan 所著的《The Commonwealth in World Politics: A Study of International Action 1965-1985》一書中論述了一些這個組織相互矛盾的形象和形態。

5 一九五二年《特威茲穆爾報告》（*The Tweedsmuir Report*）被提呈後，英聯邦成立了一個獨立理事會，並在一年後開始運作。這段史實摘自安德魯．賽因（Andrew Saint）未公開發表的英聯邦研究所歷史報告。

6 "The New Institute," in *The Commonwealth Institute Journal*, Vol. 6 No. 1, p. 15.

7 儘管這個建築設計是由該事務所創作，但是這個建築項目是在這家事務所還沒有組成之前就經已啟動，並由先前承接委託的設計師繼續跟進。

8 儘管在一九五一年為皇家節日音樂廳發想的幾個設計點子被擱置，但這次英聯邦研究所屋頂的設計形式和亞倫．哈里斯（Alan Harris）為倫敦設計一個生動的薄層混凝土屋頂的意願相符。

9 ED150/181。一九五九年六月十七日英國教育部報告。研究所在二〇〇一年十二月間進行裝修工程以建造一個新的銅製屋頂。

10 ED150/181. Commonwealth Institute Annual Report 1958, p. 25.

的政府提供資金。訪客一進入大樓，會先看到講解什麼是英聯邦的介紹展覽，以及英國在英聯邦中的角色。然後他們會走上一個小坡道，進入主空間內的圓形中庭。從那裡，他們可以飽覽高達三層的展覽廳中所展示的所有展品，這些展覽廳以中庭為中心分布在其周圍。六個歷史最悠久的前領地（former dominions，即澳州、加拿大、錫蘭／斯里蘭卡、印度、紐西蘭和巴基斯坦）的展品位於底層；非洲各殖民區的展區則分布在中層，按它們在非洲大陸的地理位置和規模來排列；而頂層則是馬來亞、新加坡、遠東、加勒比海、地中海和較小的島嶼領土的展廳。

展覽廳位置的分布邏輯是以這些殖民地與殖民者英國的統治關係遠近、關聯度來安排的，而這些關係早在先前的帝國展覽中以不同的形式重現。那些重要的殖民地和「印度帝國」的展覽被安排在底層展覽廳，這做法正是認可這些領地有如「皇親國戚」的緊密關係，以及印度帝國領地作為先前「核心內圈」的重要性。

和在殖民經濟來源比重中「次要」的字面含義一樣，非洲殖民地只在英聯邦中處於次要考量位置，在這個英聯邦展覽中也同樣被安置在中層的「地理位置」上。其餘渺遠而又「零碎」的帝國展品則被放置在最高一層，完整了殖民帝國的社會地理及同心帝國想像。如果從中庭的角度——也就是在意識形態上缺席的不列顛群島國角度，來望向各展廳，這樣的位置順序也在空間上分了主次尊卑。懸在半空的走道和坡道從中庭延伸到底層和中層，但不直接通達頂

層，在視覺上營造出一目了然和「平等」的視野，也給來到中庭的訪客某程度的參訪方式選擇權，惟就是不能以巡迴或體驗的方式來參觀，歸因於這明分尊卑的展廳排列方式，以及中庭這個具有代表性的「中心」點的空間構築方式。

英聯邦研究所於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六日由英女王伊麗莎白二世開幕。研究所對主展展品路線的政策，除了盡可能讓各國展館的展覽品成為該國的縮影，還會每十年就部分或全部重新規劃展覽，以向英國民眾提供更新的訊息，及反映各英聯邦成員國的現況和進展。之所以有必要這麼做，是因為成員國的政治事態不斷變化，又或者是當他們決定脫離或重新加入英聯邦，比如馬來西亞的情況就是個好例子。

一九六四年，馬來亞、新加坡、砂拉越和沙巴的展品是合併在一個展館內，以代表這四個地區在一九六三年一同組成的馬來西亞國。一年後，新加坡的展品在它退出馬來西亞後已被移出。一九六四年的馬來西亞展覽由加德納設計，並設有資訊板、模型，上方懸掛著彩色風箏。但將近十年的時間過去，政權也已易手，敦阿都拉薩的內閣認為這些展品經已不足以代表馬來西亞。尤其是在一九六九年的種族騷亂之後，政府急欲重塑並向世界展示馬來西亞

11 馬克．克林森（Mark Crinson）在他的書中討論了這種中庭空間的作用，但他的討論並不是從這個空間作為代表中心的排列上的偏差和世代承襲的不平等角度來出發的。參閱馬克著作 *Modern Architecture and the End of Empire*, pp. 122-123.

多元種族及日漸進步的形象，也需要在一九七三年石油危機爆發時維持經濟競爭力。最後的展館簡介如下：

「在啟用目前的展館時，馬來西亞政府渴望以任何方式呈現馬來西亞，儘管嚴格上來說還屬第三世界國家，但已經有先進的政治和工業發展，並也是一個熱情洋溢、機遇處處的國度。」[12]

馬來西亞展館被命名為「Malaysia Exhibit」（「馬來西亞展覽」）或「Instant Malaysia」（「即知馬來西亞」），一九七三年開始在英聯邦研究所設展。馬來西亞政府拒絕了當時的駐館展覽設計師加德納的設計，要求以另一個設計替代。最終欽定建築電訊學派（Archigram，或譯作「阿基格拉姆集團」）設計，他們是一九六〇年代最著名和前衛的設計集團。丹尼斯．克隆普頓（Dennis Crompton）擔綱主要設計師。他依稀記得當時他和馬來西亞政府派出的代表小組，以及從一九七一年起擔任英聯邦研究所副所長的弗雷德．萊特富特（Fred Lightfoot，一九二三至二〇一九）一起工作。[13]他們先召開一次會議，會議上有一位馬來西亞資訊部的代表先講解展出內容及如何在新展館設計中展示這些內容。不可思議的是，這位代表還向克隆普頓展示建築電訊學派的先前設計作品。克隆普頓這麼描述那場會議：

「我完全沒料到他會向我們展示那麼多我們之前的作品。多數都是從雜誌上摘錄下來的照片，而我認為他不知道這些都是我們的作品。當時，他展示了一系列建築繪圖，根本沒意識到自己是在向畫出這些圖的人說話。我們只好有禮貌地回答：『是的，我們絕對可以做出這樣的作品，因為這是我們一直在做的東西。』」[14]

促成這一系列事件的人應該是拿督魯斯蘭．卡立德（Dato' Ruslan Khalid，一九三三至二〇一二）。他在一九六〇年代加入赫赫有名的建築聯盟學院（一九六八年度文憑畢業生）和建築電訊學派，並在回憶錄中表示自己「很幸運能夠有機會從旁觀察他們工作，甚至能小部分參與他們的創意作業」。[15] 他在英國時經常出沒於馬來亞交誼廳（Malaya Hall），並在那裡認識

12 *Domus* No. 535. May 1974. pp. 28-29.

13 Allen Cobbold. "Fred Lightfoot Obituary." *The Guardian Online*. 14 Oct 2019. 萊特富特所策劃的主題式、觸感式及沉浸式展覽，影響了許多文化、教育及藝術後羣組織的運作形式。

14 專訪丹尼斯．克隆普頓，二〇〇三年九月十一日。克隆普頓表示這名資訊部代表無意間在投影片裡展示了建築電訊學派之前的作品。

15 Ruslan Khalid. *Quest for Architectural Excellence: a Malaysian Experience*. pp. 69, 70 and 295: 《*A Architecture*》第四十八頁計聞，二〇一三年一月：「拿督魯斯蘭．卡立德教授曾經在一九六〇年代參與建築電訊學派，以及在一九七三到七八年間於建築聯盟學院及樸茨茅斯大學執教。」

了諸如加沙里沙菲宜（Ghazali Shafie）、東姑阿末利濤丁（Tengku Ahmad Rithauddeen Ismail）等後來的馬來西亞領導人，尤其東姑阿末甚至還在魯斯蘭的公寓裡住了一段時間。沙菲宜於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七四年擔任大馬新聞部長，一九七四年至一九七五年則由東姑阿末繼任。

克隆普頓和羅恩・赫倫（Ron Herron）負責整體設計，其他成員包括負責圖像設計的肯尼・阿林森（Ken Allinson）和攝影師凱蒂・杜威（Katie Dewey）；弗蘭克・紐比（Frank Newby）主管結構和環境工程工作，並聘請承包商來打造展館。[16]

馬來西亞展館位於研究所的第三層。如克隆普頓所描述，它引人注目的程度是「不管你站在研究所的哪一個角落都不會錯過這個空間」。[17]展館內較矮的空間是展廳，展出講解各種資訊、張貼圖像和擺放模型的展板；展館頂部空間則是模擬各種氣候狀況的氣候模擬器。而馬來西亞展館位於研究所高樓層的部分原因，是因為需要預留空間來容納這個氣候模擬器。

展館設計在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完成，一年後就竣工。設計概念善用了「帳篷形」屋頂下的寬敞空間，創造了一個分為上下兩層的「合併」空間，以「模擬馬來西亞的真實氣候和彷彿身在馬來西亞的體驗效果」為設計方向。展架上並列著文本、圖像和其他「實物尺寸的、放大尺寸的、微型尺寸的、彩色的、黑白的、相片的、文本的、聲音的、發光的、杜撰的、轉眼即逝的、堅固的、恒久流傳的……展覽材料」。[18]

訪客從研究所二樓拾級而上，就會抵達馬來西亞展館的「前面」入口，在香港展館和汶

築展館的中間。一個黑色的「MALAYSIA」大字，嵌在兩個菱形底板上，就在展館「前面」向訪客宣示展館國家名稱；同時又有另一個霓虹燈箱閃爍著一樣的字眼，俯瞰著中庭。接著訪客就會進入檸檬綠牆色、上方懸掛著被削圓了邊角的長方形艙室的樓閣裡，尾端有兩個圓柱形樓梯支撐整個空間結構。[15] 在這個組合空間的後方是一面長長的展示牆，相連研究所屋頂底部，與幾根狹長的圓柱相鄰。在面向訪客的牆面上，裝置了一堵把各種建築物、人像剪輯在一起的黑白照片牆，各張照片中有不同規模的人群，看起來相互交融、形態各異，但剪輯合成的邊緣卻也用了細細的白邊劃分開來。

展館的下層展現了馬來西亞的各個面向，符合了英聯邦研究所展覽預期的目的。另外，展館內也設置了一個由訪客主導的自動詢息檢索系統，命名為「Instant Malaysia」（「即知馬來西亞」），為訪客提供建築電訊學派所強調的即時兼深入的資訊。而呈現資訊的方式則

16 根據《Domus》雜誌的一篇文章，設計團隊成員包括建築電訊學派合夥人如肯．艾利森（Ken Allison）、戴安娜．周希（Diana Jowsey）、凱蒂．迪維特（Kathy de Wit）和凱特琳．艾文思（Katherine Evans）。摘自 "Malaysia Pavilion – Commonwealth Institute, London." *Domus* No. 535, May 1974, pp. 28-29.

17 出自二〇〇三年九月十一日和丹尼斯．克隆普頓的專訪。

18 同上註。

19 其他較小的柱子也在各個支撐著上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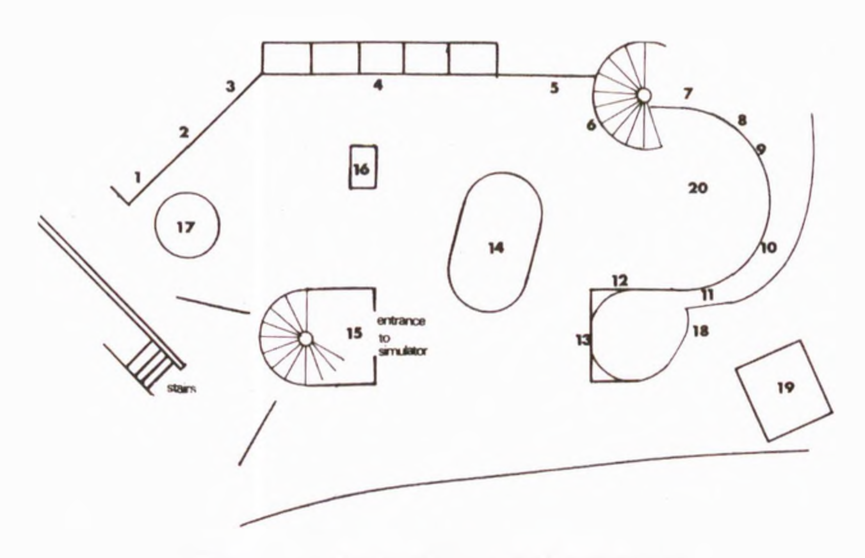


圖20.1：展館廳顯示整個布局的底層平面圖

1、歷史與文化
2、錄音帶與投影片專區
3、記錄：政經文教
4、圖片與文字記錄：政策和規劃、通訊設備、房屋政策、衛生水平、福利設施、教育制度
5、農業
6、記錄：一級產業
7、圖片與文字記錄：棕油生產
8、圖片與文字記錄：石油
9、圖片與文字記錄：黃梨（鳳梨）與胡椒
10、橡膠生產
11、錫礦開採和加工
12、工業產品展示
13、地理風貌
14、動植物模型
15、氣候模擬器（最高樓層）
16、馬來西亞國會大廈的建築模型
17、藝術與美工作品
18、首都的文物和筆記
19、馬來西亞三維地圖
20、二級產業圖（最高樓層）展覽廳平面圖

區分了每個設計師對圖像質量和清晰度的切入點，分別以圖表、地圖、插圖、相片和文字的形式來呈現內容。

至於讓這個國家看起來又民主又進步的歷史記載、地理風貌、施政和計劃中的政策、通訊設備、房屋政策、衛生水平、福利設施、教育制度等等資訊，都在「圍繞」著整個展館的不同主題展板上被論述了一番。

棕油、石油、黃梨（鳳梨）和胡椒、橡膠和錫礦也都被編入同一組，被展示在高聳的展板上。還有三個被隨意立起的展板，展示的是藝術和美工作品、一幅馬來西亞三維地圖、一座馬來西亞國會大廈的建築模型；一尊矗立在展館中央的「立體透視模型」，則拼接了樹桐、枝椏和蕨類植物的模型，向上延伸到懸在半空中的長方形艙室的底部，下方則有一塊小草坡，坡頂坐著一頭鼠鹿模型。這些擺設都代表著馬來西亞的動植物種類。[20]

建築形式在展館內的呈現方式

馬來亞最早在倫敦被「代表」的經歷，是在一八五一年作為「印度群島」的一部分在海

20 馬來西亞國會大廈的模型可能是一九六四年紐約世界博覽會上的其中一件展品。

德公園的萬國工業產品博覽會（Great Exhibition）中出現，和爪哇島、婆羅洲、蘇門答臘島、西里伯斯島、新加坡、馬六甲及其他印度洋上的島嶼一起在「農業及工業實踐」的類別中並列。[21]另外，一八八六年的殖民地及印度博覽會（The Colonial and Indian Exhibition），還有一九二四到二五年間在溫布利公園舉行的大英帝國展覽會（British Empire Exhibition），這兩個前例給新加坡和馬來亞在帝國研究所設展貢獻了豐富的館藏。

一九二四年大英帝國展覽會的馬來亞展館建築形式曾經引發一系列棘手問題，因為它的建築形式引發了諸如印度—撒拉遜建築風格（Indo-Saracenic，或印度—伊斯蘭（Indo-Islamic）以及摩爾式建築風格）等從印度發源的建築風格，如何被應用到各個馬來西亞城市（如吉隆坡、瓜拉江沙）的官方建築物中的深入討論和比較。

雖然已經正式委任辛普森（Simpson）和艾爾頓（Ayrton）來負責設計展館，但是A.B.哈貝克（A.B. Hubback）也在這其中貢獻良多。哈貝克也是設計出包括烏布迪亞回教堂（Ubudiah Mosque）在內馬來亞絕大部分政府建築物的建築設計師，而他為烏布迪亞回教堂設計的圓頂和尖塔也成為此次馬來西亞展館的參考範例之一。而英聯邦研究所內馬來亞展館的位置和印度展館正成對角，兩邊都有類似的圓頂、尖塔、前庭，導致空間比較的討論被迫發生。這也反映了為兩種截然不同的文化和社會，創作相似的帝國形象和建築形式的艱難困境。

英聯邦研究所馬來亞展館的早期草圖顯示了不少從往期展覽借鑑和考慮採用的設計元素，

形成一長串的引用註腳。這些元素包括設計幾台巨大的扇子模型來遮掩氣候模擬器。一九二四年大英帝國展覽中的馬來亞展館內部，也放了二十五棵插在裝飾花盆裡的人造油棕樹，以達到遮掩柱子的用途。Kelvin Chuah 在他的論文中也認為，用對角面來「遮掩」展館器材的做法，靈感可能是來自馬來亞本地的房屋樣式。[22]先前馬來亞參加過的展覽都或多或少借鑑了或以馬來亞本地房屋的樣式為基礎，例如一八八六年殖民地及印度博覽會裡出現的 Perak House（霹靂屋）、一八九三年哥倫布紀念博覽會裡出現的 Johore Pavilion（柔佛展館）、一九三九年三藩市金門世博會的 Johore Pavilion（柔佛展館），還有最新的一九六四年紐約世界博覽會的馬來西亞展館。在最終成品裡，這些參考部分都只是被概要地應用其中而已，而不是像往期展覽前輩們一樣直接大剌剌地套用，這也讓展覽整體的表述風格更獨樹一幟。

由於三年前（一九六九年）的馬來西亞，才因為發生種族騷亂事件，大傷國內的和平穩定，加上這場騷亂也把此前馬來西亞政府作為英聯邦成員的出色表現，包括成功在吉隆坡主辦一九六三年第九屆英聯邦議會會議的輝煌成績給一併抹除，因此把馬來西亞展館描繪及投

21 *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31 May 1851, pp. 489-90. 這篇文章表示多數的展品都是由砂拉越及新加坡執政當局貢獻的。

22 Kelvin Chuah, "Instant Malaysia: Imagining a Nation at the Commonwealth Institute," *British Art Studies*, Issue 13, https://doi.org/10.17658/issn.2058-5462/issue-13/kchuah

射成一個多元種族的國度，已經是一個不言自明的要求。

克隆普頓在一九七二年五月到訪馬來西亞時，已經從他所遊歷的各個大城小鎮切身體驗到一切回歸平靜後的種族和諧局面。當時被派去為他伴遊的是一名印度裔的公務員，他也在旅程中受到馬來人、華人及印度人的熱情接待。他的實地考察也發現不同種族在日常生活中確實已能夠和平共處，其中令他難忘的一次印象，是在檳城吉寧萬山（Chowrastra Market，「萬山」在當地是指「菜市場」）親眼看見印裔小販穿著印度傳統服裝在華人住宅區旁開檔的景象。[23]

克隆普頓也留意到街道上存有的現代性：「年輕美麗的女子走在吉隆坡的街道上，穿著的不是馬來傳統服裝，而是和當時倫敦、巴黎或紐約街頭上的漂亮女子沒有兩樣，當時的著裝時尚等各方面生活習慣就是這麼國際化。和其他伊斯蘭國家一樣，國教的底蘊依然無處不在，可是在像馬來西亞這樣的民主國家，伊斯蘭的痕跡並不明顯。」[24]

展館最終採用和付諸實現的設計中，展館最顯眼的位置都用馬來西亞國民在進行各種活動的頭像及簡介拼貼成照片牆。無數巨大及微小的個人頭像，和群眾影像並列成一幅巨大的葉片形或「片狀木瓜」形的展板，是吸引訪客走進這個展館的第一個畫面，也是反映種族共存共榮的有力示意。下層展館則以密集的文字和圖像，解說工業、農業、開發建設及旅遊發展的內容；還有重要內容如人口組成、教育方針和未來潛能的說明，不止加強這個國家的公

信力，也從另一個角度與其他展館的類似展覽形式相呼應。

氣候的呈現：氣候模擬器

展館上層是一個艙室，裡頭的溫度可以調節成各種模擬體驗模式。這個艙室被英聯邦研究所稱為「模擬器」，它的內部配備了人工加熱器和通風系統，同時設有一個全景多螢幕視聽系統，以投射影像到垂直牆面上。訪客自艙室較短那邊的門口進出，以參與特意為訪客設計及重現的「身在馬來西亞的視覺體驗、聽覺體驗、感覺體驗及完整氣候體驗」節目。

> 「艙室一次可以容納大約十五個人一同完成總長十五分鐘的節目編排。彩色投影片被投射在牆壁鑲嵌的八塊螢幕上，裡頭描繪了馬來西亞一天內的各種場景和日常生活面向。除了開頭的簡介以外，整個節目沒有解說旁白，只有各種音效和配樂。馬來西亞的各種氣候情況，從清涼海風、到潮濕炎熱及熱帶暴雨也都完整重現，以達致最接近親身

23 出自二〇〇三年九月十一日和丹尼斯．克隆普頓的專訪。

24 同上。

遊歷的體驗效果。……幼齡訪客如果坐在艙室地上，甚至可以看到（或更舒適地體驗到）更多節目細節。」[25]

克隆普頓的「環境外皮」（environmental envelope）設計靈感來自他一九七二年五月的馬來西亞之行。此行讓他發現馬來西亞的氣候必須在展館中以觸覺的方式呈現，尤其在他一落地就馬上感受到馬來西亞的氣候衝擊撲面而來：

「所以最後，我去了吉隆坡。我記得很清楚，飛機降落在吉隆坡機場，機門打開，我往那走去……而那是機場還沒有使用密封式下機走道的年代，你得從樓梯走下飛機。在那瞬間我好像穿過一堵又濕又熱的空氣牆，這是我從來沒有經歷過的。」[26]

克隆普頓此行非常重要，他向政府部門收集到更多文件和材料，也代表展館設計團隊到馬來西亞作實地考察。十天行程裡，他從吉隆坡前往亞羅士打、檳城、金馬崙高原，然後再到東海岸，走訪各個主要城鎮、工業和文化活動，親身遊覽及經歷各種景觀、文化和小氣候。他所感受到的事物，大部分都在經過篩選後濃縮到展板上和氣候模擬器裡，打造了真正的馬來西亞「即時」體驗。氣候模擬器主要選了三種克隆普頓有過的經歷：「降落梳邦國際機場

就撲面而來的「炎熱潮濕海平面氣候」、金馬崙高原的山中小鎮及茶園的涼爽氣候、「猛烈」的東海岸吉蘭丹和登嘉樓的季候風吹襲氣候。[27]

「回到英國時，我告訴團隊，不管我們放了什麼，都不可以在向英國學生介紹馬來西亞時略過馬來西亞的氣候情形。你不能直接告訴他們馬來西亞常溫介於華氏八十五到一零五度之間，濕度是百分之九十五。這些數字是沒有意義的，我們必須展示給他們看。

25 摘自英聯邦研究所發行的《馬來西亞、新加坡、香港及汶萊——給老師的學習資源指南》(*Malaysia, Singapore, Hong Kong and Brunei – A teacher's guide to study resources*)。投影片裡把馬來西亞國旗與很多不同的影像並列呈現：山林；野生動物、鳥類、蝴蝶和花卉；林業；油棕園及相關工廠；橡膠園及橡膠加工廠；鬃達水壩及灌溉計畫、稻米生長及收割；蠟染工藝；錫礦業及錫器工業；疏浚和冶煉；混合工業；男女老少；早市和夜市；娛樂活動、皮影戲；音樂和舞蹈、慶典遊行；宗教、華人及興都廟、回教堂、佛教寺廟；暴風雨；涼爽的水下場景及漁民；馬來西亞人民。一輪節目的實際時長是十二分鐘，告示上注明的十五分鐘時長是計入了訪客出入館室的時間。

26 出自二〇〇三年九月十一日和丹尼斯．克隆普頓的專訪，他描述了他第一次在梳邦機場下機時深刻難忘的感受，這份感受最後也化為建築電訊學派為英聯邦研究院馬來西亞展館設計的氣候模擬器。無獨有偶，長居倫敦後返馬的魯斯蘭．卡立德也描述了同樣的感受：「當我停在飛機的台階上時，一股濕熱的空氣迎面撲來。」Ruslan Khalid, *Quest for Architectural Excellence: a Malaysian Experience*, pp. 140.

27 這段描述出自二〇〇三年九月十一日和丹尼斯．克隆普頓的專訪。他十分惋惜當時沒能在氣候模擬器裡一併呈現馬來西亞的氣味體驗。

最後，我們說服英聯邦研究所和馬來西亞政府出資購買一個氣候模擬器，而這模擬器也確實成為展覽的主要元素。這個模擬器的的確確非常耗電、消耗很多能源，但你一走進去，不到兩分鐘，你就會完全感受到我在馬來西亞親身經歷的切身感受。」[28]

多個魚眼鏡頭在模擬器地板角落，往後方的多個螢幕投放馬來西亞的影像，和模擬器的三段節目及配樂同步呈現。由於這是個充滿同步視覺影像和環境變化的密閉空間，因此裝置了扶手讓訪客有所支撐。訪客會在裡頭的十二分鐘內體驗到一萬公里以外這片土地的氣候狀況，他們彷彿被轉送到一個觸感真實、曾是大英帝國一份子的遙遠土地。而這個氣候體驗，和他們「平平無奇」的倫敦氣候相比，完全是天差地別。[29]

結語

在英聯邦研究所被改作其他用途之前，裡頭的展館默默服務了超過二十年的歲月。一九九三年，英國外交部宣布終止挹注用以維護研究所的撥款，因此在一九九六年，所有展館都已經撤出研究所大廳。[30]馬來西亞展館不論是在知名度還是展出效果上，都非常成功地向倫敦民眾營造了馬來西亞的國家形象。這是因為一九六五年的新馬分家事件，還有一九六九年的五一三種族騷亂事件，不只改變了這個國家的政治、經濟和社會，也影響了它在英聯邦、

聯合國等組織的形象。

與其他展館一樣，馬來西亞展館所展出的文字、數據和影像都向訪客介紹及導覽這個英聯邦成員。展館內不同比例大小的馬來西亞人民影像，是在說明儘管兩年半前這個國家才因為死傷慘重的暴力騷亂而停滯不前，但是現在它的多元種族人民已經可以和平共處。而它的工業、農業及其他領域的表現也都列席於展館中，以隱射它是個足以躍上世界舞台的進步及發展迅速的國家。

通過展館設計工作，建築電訊學派也成功以多樣化的展覽元素，輸出一個涵蓋各方面國情的「即時」訊息。他們的設計和圖像元素讓這個展館得以鶴立雞群，而氣候模擬器的應用則證明了這種前所未有的模擬環境空間，可以既便攜又能夠自給自足。因此你真的可以告訴別人，你能夠隨身帶著天氣同行。[31]

28 出自二〇〇三年九月十一日和丹尼斯・克隆普頓的專訪。

29 同上。「倫敦有時下雨，有時晴朗；有時會不尋常地暖和，有時又不尋常地寒冷；但基本上還是十分平平無奇。但當你身在像吉隆坡、台北、上海或首爾這樣的城市，（當地的天氣）成了其中一個旅程體驗。」

30 二〇二〇年十月摘自英國建築機構二十世紀學會（Twentieth Century Society）網站：https://c20society.org.uk/lost-modern/commonwealth-institute-london

31 這篇文章的標題〈Take the Weather with You〉是搖滾樂團 Crowded House 的《Weather with You》一曲中的其中一行歌詞，這首歌收錄在該團的一九九一年發行的第三張專輯 *Woodface*。



圖20.2：英聯邦研究所（The Commonwealth Institute）外觀。



圖20.3：英聯邦研究內部空間，無展品。

賴啟健作品

專書

Ambrosia for the People: Hawker Centre Food (with Koh Hong Teng). Singapore: Achates 360. Singapore. 2021.

Early Hawkers in Singapore 1920s to 1930s. Singapore: Focus Publishing and the National Heritage Board. Singapore. 2020.

Singapore Chronicles: Architecture (part of a series to commemorate SG50). Singapore: Institute of Policy Studies. 2019.

The Merdeka Interviews: Architects, Engineers and Artists of Malaysia's Independence (in collaboration with Ang Chee Cheong). Kuala Lumpur: Persekutuan Akitek Malaysia and KLAF. 2018.

Recollections of Life in an Accidental Nation. (by Alfred Wong, edited by Lai Chee Kien). Singapore: Select Books. 2016.

The Garden of Foolish Indulgences. (graphic novel, executed by Oh Yong Hwee and Koh Hong Teng, based on essay by Lai Chee Kien). Singapore: Pause Narratives. 2016. 繁體中文版《尋找愚趣園》(台北：季風帶文化，二〇二二)。

Building Memories: People, Architecture, Independence. (art book, in collaboration with Yeo Yeok Chuan and Koh Hong Teng). Singapore: Achates 360, 2016. [Book of the Year, Singapore Book Publishers' Awards, 2017]

Through the Eyes of Lee Kip Lin: Photographs of Singapore 1965 - 1995. Singapore: National Library Board, Singapore, and Editions Didier Millet, 2015. [Best Non-fiction Title, Singapore Book Publishers' Awards, 2016]

Last Train from Tanjong Pagar. (graphic novel, in collaboration with Mr. Koh Hong Teng) Singapore: Epigram Books, 2014.

Cords to Histories（《歷史的臍帶》, In English and Chinese）, Foong Shoon Fui Kuan books on art and culture, vol. 10, ed. Chong Wen Ling. Singapore: 豐順會館 , 2013.

Building Merdeka: Independence Architecture in Kuala Lumpur, 1957-1966. Kuala Lumpur: Petronas, 2007. 138 pp. (The book accompanies an exhibition featuring the same 10 projects).

Marco Hsu. *A Brief History of Malayan Art*（譯自《馬來亞藝術簡史》）. Singapore: Millennium Books Singapore, 1999. 168 pp.

The Purple Orange: Notes On The Universe, School, Design Needs, Bodies And Paraphernalia. (as editor) Singapore: NUS Architecture, 1991.

"Malaya in Art and Architecture." *Revisiting Malaya: Uncovering Historical and Political Thoughts in Nusantara.* pp. 135-157. ed. Show Xing Yin and Ngoi Guat Peng. Petaling Jaya: Strategic Information and Research Development Centre, 2020.

"Murals as Projections: Readings of Figural Images in Kuala Lumpur, 1957-1969." *GRUP: Gerak, Rupa, Ubur, dan Penyataan 1957-1973.* pp. 34-49 [Malay version pp50-70]. ed. Rahel Joseph. Kuala Lumpur: IB Tower Gallery Sdn Bhd aka Ilham Gallery, 2017.

"Camp Architecture: Places and Home." *Giving Strength to our Nation: the SAF and its People.* pp. 103-109, ed. Goh Eck Kheng. Singapore: Landmark Books, 2015.

"Imagining Nanyang: the Framing of Southeast Asia in Wong Kar-wai's movies." *Asian Cinema and Space: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109-125. ed. Lilian Chee and Edna Lim. Routledge, 2015.

"Epilogue." *Iversen: Architect of Ipoh and Malaya,* Ruth Iversen Rollitt, 213-4. Penang: Areca Books, 2015. 2 pp.

"Malaysia Sojourn." *Our Modern Past: Singapore Architecture 1920s-1970s.* Singapore Heritage Society, 2014.

"The Nation and Its Murals: A Reading of Figural Images in Malaysia, 1957-69." *The Nation: Narratives and Communities in the Asia Pacific.* ed. Norman Vasu, Yolanda Chin and Kam-yee Law, 30-54. Comparative Development and Policy in Asia, ed. Ka Ho Mok and Rachel Murphy. Oxford: Routledge, 2013. 25 pp. (Reading

of murals and nation building in Malaya / Malaysia.).

"Sonny Chan: Situating Architectural Worlds." *Green Ink on an Envelope: The Architectural Practice of Chan Sau Yan Sonny*. ed. Ho Weng Hin and Tan Kar Lin, 24-27. Singapore: Singapore Heritage Society, 2013. 4 pp. (This chapter traces the early life, education and work of architect Sonny Chan.).

"Filtered Cosmopolitanism and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 Metropolitan Region*. 153-154. Singapore: Centre for Advanced Studies in Architecture, DOA, NUS, 2013. 2 pp.

"Ventilation Blocks and Their Use in Southeast Asia." *Casting Architecture: Ventilation Blocks*, 23-27. Singapore: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2013. 5 pp.

"Rambutans in the Picture: Han Wai Toon and Overseas Chinese Space in Singapore." *Singapore in Global History*, ed. Derek Heng and Syed Muhd Khairuddin Aljunied, 169-195.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11. 27 pp. 中譯版〈畫框裡的紅毛丹——韓槐準與華人在新加坡的空間表達〉收入《尋找愚趣園》(台北：季風帶文化，二〇一一)。

"Architecture at the intersection of Industrial and Biological Worlds: Dialogue about Architecture in Singapore between Tay Kheng Soon and Lai Chee Kien." *New Asia Regionalism in Global Context*. ed. Lin Jyhe-Song. 34-44. Taipei: Taiwan Architects Association, 2008. (In English and Chinese). 11 pp.

"Foreign Accents." *Singapore: Views on the Urban Landscape*. ed. Lucas Jodogne. 98-112. Antwerp: Pandora Books, 1998. (In English + Chinese dialects). 15 pp.

"A History of Private Housing Estates in Singapore." *Singapore Architect.* No. 7/2017: 33-40. (Singapore).

"The Path Less Travelled: No. 11 Geylang Lorong 24A."*Singapore Architect*, no. 273 (The New Conservators) (2013): 64-73. (Singapore).

"Post-tropical/post-tsunami: Climate and architectural discourse in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 (co-written with Anoma Pieris). *Singapore Journal of Tropical Geography*, Vol. 32, no. 3 (2011): 365 - 381. (United Kingdom).

"Southeast Asian Spatial Histories and Historiographies: a re-examination." *The 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chitectural Historians,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SAHANZ)*, 19, no. 2 (2011): 82-105. (Australia).

"Maidan to Padang: Reinventions of Urban Fields in Malaysia and Singapore."*Traditional Dwellings and Settlements Review*, 21, no. 2 (Spring 2010 2010): 55-70. (United States)

"Beyond Colonial and National Frameworks: Some Thoughts on the Writing of Southeast Asian Architecture."*Journal of Architectural Education*, 63, no. 2 (March 2010 2010): 74-75. (United States)

"Maidan-Padang-Bay: reinventions of urban fields in Singapore." *Chinese Architect* (also titled Taiwan Architect), 425 (Haptic Cities - Singapore) (2010/05 2010): 109-113. (Taiwan). (In Chinese).

"Cosmopolitanism and Southeast Asian Cities," *Dialogue*, 130 (Cities Inspiring, Asia) (2008 2008): 28-35. (Taiwan).

"Singapore: Towards Another Botanical Age." *Dialogue*, 129 (Singapore Re-discovered) (2008): 104-113. (Taiwan).

"A 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Mount Emily area." *Singapore Architect*, 243 (2008): 64-71. (Singapore).

"Botanical Imaginations of Southeast Asia in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ies," *Singapore Architect*, 233 (Landscape and the Garden City) (June/July 2006 2006): 70-79. (Singapore).

"Multi-racial Enclaves: an examination of early urban settlements in Singapore," *Dialogue*, 78 (Singapore) (2004): 28-39. (Taiwan).

"The Kopi Tiam: some reflections on an everyday space," *Singapore Architect*, 212 (Everyday Structures) (2001): 115-119. (Singapore).

"Thoughts about nature: a conversation with Iskandar Jalil," *Singapore Architect*, 203 (Architecture and Ecological Design) (1999): 128-131. (Singapore).

"200 issues of the SIA Journal: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Singapore Architect*, no. 200 (1998): 104-107. (Singapore).

"Deducing from Balimbing: Measuring a Minangkabau House,"*Architecture Journal*, (1993 1993): 59-69. (Singapore).

學術論文（未發表）

Concrete / concentric nationalism: The architecture of independence in Malaysia, 1945-1969.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Berkeley, United States. 2005. 368 pp.

Raft and Roof: Constructions of Bound Space in Six Sumatran House Forms. M.Arch thesi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1995. 158 pp.

譯者

黃智煒：〈東南亞理論的實驗性應用〉、〈想像十九與二十世紀的東南亞園藝景觀〉、〈在商業利益及多元種族之間：檳榔嶼和新加坡的早期殖民地景觀構築〉、〈帶著天氣同行：英聯邦研究所中的馬來西亞展館〉

曾寶貝：〈東南亞空間歷史與史學〉、〈東南亞通風磚的使用〉、〈新加坡：邁向另一個植物時代〉、〈新加坡的合作社房屋〉、〈圖畫中的空間：勘察新加坡國立大學博物館收藏裡的建築與風景〉

劉德豪：〈世界主義與東南亞城市〉

洪菀璐：〈熱帶的隱喻：濕熱氣候下的建築政治〉

王筠婷：〈從馬坦到大草場：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大都會裡大草坪的進化過程〉、〈三大國家建築項目〉

陳丹楓、林欣慈：〈畫框裡的紅毛丹——韓槐準與華人在新加坡的空間表達〉

陳丹楓：〈鐵路祕境：回憶新加坡的鐵道與車站〉

林方良：〈新加坡私人住宅回顧〉

李彬勁：〈哲學饒舌與詩詞歌曲——中華文化中兩種跨界的文本〉

林仁余：〈好萊塢膠卷中的新加坡〉

林欣慈：〈想像南洋：王家衛電影中的香港及東南亞〉、〈藝術與建築中的「馬來亞」〉

歷史的臍帶

東南亞建築與生活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CIP）資料

歷史的臍帶：東南亞建築與生活／賴啟健著；黃智煒、曾寶日、劉德豪、洪菀璐、王筠婷、陳丹嵐、林欣慈、林方良、李彬勤、林仁余、遜雪風麟譯．-- 初版．-- 臺北市：季風帶文化有限公司出版；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發行，2021.11

520面；21公分

ISBN 978-986-06111-3-7（平裝）

1.區域研究 2.文集 3.東南亞

738.07　　110017834

作者　賴啟健
譯者　黃智煒、曾寶日、劉德豪、洪菀璐、王筠婷、陳丹嵐、林欣慈、林方良、李彬勤、林仁余、遜雪風麟

總編輯　鄺健銘
編輯　高慧鈴
封面設計　陳敬龍
內頁排版　高慧鈴
圖片提供　賴啟健
校對　翁躍敏、遜雪風麟、林欣慈

發行人　林韋地
出版　季風帶文化有限公司
地址　103台北市大同區迪化街一段198號
電話　+886-2-87328546
電郵　monsoonzone.pub@gmail.com
臉書　季風帶
印刷　沐春行銷創意有限公司
發行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初版一刷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
定價　新台幣五九〇元



賴啟健是建築與城市歷史學者，專精於二戰後新、馬兩地的建築研究，本書所收篇章皆為作者積累多年的學術成果，是一部圍繞東南亞建築、史地、文化研究，涵蓋熱帶植物、文學活動、氣候、電影與藝術等領域的文集。

本書共收二十篇文章，共分四輯，內容包括：一，東南亞在理論、歷史編纂、生物地理學和熱帶地區的不同面向；二，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特定空間歷史；三，歌曲、電影、藝術和壁畫的文化功能；及四，國家民族形成的時刻，其首都城市、周邊地區及整個世界之間相互關聯的建築概念。

書名「歷史的臍帶」表明了作者的歷史觀。他認為，歷史是一條繩索（臍帶），連結過去與現在。他長期研究新馬兩地的文化歷史，就像「臍帶」將養份輸送到分隔的兩地。

季風帶
monsoon books

ISBN 978-986-06111-3-7 00590
9 789860 611137
定價NT$590